

戏如人生的悲怆之歌

——吴天明电影《变脸》《百鸟朝凤》细读

杨光祖,刘璐

(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兰州 730070)

摘要:导演吴天明的电影集中反映了西部在现代化浪潮中的挣扎、焦虑和巨大变迁。综观他执导的电影《变脸》和《百鸟朝凤》,可看出他前后期电影风格的变化,《变脸》呈现了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艺术手法精湛;《百鸟朝凤》则表现出了执导者视野的“窄”与思想的“浅”,如在世界文化大融合的趋势下,影片表现更多的是对西方文化不理智的否定。

关键词:吴天明;《变脸》;《百鸟朝凤》;现代化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5.001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5-0001-05

第四代导演吴天明的遗作《百鸟朝凤》上映以后,引来了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人们对于该电影的评价也是处于两个极端。而为了电影上映,主创人员“下跪”事件,更让《百鸟朝凤》一时处在全民关注的热浪之中。

众所周知,吴天明为西部著名导演,是中国第四代导演的杰出人物,曾担任西安电影厂厂长,提携了一批年轻导演。1984年执导的影片《人生》引起轰动,好评如潮,获得了第八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1988年导演了电影《老井》,获得第八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第七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谈到吴天明及其对华语电影的影响,李安感慨万千:“我在多年前,曾经在纽约跟吴天明导演有一次促膝长谈,那次长谈对我来讲非常有启发性。我对吴导演以及他的作品,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他真是一位在我们中国电影界里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没有他就没有第五代导演,没有第五代电影,也就没有现在电影这样的盛况。”^[1]

吴天明的早期电影《人生》《老井》《没有航标的河流》,都是很优秀的影片,如今看来,依然如此。这几部影片也催生了一大批评论文章,从多个层面

论述了影片。我们今日再看这几部影片,仍然为西部人的生存状况的恶劣而颤栗。我们观看《老井》时,总想起女作家萧红的《生死场》,萧红描写农村人的愚昧、麻木,都到了某种让人吃惊的地步。在封闭的村落中,人们停滞不前,动物式的生存方式的确令人吃惊。因为没有接触先进的思想和事物,人们的精神世界极度匮乏,这样促使他们的行为野蛮无理。当然,也为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努力而动容。《老井》相对于《生死场》,当然有了时代的进步。吴天明这几部电影对时代的反思,对社会的思考,对人性的拷问,都是一般导演无法企及的。他后期拍了一些主旋律的影视作品,因为不是自己的特长,以及别的一些原因,虽然有一定的艺术性,但和他的这几部早期作品相比,就有很大的差距,反响也不大。

一、拨开黑暗的面纱——

现代化语境下对男权文化的批判

我们这里只谈他的两部晚期作品《变脸》《百鸟朝凤》。这两部作品都是以中国传统民间艺术为题材,皆具有忧患意识,但取向却大不相同。《变脸》

收稿日期:2017-08-10

作者简介:杨光祖(1969—),男,甘肃通渭人,文学评论家,现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影视批评、艺术理论。

通过变脸王的苦难人生,写出了生命的无奈,写尽了下层人的悲凉。《百鸟朝凤》却试图通过唢呐艺术的日渐衰微,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主题相对狭窄,艺术表现也一反《变脸》的平易中见深刻,而显得仓促、踉跄,尤其电影的后半部分艺术性较低,与前半部分相差甚大,不像一个导演的作品。这让我们怀疑《百鸟朝凤》的后半部分不是吴天明的作品,可能是别人的续作。当然,笼统地说后半部分,也不是很准确,比如师傅醉酒吹唢呐那段,应该是吴天明的。当然,我们知道电影是有分镜头剧本的,不会一定按照故事情节从前往后拍,有时候会按场景拍,因为造一个景不容易。但是,大略可以说后半部分很弱,尤其城里的那些段落,我怀疑不是吴天明导演的。不过,这里还是按吴天明的作品来讨论,因为标明的是吴天明导演。

《变脸》是一部以四川民间艺术变脸为主要线索的电影,影片中变脸王孤身一人,为了寻找一位可以传承香火的人,历经艰难险阻,差点搭上自己的性命。在影片中,变脸王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这门变脸技术,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民间很多艺术,对于性别都有严格的要求,从这些要求中,可以看出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这种思想在变脸王身上也有集中体现。

影片中,唱戏的花旦(梁老板)很欣赏变脸这门艺术,专门拜访变脸王,希望他能进入自己的戏班。可是变脸王拒绝了,因为他一人漂荡惯了,不习惯群体生活。电影中对于重视男性的传宗接代,我们作为21世纪的观众,既有相当的理解,也为这种文化所化之人而惋惜。“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乃至知识的工具,而且也是权力的工具。”不得不说,这些话语背后,隐藏着权力的关系。女性是在男性的话语里被建构,女性无法自洽。这里面体现了强烈的不平等。由于变脸王儿子离世太早,后继无人,他从人贩子手里买回来了一个孩子。变脸王以为孩子是男的,本想把自己的绝活传给这位认领的孙子。不料,在一次意外事件中,发现小孩原来是女孩,变脸王顿时万念俱灰。导演吴天明在此处设置的戏剧冲突点,让影片一波三折。变脸王的前后情绪的变化,也体现出了重男轻女文化带给人们思想的负担有多么可怕。当然,如果往深处思考,这里不仅仅是重男轻女,可能与艺人社会地位的卑微,与他们骨子里的生存恐惧感有关。古代艺人的生活非常艰难,一日不卖艺,可能就没有饭吃。一个家族的生存,可能就靠这个家族的独门艺术,如果传给女儿,那么就会随

着女儿的出嫁传到别的家族,无形中就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在古代那样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这种结局是绝对要杜绝的。

小女孩隐藏了自己的性别,被变脸王赎回家时,得到了他的关心。电影中有一场景,是小女孩生病十分严重,变脸王为了给她治病,半夜跑到当铺,当了他唯一的一件值钱的东西——一把祖传的刀,去给小女孩买药。他们住在小河边的船上,他抱着小女孩,灰蒙蒙的夜晚,让人很压抑。“心理学家发现,人们喜欢‘解释’构图线条,却消极地接受了颜色,容许它象征心境。也就是说,线条常与名词相联,色彩则与形容词相联。”^{[2]25}在影片中,导演善于运用色彩来烘托人物复杂的心理世界。上面所讲的场景,导演就运用了灰色调,带给观影者一种压抑沉静的氛围。再比如,影片最后变脸王获救,在这场拐卖人口的巨变中,他差点命丧黄泉,由于梁老板和小女孩的相求,加上师长的出手相求,他终于走出了死牢。变脸王感动于小女孩的仁心,最后决定传艺给她。影片遂以“大圆满”结束,影片的色调也由之前的灰暗转向暖色系。这也是人物心理的一种隐性表达。可以看出,人物内心的表达方式除了演员的表演之外,还有场景的色调转变,对于电影情节的发展也是一种诠释。

影片中有一场景是变脸王去寺庙求神送子,尼姑回答他,河边自然有后人。他回到河边,发现小男孩天赐在船上坐着,变脸王再一次情绪达到了顶峰。被拐卖七次的小女孩为了报答变脸王爷爷,在最后一次自己被人抢走的过程中,偶遇天赐这位少爷,然后凭着自己的机智,逃离人贩子的关押,为爷爷送去了一个真正的小男孩天赐。得到天赐的爷爷高兴得忘乎所以,他把天赐放在桌子上面。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的传统中,桌子上方是非常有权威性的位置。影片专门为小天赐这一坐,给了特写镜头,更加突出天赐的地位。影片中的人,上到达官贵族,下到平民百姓,重男轻女的思想渗透在每个人的骨子里。小女孩狗娃自己都说:“爷爷喜欢有茶壶嘴嘴儿的。”在小女孩的话语刚落时,影片镜头给旁边的茶壶嘴嘴儿一个特写,这也是画面与语言的呼应。而影片中小女孩的处境,也印证着这样的历史语境。“有时把‘女性世界’作为男性世界的参照物,但必须重申这种观点,女人始终没有真正作为封闭、独立的社会而存在,她们是人类社会无法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群体由男人支配,在社会中位于附属地位。”^{[3]224}这样的集体无意识是整个时代的思想,也是整个民族

的思想。女性作为“他者”，活在男性建构的话语体系中，然而中国社会一直以来都是由男性来主导。福柯提出的话语权力中就体现出，社会中一整套话语体系的建构，传递着统治者的思想。而影片中小女孩的处境，也印证着这样的残酷现实。

在这部影片中，吴天明导演有意打破封建迂腐的思想。影片最后，小女孩救了在监狱里的变脸王，在这一过程中，很难想象一个八岁的小女孩经历的艰难，甚至为了变脸王差点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最终变脸王被小女孩的行为所感动，把变脸的绝活传给了这个女孩子。这样的结局也是导演吴天明有意打破传统观念所设置的结局。在中国传统影片中，这种结局的设置也呼应了美满和大团圆。

从传承的角度来说，吴天明导演否定了重男轻女的思想，这样的结局也是民间艺术的一种出路，一代一代的传承艺术，不再分是男是女。这给民间艺术创造了一条健康的发展路径。

吴天明在一次访谈中说：“我的电影观就是真善美。”^[4]影片的主题体现了他的这一观点，小女孩为了变脸王的恩情，经历了千难万险去报恩。给观影者传递了一种普世价值观。就像影片中梁老板所说：“虽然世态炎凉，但是这样的恩情也算是让人有生活下去的念头。”封建的集体无意识不敌人间真情，这种突破也推动了民间艺术的进步和思想观念的革新。因为身处在现代的历史语境中，导演吴天明赋予小女孩反抗的精神。福柯曾经说过：“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小女孩的反抗和最终的继承，都打破了原有既定的规则，体现了对权威的解构，打破了神性，解放了人性，其中更多的是对女性观念上的解放。在影片中，导演吴天明对于影片中的故事和人物都赋予了新的理解和诠释，他的观念和思想深受当时历史语境的影响。他把真善美的事物呈现给观众，也为艺术的传承和社会发展增添了一丝光明。

在《变脸》中，从故事结构到主题的展现，都对当时的社会起着向上的积极的作用；面对社会问题，影片也有着突破性的思考和处理。

二、《百鸟朝凤》眼界的“窄”与思想的“浅”

相对来说，同样是以民间传统艺术为红线，《百鸟朝凤》却没有《变脸》成功。《变脸》内容丰富，主题多元，刻画人生，功夫老到。《百鸟朝凤》则主题单一，似乎就是为了反对外来文化，力挺中国传统文

化。电影前半部分自然、平实，还可以看出吴天明一贯的导演风格。而后半部分则突然变异，用力过猛。以至于我怀疑这部分就不是吴天明导演的，否则真的很难理解，一代大导演，怎么会出此下策？

可以说，《百鸟朝凤》是一部平庸的影片，甚至可以说，是一部失败之作。它能够引起社会反响，完全是操作的结果。艺术毕竟是残酷的，没有水平，就是没有水平，靠什么都没有用，虽然能换来一些票房。首先，就讲述的故事来说，就很牵强，前半部分拜师学艺，还算过得去。后半部分焦家班子，改为游家班子，过度太仓促，情节衔接不上，太突兀。而后半部分叙述的唢呐的衰微，被西洋音乐的打败，都很勉强，不太真实，演员的表演也很不自然。焦三爷为了让徒弟接人家的活，白事上吹唢呐，自己气急败坏地跑到徒弟家截堵、打人，强行将徒弟带到主人家，而且还为死者吹《百鸟朝凤》，以至于自己的血从唢呐孔流出来。这种为艺术献身的的神话，太现代了。在真实的农村，不会发生这种事情，首先死者家属就不会同意。这不是舞台，这是丧事。主创人员把现代舞台的一些理念强加到农村，是很隔膜的。而且一个真正懂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吹唢呐的大家，是能够得到天人合一之境的。生活虽然艰难，日子虽然平淡，唢呐日渐衰微，他们是可以淡定面对此事的，不至于如此慌乱失态。这一点在《变脸》中我们是可以看到的，那恐怕才是真正的吴天明。虽然吹唢呐的在农村地位卑微，并不像电影中说的那么高，但再卑微，一个艺人的尊严还是有的，不至于如此变态。后面坟墓上游天鸣吹唢呐，师傅在幻境中慢慢远去，更是败笔。其实，越是平淡的描写，越见功夫，也越见那种人生的残酷，时间的无情。

至于影片的思想，更是浅薄。很多评论家过度阐释了这部影片，什么传统艺术的坚持，传统文化的衰微，云云，都是言不及义，语无伦次。因为，第一，唢呐在农村就是红白喜事上露面的东西，社会地位并不高，在旧社会也不高，没有电影里说的那样。丧事上，礼宾是受到厚待的；乐工，是不受重视的。而且唢呐是不是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也还两说，即便代表，也没有那么重要。电影以唢呐的衰微来哀叹或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明显是找错了对象，也给唢呐这个民间不大重视的乐器承载了过多的重负，它是无法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也无法承载这么重的文化责任的。

不过，在《百鸟朝凤》中，在过度表现唢呐的衰微的过程中，无意呈现出了更加复杂的社会问题。

比如蓝玉和几位师兄去省城打工谋生,这些方面都体现着农村传统的小农业生产模式已经衰败,年轻一代的村民,已经被卷入工业化的时代当中。因为在大城市有更多的谋生机会,有很多的文化诱惑,这些在封闭的小乡村是不具备的。尽管这种转移是被动的,但是时代发展的脚步促使每个人不断地向前进。“广义的现代化主要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生产力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引起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具体地说,就是以现代化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5]在经济全球化、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世界变成了“地球村”,缩小了彼此间的距离;文化方面提倡多样性,各国文化糅杂在一起,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在《百鸟朝凤》中也有所体现。譬如游天鸣在婚礼上吹唢呐的那场戏中,他带领游家班为婚礼奏乐,与此同时,主人又请来一支西洋乐队。影片通过镜头之间的交叉剪辑,试图产生对比蒙太奇的效果。最后,双方因为相互不服气产生了冲突、打斗,最后的结局是传承百年的唢呐被踩坏了一地。吴天明想通过这个镜头揭示中西文化的冲突,但却成了一场闹剧,缺乏生活的真实。因为吹唢呐的人从来就没有受到过村民的尊敬,在农村就是红白喜事上用一下,平时谁会真正尊重他们?而且唢呐在农村被人看作不吉利的声音,一般多用于葬礼,平时是不愿意听见这声音的。所以,这种试图进行中西文化对比的努力,是没有多少价值的。唢呐也无法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一则它本身就是外来音乐,二则是它的卑微。不过,影片从侧面展现的农村和传统艺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无奈、艰难,却是残酷的、真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百鸟朝凤》可以说是《变脸》的续篇,它们是一种逻辑的自然发展。

当吹唢呐这份职业慢慢地无法谋生时,游天鸣的师兄都选择去城市打工。有一场戏是焦三爷去徒弟家,他狠狠地辱骂徒弟为了挣钱,放弃了吹唢呐。可以看出每个人心中的痛苦和无奈,可是人活着的首要任务就是生存。当吹唢呐已经无法保障个人的基本衣食住行时,那就只能去大城市谋生。传播学中有一则定律叫“沉默的螺旋”,就是当一种现象已经被大部分人所认可的时候,接受这个现象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现代化进程的范围越来越大,影响的范围也会不断扩大。

吴天明导演一生热衷于对传统民族文化的探索。在《百鸟朝凤》中,吴天明对于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对于社会问题提出了质疑。他在访谈中也多次谈到,他的电影希望为观众带来正确的价值观和深刻的思考。但同时我们看到,在《百鸟朝凤》中对西方文化一边倒的批判,是稍显片面化、情绪化的。在现代化的大浪潮中,外来文化的进入是无法避免的,我们要用辩证的思维去看待这一问题。多元化的交融也为我国本土文化带了一些有益的影响,而在《百鸟朝凤》中,对于现代化过程中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带来的冲击,处理得相对极端。唐宏峰认为:“影片在主题上没有跳出从‘五四’以来表现这一主题的双重窠臼,即要么将乡村表现为美好的伊甸园,视其为对堕落的现代都市文明的拯救;要么将其理解为僵化压抑的封建铁屋子,是启蒙演练的对象。无论哪种态度,根本上都是一种二元对立的他者想象,而本片无疑采用了前者,表达一种鲜明而简单的现代性批判。但这种批判没有建立在一种理性的、复杂与有难度的思考之上,就只能发挥与流行的怀旧文化同等的肤浅的慰藉功能。”^[6]这种城乡对立、中外对立的二元思维,在中国当代作家、艺术家的作品中,呈现得比较普遍,尤其在西部文艺作品中,更加突出。某种意义上,这是艺术家不成熟的表现,是一种内心的不自信。

“影片表面上是在讲民间唢呐技艺遭遇到的现代冲击,但更根本上,当然是用唢呐来连带整个传统的乡村伦理体系,从师徒关系、夫妻关系到婚丧礼仪、典章制度,唢呐的衰落是整个传统文化衰落的象征。”^[6]在关于《百鸟朝凤》的评论中,我比较认同唐宏峰的观点。2016年5月,我们曾同在苏州第二届全国文艺评论家骨干研修班,当时在课堂讨论中已经领略了她美丽后面的锐利,读了此文,更加佩服她的见识。

在落后的西北农村中,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等各方面都经受着现代化的冲击。工业化的脚步一步步逼近,无疑对之前扎根于土地的传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社会需要发展,人们也需要适应发展的步伐。当传统与现代化狭路相逢时,我们应当如何权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用辩证的方法去思考其中的原因和利弊,这是一个大问题。

在世界文化大融合的趋势下,影片《百鸟朝凤》表现更多的是对于西方文化的愤慨和不理智的否定。导演吴天明所坚守的传统观念似乎与现代化过程中的大融合格格不入。在中国的传统电影中,忧

患意识一直是导演肩负的责任,可是过度的忧患会带来极端的效果。当下我们对于本土文化,应该表现出文化自信,过多地保护本土文化,抵制外来文化,也会造成畸形的文化发展趋势。

“由于缺乏超验的价值之根和终极关怀所指向的神性的悲悯情怀,‘第四代’的电影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和时代主题的转换而日渐丧失美学的力量。”^{[7]16}吴天明导演经历了时代的变迁,在他所执导的这些影片中,前期的一些作品比较优秀,他以电影作为传播媒介,为大众带来了有深度的思考;但是在他执导的后期影片中,明显地表现出时代衔接方面的断层,在社会前进的步伐中,他仍然以传统的视角和观念思考问题,使得影片深度有所欠缺。如《百鸟朝凤》中,传统的意识形态传递太过强烈,基本不接受外来文化,有些“闭关锁国”的味道。

通过对吴天明导演两部作品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剧烈变化的时代中,我们应当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问题。这也是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面对冲击,

我们应该采取的清醒态度。

参考文献:

[1] 李安直言吴天明了不起. <http://news.163.com/16/0513/04/BMU0J6B600014AED.html>.
[2] [美]路易斯·贾内梯. 认识电影:插图第11版[M]. 焦雄屏,译.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08.
[3] [法]西蒙·波伏娃. 第二性[M]. 舒小菲,译. 北京:西苑出版社,2009.
[4] 吴天明. 艺术与人生 160 心意服饰商学企业培训讲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kxNTQyMTc2.html.
[5] 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6] 唐宏峰. 一部从剧作到影像全面平庸的作品[J]. 上海艺术评论,2016(3).
[7] 史可扬. 影视批评方法论[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he Pathetic Song for Life Itself

——Analyzing *The King of Masks* and *Song of the Phoenix*

YANG Guang – zu, LIU Lu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WU Tianming’s movie centers on the struggle, anxiety and great changes of the west in the tide of modernization. The two works *The King of Masks* and *Song of the Phoenix*, which are directed by him, tease out the changes of whole movie in details. The first work *The King of Masks* mainly analyzes the criticism of the Patriarchal culture and the exquisite artistic achievements. The second work *Song of the Phoenix* discusses the limitation of thinking, and analyzes the “narrow” for vision, the “shallow” for thinking, like under the trend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the whole world, these works put more irrational denials toward western cultures.

Key words: WU Tianming; *The King of Masks*; *Song of the Phoenix*; modernization

谈《沱河记忆》中的农事记忆情结

李欣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 郑州 450044)

摘要:《沱河记忆》是一部知青题材小说。曾经是知青的作者董克林用独特的视角,用平实朴素的带有豫东特色的语言回忆了知青到农村插队的美好往事,记录了知青和农民的深厚感情,描绘了那一代青年人的热血青春和理想追求。《沱河记忆》中的农事记忆是文学描述,更是具有社会性、历史性的有价值的文献。它不仅是知青题材的小说,更是中国农村发展和变迁的历史缩影;它不仅是作者的个人记忆,更是能激发群体认同感的社会记忆。小说具有一定审美境界和历史文化价值。

关键词:《沱河记忆》;农事记忆;情结;审美境界;文化价值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5.002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5-0006-03

描写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山下乡”知青题材的小说众多。80年前后有描写知青苦难历程的“伤痕文学”,如叶辛的《蹉跎岁月》,竹林的《生活的路》,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80年代前期有讴歌青春和理想的,如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张曼菱的《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张承志的《黑骏马》,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80年代中期以后有“反思文学”,如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张抗抗的《隐形伴侣》,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老鬼的《血色黄昏》,李锐的《合坟》;之后,有更多沉思和温暖成分的知青小说出现,如刘海的《青春无主》,梁晓声的《知青》。董克林先生的长篇小说《沱河记忆》属于最后一类。

《沱河记忆》这部小说没有史诗般的宏大叙事,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更没有华丽的词句。它用平实朴素的带有豫东特色的语言回忆了知青到农村插队的美好往事,记录了知青和农民的深厚感情,描绘了那一代青年人的热血青春和理想追求。读来让人温暖,令人感动。“如果说语言是思想的工具

和材料,记忆则是思想的源流。”^[1]知青生活是那一代人刻骨铭心的记忆,是他们人生故事里重要的情节。正像作者本人所说:“返城三十多年来,在沱河岸边庄稼地里摸爬滚打的场景慢慢变成了发黄的老照片。但是,这种镜头一直使人魂牵梦绕,心中总有一股力量在冲动,时时激励着我提笔书写那段流逝着、沉淀着铁质的岁月。”^{[2][32]}小说描写的是20世纪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山”时期,京港市18位知青(小说中的18位罗汉)到沱河县沱河岸边的李楼大队劳动四年多时间里发生的故事。小说开头,讲到18位知青(9男9女)乘坐大客车来到李楼大队,大队书记和大队长已为他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饭,而且提前为他们新盖了三间草房。看到草房、树木、果实和田野,他们充满新鲜和好奇,“九枝花”开心的把他们的草房称为“千金店”,九弟兄晚饭后迫不及待的跳入沱河,在河里嬉戏打闹游成了欢乐的“浪里白条”。他们的青春活力、阳光开朗也给偏僻的乡村带来了清新和生机。“石榴树枝头挂满了带有红脸蛋儿的果实,高高的柿子树上结满了嫩绿的青果儿。累累果实在风中摇曳,在太阳下微笑,好像在

收稿日期:2017-09-05

作者简介:李欣(1964—),女,河南武陟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节日文化。

说:欢迎!欢迎!热烈欢迎!”^{[2]4}这是小说开头引子里的描述,为本书奠定了清新、明亮而又温暖、向上的橙色和绿色交织的色彩基调。

《沱河记忆》是一部长篇纪实散文体小说。小说除了引子,有二十一章:十个“和尚”和“一小撮”、地锅馍和“独腿烧鸡”、制止敌台、种麦、房东、雪中的大白鹅、大队书记的酒坛、章来打架、参加整党工作队、捉老鼠、九公里事件、盖新房、收麦打场、木雨伞、棋“生”棋子、闹鬼、车祸、吃大鱼、王引河会战、红芋活、知青调研。这二十一章故事各自相对独立,前后既没有时间上的承前启后,又没有故事情节的逻辑关联,每一章都是人物情节相对完整的短篇小说,在栩栩如生的描述中昂扬着积极向上的力量。内容有劳动和生活中的逸闻趣事,也有矛盾冲突和意外事件,其中关于农村农事、农活儿的描写占了大量篇幅。例如第四章种麦、第十二章盖新房、第十三章收麦打场、第二十章红芋活,其他章节里也不乏农事、农活儿的片段描写。这些农村农事的描写既表达了曾是知青的作者对农民、对农村深深热爱的情结,又表现了作者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和教育家对农事的文化思考。

一、《沱河记忆》的农事记忆具有景真情切的审美境界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3]5}意即作家写作要写真景物、表达真感情,要真切地写真,才叫有境界,否则就是无境界。董克林是有境界的作家,他眼中的农事真实自然,他面对农活不是被动抱怨而是主动学习掌握,他笔下的农事、农活儿不仅有意义而且有情趣。第四章“种麦”中详细描写了多种农事、农活儿:沤粪、上粪、打坷垃、耙地、打畦田、耩麦等等。作者通过生动的人物对话和细致入微的描述把所用农具及使用方法、技巧、使用效果、出现的问题全部记录下来,可以说是“种麦的农具农活大全和教科书”。比如作者对耩麦的耩的介绍,如果不是亲眼见过、亲自用过,就不会把它的结构描写得如此细致和具体,因为如今这些农具已鲜为少见。在第十二章“盖新房”中,作者用12000字,描绘了从钉木线橛子、挖地基、打夯、和泥、砌砖、垒墙、上梁、铺

房顶等环节到新房盖成的全过程,讴歌了村民们代代相传的聪明才智、盖房工艺和友爱协作的精神,表达了村民们对知青的关爱和盖新房的喜悦之情。其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不一会儿,村里的建房高手、青壮劳力‘云集’工地,参加建房‘会战’。高金顶是全大队手艺最好、最权威的‘把式’,小学生似的站在徐队长身旁,‘老队长,只等您发话了,恁说干,俺就下手。’”^{[2]151}“干活的社员个个都是艺术家,他们光着膀子,耍着家伙,胶泥在他们手里好像有了生命,特听使唤。……泥里露出的麦秸茬都齐刷刷地头朝外,泥墙成了艺术品。”^{[2]161}作者描写的劳动,从字里行间传递出的不是苦而是快乐,这既表现了当时的劳动场景的确是欢乐的,同时也表达了作为知青的作者对劳动的认知和体验也是快乐的。这源于作者对劳动和村民们的深情和热爱,也源于作者对劳动的审美态度,给读者带来了审美上的愉悦感受。

《沱河记忆》小说通篇充满真善美和人性的光辉,其中关于农事劳动的描写也充满了真善美。王泽龙教授为《沱河记忆》所作序文中说:“真、善、美——就学理而言,分属哲学、伦理学和美学中最基本的范畴,也都属于美学研究中的基本课题。所谓真,就是客观事物的存在及规律性,人们只有尊重客观事物存在及其规律(真),才能自由地进行造福人类的活动(善),从而显示出人的本质力量(美)来。”^{[2]1}农事劳动是本真,在劳动中体现善和美,这是作者具有高度的审美境界和自觉所致。在第十三章“收麦打场”和第二十章“红芋活”中,作者同样如教材般详尽描写了这两种农活的程序,但效果又比教材生动和灵活。作者巧妙的以徐队长及村民和知青们一问一答对话的方式,把收麦打场及翻红芋秧的原因、细节、技巧展现出来了。作者对农事劳动的描写也颇有意境,颇具美感。“庞大爷接过扫帚,左脚在前,右脚在后,身体像个中心轴,随着上半身扭转,手中的扫帚不紧不慢地围绕着庞大爷的身体画着弧。一扫把、两扫把、三扫把……扫过之后,麦秸在上,麦粒都乖乖地留在地面上。”^{[2]177}“这个麦季,正像安国夸庞大爷菩萨心肠那样,一周艳阳眷顾了诚实劳作的社员,直到麦子装袋入仓。”^{[2]179}在作者眼中,农活儿是美的,干农活儿是快乐的。在第十九章“王引河会战”中,作者用轻松幽默的文字生动描述了劳动后的快乐心境。“太阳落山,工地放工,吃饭算是摸黑‘晚宴’。社员头顶挂着星星的碧空,用

欢声笑语把饭场搅和得五味俱全,用诙谐幽默的智慧装点出一个偌大的晶莹透亮的天然宴会厅。老少爷们尽情地说啊、笑啊、闹啊,享受着释放疲惫之快乐。”^{[2]269}

读者从书里描写的农事劳动中不仅感受到了真善美,也感受到了快乐。除了中国农村农事本身传递的美学意象之外,作者的文学功底和审美境界令人叹服。

二、《沱河记忆》的农事记忆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

以苦难知青生活和蹉跎青春岁月为题材的知青小说很多,它们浓墨重彩讲述的多是知青们的生活和情感经历。而像《沱河记忆》这样能欢快表现丰富的知青生活、温情讲述知青和社员和谐美好感情、详实记录农村农事活动的比较少。董克林先生撰写的《沱河记忆》为人们认识和了解上山下乡运动和知青生活多了一个角度和窗口,为社会记忆提供了独特的资料,也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定印记。很赞同清华大学郭于华教授在《社会记忆与人的历史》这篇文章中的观点:“就中国社会而言,贯通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并由此重建社会记忆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任务之一……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历史!每个人的苦难都有历史的重量!每个人的记忆都弥足珍贵!每个人的历史都不应遗忘!”^[1]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和教育家,董克林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他想把个人历史、个人记忆融入社会记忆,想让自己具有青春纪念碑意义的“知青”生活不仅成为自己的人生财富,而且把那一代人甚至中国某一阶段的历史记忆变成可以翻看和咀嚼的文字,同时也为当代青年提供活生生的、可以借鉴的社会实践素材,倡导向社会学习、向实践学习、向劳动人民学习的良好风尚。

不仅如此,《沱河记忆》还是一部生动的农事教材。作者描写农活儿、农具的农事记忆不仅是作者个体的,更是社会的记忆,其历史文化价值值得重视。社会发展与乡村变迁使农村的生活方式和农耕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传统的农具、农活儿正逐渐消失,即将成为历史和文化记忆。在这种时间节点上,《沱河记忆》的农事记录无疑是具有文献记载的历史价值的。耧是一种播种的农具,现在已被

播种机取代很少见到了。书中这样描述:“它有三个上下高度约1米的圆木棍,上端有一根横杠,是扶把;耧扶手即两根木料,长1米多,一端向人力车扶手,把手下面与三个圆木棍呈110度衔接,三跟圆木棍下面部分俗称黄瓜筒,黄瓜筒是空心,麦种从漏斗进入筒里经过下面的耧铧脚落到土层里。与三根圆木棍衔接的两根木料有一个口大底小的漏斗,斗底有一个踏门,踏门引出三个空心筒与黄瓜筒连接。耧铧脚是铁质的,前尖后宽,扎在蓬松的土壤里,前行的同时播下种子。”^{[2]55}这一段文字是用过或见过耧的农民和知青能读懂的,其他人读后一定不知其为何物。现在耧和织布机一样已被抛弃或作为农耕文化的象征成了历史陈列品,以后也许只能在博物馆和陈列室才能见到。第二十章“红芋活”就是一堂红芋的科普文化课。小说先叙述红芋的重要作用:对于20世纪70年代中原农村的农民来说,“一年红芋就是半年粮”,“红芋汤、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之后详细描写了知青学翻红芋秧、学做红芋粉条、晾晒红芋片的全过程。最后还进行了概括总结:“红芋的食用方法还有很多。红芋片可做白酒…可制作淀粉;淀粉能制成粉条、粉皮;红芋渣是喂猪的好饲料。经过霜打的红芋秧变成黑色,把它和豆腐、红芋煮在一起,便成为一种叫做‘懒豆腐’的主食。”^{[2]300}

这种浓郁的农事记忆和乡村情结是知青们的乡愁,也是中国农民的乡愁。农事成了乡愁的载体,而当实际生活中农事发生变迁或消失的时候,这些关于农事的文字记载也成了乡愁的载体和传世的史料,其意义已远不是个人记忆和个人情结了,它是一种社会记忆和历史的文学再现。美国史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指出:“物质器物、宗教知识、科学著作、文学作品等都渗透着传统社会记忆的踪迹。”^[4]所以,《沱河记忆》中的农事记忆是文学描述,更是具有社会性、历史性的有价值的文献;它不仅不是知青题材的小说,更是中国农村发展和变迁的历史缩影;它不仅是作者的个人记忆,更是能激发群体认同感的社会记忆。

参考文献:

- [1] 郭于华. 社会记忆与人的历史[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08-20.
[2] 董克林. 沱河记忆[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

(下转第26页)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 梦境叙事在《聊斋志异》中的发展

郭 艳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文献信息中心, 郑州 450002)

摘 要: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梦境叙事有以下几种类型:人神相恋、托梦、梦幻人生等。《聊斋志异》作为志怪小说的顶峰,受到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影响,其中也有许多梦境叙事,并进一步发展——男女相恋具有世俗化特点,托梦叙事复杂化,梦幻人生的主题更加意图化。《聊斋志异》中梦境叙事的功能:通过梦境叙事来使时间呈现空间化,通过梦境叙事推动情节发展,通过梦境叙事使中国古典小说出现“元小说”的雏形。

关键词:梦境叙事;志怪小说;《聊斋志异》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5.003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5-0009-05

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一个经典内容,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作为中国小说的开端,有许多梦境叙事类型,对于后世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聊斋志异》作为志怪小说的顶峰,受到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影响,其中也有许多梦境叙事,在全书490多篇作品中,70多篇都与梦有关。

一、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梦境叙事

梦境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叙事说情、塑造人物的重要空间,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人神相恋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梦境有时是神人相恋发生的场合。如《搜神记·弦超》:“以嘉平中夜独宿,梦有神女来从之。自称天上玉女,东郡人,姓成公,字知琼,早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遣令下嫁从夫。超当其梦也,精爽感悟,嘉其美异,非常人之容。觉寤欽想,若存若亡。如此三四夕。”^{[1]16-17}弦超在梦境中结遇神女并结为夫妇。这一梦境叙事体现了人们对于自由美好爱情的追求。在封建社会,婚姻

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很多青年男女在婚前都未见过面,更不要说心灵相通、互恋互爱,因此,古代有很多并不随人愿的婚姻存在。由于“梦是欲望的满足”^{[2]97},梦境也就成为人们理想爱情的“发生地”。如果说情投意合是普通男女对于爱情的最低标准,那么凡夫俗子与天上神女的姻缘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无疑就是爱情的最高境界。这一爱情的最高境界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只能发生在梦境中。人神恋中的梦境具有隐喻的意义,它暗示着:梦终究要醒来,所以小说中弦超与神女的爱情并不顺利,在成为夫妇七八年后,由于弦超把事情泄露,神女告辞离去。

(二)托梦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梦境有时是亡人托付生者了却自己意愿的场所。如《列异传·蒋济儿》中,蒋济的妻子两次梦见儿子哭诉在阴间做泰山伍伯“憔悴困辱”,让母亲委托泰山令孙阿给自己谋个“得乐处”^{[3]10},蒋济推问诩士孙阿验证了妻子的梦,孙阿受蒋济之托到阴间为蒋济之子谋取了理想的职位,成为录事。

收稿日期:2017-08-20

基金项目:2017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基本科研费项目“六朝志怪小说空间叙事的文化内涵”(17E46)

作者简介:郭艳(1979—),女,河南郑州人,硕士,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文艺学。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托梦情节有时又是人物获知事态发展趋势的重要空间。如《列异传·三王冢》：“王梦见一儿，眉广三寸，辞欲报仇。”^[4]¹⁴⁰楚王就是在梦中梦到眉间尺说要杀他替父报仇，后来果真被眉间尺托付的怪客砍下头颅。《拾遗记·秦始皇》中秦王子婴在梦中见到一个“身长十丈，须鬓绝青”的人告诉他：“余是天使也，从沙丘来。天下将乱，当有同姓名欲相诛”。正是由于梦境中的预言，子婴就怀疑赵高，并囚禁赵高。接下来才有了诡异的情节，赵高被“悬于井中，七日不死；更以镬汤煮，七日不沸。”赵高死后，“有一青雀从高尸中出，植入云”^[5]¹⁰⁵。不论是亡人托梦生者了却自己的遗愿，还是异人托梦告知事态发展的结果，都与古人占梦的情结有关。古代由于科学不发达，人们对于许多自然现象和生理现象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尤其是对于做梦这一现象更是充满了神秘感。因此，人们就试图通过占梦之术为离奇的梦境与现实建立一种联系。

（三）梦幻人生

《幽明录·柏枕幻梦》中，县民汤林在进庙祈福时从柏枕的一个小孔进入梦幻世界：“见朱门、琼宫、瑶台胜于世”，这一梦境的繁华远胜于现实。接下来，“见赵太尉，为林婚，育子六人，四男二女”，汤林在梦里又获得了婚姻，并且儿女双全。汤林不仅家庭幸福，还仕途得意，“选林秘书郎，俄迁黄门郎”。人生几大喜事——结婚、生子、升官，都在梦境中一一得到满足，如汤林自然乐不思蜀，“永无思归之怀”。但好景终不能持久，后来他“遭违忤之事”，从枕中出来，才发现枕内的好几年不过是自己“俄乎之间”做的一场梦。^[6]⁴

《柏枕幻梦》中的主人公——县民汤林是一个行贾之人，在古代商人地位低下，他自然对于功名利禄更加渴望；另外，他还未成家，因此，成家立业就是他的全部理想。枕中一梦使他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但人生就像一场梦，虚幻的东西终究不长久。一切功名利禄、荣华富贵最终都是过眼云烟。这与当时盛行的道家的虚无观有关，在道家看来，人间众生无论在物质层面上还是在精神层面上的追求都是没有意义的。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梦幻人生的梦境叙事还体现为梦变为真。梦境有时还是事态发展的另一“现场”，之所以说是“现场”，是因为人物梦境中说的话或者做的事在现实中会产生相应的结果。如《幽明录·换头》中，贾弼之“夜梦有一人，面黧甚，

多须，大鼻矐目”，听这个人说“爱君之貌，欲易头，可乎？”贾弼之说：“人各有头面，岂容此理！”^[7]³⁰拒绝换头。天亮又梦到这个人，非常厌恶，于是在梦中答应了换头要求，起床后贾弼之的头果真被换了。梦境虽然是虚幻的，但它又与现实具有一定的映射关系。梦变为真的情节体现了梦境是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融合体。

二、梦境叙事在《聊斋志异》中的发展

文学既有传承的一面，更有在继承基础上的新发展。《聊斋志异》在传承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梦境叙事的基础上，呈现以下特点：

（一）男女相恋：世俗化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梦境中人神相恋的故事，发展到《聊斋志异》，就成为世俗化的男女相恋了。不论故事中是人神相恋、人鬼相恋、人妖相恋，这里的神鬼妖都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人与神鬼妖的界限变得模糊了。梦中男女之间即使横亘着人间与仙界的巨大鸿沟，如果发生恋情，世俗的人也不会震惊。同时，男女恋情发展也更加世俗化。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当中说道：“《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鹖突，知复非人。”^[8]²⁵⁸

《聊斋志异》中的男女相恋梦境叙事一类是异类相恋。如《狐梦》通过毕怡庵梦中之梦讲述了一段人狐相恋的故事。毕怡庵总想见到狐仙，一日“归斋，日已寝暮。时暑月燠热，当户而寝”^[9]⁶²¹。睡梦中首先有一位狐女幻化的妇人出现，她介绍自己的三女儿与毕怡庵结为良缘。第二天，三娘子又让毕怡庵见自己的三个姊妹共同庆贺。这四位狐娘子就像人间不同性格的可爱女子一般生动，没有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异类幻化为人的神秘感。

另一类是世间普通男女相恋。男主人公因为目睹了女主人公的美貌而心生爱恋，但又囿于某种现实原因不能在一起，因此，只能在梦境中一解相思之苦。如《阿宝》，男主人公孙子楚生性迂讷，对别人说的话往往信以为真。一个富商为自己的女儿阿宝择婿，正好孙子楚的妻子死去，他就听别人的话去提亲。阿宝戏弄他，让媒人转告如果他把多余的手指切掉就嫁给他。孙子楚就切掉了手指。后来清明节妇女出游，孙子楚得以见到阿宝的真容，从此魂不守舍，“至家，直上床卧，终日不起，冥如醉，唤之不一醒。”而魂“遂从女归，坐卧依之，夜辄与狎，甚相得”。梦中孙子楚与阿宝的恋情双方也都有感知，

“女每梦与人交,问其名,曰:‘我孙子楚也。’”^{[10]231}

正是由于梦境中的相恋才为后来二人在现实生活中结为夫妇打下了基础。孙子楚和阿宝恋情既有传奇的一面,又有现实社会的反映,由于二人家世悬殊,恋情发展曲折,体现了当时门当户对的婚恋观念。此外,还有《王桂庵》《寄生》,父子良缘皆因梦成。

(二)托梦:复杂化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托梦叙事,大多采用全知视角,对梦境的主要内容进行叙述,内容以委托他人实现愿望或者预测事态发展趋势为主,而且梦境多为一人所做之梦。《聊斋志异》中的托梦叙事就复杂多了。

首先,《聊斋志异》的托梦叙事既有采用全知视角的,也有采用限知视角的。如《董生》中,董遐思被狐女魅惑致死后,王九思重蹈覆辙,也被狐女害得迷罔病瘠,一日忽然梦到董生。这一情节,作者就是采用全知视角,原原本本地把王生的梦境对话复述出来。“与君好者狐也。杀我矣,又欲杀我友。我已诉之冥府,泄此幽愤。七日之夜,当驻香室外,勿忘却。”^{[11]136}还有一些作品采用限知视角来叙述梦境。如《连城》中,连城在违背当初让乔生割肉和药就嫁给他的诺言时,让老太婆传话:“我梦不祥,三年必死,不必与人争此泉下物也。”^{[12]361-362}由于是他人转述连城的话,自然也就无法原原本本地把梦境全部反映出来,因此,也就无法得知连城梦到了什么使她知道自己三年后必死。

其次,托梦的内容除了诉说遗愿和预言未来外,一些作品中的托梦叙事具有揭示真相的功能。如《陆判》中,朱尔旦的妻子被陆判换了吴侍御女儿的头之后,消息传到吴侍御那里,吴侍御猜测女儿为朱尔旦所害,要讼之官府,陆判让吴侍御的女儿夜晚在其梦中自言:“儿为苏溪杨大年所杀,无与朱孝廉。彼不艳其妻,陆判官取儿头与之易之,是儿身死而头生也。愿勿相仇。”^{[13]144}托梦叙事揭开了吴女死亡、朱妻换头之谜,为朱尔旦洗了冤。另外,《聊斋志异》不仅有“一人一梦”,还有“多人同梦”。《王六郎》中,许某在王六郎被天帝授为招远县郛镇的土地神赴任后,到郛镇准备会见王六郎,问路时才知道村人等候已久,这些村人之所以等候许某,是因为他们做了一个相同的梦:“众乃告曰:‘数夜前,梦神言:淄川许友当即来,可助一资斧。祇候已久。’”^{[14]29}《凤阳士人》中,妇人、妇人之弟、妇人之夫,身处三地却共作一梦。《聊斋志异》还有一人多梦、多人多梦的作品。

(三)梦幻人生:意图化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关于人生如梦主题的梦境叙事对于后世作品影响颇大。鲁迅先生评价唐传奇《枕中记》时说:“如是意想,在歆慕功名之唐代,虽诡幻动人,而亦非出于独创,干宝《搜神记》有焦湖庙祝以玉枕使杨林入梦事,大旨悉同,当即此篇所本,明人汤显祖之《邯郸记》,则又本之此篇。既济文笔简炼,又多规海之意,故事虽不经,尚为当时推重。”^{[15]44}《聊斋志异》中的《续黄粱》《王子安》正是在《柏枕幻梦》的基础上,对这一题材的再创作,进一步扩大了这一题材的影响。

《续黄粱》中,讲述了曾孝廉中举之后到郊外游逛,让寺里的算命先生给自己算命,算命先生说他能做二十年太平宰相。门外雨大,曾孝廉倦伏榻间,做了一场黄粱美梦。在梦中曾孝廉官至宰相,拥有荣华富贵,周围有美女陪伴。他贪赃枉法,最终受到严厉惩罚,不仅头被砍掉,还在阴间受到酷刑,最终转世为流浪汉的女儿,身世悲惨。正当曾孝廉痛苦哀嚎时,有人把他叫醒,才知道是做了一场梦。

《王子安》中,讲述了科举失意的落魄书生王子安在参加科举考试后,醉梦中实现了自己的功名理想。作者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人物梦中及第后的变化,一开始“忽有人曰:‘报马来。’王踉跄起曰:‘赏钱十千!’”“踉跄起”三个字就把王子安得知自己考中的消息后,兴奋的状态描绘了出来。接下来,“俄又有入者曰:‘汝中进士矣!’王大喜。”又过了一会儿,有人说:“汝殿试翰林,长班在此”,在狐精的欺骗下,王子安对自己考中进士深信不疑。这时他的心态就又变化了从兴奋——炫耀,“久之,王自念不可不出耀乡里”。与此同时,对待长班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从“呼赐酒食”到“大呼长班”“捶床顿足,大骂”,甚至在长班不听他令之后,“王怒,骤起扑之,落其帽”,发展为“扑”。^{[16]1234}该小说塑造了一个醉心于科举功名的读书人,充满讽刺意味。最后,作者假托“异史氏”之名,对于科举制度进行直接的理性批判,这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梦幻人生叙事显著不同。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梦幻人生叙事更多是一种隐喻,叙述者沉默,只是讲述故事,但不直接评论,让读者自己体会。《聊斋志异》的此类叙事更多是一种意图叙事,作者不仅在情节发展中倾注了自己的意图,在文末还直接发表评论,表明自己的价值观。以《续黄粱》为例,最后异史氏的话:“梦固为妄,想亦非真。彼以虚作,神以幻报。黄粱将熟,此梦在所必有,当以附之邯郸之后。”^{[17]532}体现了蒲

松龄对于梦幻人生的深刻认识。

三、《聊斋志异》中梦境叙事功能的继承发展

梦境叙事作为志怪小说主要的空间叙事形式之一,对于作品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志怪小说创作高峰的《聊斋志异》吸取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创作手法,同时也进行了新的突破。以梦境为例,《聊斋志异》在叙事功能上既有继承,又有新的创造。

(一)通过梦境叙事来使时间呈现空间化

时间和空间作为叙事的两个基本维度,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就二者的关系提出了“时空体”理论,“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时空整体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这两种不同系列的交叉和不同标志的融合,正是艺术时空体的存在。”^{[18]274-275}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梦境叙事模糊了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的时间界限,使得时间叙事明显呈现出空间化、跳跃性的特征。梦境是与现实生活不同的空间,也是对现实时间的重要突破;梦境既可以预知未来,又可以见到已故的亡者(亡者的隐喻是逝去时间),成为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空间载体。这形成了中国古典小说独特的时空体。

《聊斋志异》继承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梦境在叙事上的这一功能,在梦境这一空间中,现实生活中的人从现实时间进入到梦中时间,可以与亡故的人进行沟通交流,如《聊斋志异》中的《婴宁》,王子服把婴宁的鬼母与秦氏合葬后,“是夜,生梦媪来称谢”^{[19]150},梦境中鬼魂与活人进行了沟通。此外,现世的人还可以在梦境这一空间中预知事情的发展趋势,从而突破了以时间为轴线的叙事方式的局限,达到预叙的效果。如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搜神记·三王墓》中,楚王就是在梦境中得知:自己将被眉间尺杀死,为其父母报仇的结局。这在《聊斋志异》中也有反映,如《聊斋志异·姊妹易嫁》中,毛公参加乡试,道经王舍人店的前一晚,店主梦见神仙告诉他:“旦夕当有毛解元来,后且脱汝于厄。”^{[20]523}这一梦境叙事预测到了后面“店主人以人命逮系图圉,公为力解释罪”^{[20]524}这一事件。

(二)通过梦境叙事推动情节发展

梦境叙事对于志怪小说的情节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有时梦境叙事是故事情节发生的依据,离开这一空间,情节将不复存在。梦境叙事贯穿整个情节的全过程。这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和《聊斋志异》中均有反映,如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柏枕幻梦》,《聊斋志异》的《续黄粱》和《绛妃》等。有时梦境叙事是故事情节的一个组成部分,仅作为情节发展的某一阶段:起因或者结局。例如托梦交代任务或预叙结局的梦境空间叙事都属此类。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列异传·蒋济亡儿》《拾遗记·赵高受诛》《搜神后记·李仲文女》等,均以梦境叙事作为故事的起因或结果。

《聊斋志异》继承发展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梦境叙事推动情节进展的功能,梦境叙事作为情节推进的诱因。如《鲁公女》中,张于旦偶遇鲁公女心生爱慕,鲁公女死后与张生结为良缘,在鲁公女托生前二人定下约定,张生十五年后赴约。但由于相貌变化,鲁公女不相信他就是张生,她哭了几天就死了,一晚鲁公女托梦张生:“下顾者果君耶?年貌舛异,靛面遂致违隔。妾已忧愤死。烦向土地祠速招我魂,可得活,迟则无及矣。”^{[21]286}于是找人招魂,鲁公女复活,二人结为夫妻。梦境叙事成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重要契机。

《聊斋志异》中的梦境叙事较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更为复杂,不再独立地成为故事情节的开端或结尾,而是交织在故事情节发展的具体过程中,与其他叙事因素共同推进情节发展。

(三)通过梦境叙事使中国古典小说出现“元小说”的雏形

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相比,《聊斋志异》中的梦境叙事最大的不同就是出现了“元小说”结构。“元小说”是1970年美国作家威廉·加斯在论文《小说与人物生活》中正式提出的,意思就是关于小说的小说。虽然“元小说”的概念产生较晚,但它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早已产生。《聊斋志异》中的《狐梦》具有“元小说”的许多特征,整个故事呈现“大套小”的结构。毕怡庵对于狐仙特别倾慕,日思夜想自己能够遇见狐仙,一天“睡中有人摇之”,其实这时毕怡庵已经进入梦境。接下来,他与狐女三娘结为良缘,并与其姊妹喝酒庆贺,这其实都是梦境中的事情。宴席结束后,毕怡庵自己回去,“瞥然醒寤,竟是梦景;而鼻口醺醺,酒气犹浓,异之。”^{[22]621}《狐梦》描述了双重梦境:一重是毕怡庵梦遇狐女,一重是毕怡庵与狐女三姊妹喝酒庆贺。在这双重梦境之外,又套着毕怡庵向“余”(作者)讲述这段传奇经历

的一层。因此,《狐梦》呈现出三层套的叙事结构,而其中两层都是梦境叙事,最外层是元小说。而隐藏于故事之后的作者也忍不住直接说话:“有狐若此,则聊斋之笔墨有光荣矣。”^{[22]623}

参考文献:

[1][晋]干宝.玄超[M]//搜神记:卷一.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

[2][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魏]曹丕,等.列异传·蒋济儿[M]//列异传等五种.郑学棖,校注.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4]曹丕.列异传·三王冢[M]//唐前志怪小说辑释.李剑国,辑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晋]王嘉.秦始皇[M]//拾遗记·卷四.[梁]萧绮录,齐治平,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

[6][南朝宋]刘义庆.柏枕幻梦[M]//幽明录·卷一.郑晚晴,辑注.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

[7][南朝宋]刘义庆.换头[M]//幽明录·卷一.郑晚晴,辑注.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

[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M]//郭箴一,主编.民国丛书:第二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

[9][清]蒲松龄.狐梦[M]//聊斋志异·卷五.朱其铠,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0][清]蒲松龄.阿宝[M]//聊斋志异·卷二.朱其铠,主

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1][清]蒲松龄.董生[M]//聊斋志异·卷二.朱其铠,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2][清]蒲松龄.连城[M]//聊斋志异·卷三.朱其铠,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13][清]蒲松龄.陆判[M]//聊斋志异·卷二.朱其铠,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4][清]蒲松龄.王六郎[M]//聊斋志异·卷一.朱其铠,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文[M]//郭箴一,主编.民国丛书:第二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

[16][清]蒲松龄.王子安[M]//聊斋志异·卷九.朱其铠,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7][清]蒲松龄.续黄粱[M]//聊斋志异·卷四.朱其铠,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8][俄]巴赫金.小说理论[M]//巴赫金全集.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19][清]蒲松龄.婴宁[M]//聊斋志异·卷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20][清]蒲松龄.姊妹易嫁[M]//聊斋志异·卷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22][清]蒲松龄.鲁公女[M]//聊斋志异·卷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he Development of Dream Narrative in Ghost Stories from
The Strange Tales of Liao-zhai during Wei,
J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GUO Yan

(Document Information Center, He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engzhou 450002, China)

Abstract: Dream narrative in Ghost Stories during Wei, J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mainly has the following types: the love between human and immortal, the request by the Ghost appears in one’s dream, dreamy life, etc. Affected by Ghost Stories during Wei, J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e Strange Tales of Liao-zhai*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summit of ghost novels, and it contains many dream narratives, which had been further developed. Love between men and women becomes the character of secularization; the request by the Ghost appears in one’s dream becomes complexity; the central theme of dreamy life comes intentionize. Dream narrative in *The Strange Tales of Liao-zhai* has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time is shown spatialization through dream narrative, the plot is motivated, the primitive form of meta – fiction comes to appear in Chinese classical novels.

Key words: dream narrative; ghost novels; *The Strange Tales of Liao-zhai*

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

——以毛姆《在中国屏风上》为例

尹萍^a, 祁国江^b

(黑河学院 a. 通识教育学院; b. 外国语学院, 黑龙江 黑河 164300)

摘要:《在中国屏风上》是英国作家毛姆在中国旅行时的游记,他对中国的山川风物、人文景观的考察,对上至达官贵人下到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的书写,描绘了一幅光怪陆离的中国形象。该书中既有文化“他者”中的中国形象,又有集体无意识下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体现了作家所属群体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范式。

关键词:毛姆;文化;中国形象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5.004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5-0014-04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1874—1965)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英国著名小说家和戏剧家。毛姆最初以戏剧家闻名,但小说创作是他的主要文学成就,不少小说被搬上银幕,他的作品被译成各国文字。其中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彰显了他对东方文化浓厚的兴趣。他的旅行札记《在中国屏风上》(On a Chinese Screen, 1922)和长篇小说《面纱》(The Painted Veil, 1922)都是以中国为背景创作的名篇。毛姆在1919—1921年间曾两次踏入中国土地,在《在中国屏风上》是由50多篇长短不一的作品构成了一幅中国之行的画卷。在近10万字的叙述中,刻画了上至达官贵人下到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街头小巷的肮脏拥挤,瓷器、壁画的优美雅致,山峦、河水的压抑污浊,长城、天坛的静谧宏伟,构筑了一个别样的中国形象。

巴柔在《比较文学概念》中对形象下了这样的定义,“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它“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做的文学或非文

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1]25}。他认为,形象有两种知识立场:一是现代的、经验的知识立场,二是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亦即:形象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有理解与曲解;形象是他者的文化表述,无关真实或虚构。深受东方主义影响的毛姆,在他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中国的藐视和偏见。

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之一:破败滞后的中国

该书第一篇《幕启》,是这样一幅断壁颓垣,满目凄凉的画面:“在你的面前是一排茅草房,一直延伸到城门口,这些用土坯砌成的茅屋倾圮破落,好像一阵风就能把它们吹倒。古老并有着雉堞的城墙频于坍塌。”^{[2]1}这就是毛姆刚刚拉开那层神秘的屏风所看到的。他看到的是一个衰败、凄凉的中国。此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鸦片战争的失利,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正处于饱受战争、割地、赔款之苦的千疮百孔之境地。而此时的英国工业革命已接近尾声,国家实力不断增强,通过海外扩张积累了大量财富,殖民体系得到保障。毛姆既有对中国现实

收稿日期:2017-08-15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文化诗学视阈下近代以来英美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及中国形象变迁研究”(2017D077);黑河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近代以来英美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及中国形象变迁研究”(RWY201709)

作者简介:尹萍(1981—),女,黑龙江哈尔滨人,黑河学院通识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状况的描写,又有意识形态的抒写。在描写鸦片馆时,他是这样形容的,“这地方真令人愉快,像家里一样,舒适而温馨。”^{[2]35}他把残害中国人身体和灵魂的鸦片,把人们吸食鸦片的地方,用尽了赞美之词,毫不掩饰地反应出作家的殖民主义心态。正如基亚所言:“形象总是某某事物的形象,总要与它或多或少忠实再现的现实保持某种关系,这是所有的折射、棱镜都改变不了的。”^{[3]87}中国的道路不是狭窄曲折就是破损不堪。中国的客栈不是低矮拥挤就是油腻斑斑。“有一家既肮脏又不舒服的中国小客栈。在那儿,你会见到光秃秃的墙壁,滑腻腻的泥土地面。”^{[2]70}在毛姆的笔下,中国的房屋阴沉、低矮、空荡,坐落在拥挤或冷僻的街道。客店邈邈、污秽不堪,但这幅粗糙简陋的画卷也别有一番景致。被列强恣意欺凌的中国,城市是阴郁的,河水是浑浊的,就连天然形成的山峦都在竭力地抖动着。

在《面纱》中,作者对中国的城市有过这样的描述:“街道狭窄曲折,街道上阴森森的一个人影也没有,俨然是一座死城。”^{[4]77}陆路和水路交通闭塞,在不到一千公里的两座城市间穿梭少则五六天,多则数十天。这些贬义性的语言,可以窥探出毛姆对中国的反感与厌恶。

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之二:庸俗无知的中国人

毛姆用他深邃的观察力和犀利的文笔,用两种方式来刻画中国人的形象:一是作为旁观者直观的观察,二是通过在华的英国传教士、商人和政客等转述。主要描写了三类人的中国形象,一是普通百姓,二是达官显贵,三是儒雅学士。

他用较多的笔墨刻画了普通百姓的生活。“你可以观察那些中国人,顾客和店员,他们露出一种愉快的神秘表情,好像在进行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2]24}“如果你脑子里没有装满东方人都是神秘莫测的这种观念的话,你会觉得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好人;可是如果你向常驻中国的那些老资格外交官提起你的这种钦佩,他们会认为你有些荒唐。他们把苦力视为不过是些牲畜。”^{[2]49}毛姆对普通百姓的描写用尽了蔑视和挖苦之词。

在《面纱》中,男主人公瓦尔特用生命爱护自己的妻子,妻子却与另一位来自英国驻香港风流倜傥的副领事偷情,在一个午后,当他们两人在瓦尔特的家中密会时,突然发现门把手有人在拧动。两人神情极度紧张,他们在诚惶诚恐中这样彼此安慰:“除

了中国人,没人上来就那样拧把手。”^{[4]3}事实上,是丈夫瓦尔特昨晚听说妻子想看一本书,就顶着烈日给妻子送回来,他知道妻子一般都午睡,怕惊扰妻子,想着把书轻轻放下就走人。最终妻子在瓦尔特爱的感召下,“在善与恶的博弈中,回归了家庭。”^[5]

无论是衣衫褴褛、身材枯瘦、干瘪的苦力,还是为生活而奔波的普通百姓,在毛姆的眼中都是窥视欲甚多、庸俗无知的人。中国有一个怪现象,人的地位可以为其行为辩护。大意就是不论你的人品如何,只要你有权有势,人们就会讨好你,想和你成为朋友。在《内阁部长》里,毛姆这样描写:“他是一个清瘦的人,中等身材,有一双瘦削、优雅的手;他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中流露出一丝忧郁,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他根本就是个恶棍。”他把这位内阁部长形容为是奴颜婢膝、不择手段、凌弱暴寡、贪赃枉法、任人唯亲的政府官员。在领事和中国官员因为战俘而起争议时,领事完全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他气急败坏地说:“他不允许一个可恶的中国官员用这样的语气和他说话。”^{[2]34}有一位在中国工作的领事皮特先生,他不遗余力地查禁鸦片,但城里人只有他不知道他的雇员将鸦片藏在领事馆内,而且是在领事馆大院的后门公然进行大量的鸦片交易。这是全书唯一一位毛姆提到的英国官员,在中国禁止鸦片交易,实际情况又叫毛姆啼笑皆非。

不论是来中国30年的怡和洋行的老板,还是来中国十几年的大班;从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干事员,到现在住着气派的石砌大厦的成功人士,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连一句在街上问路的中国话都不会,甚至用异样怀疑的眼光打量任何学中文的人。即使是为了自己的精神得到重生,带着某种目的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温格罗夫,在中国已经呆了17年,他表面上肯定赞扬中国人,听不得别人说中国人不好;然而从他妻子的口中,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她从无数传教士的言行中得知中国人肮脏、残忍、不可信任。夫妻两人这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让毛姆迷惑不解。毛姆这位善于洞察人内心的作家,给出了这样的答案:他的感官所喜爱的,他的灵魂就厌恶。不管他想极力掩饰什么,他灵魂深处是憎恨中国人的,妻子的憎恨和他比起来真可谓相形见绌。温格罗夫先生是在英国生活得比较安逸的为数不多的来中国的其中一位,起初,他极为反感并加以拒斥,可是无休止的焦虑始终萦绕于心,他无法摆脱精神的枷锁——害怕永恒的惩罚,不得已来到中国。另一位来中国的传教士,把工作当成了生意来做,他对自己

的工作既没有激情也没有热忱,他觉得中国人头脑简单、愚昧无知。这些所谓带着上帝使命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认为自己在在一个远离文明的世界里工作。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分子亨德森,刚来中国,他极不习惯用人力黄包车作为交通工具,时间久了,他认为坐人力黄包车是天经地义的,他用冷漠的口吻说:“你不必去关心中国人,我们在这儿是因为他们害怕我们。我们是统治的民族。”大部分来中国的外国人基本上都是他们国家里贫穷的下层人士,到了中国都成了富有的上等人,如沙利文本是爱尔兰的一个水手,在英国,他是一位食不果腹的贫苦人,到了中国,经过几番辗转竟成了一位衣冠楚楚、大腹便便的富人。毛姆此行一直想拜访中国著名哲学家辜鸿铭,对他有过这样的描写:人消瘦,吸食鸦片,寻花问柳,而他满腹经纶的儒家经典却少有人问津。毛姆对这位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作家、哲人,毫不客气地把他形容为朝秦暮楚、嗜毒成瘾的人。然而,笔锋一转,又怀着体谅的情绪,把他的这种行为称之为“雅好”。辜鸿铭通过体验普通人所遭遇的人生浮沉,来使他的著作更有现实意义。这是毛姆赤裸裸地为西方殖民主义思想作辩护。

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之三: 集体无意识下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

“一种文化一个时代中关于特定主题的典范之本,不是创造出一种形象,而是为那种文化和那个时代集体无意识生活中的原型找到了理想的表达式。”^{[6]45}文人墨客塑造“他者”文化,无意再现他国的现实,按照当时所属文化的一般想象来描述他者,实际表现的是西方文化无意识的欲望。毛姆踏上中国国土时,正值西方政治腐败、社会不公、司法混乱,人口稀少却狂热的进行海外扩张。毛姆期待在这次异域的东方之旅中找到西方文化无意识中的缺憾。这正是异域文明化解在自身文明的期待视野中,变成自身文明自我评价自我定义的他者,西方的中国形象折射出西方自我意识、欲望的转移。

1250年前后问世的《柏朗嘉宾蒙古行记》与《鲁布鲁克东行记》,“只提到了一个中国形象生成的起点,真正让中国形象鲜明地进入西方人的知识与想象视野的,是半个世纪以后陆续出现的三部著名游记”^{[7]127}。他们分别是《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和《曼德维尔游记》。马可·波罗与鄂多立克本人都是亲历到访过中国的旅行家,马克·波

罗更是在中国生活了17年,他们将大汗统治下的中国描述为地大物博,市井繁荣,政治安定,商贸发达、交通便利。在当时影响最大的却是从未踏入中国的曼德维尔撰写的《曼德维尔游记》。曼德维尔是一位英国绅士,游历最远的地方也不出法国。人称“座椅上的旅行家”。在这部游记中,他综合了那个时代的所有关于东方的传说与事实,以骑士传奇的笔法进行杜撰,但符合西方文化期待视野下的伊甸园式的东方帝国想像。13—18世纪,西方近5个世纪不断美化中国形象。在社会文化中掀起了崇拜中国的思潮——中国潮,其中16—17世纪间的“中国潮”达到高峰。西方的中国热情表现在社会物质文化的方方面面。孔夫子的道德哲学、中华灿烂悠久的历史、中国的瓷器、丝织品、茶叶、漆器、中国工艺的装饰风格、园林艺术、诗与戏剧使中国成为西方社会期望中的理想楷模。从那时起,西方很多作家的作品中,就开始出现了东方帝国和中国文化的影子。在英国,从乔叟、莎士比亚开始,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书写遥远神秘而又让他们心神驰往的东方帝国。“无法抵御社会的整个倾向——对他者的梦想,这倾向就构成了‘社会集体想像物’。”^{[3]197}毋庸置疑,作为对中国深感好奇的毛姆,他笔下的异国形象显然带有英国社会集体想像物的神秘与辉煌。

尽管毛姆在中国游历期间,正是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水深火热之中,但他仍然看到并感受到了这个衰败的国家曾经拥有的辉煌。店铺里精雕细刻的木格,让人恍然间觉得在幽暗的格挡里,陈列着各式各样的东方奇珍异宝。雕梁画栋上的飞龙都已褪色,但仍不失优美。在内阁部长的收藏室里,他看到了价值连城的瓷器、青铜器和唐代的塑像。特别描写了从河南古墓中出土的造型优美、神韵精致的唐三彩马。中国的花鸟画令毛姆发出叹为观止的感慨,虽寥寥数笔,却表现出生命的搏动和颤栗。

在《天坛》中,“它向着苍天而立。三层圆形的汉白玉露台,四道大理石阶梯,分列于东西南北四方。象征着天球及四个基本方位。每一朝的天子都会来到这里,庄重地祭拜皇族先祖”^{[2]17}。毛姆描写了宏伟、壮观、精致的天坛,皇帝祭天,供奉神灵时恢弘的场面。更让人惊讶的是,在穷乡僻壤的乡村也能找到装饰华美的器物。在这里,毛姆似乎看到了《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展现的富丽堂皇的东方帝国。

毛姆在中国的山川城郭间旅行,他看到的是落后贫穷、山河破碎的中国。他以“他者”的眼光,来揣摩中国人的性格和生存状态,一方面,难免有错位,甚至有贬低或丑化;另一方面,他对东方文化充满了好奇,不断挖掘东方文化的原始光彩,他似乎又看到了曾经地大物博、富庶无比、有着悠久灿烂文化的古老中国。在这片魅力无穷的东方乐土上,呈现出令人敬畏的长城、精雕细琢的飞龙、富丽堂皇的建筑、富有诗意的园林艺术以及满腹经纶的儒雅学士。这既是毛姆带有西方优越姿态的书写,又是不断找寻在文化记忆中保存下来的西方集体无意识的书写——最早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便是充满了异国情调和传奇色彩。

参考文献:

- [1] 转引自李正国. 国家形象概论[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
- [2] [英]毛姆. 在中国屏风上[M]. 唐建清,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 [3] 孟华, 主编. 比较文学形象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4] [英]毛姆. 面纱[M]. 阮景林,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6.
- [5] 尹萍. 艾·巴·辛格小说《傻瓜吉姆佩尔》之犹太性解读[J]. 白城师范学院学报, 2016(4).
- [6] 王寅生. 西方的中国形象[M].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4.
- [7] 周宁. 龙的幻象[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4.

(责任编辑 刘海燕)

Culture “The Other” in the Image of China

——A Case Study of Maugham's *On a Chinese Screen*

YIN Ping^a, QI Guo - jiang^b

(a. School Of General Education; b.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ihe University, Heihe, Heilongjiang 164300, China)

Abstract: The travel note *On a Chinese Screen* was written by English Writer Maugham when he travelled in China. It paints a bizarre image of China by visiting the landscape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as well as the cultural landscape. At the same time, he describes the living conditions from the high - rank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the ordinary people. It embraces the Utopian image of China in the culture “the other” and the image of collective unconscious. Meanwhile, it embodies the social,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paradigm of the writer's group.

Key words: Maugham; culture; image of China

在新的现实中召唤先锋的能量

——评墨白的“谋杀与终结”系列中篇小说

吕东亮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摘要:墨白的系列小说“谋杀与终结”以“颍河镇”为共同的叙事背景,集中展现了墨白在先锋小说方面的探索。这些小说受到新历史主义文学观的影响,也继承了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对存在的关注和勘探,展现出墨白在中国底层困窘生活情境中对于生存发现和思考。这使得墨白的先锋小说写作走出因袭和拘泥,从而拥有了鲜明的中国气质和强烈的时代呼应能力。

关键词:先锋小说;新历史主义;存在;中国气质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5.005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5-0018-04

作家墨白将他的“颍河镇”系列中篇小说命名为“谋杀与终结”。这一系列小说包括《霍乱》《三兄弟》《奇死》《谋杀者》《弑父者》《终结者》和《幽灵》。七个中篇讲述了七个结实饱满、相对独立的故事,七个故事有一个相同的发生地——颍河镇,这是连接七个故事的唯一链条。以小镇作为文学故乡,作为情节和情绪的源生地,在当下的写作中并不少见。但“谋杀与终结”所建构的颍河镇,并不是一个格局完整、人物毕现的质实真切的小镇。

在这个中篇系列小说的书写中,颍河镇虽然有河流、有码头和仓库、有医院和光荣院、有酱菜场和药铺,但这些景观并没有呈现出一种结构性,只是作为虚化的背景参与了故事的生成。如此处理,和作者的创作抱负以及相应的小说艺术品质有关系。作者致力于精神空间的探询,实存的物质空间自然不用着意描绘,只需赋予其感觉气息即可。七个故事时间跨度60年,在作者看来是一个轮回,“轮回”的观念是作者压在纸背的东西,这也使“谋杀与终结”迥异于惯常的史诗性写作。在小说中,也有一般小镇叙事中所屡现的仇杀、阴谋、疯狂、倾轧、情欲甚至

乱伦,但弥漫在文本中令人挥之不去的是对存在的复杂莫名的感觉,正是这种感觉使颍河镇如无物之阵,围困着我们的灵魂。

整体来看,“谋杀与终结”的先锋小说的气质是浓郁的,这缘于作者长期以来对于先锋写作的坚守。先锋小说异军突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趋于衰落。当年的代表性作家马原、余华、格非等或者长期辍笔,或者转向“与现实和解”的常态写作。这一转向是深刻的,有着多重的意识形态背景和纷纭的文化逻辑。但先锋小说的衰落是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衰落,先锋的气质和精神则已注入到这些作家的写作中,也改造了并继续改造着文坛的写作生态。在一时显得浩浩荡荡的转型潮流中,墨白以坚守先锋的姿态而显得格格不入。墨白的坚守有其刻骨铭心的生存经验作底,在创作上也表现得自立不俗、风骨凛然。这一坚守不是没有代价的,先锋小说所面临的困顿也一样会在墨白小说的创作中表现出来。比如先锋小说叙事形式在80年代所携带的革新能量已经耗尽,先锋小说在80年代所崇尚的理解现实、历史的方式也渐趋固化,并因此而丧失解释现

收稿日期:2017-08-12

基金项目: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4CZW011);2014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2015年度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人文社科类)项目;2017年度河南省高校社科优秀学者支持项目(2017-YXXX-18);信阳师范学院南湖学者青年计划支持项目

作者简介:吕东亮(1980—),男,河南新郑人,文学博士,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实的效力。也就是说,先锋小说初生时所面临的他者、所攻击的敌人已经不见踪影了,先锋小说的持续成长就成为一个尴尬的话题。在关于墨白的许多访谈中,我感到这些问题事实上对墨白的写作也构成了压迫。这使得墨白的坚守以及坚守中的写作显得艰苦卓绝,他需要克服先锋意义的弥散,需要在新的现实文化语境中激活先锋的能量。“谋杀与终结”反映了墨白克服这种文化窘境的努力,也显示出为先锋写作寻找新的契机的旨趣。应该说,这种努力和寻找是有成效的。

一、新历史主义风潮下的书写

作为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作家群体中的后来者,墨白最初的先锋小说写作,不可避免地带有模仿的痕迹,一些情节的设置和叙事手法的运用不难看出其中的因袭的意味,这也使得他早期的小说给人以拘泥之感,缺乏自有的气象和独特的文化关怀。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谋杀与终结”中的《霍乱》和《三兄弟》是典型的新历史小说,故事中那种糜烂、颓废、阴霉的南方气息也是先锋小说所特有的。尤其是《霍乱》,让人想起格非的先锋小说名作《迷舟》。孱弱的知识者回到颓败的故家,本想获得片刻的喘息,却被异样的气氛和病态的人物包围着,陷入亲戚纷争与战事阴谋相交织的危险境地而不自知,最终成为强者欲望的牺牲品。权力、阴谋、情欲既存在于微末的家族的历史中,也存在于略显宏大的战事中,既遥远又迫近,构成了小说内在的张力。《三兄弟》也是如此,小说中那个妖娆的女性荷花成为叙事的聚焦点,左右着三兄弟的归去来,归来的老二、老三在寻找疑惑答案的过程中逐渐揭示了家庭内部的隐秘和腐恶,却最终无法改变占有财产的阴险毒辣的老大获胜的结果。

《霍乱》和《三兄弟》中的小说元素是相似的,作者处理这些元素时就像一个贪玩的孩子在乐此不疲地玩弄手中的魔方,翻来覆去的编码确认了胸有成竹的历史观,即历史由欲望而推动,人是欲望的囚徒并因此而挣扎,最终在历史的不可把握中陷入悲剧性的徒劳。这是新历史小说通行的史识,在其盛行的年代,对于瓦解宣扬历史确定性的宏大叙事确有摧枯拉朽的能量。《霍乱》和《三兄弟》也可以放在新历史小说的脉络中去考量。但这样的写作显然是难以为继的,因为以欲望来解释历史的史识是可以穿透一切历史过程的,这就必然造成书写的重复。事实上,很多新历史小说陷入了严重的自我复制,历史背景的更换也流于换汤不换药的俗套。如此的史

识和书写到了今天则已被大众文化所转包,在一些宫廷剧及悬疑、仇杀等类型小说中被泛滥性地消费。墨白先生显然及时洞悉了先锋写作在文化场域中被裹挟、被污名化的境遇,他把先锋的注意力投入到普通人日常生存情境的荒谬性发现上。于是有了“谋杀与终结”中的《奇死》和《谋杀者》。

二、生存荒诞性的聚焦式呈现

与《霍乱》《三兄弟》相比,《奇死》和《谋杀者》的现实气息明显浓郁一些,这里的现实更多指的是实存、实在方面的意义。《霍乱》《三兄弟》中的历史时空也是现实之一种,但稍显苦心经营的滞涩,也多多少少带有和先锋小说趣味相异的典型化特征——典型的病态人物和典型的阴郁环境。《奇死》和《谋杀者》的实在感和人物的生命体验是浑然一体的。《奇死》中的陈坤,其振兴酱菜场的生命意志,原本也积极向上,但在被利益异化的亲情的啮咬和自我情欲的沉沦中无法遏止地走向萎顿。小说中,环绕着陈坤的空气是沉闷的,相应的情感也是压迫性的,混乱中的躁动、溃败中的挣扎以及由此而来的恍惚之感是陈坤生存的常态,他找不到意义感的稳定来源,也无法获得抗争的力量。小说还有一条副线是关于谭万振的复仇叙事,这一叙事为小说增添了神秘感;但综合地看,并没有为小说增强张力,相反还使得小说有堕入俗套的危险,一些旁逸斜出的细节也因此显得故弄玄虚。

《谋杀者》的故事发生在病院,这是现代主义文学偏爱的文学场景。故事的主人公苏警己是一个适宜做精神分析的样本形象。苏警己的童年是充满压抑的,母亲因偷情而被游街带给自己挥之不去的羞耻感,同伴的欺凌则带给自己刻骨铭心的创伤性记忆,这使得苏警己在通往成功的途中内心隐匿着一种攻击性的元素。这样一种元素在苏警己满足于现状时是被压制的,偶尔的显现也不足为患——比如凭借医生的权威和技术手段对于姜仲季的制服。一旦他内心的平衡状态被不公正地打破时,这种攻击性就演变为谋杀。小说中,苏警己对于白冰雪母亲的医治是有成效的,但遭遇的却是白冰雪对于感情的背叛。这种现实无疑是残酷的、荒诞的,一度恢复自信的苏警己不能接受,也唤醒了苏警己的耻感记忆,进而激起他报复攻击的冲动。

小说中的另一场谋杀的真相是被悬置的,被谋杀者秋霞是一个美丽的女人,是苏警己和姜仲季共同的同学,也是共同的欲望对象。两人对秋霞的争夺从少年时代一直延续着,当苏警己同样凭借医生的权威和技术手段在争夺中获得绝对优势时,作为

病人的姜仲季采取决绝的方法消解了苏警己的优势——这是小说的暗示,真相一直是被作者处理为空缺的。苏警己和姜仲季作为谋杀者,畸形的欲望和生命状态是谋杀的动力。但以欲望作为动力阐释显然是较为宽泛的、不精准的。小说显然没有停留于此,小说中写到的院长、卫生局长以及拥有城市背景的俘获白冰雪的郑楠,都显示了权力以及与权力相关的东西才是真正的谋杀者,权力不仅压抑人、摧毁人,而且可以书写事实,篡改或诠释一个人的死亡——比如苏警己稍微明智些,秋霞的死就可以被处理成医疗中的正常死亡。苏警己无论生命意志如何强盛,在权力体制中,最终也不可避免地沦为和姜仲季一样怪诞的病人。《谋杀者》这篇小说中,可展开的东西还有一些,可能是作者感到暗示、空缺的效果可能更有助于凸显现实的复杂荒诞吧,小说才没有充分铺陈,留下一些存在的可能性作为小说的余味,这样的处理自然也是好的。

三、底层叙事中的“先锋性”探索

与《奇死》和《谋杀者》的探索向度一致,《弑父者》《终结者》和《幽灵》中的先锋锐角刺进更广博、更深层的现实。三篇小说中的现实图景是庸常的,但正因为庸常,存在的本相才呈露无遗。《弑父者》的信息量极大,架构也可以扩展成长篇家族小说,但作者着意书写的显然不是那种被高度附魅化的文化形态,因而所谓家族也是底层的家庭形态,家庭的黏合没有任何的文化元素;相反家庭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处所,家庭生活也是暴戾恣睢的生活。家庭的起源是不洁的,衍传过程就更加不堪。乱伦、偷情、殴斗、阴谋、灾祸,构成了小说的全部细节,生活的重压以及重压下的愤恨、仇怨最终推进到弑父这一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看似汇集而来、甚至有堆砌感的黑暗情景并没有任何虚张,处处都有现实的苦难作底,历史的逻辑作支撑。

《弑父者》可以视为典型的民间书写或底层书写。和文坛一度流行的民间书写相比,它没有张扬民间的那种自由欢乐的生活精神;和新世纪以来的底层书写相比,它也没有刻意申说底层苦难中所蕴含的对非公平非正义的承受以及由此而来的道德优势;它甚至也不好被阐释为鲁迅式的揭示愚昧麻木国民性的书写。这些书写都太过于知识分子化了,投注的都是知识者出于自身生活乏味或是知识学意义上的义愤因而显得一厢情愿的目光。作者与这些书写划清界限,选择直面生存景象的惨淡和生存意义的虚无,呈现了真实的民间生态和底层处境。如此的书写不能不说是独树一帜的。

《终结者》讲的是颍河镇光荣院里的故事。光荣院住的都是立下战功的革命前辈,但时光的变换逐渐消解了“光荣”所依凭的意义体系,养老院仓库里并列停放的棺材象征着并催促着意义的溃散。在溃散中,养老院里的老军人都在利用残剩的价值去谋求或交换一点可怜的现实利益;掌控权力的院长以及背后的民政局长则乐于看到这种溃散并从中攫取利益;身处底层的虾米——名字揭示了他的被损害的底层境遇——则不断地被折磨、被伤害以至于丧失梦想的权利。小说的隐喻意味是深长的,光荣院里居住的老军人曾经是为被侮辱的、被损害的底层人民利益揭竿而起的革命者,但革命成功之后似乎并没有改变什么。具体到光荣院里,虾米依然被欺凌,欺凌者中就包括这些乖张变态的曾经的革命者。小说给人的轮回之感和无意义之感是强烈的。故事的题目“终结者”则点出了小说的“寓言性”。“寓言”是本雅明所推崇的小说形式,墨白也娴熟于此道,这里则以颍河镇的光荣院“寓言”了曾经固有的宏大象征体系的坍塌。

象征的坍塌之时也是存在真相的裸露之时。这种裸露在《幽灵》中表现得最为彻底。在“谋杀与终结”中,《幽灵》的叙述最为素净,也最为沉实有力,削减了其他作品中过多的以至于令读者有充斥和粘贴之感的梦境、幻象和记忆,素面朝天、单刀直入,在墨白小说中和《父亲的黄昏》的气质相类似,可能是墨白最值得推重的作品。小说写的是颍河镇农村的生活,乡土的贫瘠、生存的局促是昭然的,纷至沓来的生活重压,以及重压之下的心灵的积愤沉郁被作者书写得淋漓尽致。小说呈现于表面的情节感并不强,为故事注入张力的是人物心灵的强度。作者叙述的控制力很强,小说的节奏感亦把握得很好,在从容的叙述中,人物内心随着细节的呈现而逐渐积蓄力量,直到最后随着现实的爆炸而毁灭性地爆发。

《幽灵》当然也有它的现实背景,比如90年代初农民负担的急剧增加,改善生活的途径日趋狭窄,以至于冒着生命危险和触犯法规的风险去赚钱养家。当时以及此后,此类叙述是较多的。但像墨白《幽灵》式的重压之下的心灵书写是不多见的,而写出看似平静的生活细流之下累积而成的触目惊心的生活内爆,则更加罕有人匹。这得益于作者犀利的剖析灵魂的先锋视角和营造感觉氛围的先锋艺术。作为“警世通言”来看,《幽灵》自然是有震撼力的,但显然无法道尽小说的涵蕴。还是小说的题目“幽灵”一语道破,“幽灵”这一不在场的在场,这一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所道出的存在,深刻地影响

着甚至雕刻着我们的生活。“幽灵”现身于《幽灵》中,是最后的那场爆炸。爆炸写得实在是好,写出了人物不堪围困、不堪逼压而内心涌现的与生活彻底决裂,进而毁灭生活、毁灭自己的冲动。这冲动存在于每一个对生存之逼仄挤压有切身体验的人心中,只不过在小说中发生的那场爆炸更多地发生在我们的白日梦中而已。

长久以来,墨白作为一名守持先锋的作家是孤独的。这既是文坛的风向所致,也缘于他个人先锋探索的偏执。在我看来,他的一部分作品确实存在遗世独立的倾向,这显然不是先锋小说的品质所在。尤其是一些书写个人经验的作品,存在明显的伦理脱身术与美学易容术相交织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先锋写作的现实批判和存在勘探的锐气。有关这些耿占春、李丹梦等批评家都曾经指出过,我也深表赞同。墨白先生理论修养深厚,也是自我阐释能力较强的作家。这是难得的优势,但有时会妨碍对自己创作的审视。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中,任何艺术处理都可以获得一套严密的解释,从而具备自足性,但也很容易陷入相对主义的虚无中。“怎么都行”是后现代主义标榜的品质,但作为一种反叛精神尚可,行诸于创作,还是无法令人苟同。因而,先锋作为一种值得珍视的品质,首先在于激活自身的能量,去刺破现实,去洞穿现实,虽不同于现实主义的正面强攻,但一定要寸铁杀人、一招毙命。生活永不止息,存在博大无垠。对于思考型的创作,生活同

样重要。贾平凹就直言:“生活会给我们提供丰富的细节。细节的丰腴和典型可以消除观念化带给作品的虚张,使作品柔软而鲜活。”^[1]即便是强调作品的超越性,也不能使之与作品的现实指向对立起来,这正如美国作家赫姆林·加兰所说:“为一切时代而写作的最可靠的方法就是通过最好的形式,以最大的真诚和绝对的真实描写现在。”^{[2]⁸⁴}在墨白的《谋杀与终结》中,“最大的真诚和绝对的真实”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而“最好的形式”于先锋写作已经炉火纯青的作者而言,显然不是问题。

岁月不居。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小说的发生已经30年了。中国的这30年,于文学而言是充满沧桑感的30年。30年之后的今天,墨白的颍河镇也一定有了新的变化。变迁中的颍河镇也一定有了新的故事和经验,也一定会给墨白的小说带来新的存在发现和先锋体验。因而执着于先锋探索的墨白,也一定会在新的现实中重新召唤出先锋的能量,写出属于他自己也属于中国文学的新先锋、新新先锋的作品来。

参考文献:

- [1] 贾平凹. 生活会给我们提供丰富的细节[J]. 当代作家评论, 2006(1).
[2] 刘保端. 美国作家论文学[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4.

(责任编辑 刘海燕)

Summon the Power of the Pioneer in the New Reality

——A Judgement of Mo Bai's Series Novel *Murder and the End*

LV Dong – li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Henan 464000, China)

Abstract: Mo Bai's series novel *Murder and the End* has a common narrative background with “Yinghe Town”, it focuses on the exploration in the avant – garde novels. These novels are influenced by the neo – historicist literary view, and also inherit the attention and exploration of the western modernist novels. They show the discovery and reflection of the embarrassing situation in bottom society in China. These novels make Mo Bai's vanguard fictions out of the attack and stick, so as to obtain a clear Chinese temperament and a strong ability to echo the times.

Key words: avant – garde novels; neo – historicist literary; existence; Chinese temperament

看吧,“我们”的这个世界

——伯恩哈德《声音模仿者》与墨白《癫狂艺术家》比较研究

杨文臣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摘要:墨白的《癫狂艺术家》和伯恩哈德的《声音模仿者》都以“我们”为叙述者,用“止于表面”的讲述,把世人司空见惯的世界撕开一个缺口,极致地呈现出这个世界的荒诞和残酷。不同于伯恩哈德大量使用夸张、变形等现代主义手法,墨白在《癫狂艺术家》中采用了写实风格,因为那些罪恶、苦难和荒诞,就真实地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上演过。隐而不察之物,需要艺术的照鉴;而对于本就血腥残酷的历史和现实,艺术的介入反而有可能导致弱化。

关键词:墨白;伯恩哈德;《癫狂艺术家》;《声音模仿者》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5.006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5-0022-05

在奥地利作家伯恩哈德的系列短篇小说集《声音模仿者》^[1]和中国作家墨白的系列短篇小说集《癫狂艺术家》^[2]中,出现了一个很罕见的叙述者——“我们”。当然,严格地说,“我们”不能同时开口,叙述者只能是一个人,但由于说话的这一个始终不显露任何个体特征,他可以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因而笔者把“我们”作为小说的叙述者。众所周知,相对于第三人称叙事,第一人称“我”更容易引发读者的移情,更容易营造出强烈的现场感。不过,第一人称也有一个劣势,那就是无论在阅读中读者怎样认同于叙述者,无论叙述者的口吻多么真诚,在阅读之后,读者都可能离开叙述者,并以“主观性”为由对其加以拒绝。相比之下,第三人称叙事却较少招来“主观性”的指责,尽管本质上并无不同——无论哪种人称的叙事,都是作家的构建,都无法摆脱主观性的缠绕。从这个角度来说,伯恩哈德和墨白以“我们”的名义讲述故事^①,既赢得了第一人称的那种现场感,又避开了“主观性”的指责,无疑是一种相当高明的策略。

当然,二人选择“我们”作为叙述者,意图不仅于此。因为集体身份的限制,叙述者的讲述只能

“止于表面”^{②[3]141},既不能在个体好奇心的推动下对事件深入追索,也不能对事件和人物展开长篇大论。不过,伯恩哈德和墨白却巧妙地利用止于表面的讲述,把人们司空见惯的世界撕开一个缺口,面对这个缺口我们如临深渊,一股森冷之气瞬间袭遍全身……我们恍若从一个做了很久的迷梦中惊醒!再环顾四周,看到的是影子一般到处游走的人们,醉生梦死、麻木不仁又自以为是、执迷不悟。这就是我们的世界!

一、《声音模仿者》:醒世寓言集

“声音模仿者”成功地模仿了许多著名人物的讲话,“我们”要求他模仿下自己的声音,他却回答说办不到。两位哥廷根大学教授登上高山之巅,先后用观景望远镜眺望美景,一位被美景征服,另一位却在发出一声刺耳的大叫后倒地而亡。这是伯恩哈德在《声音模仿者》和《美丽景色》中分别讲述的故事。

模仿自己的声音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无需任何技法,把声音发出来就行了,但“声音模仿者”说办不到,因为他根本没有自己的声音。这个世界上,触目皆是“声音模仿者”,人云亦云,毫无思想。代

收稿日期:2017-08-05

作者简介:杨文臣(1980—),男,山东兖州人,文学博士,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与批评。

表著名人物的两位大学教授是“声音模仿者们”模仿的对象,面对同一个世界,他们看到了截然不同的景观。在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性话语几成陈词滥调的今天,这个故事的象征意味不难揣明。不过,睹世伤情的那位死去了,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人们只能接受年纪更大、学问更高因而也更具权威的那位教授的说法:美轮美奂,歌舞升平!

不过即便明察世事者不死,也会被送进疯人院。《断言》中的那个奥格斯堡人,就因为坚持歌德去世前最后的话是颇为消沉的“就这么多了”而不是鼓舞人心的“更多的光”,惹恼了公众,被送进疯人院。将其送进疯人院的那位医生还受到了当局表彰,荣获法兰克福市歌德纪念章。说真话或持异见者被迫害放逐,而维护谎言或权威观念者却被视为英雄。《放弃》中的音乐家、画家和自然科学家倒是没有被送进疯人院,他们三个选择了自杀,“因为这个世界不再拥有与他们以及他们的艺术和科学相适应的接受器官和接受能力了”。《不谙世情》中的天才艺术家同样因为没有人能读懂他的东西而投湖自尽,“在死者的尸体被打捞出来之后,当地报纸关于这位未受到赏识的人发表了一则简短的消息,着重指出他不谙世情。”

人们的接受和理解能力何以会退化?“世情”何以会变成这样?人们何以如此抵触“离经叛道”?无论他们自己认同的“道”是否合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专制权力的规训。

《比萨和威尼斯》中,两位市长预谋调换下地标建筑,将比萨斜塔迁到威尼斯,将威尼斯钟楼迁到比萨。他们没有成功,预谋泄露后被双双送进疯人院。“意大利当局这件事办得干净利落,秘而不宣。”变革现有秩序是绝不允许的,不仅变革行动会遭到无情的镇压(“干净利落”),变革思想也不允许流传(“秘而不宣”)。《归来》中的那位叛逆的艺术家也被送进了疯人院,他热爱的故乡用仇恨和诽谤迎接他的归来。相比之下,《难以设想》中的剧作家要幸运得多,不仅得到了认可,作品还在当时最好的一家剧院上演。作者特别强调,被认为最好并不等于确实是最好。可让人意想不到的,剧作家在看过演出后,竟然控告剧院经理,要求交还他的剧,同时还要求观众把看到的一切退还给他。法院没有审理他这种“难以设想”的控告,反而把他送进了疯人院。而我们知道,剧作家之所以提出这种控告,是因为他的作品已被“最好的剧院”涂改得面目全非。

又是疯人院!这不禁让我们想起米歇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阐发的命题:疯狂是权力话语和医学话语合谋对异己话语进行压制的产物。《没有心灵》中,医生只对身体感兴趣,某学者因所谓古怪异常被送进了医院,做完身体检查后,他问医生:“那么心灵呢?”医生马上回答:闭嘴!小说就此结束,可以想象,这位重视心灵的学者也终将被送进疯人院。权力对人的规训不只发生在医院中,它无处不在。《九百九十八次》中,讲述了一个高中生在弗洛里茨多尔夫桥上走了九百九十八次后昏倒在地,原因是上学路上被“对学校的恐惧”所控制。我们不知道他在学校里经历了怎样的心灵压制,但我们能确定的是,在学校之外他也不能获得解脱。昏倒后他没有被送往医院,而是被送到弗洛里茨多尔夫尖形广场的警察值勤处——“尖形”是权力监控一切的空间象征。

放逐了思想者,清除了思想杂音,扼杀了心灵和自由,世界就变成了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也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秩序。如《邮局》,讲述了生活中一个很普通的事件,“我们”的母亲去世后数年里,邮局仍继续将写着她姓名和地址的信件投递给她,而没有注意到她的去世。似乎没有理由去指责邮局,他们的职责是投递信件,客户的生死与他们无关。我们都有自己的职业,都像邮局一样行使职责,把他人当作管理或服务的对象,这个世界也因而像机器一样有条不紊地运转。可是,谁来关注人本身,生命关怀和人文关怀该如何安放?《决定》中,官员在城市遭受地震后,下令用机器把那座完全坍塌的饭店推平,而不是清除瓦砾,搜救幸存者。由于被埋的几百人的叫喊声实在不能让人心安,他进一步指示,封锁饭店所在地直至喊叫声消失。这位官员的做法是为了给国家节约高额的搜救费用以及将来赡养伤者的巨大开支,从大局角度来看,也不失为忠于职责,自然也得到了国家的肯定,仕途升迁指日可待!《议会里的发问》中,面对中小学生自杀率比上年增加一倍的问题,萨尔茨堡州议会的一位议员关注的是:两年间自杀地点的变化——去年孩子们多跳河或跳下山岗,而今年一个工人家庭的孩子从华丽的洪堡平台上跳下——是否表明工人阶级已经上升到有产阶级?他的答案是肯定的。在他看来,一个城市被评价得越是美丽,自杀率就越高。所以,一切都很好!

死亡都能成为进步的证据,还有什么能阻止对

这个世界做出至高的评价？在权力话语营造的尽善尽美的幻象下，苦难不是消失了，而是越来越多，只不过人们失去了感受和言说苦难的能力。《两张纸条》的图书馆员和猎手自杀了，他们留下纸条宣称不能再忍受人们遭受的不幸。可以想见，在“声音模仿者们”的眼中，他们不是怪人，就是发疯了。

二、《癫狂艺术家》：走进历史深处

墨白非常欣赏现代主义文学，对卡夫卡有着极高的评价，作为先锋小说家，他的很多作品中也不乏现代主义技法。但在《癫狂艺术家》中，他回归了写实风格。因为，伯恩哈德借助于夸张、变形等手法讲述的罪恶、苦难和荒诞，就真实地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上演过，单单讲述出来就足以震撼人心了。隐而不察之物，需要艺术的照鉴；而对于本就血腥残酷的历史和现实，艺术的介入反而有可能导致弱化。

在《首长》中，墨白讲述了一次邂逅。在锡铁山以南40公里处的万丈盐桥上，“我们”见到了寻找出走妻子的首长一行。健谈的警卫员告诉“我们”，首长的妻子是个貌美如花的高中生，以女兵的名义被征，召到了边疆，然后被强行“分配”给了大自己几十岁的首长做妻子，结婚那天她就疯了，之后多次出走。十万大军屯垦戍边，数万女兵报国赴疆，历史留给后人的是这样荡气回肠的篇章，没人知道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我们的卡车沿着光滑如镜的万丈盐桥离开时，我们又朝正在消失的海市蜃楼看了一眼。我们知道，在那美丽虚幻的景象下面，就是广阔的受风沙侵蚀的盐湖。
(墨白：《首长》)

行走在大漠深处的“我们”不期闯入了历史的深处，否则我们可能永远无从得知“海市蜃楼”伪饰下的历史是什么样子。

“我们”是谁？在不同的故事中，“我们”的身份各有不同，《按摩师》中“我们”是盲人按摩师；《追捕者》中，“我们”是刑侦队员；《流放地》中，“我们”是勘测队员；还有一些篇章中，“我们”似乎是带有采风意向的游客……不过，“我们”的声音却是一致的：“我们”总是结识到某些奇怪的人和事，然后引出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让“我们”悚栗不已，并沉陷在深深的怀疑和思索中。就对历史的认知而言，“我们”和芸芸众生一样，被历史的假象所蒙蔽，即便曾听说过一些事情，也如同听到一个遥远的神话，

无关于己并抛之脑后。但“我们”又不同于芸芸众生，因为“我们”总是能邂逅到真实的历史。

伯恩哈德在《国王陵墓》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二战以来的某个时间，因为一个克拉考人在瓦维尔山国王陵墓听到从波兰末代国王的石棺里传出了国王颂歌，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参观陵墓并像他一样倾听国王颂歌。当局逮捕了这个男子，并封闭了瓦维尔山，对每个上过山的人严格审查。现在瓦维尔山上的国王陵墓早就重新开放了，没有人还记得上述这段往事。国王颂歌的影射意味，我们在此姑且不论。当局曾经试图抹除真相、封锁历史，不惜诉诸暴力，现在解禁了，没有了暴力的震慑，可人们却失去了追索真相的兴趣，历史已被遗忘。或许正是由于人们如此善于遗忘，当局才重新开放了国王陵墓。和被迫缄口相比，主动遗忘更可怕！

事实上，历史并未走远，也是无法抹除的。在墨白的小说中，“我们”总能与历史不期而遇。甚至可以说，历史一直在发出声音——就像《护士》中那位女士的讲述每天都在进行，只是，以保洁员和年轻情侣为代表的庸众群氓们对此听而不闻，他们已变成伯恩哈德笔下的佩拉斯特人。在《佩拉斯特》中，“我们”想知道佩拉斯特那些破败的宫殿属于谁，历史对此没有记载，但被问到的人总是笑笑便转身离去。原来，佩拉斯特已经没有了正常人，他们都是由国家定期供给“食品”的精神癫狂者。

《首长》《护士》《枪手》《弹孔》《陪法场的人》等，墨白椎心泣血地讲述着猖狂的权力曾经如何肆无忌惮地剥夺人的生命，践踏人的自由和尊严，曾经如何以崇高的名义犯下最卑劣最暴虐的罪行。这些作品中的故事之悲惨和令人发指，让人不忍转述。我们会认定伯恩哈德的《两张纸条》使用了夸张的手法，图书馆员和猎手只是作者虚构出来的符号式人物，但在墨白的《记者》中，他们进入了我们的历史。那个姓鲁的新闻记者，不忍面对60年代初饿殍遍地的惨象，自绝于鸡公山一座荒凉的别墅中，死前给后人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真实影像和文字资料，还有血泪斑斑的控诉——用血在当时的一段信口雌黄歌功颂德的社论文字上写下了“谎言”两个字。《记者》带给我们的震撼，远远超出了《两张纸条》。

有人会不耐烦，何必纠缠于过去？为了不变成佩拉斯特人，我们必须铭记历史。一方面，长期匍匐于权力之下造成的奴性，依然根深蒂固地盘踞在我们的人格中。《纪念碑》的故事背景是1994年发生

在克拉玛依的那场大火。“孩子们，不要动，让领导们先走！”这句耻辱的话出自一位女领导之口，她喊出这句话时是否清楚地意识到她是领导中的一员，或者说，她是为了作为领导的自己活命还是为了她的领导活命，我们不得而知，没有相关报导。但我们可以想象，这句话也完全有可能从一位会场工作人员或普通教师口中喊出来。工作和生活中的一切场合，发言、拍照、宴会、坐车等等，我们都是“让领导先……”这几乎成了我们的下意识，即便有时领导不是我们的领导，我们也会“让领导先……”如果没有无处不在的深入骨髓的对权力的膜拜，可能会有夺路而逃者，但不会有女领导那般极致丑陋的表演。我们并没有真正从那个丧失精神自我的年代里走出来，所以墨白把“心灵的自省与自救”^{[4]17}作为文学的首要使命。另一方面，权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敛起了过去那种明火执仗的嚣张气焰，但依然高高在上惟我独尊，依然在压制着民主和自由。“我们”的老师奔走多年最终没有达成心愿，旨在警世的纪念碑最终没有树立起来，甚至“我们”用原盐浇筑的那座暂时的纪念碑也因当局不予批准而无处安放，没有与世人照面便很快融化了。

到了第二年的十二月八日，那座雪白的纪念碑已经变得千疮百孔，我们老师雕刻在底层上的那些浮雕已经面目全非。

或许，比纪念碑融化得更快的，是人们对这件事遗忘的速度——这就是我们的世界！（墨白：《纪念碑》）

三、结语

责之愈切，爱之愈深。无论伯恩哈德还是墨白，都没有放弃对世界、对人性的信念。伯恩哈德的《在女人沟》是《声音模仿者》中少有的“温暖”的篇章。“我们”在奥拉赫河谷碰到了一个沉默的男子，后者在聊天时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他在寻觅一个妻子，“我们”于是恶作剧地怂恿他半夜三更去一个叫女人沟的不见阳光的地方，那里住着一个完全残疾、酷爱动物的老女人。让我们意外的是，那男子一去不回，十年后从沟里出来和那位女人在教堂里成了亲，然后又回到沟里住了十年没有露面，据说他们生活得很幸福。

墨白《癫狂艺术家》中也有“温暖”的故事，并与伯恩哈德相仿，他把故事空间安放在了遥远的西域。在那里，麦吉依一生都在唱着十二木卡姆，寻找情人

阿依古丽，后者十五岁时跟随父亲去遥远的麦加朝觐一去不回，麦吉依因而成为人们心中忠于爱情的偶像（《寻找歌手》）；在那里，有位老人几十年来执着地用坎土曼在叶尔羌河畔的胡杨林中挖掘，他在寻找因河水漫溢而失去了标记的妻子的坟茔，他答应过那位薄命的上海女子，要把她带回老家去，他要兑现自己的诺言（《胡杨林》）；在那里，沙吾尔·芒力克老人活得笃正坚忍，死得从容安详（《葬礼》）；在那里，银匠父子一生都在流浪，跋山涉水寻找亲人，备受当地人尊重，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间谍罪”显得那样地鄙琐无聊……

笔者之所以给温暖加上引号，是因为可以感受到伯恩哈德和墨白讲述上述故事时的忧伤，即便前者摆出不动声色的姿态。墨白在《胡杨林》的结尾写道：

我们站在叶尔羌河畔，注视着倒映在河水里的胡杨树，那被河水摇曳着的金黄色，使我们突然萌生了一种遥远的孤独。

之所以孤独，是因为胡杨林之外，大漠之外，美好的人性已不复存在。正如席勒所说：“在一个污浊纷乱的时代，诗要追慕自然、表现理想，不能不是感伤的。”^{[5]165-166}这也是墨白和伯恩哈德的故事空间设置的深意所在。相比伯恩哈德，墨白要温和一些。伯恩哈德的“我们”多扮演《在女人沟》中的角色，以反面形象参与到故事中；而墨白的“我们”，则多作为有良知的见证者出现，吁请读者和“我们”一起思考、前行。

在戈壁的深处，在这黄昏来临的夜晚，我们感受到了生命与灵魂的歌唱，麦吉依，在你那混合了热血和泪水时而悲壮高昂时而低迷婉转的歌声里，终于让我们找回了前往的方向。”（墨白：《寻找歌手》）

是的，只要我们勇于反思历史、省察自身，只要我们找回前行的方向，这个世界就还有希望。

注释：

①虽然两部集子都各有一些作品叙述者没有亮出“我们”的身份，但这些作品与其他作品叙述者的声音是一致的，一篇篇连续读下来，在读者的阅读感受中，“我们”就不断地从一篇迁转到下一篇，成为了整部集子共同的叙述者。

②戴维·洛奇把“止于表面”视为小说艺术手法之一，认为“文本拒绝评议故事人物或情节，拒绝给读者提供明确的指引以供衡量角色时思考——许多读者会颇受这类文本的困扰；可是，这毫无疑问也是故事的力量所在，是它吸引

人的特点。”

海译文出版社,2010.

[4]墨白.我为什么而动容[C]//杨文臣.墨白研究.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

[5][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张玉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刘海燕)

参考文献:

[1][奥]伯恩哈德.声音模仿者[M].马文韬,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

[2]墨白.癫狂艺术家[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

[3][英]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M].卢丽安,译.上海:上

Look, the World in Which We are Liv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ernhard’s *Voice Imitator* and Mo Bai’s *Mad Artist*

YANG Wen – che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Henan 464000, China)

Abstract:Both Bernhard’s *Voice Imitator* and Mo Bai’s *Mad Artist* use “we” as the narrator, and they use the “surface” narrative statement to give fully expression of the absurd and cruel world. Different from Bernhard’s extensive use of modernist technique, such as exaggeration and deformation, Mo Bai adopts realistic method in *Mad Artist*, because the evils, sufferings and absurdities are truly happened on our land. For those hidden cannot be seen, they need to be identified by the art. As for the bloody cruel history and reality, the art of intervention may lead to weakening.

Key words:Mo Bai; Bernhard; *Mad Artist*; *Voice Imitator*

(上接第 8 页)

评论,2015(1).

[3]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中华书局,2016(11).

[4]郑杭生,张亚鹏.社会记忆与乡村的再发现[J].社会学

(责任编辑 谢春红)

Study on the Complex of Farm Work Memory in *Tuohe Memory*

LI X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Tuohe Memory* is a novel with the theme of educated youth. Dong Kelin, the author of this novel, with his unique perspective as an educated youth himself, he recalled his glorious memory, which was educated youth learned from the countryside with the natural and simple Eastern Henan language. The novel records the deep feeling of farmers and educated youth, depicting the passionate and pursuits of that generation. The agricultural memory of *Tuohe Memory* is not just a literature description, but also a social, historical and valuable literature. It is not only the novel of educated youth, but also the historical epitom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vicissitude of China’s rural areas. It is not only the personal memory of the author, but also the social memory that can stimulate the identity of the group. The novel has a certain aesthetic judgement, a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s.

Key words:*Tuohe Memory*;memory of farm work; complex; aesthetic state; cultural value

墨白小说中叙事时间的形式和价值

张延文

(郑州师范学院 文学院, 郑州 450044)

摘要:墨白在小说创作当中具有鲜明的时间意识,这体现在他对梦境、幻想、记忆和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和认识。墨白重视小说中人物自身的时空经验,构筑出具有独特风格的时空体构型的艺术世界,从审美的精神尺度,为我们体察时代生活提供了丰富的有益的可靠的借鉴。

关键词:墨白;叙事时间;时空体构型;艺术真实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5.007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5-0027-04

当代小说叙事中,摆在小说家面前的头等大事就是如何叙事,而叙事自然离不开叙事时间,我们甚至可以说,对于时间的处理和把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决定着小说这门古老的艺术如何焕发出新的生机。小说从讲故事到叙事,也是从重视故事时间到重视叙事时间的转换。作为人类描述物质运动过程或事件发生过程的一个基本的参数,时间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小说家对于人类社会的发现和探索的意识,可以通过他们对于时间的思考和把握的状况来加以体现。对于读者来说,小说里的时间也是他们能够顺利进入到文本世界里的一把特殊的钥匙。

小说家墨白就是这样一位叙事艺术方面的探索者。对于叙事当中的时间问题,墨白进行了深入而持久的思索,并在其小说创作当中加以实践,实现了叙事理念的创新和发展。墨白在他的长篇小说《映在镜子里的时光》^[1]的题记中写到:

你看,事实正是这样
我们世间每一个活着的人
都是受了死神的旨意
踏行在时间的迷途之上。

这部小说集体现了墨白对于小说叙事时间的理解。这些诗句说明了作为个体生命的人,他的宿命是死亡。既然人的时间看似简单明晰,有起点、终

点,有时序,不可逆;为什么又要将其称之为“迷途”?这就是这部小说将要回答的问题。

同样对于时间问题,物理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文学家的认识方式是不一样的。人类在不停地革新着对于时间的认识,一个好的叙事人对于时间的认识价值到底在哪里呢?

《映在镜子里的时光》的第一部分有一个副标题——“剧组的故事:丁南对时间和历史的认识及其对往事的有些伤感的回忆”。小说一开始就通过主人公丁南对人类认知当中与时间相关的元素,比如记忆、历史等进行了集中的讨论。丁南对剧组的其他人员谈起他对时间的认识,对于时间当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做出了自己的解释,那就是这一切的关键在于人的记忆:

他摊开自己的双手,耸了一下肩,没有什么好说的,一切都是记忆。记忆是什么?记忆就是把昨天的事情和二十年前的事情混搅在一起,记忆就是把你听别人讲的事情和你夜间睡觉做的梦混搅在一起,记忆是靠不住的!所以我们全是一些迷路的孩子。

作为心理学的范畴,记忆是人类的一种心智活动,代表着一个人对于过去活动、感受、经验的印象累积,和环境、时间、知觉有关系,记忆也是人脑进行

收稿日期:2017-08-06

作者简介:张延文(1973—),男,河南方城人,诗人,评论家,文学博士,现任郑州师范学院中原作家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当代诗学、叙事学。

译码、储存、检索等信息处理的过程。丁南强调了人类个人记忆形成的复杂性,不同类型的经验对于记忆的影响,特别强调了心理时间的重要性。

《映在镜子里的时光》描写一个电视剧组前往颍河镇去寻找外景地,剧本是根据墨白创作的另外两部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其中一部是描写“大跃进”时期豫东农村建造风车闹剧的《风车》,另外一部是反映文化大革命时期一起神秘的多人死亡事件的《雨中的墓园》。在寻找外景地的过程中,小说中虚构的环境、事件和人物却在现实生活中意外出现了,并对现实世界的存在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另类侵入。通过巧妙的艺术处理,在《映在镜子里的时光》中,作为集体记忆再现的历史和个人生活的命运交错混杂,产生出了扑朔迷离的艺术效果。墨白将《风车》和《雨中的墓园》这两部中篇小说,作为剧组使用的剧本的内容;当它们成为小说当中的剧本内容后,就出现了全新的时间关系,而剧本不过是这部长篇小说的另外一种叙事的工具。在这部作品当中,通过叙事人巧妙的铺设,一下子就包含了至少四个到五个层次的时空关系;这些时空之间互为表里,枝蔓交错,构筑了一个庞大的时空的迷宫。墨白试图通过叙事的方式来引领读者进入到时间的迷宫,以探寻人类心理和精神世界的奥秘。

在书的后记《梦境、幻想与记忆》当中,作为叙事人的墨白对此发表了个人看法,他指出:

记忆使我们能回忆过去,回忆过去那些我们亲身经历的事情,同时也能让我们回忆起我们的梦境和幻想的内容。……我们现实生活里的每一个人对世界所承担的责任,都通过他对梦境、幻想与记忆的陈述变成了一种衡量世界精神的尺度,同时他还告诉我们,那些我们所经历的,现实的和将来的,这一切与时间有关的精神和物质的内在的联系。

墨白特别强调了梦境、幻想等主观的精神因素对于客观的物质的现实世界的影响,在他看来,一个人只有以独立的人格去存在、思考、创造,才能真正理解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部小说对于理解墨白的叙事理念至关重要,他说:

《映在镜子里的时光》写于1998年,应该说这是我对梦境、幻想、记忆和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理解和认识,也是我对时间的理解和认识,同时也是我的历史

观。那个时候我只看过达利的一些作品,对布努艾尔、夏加尔还有塔可夫斯基都不甚了解,当然对梦境和幻想与记忆的认识还没有现在这样的清晰,当我重新看完一遍《映在镜子里的时光》的时候,我才感悟到,实质上,她已经具备了这种特质和精神。^[2]⁴²⁴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墨白对于时间问题的思索从未停止过,他从东西方艺术大师那里汲取着精神营养,形成了自己作品独特的美学风格,这种风格恰恰也是墨白自身卓越的精神品质的一种体现方式。

除了小说之外,墨白还从电影、绘画等不同门类的艺术作品当中汲取有益的经验,丰富自身对于时间的理解和认识,这其中包括大量东西方艺术大师的经典作品。早在1995年初发表于《收获》上的中篇小说《重访锦城》当中,墨白对于时间、记忆和梦境等就有创造性的运用。《重访锦城》中,男主人公谭渔在冬日到一个小城去探寻早年的恋人锦,通过和几位女同学的接触,去发现深藏在往事里的隐秘和悲痛。谭渔深陷在过去和现在交织的时间乱流当中,记忆、流言、幻想为本就迷离的悬案打上了一层浓郁的暗影,从而让我们得以洞察深隐于虚无背后的真实。这种艺术效果是线性叙事无论如何都无法达到的。人物内在的精神世界,如何在多元、混杂、扰攘喧嚣的尘世当中,保留其特有的品质和风貌,同时又恰如其分地还原事件在不同时期所具有的空间特性,这就要求叙事人拥有自觉的时间意识,同时又能够将艺术作品当中的人物和自身隔离开来,赋予其鲜活的生命力,让其拥有属于“他”或“她”独有的时空体构型。也可以说,这种独有的时空体构型是一种变动不居的流动着的生命意识,从审美角度被重新唤醒。

2011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和墨白行走在郑州的一个居民小区里,这里是墨白居住的地方,周围是熙熙攘攘的人群,金黄色的阳光吹拂着,墨白忽然说:“要说黄秋雨也是个挺有意思的人。”这句话让我摸不着头脑,“谁是黄秋雨?”

黄秋雨是墨白的长篇小说《手的十种语言》^[3]当中的男主人公,一个突然死亡的画家、教授。当时墨白正在创作这部小说,在墨白看来,黄秋雨不仅仅是一个作品中的人物;他一旦被作家塑造出来,就具备了独立的生存条件,甚至可以说,在写作的过程当中,黄秋雨就已经具备了独立的人格。这也是墨白

小说写作的一个重要的理念,在他看来,作家和他作品当中人物的关系是多元的,作家应该根据人物本身的生存逻辑去塑造人物形象,人物在他特定的时间空间里与各种类型的存在发生着密切的联系,有着自身的梦境和幻想。这也体现着叙事人对于生命个体生存尊严和价值的肯定和强调。由此可见,这种独特的时间意识,是一条贯穿墨白艺术创作的重要线索,具有极强的辨识度。

《手的十种语言》是墨白创作的“欲望三部曲”当中的最后一部,这三部曲分为红卷、黄卷和蓝卷,其它两部分别为《裸奔的年代》^[4]和《欲望与恐惧》^[5]。这三部曲的特点都是浓缩的时间,其中《裸奔的年代》涉及的时间是三天和两个季节,《欲望与恐惧》以及《手的十种语言》更是只有短短的两天的。这种时间的安排增强了小说叙事的戏剧性,人物的命运在短暂的时间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处于漩涡当中的人物必须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将来做出回应。过去和将来这两个时间向度非常巨大,而现在就处于一个时间点上,真实再现了我们生存的现实——一个生存的“黑洞”,所有的一切都在这现实的黑洞里凝固、变形、消解。如果我们想要从中获得什么,就得释放那些曾经有过的生命信息,让其在快速的变幻当中缓慢成形。

墨白善于在有限的时空里设置紧张、深刻的矛盾冲突,展示出一个无限延伸的外部世界,使那些扭曲、变形的小说人物的精神世界,得到深入、细致的剖析。比如《手的十种语言》当中,墨白通过描写黄秋雨生存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存在于这些外部世界里的各种力量,来说明黄秋雨的生命经验为何是那样发生的,他的记忆受到了来自于哪些方面入侵,而他自己的生命经验又是如何通过他的行为去对周围的世界做出回应,并产生影响的。这种复杂多元的外部关系又是如何进一步塑造了黄秋雨的内心世界。黄秋雨的精神生活的资源也是相当丰富的,甚至比现实的经验更为广泛和长久,因为书籍、音乐、绘画等人类的艺术样式当中,大量保存着的也是浩如烟海的生命经验,或者说是被抽象化了的时空塑型,这些都对那些重新与之相遇的生命发生着新的影响。

时间和时间观念是有所区别的,生命个体实际经历的是时间,但感受到的却是时间观念。时间是客观的,时间观念是主观的。不同时代、地域、阶层,甚至同一个人的不同的生命阶段,其时间观念都会

有很大的不同。就叙事来说,一旦一部小说完成,小说作品凝固起来的就是叙事人的时间观念。小说叙事可以把主观的心理时间通过艺术手段让其获得客观的样式,这是我们得以观察那些逝去的时间的基本形式。20 世纪初期,法国思想家亨利·柏格森提出了“心理时间”^{[6][8]}的概念,他指出人类思维活动当中的时间观念区别于物理时间。柏格森的“心理时间”既是对传统的基于农业文明的循环的轮回观的反动,也是对工业文明的达尔文式的进化论的反动。它区别于普通的技术理性,是对于人的内在的心灵世界的强调和重视,对于具备了主动性的生命的创造力的颂扬。这些都为 20 世纪的叙事文学提供了思想资源,尤其对意识流小说影响很大。

和任何一位致力于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者一样,墨白在叙事时间方面进行的探索值得我们进行再认识。21 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对于时间的认识有了新的进展,特别是信息社会的来临,虚拟的时间样式开始出现,更新了人类对于时间存在的新理念。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开始,人类对于物理时间的认识就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而到了今天,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结合起来提出了量子重力理论、弦理论、M 理论等等,人们逐渐认识到时间也许是间断的,而非之前认识的物理时间均匀、持续不断的流动状态。大爆炸理论指出了时间有一个起点,霍金曾经在他的《时间简史》^{[7][4]}当中讨论过时间的终点和可逆性。这些都为今天的叙事文学提供了新的叙事理论和叙事主题,比如之前曾经流行过的“穿越剧”。但如何才能把这些科学技术领域里的新发现对应于人类的精神领域,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却显得异常艰难。在技术理性的社会里,人文学科发展相对滞后,我们对于自身经验模式的整理,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障碍。

墨白的小说《手的十种语言》中,有一个场景,一个在凌晨玩偷菜游戏的秃顶男人,他是替老婆值班的在宾馆负责房客登记的前台人员,其真实身份是某种势力安排在宾馆里的一颗棋子,或者说眼线。这个人的存在颇耐人寻味,他自身是一种被工具化的存在,却在忙里偷闲当中干着令他短暂心跳的在小姨子菜地里偷菜的活动。这种脱离了他真实身份的虚拟的生命经验的获取,让我们对于这个秃顶男人的内心世界多了一个认识的纬度。虚拟的生活到底对这个男人起到了什么作用?偷菜游戏是不是只能作为他敷衍刑侦人员的一个借口?小说叙事当

中,人物存在的社会环境的描绘至关重要,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叙事空间是叙事时间发生作用的有效媒介。这进一步为艺术真实提供了细节方面的支撑,也为不同时期的读者对于人类社会曾经存在过的生命经验样式提供了观察的样本。

对墨白来说,他精心构筑的文本世界内部形成了一个与现实世界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又并行不悖的时空体系。这个文本当中的世界一旦形成,就具备了自我发生的能力。墨白曾经绘制过不同时期的颍河镇地图,“颍河镇”——其实只是在墨白的叙事当中存在的一个虚拟的场所,但在颍河镇当中繁衍生息着形形色色的人群,他们验证着颍河镇自身的历史,有着它的气息和记忆。而作为颍河镇的范本的淮阳县新站镇,也就是墨白的故乡,它自身的历史已经不可能再去还原了。我们无法获得新站镇生存过的人群的生命经验,他们的喜怒哀乐早已如过眼云烟,他们的时间已经被尘封起来。但是颍河镇里发生的一切,都还在那里一直上演着,是一幕幕的活剧,哪怕再经历时间的洗礼,也不会有一点

点的磨损和破裂。这就是小说叙事的价值,墨白在用另外一种时间方式来构筑颍河镇的历史,一种被充分精神化了的时间模式,我们可以从中透视这个民族的精神实质。它从时间中来,到时间中去,欣欣向荣,生生不息。

参考文献:

[1]墨白. 映在镜子里的时光[M]. 北京:群众出版社,2004.
(这部小说初版名为《寻找外景地》,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
[2]墨白. 梦境、幻想与记忆[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
[3]墨白. 手的十种语言[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4]墨白. 裸奔的年代[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5]墨白. 欲望与恐惧[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6][法]柏格森. 时间与自由意志[M]. 吴士栋,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7][英]史蒂芬·霍金. 时间简史[M]. 许明贤,译.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he Form and Value of Narrative Time in Mo Bai’s Novels

ZHANG Yan – wen

(College of Literature, Zhe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 clear sense of time in Mo Bai’s Novels. This is reflected in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dreams, fantasies and memories of his real life. He focuses on the spatio – temporal experiences in his arts, to build a unique style with a distinctive space – time structure of the art world. It provides a wealth of useful and reliable reference for us from the aesthetic scale.

Key words: Mo Bai; narrative time; space – time structure; artistic reality

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面临的制度性约束分析

——以山东省为例

王珺鑫

(山东女子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济南 250300)

摘 要:农民财产性收入是农民收入增长中极具潜力的部分。以山东省为例,农民财产性收入呈现出三个特点:绝对额和增长速度均低于城镇居民,收入结构不尽合理,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当前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面临诸多制约因素,其中制度因素尤为为重要。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土地流转制度、农村金融制度等影响着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因此,需要清晰界定农民财产权利,建立健全农村土地市场和金融市场,这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农民财产性收入;农村土地制度;农村金融市场;山东省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5.008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5-0031-04

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是农民总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具挖掘潜力的部分。2016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 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明确指出要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并进一步要求有效盘活农村土地,创造条件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然而长期以来,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增长较为有限,对农民总收入的实际贡献率较小。以山东省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均纯收入从 1978 年的 114.6 元增长到 2015 年的 12848.6 元。虽然农民的总收入水平在稳步提高,但是收入结构并没有发生显著性变化。由表 1 可以看出,现阶段家庭经营收入仍是农户家庭收入的主要部分,但其所占比例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工资性收入成为家庭收入

增长的主要来源,所占比例逐年提高;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两者合计达到了家庭总收入的 90% 以上,而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所占比例非常小。相比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则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因为农民目前所有的资产,包括耕地、房屋、集体资产等,尚未发挥出自身在农民增收方面应有的潜力。由于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源、结构与政府颁布的政策法规息息相关,因此,从制度层面上探讨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面临的制约,尤其是大多数农民十分关注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征地补偿等方面的制度制约显得十分必要,对提升农民财产性收入、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表 1 2008—2015 年山东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及其构成(单位:元;%)

收入类别	2008 年		2009 年		2011 年		2015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家庭经营收入	5339.43	65	5534.44	64	7590.55	62	7195.22	56
工资性收入	2263.46	28	2496.57	29	3715.25	31	4497.01	35
财产性收入	163.93	2	196.11	2	246.45	2	385.46	3
转移性收入	369.82	5	456.7	5	594.45	5	770.92	6
总收入	8136.66	100	8683.82	100	12146.71	100	12848.6	100

数据来源:相关年份《山东统计年鉴》,下同。

收稿日期:2017-06-12

基金项目:山东女子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科研项目“山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中的妇女权益保护研究”(2015RCYJ02)

作者简介:王珺鑫(1986—),女,山东泰安人,博士,山东女子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

一、山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现状及特点

根据我国历年的统计数据中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类型的划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银行存款利息、集体分配股息和红利以及其他股息和红利;二是通过出租土地或农业机械获得的租金;三是通过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得的收入;四是政府征收农用地对农民做出的补偿。具体来看,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包括6个收入项目类型。由表2可知,2008—2011年,在山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构成中,占比排

表2 2008—2015年山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及构成(单位:元;%)

收入类别	2008年		2009年		2011年		2015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利息	13.81	8	15.7	8	58.47	24	65.3	20.1
集体分配股息和红利	1.84	1	2.45	1	15.55	6	39.7	12.2
其他股息和红利	5.4	3	6.1	3	8.01	3	17.1	5.3
租金(包括农业机械)	16.09	10	19.54	10	56.37	23	71.48	21.9
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收入	13.61	9	17.27	9	33.55	14	114.70	35.2
征地补偿	113.18	69	135.05	69	74.48	30	18.02	5.5
总计	163.93	100	196.11	100	246.45	100	326.3	100

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山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呈现以下一些特点:

(一)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和增速均低于城镇居民

由表3可知,2015年山东省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为326.3元,比2008年增加了162.37元,年均增速为10.33%,而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由2008年的346.9元增长至2015年的2475.5元,年均增速达32.4%,因此与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相比,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在绝对值和增速上均较低,并且城镇和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差距也有增大的趋势,这显然不利于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协调和统筹发展。

表3 2008—2015年山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城乡比较(单位:元)

年份	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	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	城乡之比
2008	346.9	163.93	100 : 47
2009	412.76	196.11	100 : 47
2010	490.22	238.29	100 : 48
2011	615.69	246.45	100 : 40
2015	2475.5	326.30	100 : 13
年均增速(%)	32.40	10.33	100 : 32

(二)农民财产性收入结构不尽合理

通过表2可以看出,尽管利息收入在山东省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总额中占比有所增长,但征地补偿收入和租金收入目前仍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部分,这说明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还是与政府行为相关,而不是主要依靠农民进行投资行为获得。也就是说,当前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具有极强的政策依赖性。从农民财产性收入结构优化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不利于农民收入结构改善的。

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征地补偿、租金和利息,2011年这三项收入占比之和达77%。从构成上看,其中征地补偿在农民财产性收入中的比重由的2008年69%下降至2011年的30%,而利息和租金分别由2008年的8%、10%增长至2011年的24%、23%。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收入”也由2008年的9%增长至2015年的35.2%。以上分析表明,近年来山东省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构成伴随着收入增长发生了显著的结构变动。

(三)农民财产性收入与自身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从表4可以看出,就整体而言,现阶段山东省17地市的农民财产性收入均较低,绝大多数地区只有数百元,有的地区(德州、枣庄)甚至低于百元,这与当前各地农民万元以上的总收入水平相比较,显得十分有限。从各地区比较来看,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如济南、东营、威海、烟台等地的农民财产性收入相对较高,相应的所占比重也相对较高,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如菏泽、莱芜、德州、枣庄等地的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数额较小,占当地农民总收入的比重也较低。这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为经济发达地区的要素流动性较强、投资机会较多,并且政策环境一般较好,处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能够通过多渠道实现农业要素流转、财产性投资,从而有利于增长其财产性收入。

表4 2015年山东省各地市农民总收入、财产性收入及其占比

(单位:元;%)

地级市	总收入	财产性收入	占比	地级市	总收入	财产性收入	占比
济南市	14232	470	3.30	青岛市	16730	281	1.68
东营市	13887	388	2.79	泰安市	13322	163	1.22
济宁市	12570	269	2.14	日照市	12319	160	1.30
威海市	16313	352	2.16	菏泽市	9802	116	1.29
滨州市	12727	295	2.32	聊城市	10512	132	1.18
淄博市	14531	290	1.99	莱芜市	13714	120	0.88
烟台市	15540	306	1.97	德州市	11269	87	0.77
潍坊市	14890	267	1.79	枣庄市	12038	79	0.66
临沂市	10828	200	1.85				

二、影响山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制度性因素分析

根据本课题组 2015 年 7 月对山东省部分农村地区的实地调查,并结合相关资料分析发现,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制度性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地产权主体虚置导致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的流失

我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和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外,属于集体所有。”《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土地属于三级所有,即“乡集体所有、村集体所有、村民小组所有”。但是,目前的土地集体所有,对于农民尤其是长期在城市务工的农民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没有意义的。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地区的村民委员会充当集体土地财产的所有者代表,在村民法律法规知识积累有限、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留守人员大多文化素质不高的情况下,土地集体所有往往成为村长和村委会少数人所有。在部分地区,基层政府为了获得自身的利益,违背村民意愿进行大面积土地流转,导致很多适合农作物种植的土地转成工业用地,而这种流转带来的巨额土地收益并未到达农民手中,这就严重影响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规不落实,限制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

据调查,在山东省的土地流转中,以转包为主,占 61%,出租占 13%。随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模不断扩大,当前关于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些制度安排对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影响也凸显出来。

一方面,由于农民对土地流转市场信息的掌握不足,加上农民多具有保守、害怕风险的心理,所以目前的农地流转依旧多以农户之间的转包为主,并且以“熟人转包”为多,价格也多数是“人情价”,有的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一点费用,也就是说,土地流转并未给转出户带来多少经济利益,从而限制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当前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不足,在多数地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受到村委会的行政干预,存在强迫农民低价流转土地的现象,从而影响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

(三)现行的农村宅基地管制政策限制了农民土地财产升值的空间

目前,国家的法律、法规、地方性文件对农民的宅基地进行严格的管制。现有的法律规定是“一户

一宅”,法律禁止农民把宅基地转让给其他人。在实际生活中,宅基地交易的范围、方式都受到限制,宅基地作为农民财产的价值难以体现,即使农民迁入城市定居,也一般是将房屋闲置。现有法律不允许农民将宅基地进行市场买卖,其结果是农民不动产的流转价格无法真实反映土地资源的稀缺程度,掩盖了其真实的市场价格,大大影响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

(四)农村金融市场发育不足导致农民的货币多用于存款而不是进行投资

随着国有银行各种改革措施的逐步落实,很多农村地区的商业银行网点被撤销。目前,大多数农村地区的正规金融机构只剩下农村信用社,因此,农村市场上的金融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大部分地区的农民可供选择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仅有储蓄存款一种,股票、债券、基金等金融产品基本上与农民无缘。由于农村金融市场不发达,加上大多数农民缺乏必要的金融知识,导致绝大部分农民无法通过金融市场有效运用资金来获取较高收益,尤其是在通货膨胀较为严重的背景下,农民不仅不能实现其金融资产的增值,而且还会因通货膨胀而遭受损失。另外,农民尚可参与的民间金融市场则存在着不规范、风险大等问题,难以获得稳定的财产性收益。

三、提高山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政策建议

针对制约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制度性因素,我们认为,应在产权制度、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等几个关键方面作出相应的改革。

(一)清晰界定农民财产权利

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明确界定农村土地产权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最重要的基础。2011 年,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的《中国改革调查问卷报告》显示,72% 的专家认为,农民拥有物权性质、可转让的土地使用权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条件之一。

要明确界定国家、集体与农民之间的土地权利边界,并要强化对相关主体土地权益的保护。一方面,要适当扩大农户承包经营权权能,尽快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发证到户的工作,落实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稳定农民信心。另一方面,要将农村宅基地依法确权到户,并核发农民房屋产权证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房屋登记管理办法,实行同证同权。

(二)放松对农民财产交易的限制

产权进行自由流转和交易是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必要条件。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加快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制定合

理、清晰的交易规则,完善土地流转中介服务,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逐步建立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制度,逐步放宽对农房交易的限制,允许农民对自己的住房进行资产评估、允许农民自由购买住房、允许农民出租自己的住房。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调整城乡各种生产要素的交换关系,推进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设,探索集体建设用地交易的可行办法。

(三)推进农村金融发展与产品创新

一是应当增加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的金融服务,扩大农民的选择权。正规金融机构要向农民普及金融知识,为有一定积蓄和投资意愿的农民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提高他们的财产收益。二是应当加快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引导社会资金在农村设立各种新型金融组织。鼓励金融机构根据农民资金额度小、金融知识有限、风险承受能力不强的特点,开发符合农民理财需要的金融理财产品,为农民提供丰富、优质、安全的投资渠道。三是应当允许农民用活金融资产。支持有条件的农民合作组织开展信用合作,规范农村民间金融,在服务现代农业建设和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参考文献:

[1] 周其仁. 增加中国农民家庭的财产性收入[J]. 文史博览:理论,2010(7):1.
[2] 刘兆征. 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分析及增加对策[J]. 经济问题探索,2009(7):34-40.
[3] 夏宁,夏锋. 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制度障碍与改革路径[J]. 农业经济问题,2008(11):66-70.
[4]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综合课题组. 还权赋能:成都土地制度改革探索的调查研究[J]. 国际经济评论,2010(2):54-92.
[5] 张乃文. 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现状及原因探析[J]. 农业经济,2010(4):36-38.
[6] 肖红华,刘吉良. 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途径[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21-23.
[7] 刘鸿渊,刘可. 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困境与破解之策[J]. 经济体制改革,2015(6):90-94.
[8] 朱秀茹,张永敏. 社会主义新农村土地流转的制约因素与路径选择[J]. 农业经济,2011(4):57-58.
[9] 张勇奇,湛中林,周方元. 增加农民财产性与转移性收入对策解析[J]. 江苏农村经济,2017(2):52-54.

(责任编辑 刘成贺)

Analysis of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of the Farmers’
Property Income Growth

——A Case Study of Shandong Province

WANG Jun - x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dong Women’s University, Jinan 250300, China)

Abstract: The property income of peasants is a potential part of the farmers’ income. Taking Shan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Farmers’ property income shows three characteristics: absolute amount and growth rate are lower than urban residents, income structure is not reasonable and there are more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At present, many restrictive factors limit the increasing of farmers’ property income, and the institutional factor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he land property right system, the land circulation system, and the rural financial system influence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property income. Therefore, defining the farmers property rights clearly, establishing and perfecting the land market and the financial market, are some effective paths to increase the farmers’ property income.

Key words: property income of peasants; rural land system; rural financial market; Shandong province

郑州市“国际商都”城市文化的定位与培育路径

魏瑞霞

(铁道警察学院 公共基础教研部, 郑州 450053)

摘要:随着郑州“国际商都”战略的实施,郑州市城市文化的定位需要进一步梳理和明确,体现出“根源文化+商贸文化”的特征。围绕传承创新、多元融合、凝聚辐射的现代城市文化内涵,从文化资源、文化互动、文化产业、文化服务等方面探索郑州“国际商都”文化培育的路径。

关键词:国际商都;文化资源;城市文化建设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5.009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5-0035-04

文化作为城市的灵魂和软性资本,是城市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随着郑州市确立“国际商都”的建设目标,如何发挥城市文化在城市建设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成为城市建设者和管理者十分关注的问题。笔者认为,郑州市“国际商都”城市文化的建设关键在于发掘现代城市文化的内涵,明确城市文化定位,不断探索有特色、有活力的城市文化培育路径,增强文化与经济、社会的交融程度,提升郑州市的核心竞争力。

一、现代城市文化的内涵

城市文化是城市之间区域地理、人文历史、经济形态、民风民俗等方面差异性的综合体现,是城市的“脸”和“魂”^[1]。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新时期,现代城市文化又呈现出别样风貌。

1. 传承创新性

城市文化是经过漫长的岁月积淀而成的,传承下来的文化传统与文化遗产是城市市民对城市产生认同感、归属感的基础。现代的城市文化一方面延续了已形成的城市“文脉”,保持城市记忆;另一方面突出了“现代性”,体现信息技术运用和市场经济运行下人们新的生活方式、社会秩序和精神面貌。

2. 多元融合性

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经济使社会分

工越来越精细化,服务对象越来越精确化,新的生产和消费观念正在形成,个性化的小众群体不断出现,人们的社会需求、价值观念的差异性愈加明显,文化多元化势不可挡。多元开放的城市环境激发了城市的无限活力和强大吸引力,促使异质文化在这里汇集、碰撞、融合。

3. 凝聚辐射性

城市一旦形成,它就为人流、物流、财富流、信息流大量频繁的交流提供了极为便捷的场所,不同的文化在城市里得以交流发展^[2],逐渐形成独特的文化气象,使千差万别的城市市民接受、认同,凝聚在城市之中。强大的城市文化能够在城市间的互动中对周边城市和地区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带动周边区域向核心城市靠拢,逐渐形成文化的一体化。

二、郑州“国际商都”城市文化的定位

郑州自古就有“商都”之称,这里的“商都”有两层含义,一为商代都城,一为商贸都市。郑州“国际商都”文化的定位要体现出“根源文化+商贸文化”的特征。

一是以商代都城文明为代表的中原“根源文化”。郑州地处黄河之滨,中原腹地。据考证,商汤曾建都于此,郑州商都在当时是商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修建了高城深池,设计建设了早期的

收稿日期:2017-06-08

基金项目:2016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郑州市‘国际商都’城市文化培育策略研究”(2016B058)

作者简介:魏瑞霞(1979—),女,河南濮阳人,硕士,铁道警察学院公共基础教研部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化研究。

排水系统和消防设施,在城市功能上也有了初步划分,军队主要驻扎在外郭城,铸铜、制陶、酿造等手工业集中分布在郭城附近,宫殿区、祭祀场所主要集中于郑州商都的内城的东北部,体现了清晰的城市规划意识。^[3]商代的夯土城墙、宫殿遗址、墓葬、青铜器窖藏坑、祭祀坑等遗迹和出土的大量陶器、骨器、铜器、原始瓷器等遗物,充分展现了早期华夏文明在城市建设、城市文化方面的巨大成就,也反映了中原地区早期文明的发展高度,是中华文明的根源。

二是以商贸文明为代表的多元开放文化。郑州商都利用其强大的经济、文化优势大力向四周扩张,向西辐射至陕西、甘肃、青海一带,向南越过长江,将青铜文化推广至湖北、江西,并将南方的铜矿石、锡矿石等原料运至中原;秦统一中国后,在郑州西北区域河流交汇的岸边兴建了著名的敖仓,作为转运站,成为早期的物流中心;近代,京广铁路和陇海铁路在这里交汇,交通的便利带来的是贸易的兴盛;当前,郑州正在构建融航空、铁路、公路为一体的国际化现代化立体综合交通大枢纽体系,积极建设“国际商都”。独特的地理优势使郑州成为东西交汇、南北通衢的重要枢纽,利用商贸交通优势,与五湖四海的朋友广泛交流、频繁贸易,使郑州人性格中具备了“崇尚竞争,敢为人先”的基因,这应成为郑州城市文化培育的人文内涵,开放、多元、包容的人文环境散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极大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和接纳能力。

郑州“国际商都”文化的两重涵义不能各自发展,各行其是,应相互扶持,相互融合。

三、郑州“国际商都”城市文化的培育路径

(一)突显城市文化脉络,整合历史文化资源

1. 承续郑州城市文脉,重视城市的历史记忆

商都郑州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数千年的时代更迭中,历史文化从未中断。在建设“国际商都”城市文化过程中,首先要围绕“商都”来挖掘、保护和开发郑州的文化资源,商代都城遗址,春秋时期的子产祠,东汉时期的文庙,唐朝的开元寺、夕阳楼,明代的城隍庙、北大清真寺和天中书院,清代的岳氏民居,百年德化街,二砂厂,国棉三厂……这些文化遗址和文化街区犹如古老城市中散落的珍珠,是郑州市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除此之外,郑州还有两处世界文化遗产,即嵩山“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和中国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更是代表郑州绵延数千年的历史和辉煌的文明成就。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言,“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已经是当今城

市中一项重要事实”,“以往历史上的各种文化习俗、价值观念、生活理想,都因此流传到来世”^[4]。这就是城市的文脉。

历史文化资源不仅以物质形态的形式存在,更以一种隐性的意识形态方式延续下来,构成一种城市的记忆。如郑州的棉纺路,曾经聚集着郑州国棉一厂、三厂、四厂、五厂、六厂和印染厂等国有企业,见证着郑州全国纺织工业基地的荣耀,现在虽风光不再,但保留下来的厂区大门和部分旧厂区仍承载着一代棉纺人“为国家建设无私奉献”的青春与梦想,也昭示着这个城市曾经的辉煌和历史变迁,是挥之不去的时代记忆。

2. 依托厚重的中原文化,形成文化资源的聚集效应

郑州作为中原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在城市文化建设中可以以古老厚重的中原文化为积淀,整合周边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形成聚集效应,走“组团式”发展之路。依托郑州的快速铁路网和高速公路网,在距“商都”郑州高铁1小时路程范围内,联合“宋都”开封、“殷都”安阳、“唐都”洛阳,形成古都文化景观;在省内距郑州高速公路2小时路程范围内,整合洛阳、开封、安阳、南阳、商丘、浚县、濮阳等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形成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群景观;在中原城市群中,整合新郑黄帝故里、鹿邑老子故里、民权庄子故里、淮阳太昊陵、涉县娲皇宫等文化资源,形成中原根亲文化景观等等。通过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和综合开发,培育文化旅游区或旅游带,将郑州城市文化建设与中原文化遗产的保护相结合,与中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联系。

在发掘整合历史文化资源过程中,需要依托其蕴含的场地、场所、场景三要素,对城市文化生态体系进行科学构建,并将社会观念、自然风光、宗教信仰、日常生活等无形的文化因素纳入其中,形成复杂多样的文化形态;需要站在全球化视角,对历史文化资源的精神价值进行现代化重塑,结合时代精神,推陈出新,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碰撞和融合中,提炼出更多“中国标识”;需要尊重和保护民间文化,扶持本地或反映本地特色的艺术文化创作,包容不同形式、不同主题的民间文化活动,带动市民参与城市文化建设的热情,丰富城市文化的多样性。

(二)加强国际文化交流,提升文化传播能力

1. 推进文化互动,开拓国际视野

文化不是莱布尼兹式的“没有窗户的单子”,有机、动态、流变才是文化的基本特性^[5]。任何一种

优质的城市文化都不可能是关起门来自我发展的,需要与不同的文化进行接触、碰撞与融汇,即文化之间的互动。郑州市作为一个内陆城市,建设“国际商都”城市文化,关键是如何做到文化本土性与全球性的融合。根据文化互动理论,郑州在实现“买全球、卖全球”的物与物的交换中,应不断推动人与人的往来,文化与文化的交流,以开放自信的心态与同质文化或异质文化进行平等对话,推动文化的双向流动,在冲突和扩张中增强城市文化的韧性和张力。

城市文化间的互动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交流,不仅可以增进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可,也会促使人们对其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城市文化互动的方式灵活多样,如结为友好城市、开展文化周或文化年活动、举办文化节会、合作开发文化产品、互推文化旅游品牌、人才交流合作等,频繁的文化互动将会打破区域界线,使城市发展拥有更大的平台,真正走向国际。

2. 参与丝绸之路文化之旅,提升文化传播能力

城市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与该城市文化交流的参与度密切相关。郑州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应与沿线国家合作建设文化交流平台,打造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心。依托丝绸之路河南段世界文化遗产,加强与沿线国家开展古丝绸之路历史遗迹保护利用和项目合作;大力宣传推广历史文化、民俗文化,打造具有中原特色的精品演出剧目、少林功夫、动漫、网游等文化产品并推动“走出去”;推动与沿线国家的旅游合作,打造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等黄金线路,重点推介郑州的禅武文化、黄河文化、商文化,合作开发丝绸之路文化探秘等旅游产品;扩大与沿线国家在教育、医疗服务、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合作。

(三)促进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联姻,构建文化创意产业体系

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催生了文化经济。文化产业是文化经济的产物,使文化激发出巨大的经济价值,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城市文化的培育离不开城市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将文化资源转化为与消费需求相适应的文化产品,进入社会的交易、流通、服务等领域,才能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因此,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的联姻是文化产业提升竞争力的源泉和基础,也意味着文化资源从保护到开发的重大转变。

文化产业,也被称为“文化创意产业”,要真正

实现文化资源到文化产业还必须经过创意的提升和技术的实现两大过程^[6],强调的是对文化资源的创新、创造。郑州市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而且文化创意消费需求也处于井喷阶段,传统的文化娱乐生活已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尤其是随着郑州“国际商都”战略的实施,对于其中“文化创新发展区”目标定位更是要求通过创新,搭建平台,整合各种文化资源,激发更多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实施高端引领工程,构建文化创意产业体系。

充分发挥中原文化引领作用,推动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打造沿黄文化旅游带、登封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区、新郑黄帝故里历史文化园区等文旅产业集群;坚持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技术的结合,培育一批如《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实景演出、舞剧《风中少林》《水月洛神》、豫剧《斗笠县令》《琵琶记》等高端原创演艺品牌;采用高新技术对登封瓷、新密玉雕、郑商瓷、黄河澄泥砚制作等传统技艺的保护和改造,促进工艺美术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依托国家动漫产业基地(河南基地)、郑州动漫产业基地,充分发掘中原文化资源,积极培育“小樱桃”“少林海宝”“二兔”“漂亮宝贝”等本土原创动漫品牌,扩大动漫衍生品产业链条,推动动漫创意在教育科普、医疗卫生、会展、广告、设计、建筑等领域的广泛应用。

(四)推动文化惠民工程,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广大民众是城市的主人,是城市文化的创造者和守护者。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是城市文化建设的动力和基础,应最大限度地维护和保障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让更多的民众充分享受到文化发展成果。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对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作了全面部署,是文化惠民的纲领性文件。

推动文化惠民工程,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坚持正确的文化导向,发展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将满足广大民众的文化需求作为文化惠民工程的基本目标,涵养民众的精神家园。二是均衡城乡文化均等化发展,正视公共文化服务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群体差距,有针对性地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确保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公平性。^[7]

城市社区要构建多层次文化艺术空间,确保居民能在周末、在适宜的游憩出行范围内使用到具有一定服务品质的体育场馆、图书馆和青少年文化中心等公共文化设施;鼓励商业商务配建图书馆等文化设施,多元业态混合,提升实体商业活力和体验度;鼓励各类学校的图书馆、体育场馆、各类训练中心等文化、体育设施,在确保校园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向公众开放。

加强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重点开展文化站(室)、图书室等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村公益性文化实体和文化活动,让农村文化活动有阵地、有载体。充分发挥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优势,利用公共数字文化项目和资源,为基层群众提供数字阅读、文化娱乐、公共信息和技能培训等服务。

四、结束语

以打造“国际商都”为目标,郑州市城市文化建设应基于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掘和整合,突出城市文化的底蕴和独特风格。扶持文化创意创新,提升文化辨识度和现代感;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提升文化多

元性和辐射力,使郑州国际商都文化成为“中原文化”立足世界的名片,引领区域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国荣. 城市的“脸”与“魂”[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2] 殷京生. 试论城市文化的特征[J]. 宁夏社会科学,2003(1):51.
[3] 郝本性. 谈郑州商都文化内涵在中国历史上的深远影响[J]. 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6(1):48.
[4] [美]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文化[M]. 宋俊岭,李翔宁,周鸣浩,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5] 吴忠,王为理. 城市文化论[M]. 深圳:海天出版社,2014.
[6] 姚伟钧. 从文化资源到文化产业: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7] 杨志今.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原则与重点[J]. 求是,2015(4):23.

(责任编辑 刘成贺)

The Path of Fixed Position and Cultivation of Urban Culture on Zhengzhou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ity”

WEI Rui - xia

(Genenal Courses Department, Railway Police College, Zhengzhou 450053, China)

Abstract:As the strategy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ity” in Zhengzhou has been implemented, the fixed position of Zhengzhou’s urban culture needs to be further hackled and defined with the embodimen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cestor Culture and Commercial Cultu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ltural cultivation on Zhengzhou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ity” in various ways, embroidering the modern urban cultural connotation –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multi – fusion and coherent rad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al resources, cultural interactions,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cultural services.

Key words: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ity; cultural resource; urban culture construction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中村改造模式探析

杨仪青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 郑州 450044)

摘要:以独特的视角阐述城中村改造的内涵和现实意义,深入分析当前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中村改造的模式。在此基础上,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中村改造模式作进一步的思考:加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协调政府、企业与村民之间的关系;以人为本,因地制宜,合理选择开发模式;扎实推进股份制改造,群众的问题交给群众解决;大胆探索,全员参与,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城中村改造;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协调发展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5.010

中图分类号:F29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5-0039-04

全面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迫切需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消除城乡发展的二元结构,在公共配套服务方面享有均等化的待遇,在道路、水、电、景观建设等基础设施方面纳入城镇统一的发展规划和管理体系中,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健康发展。

一、城中村改造的内涵和现实意义

(一)城中村的内涵

狭义上讲,城中村也被称为“都市村庄”,是指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广大农村的耕地被大量征用,失去耕地的农民仍在原村落居住,但生活方式、收入来源等都发生改变的居民区。广义上讲,城中村是指在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中,居住在城镇,但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经济收入和文化理念等方面落后于城镇发展的居民区。城中村在一定程度上为城镇建设做出了贡献,但是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中村与城镇整体的发展越来越不协调,负面影响越来越突出,迫切需要改造。

通常所说的城中村改造是指物质形态的改造,主要包括对城中村房屋、道路、绿化景观、社区规划布局等方面的重建,这种改造的结果还会导致土地

所有权属方面的变革、管理体制的变革、经济体制的转型和村民素质的转型等。城中村改造不仅使村民享有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待遇,享有均等化的公共配套服务和优美的居住环境,过上高水平的城镇现代文明生活,而且使整个城镇环境得到改善,体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时代文明的进步。

(二)城中村改造的现实意义

首先,城中村改造通过制定合理的城镇规划,对原有的空间重新进行合理的布局 and 规划,有利于集约利用城镇土地,有利于推动城镇化的进程。其次,城中村改造后,各种基础配套设施和城镇发展同步,并且在就业、保险、医疗和教育等方面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配套;改善了过去脏、乱、差的环境,居住环境优美干净,房屋采光充足,户型设计合理,提升居住品质;同时也会使得村民的精神文明上升到更高层次,村民的文化理念、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等都将发生很大改变,村民的幸福生活指数得以大幅提升。再次,经过城中村改造后的房屋是证件齐全的商品房,可以直接进入市场交易,较容易出手,并且享有房屋溢价获得的收入,改变了过去城中村房屋不易

收稿日期:2017-08-19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协调发展视阈下的河南新型城镇化研究”(2016BJJ066);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教育研究”(172400410086);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乡土情结视阈下的河南新型城镇化研究”(2017-ZZJH-613)

作者简介:杨仪青(1982—),女,河南光山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与战略管理研究。

卖、卖不上价钱的局面,提高房产价值、增加村民收入。最后,城中村改造可以合理规划片区,将片区打造成为集发达的交通道路体系、商业综合体、居住商品房、学校等为一体的多功能区域,带动区域的商业繁荣,为改造后的城中村居民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有利于居民的收入提高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中村改造的模式探析

按照城中村改造的主体情况差异,城中村改造的模式可以分为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和自我改造型,城中村改造涉及的三方都有各自的优势。

(一)政府主导型模式

政府在城中村改造的各个环节充分发挥宏观指导和重要的引领作用,协调管理城中村拆迁与重建、村民安置、商品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服务配备等各项工作。此种模式下,政府在城中村改造中扮演的角色是多样的,既是发起者和组织者,又是管理者和推动者。政府主导的职能是维护社会公众利益,以及改造范围内群众的利益。在投资方面,政府可以作为投资的直接参与主体,也可以联合多方力量共同投资,比如可以联合开发商和村组共同投资改造。

政府主导型城中村改造模式能有效保障社会公众的利益,实现可持续发展,注重村民生活品质的提高,会适当控制安置规模。政府通过统筹安排,充分利用各部门所掌控的资源,使土地资源得以集约利用,优化城镇规划布局,改善城镇居住环境,合理发展城镇产业。政府充分利用其所拥有的行政职权,同时尊重市场运行规律,制定城中村改造的政策机制,并且还可以更好地在操作层面执行政策,规范城中村改造工作。政府主导城中村改造,通过在操作层面的参与,能够快速锻炼一批高素质的精通建设、管理、规划、工程等专业知识的队伍,提高干部的素质。在改造中充分发挥规划引领和宏观调控作用,注重产城协调发展,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升城镇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促使开发商主动参与投资,有效推动城中村改造工作的进度。

政府主导型城中村改造模式有一定的弊端。个别干部积极性不高,思路古板不灵活。村组和村民是被动参与到城中村改造中,成为城中村改造的对象,由于对改造的不理解,或者期望过大,往往表现出不愿意配合的举动,甚至是抵触行为。例如,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的花园口合村并城项目,群众攀比心理严重,拆迁难以进行,仅靠思想教育很难取得全面突破。还有来自资金的压力,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项目运作过程中容易受制于开发商。干部队伍

与城市建设任务不相适应,懂规划、管理、土地、工程方面的专业人才缺乏,在与企业的合作中,虽然名义上占主导地位,实际大多还是企业占上风,违背政府主导的初衷。

(二)企业主导型模式

开发商依据城镇总体规划,承担整个城中村改造的各方面工作,包括拆迁、建设、安置以及管理协调等工作。在城中村改造工作中,政府先行制定好改造的规则、机制和政策,运用市场手段,通过公平、公正、有序的竞争机制,使得开发商参与到城中村改造中来。为了避免开发商只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不顾及城镇的可持续发展和损害村民的长远利益,政府应对城中村改造中的配套设施、建设规模、容积率以及城镇环境等方面制定统一的要求和规定,合理规范开发商的行为。

企业主导的条件下,为实现利益最大化,企业具有极大的积极性,在项目涉及的各个环节都会主动参与,追求效率的提高。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积极筹集城中村改造所需的资金,并且注重时间和效率,努力实现城中村改造工作的及时顺利开展。通常情况下,房地产开发企业拥有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手段,同时拥有高素质的人才队伍,这些优势能有效填补政府主导模式和自我改造模式的先天不足,实现土地开发的**大价值。企业作为改造的主导方,具有资金优势,同时又可以避免行政力量的介入,减少社会问题,在协调各方关系方面可以采取更为快捷的市场、经济等手段。企业主导下,政府需要做的群众工作压力相对较小,具体琐碎的事情都交由企业来解决。

企业主导型城中村改造模式也存在一些弊端。开发商容易拿群众的利益绑架政府,使其在公众利益中让步。在一定程度上,被拆迁群众只能被动接受开发商所提供的改造方案,群众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开发商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往往忽视群众的合理诉求和城镇的长远发展,在政策上钻空子或打擦边球,出现城镇公共用地缩减、社区容积率大和压缩公建配套等问题,影响城镇化建设的质量。项目由企业主导,企业来行使决策,企业和群众容易相互影响,造成共同的利益膨胀,导致的结果就是安置标准降低。

(三)自我改造型模式

自我改造模式是指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政府指导下,由村民自发组织起来的,将村民转换成股民和股东,自己组建人员队伍、自己筹措资金、自己成立公司、进行自我开发与安置的一种形式。同

时,政府充分发挥宏观指导的功能,在城中村改造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方面给予宏观指导和政策上的支持,在拆迁、安置、回迁以及商品房建设等方面引导和协助村委会和村民。这种改造模式适合村办企业比较发达,村规模较小,村集体及村民筹资能力强的城中村。

自我改造型城中村改造模式是目前最为理想的一种城中村改造模式,它可以保证村民利益最大化。通过股份制改造,村民成为村集体资产的股东,能充分调动村民参与改造的积极性,使城中村改造工作取得村民的有效支持,而且还使村民直接享受改造的利益所得,使群众利益最大化。通过自我改造,可以培养一批懂管理、会经营的基层干部管理队伍,在城中村改造中遇到棘手问题时,能够做到游刃有余。村集体在整个改造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将享有改造带来的收益。

但是自我改造型模式运行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过成功的案例,究其原因是因为自我改造模式也表现出了一些弊端。自我改造模式因其自身的复杂性,对领导队伍的要求较高,需要精明能干的村班子队伍,需要远见卓识,并且要有一定的实际经验,需要具备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的人才。而城中村自我改造涉及的村组和村民中相当缺乏这样的人才,因此难以掌控整个城中村的改造工作。同时,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城中村改造工作容易遭到部分群众的质疑,村组领导对自身进行改造的能力不信任。城中村改造需要的资金雄厚,改造立项、拆迁、安置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服务配套的供给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注入,而城中村本身经济发展落后,收入水平低,没有足够的资金。因此,巨大的资金短缺是自我改造面临的又一重大难题。

三、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中村改造模式的进一步思考

城中村改造能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优化城镇环境和节约社会资源,是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城中村改造工作,必须统筹考虑,协调好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的关系。坚持民生为先,大局至上,突出人性化、和谐化,赢得民心,维护社会稳定。

(一)加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协调政府、企业与村民之间的关系

政府、企业和村民是三个利益博弈方,村民渴望环境的改善,却担心在迁移安置中开发商侵占自身的利益;政府在城中村改造中考虑的是社会的长远发展和整体效益,希望改善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配套,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考虑的是全体居民的整体利益;开发商要求利益最大化,但达到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往往达不到村民和政府的要求。因此,政府在企业主导型和自我改造型模式中应充分进行宏观引导,通过制定相应政策和机制引导城中村改造规范操作,保障各方的利益。

城中村改造社会影响广泛而深入。城中村改造应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制定的工作程序要规范,在实际操作中要合法。城中村改造中,要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切实维护群众在拆迁补偿和安置方面的利益,在安置方面可以考虑遵循就近安置和方便人民生活的原则,合理公平地处理村集体资产,为广大群众带来实际的收益。推行各种政策机制改革,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在住房、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让村民享受到统一的公共配套服务,加快村民融入城镇生活,提高居民的幸福生活指数,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在进行城中村改造时要尽量结合市政设施项目,从某种程度上减少改造初期的阻力,并获得一部分来自政府的资金补偿,减轻前期资金投入的压力。传统观念认为想致富,先修路,修路可以发家致富,如郑州市惠济区苏屯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就和长兴北路与新苑路的打通工程关联在了一起。

(二)以人为本,因地制宜,合理选择开发模式

城镇板块的扩大使得城中村的居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城中村居民为了生存而建造大量的城中村房屋。这些城中村房屋为大量进城务工人员提供廉价的居所,也为城中村居民带来了收益。但是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后果:一方面外来人口越来越多,而城中村居住环境脏、乱、差,降低外来人员的生活质量并且影响城镇形象;另一方面受利益的驱使,越来越多的远郊区居民也开始大量建房出租,久而久之形成新的城中村。因此,应加强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居所,客观上阻止新城中村的产生,同时也做到了真正的以人为本。

城中村改造要以实现经济利益的平衡为首要前提,城中村改造的目的是为改善村民的生活居住环境,保障村民的经济利益。城中村的改造模式必须根据各地的实情,合理选择,如集体企业规模大、资金丰厚的城中村就适合自我改造模式。

(三)扎实推进股份制改造,群众的问题交给群众解决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在我国的大力推进,广大群众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群众的观念也在不断更新,为城中村改造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

了基础。但群众对城中村改造还是持有一定的观望心理:一方面村民希望通过改造,个人可以享受城镇化建设的成果,享有集体资产的收益,从而保护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村民又担心城中村改造中存在集体资产分配不公平的现象,使得村集体资产收益落到村干部或少部分人的手中,从而使普通民众的自身利益受到损害。

村集体资产改制可以通过层层公示,对村民、股民进行界定,对股权进行配置,使老百姓拥有知情权、表决权,把群众担心的问题交给群众解决,让改制方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而解决群众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这样不仅可以保持村集体资产村集体享有的总体特征,还可以使得村集体资产不受少数人长期控制,保障村民的集体利益,解决集体经济与村民利益不关联的问题。村民以股东身份参与经济组织的收益分配,让村民成为实实在在的资产主人,为顺利拆迁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大胆探索,全员参与,实现可持续发展

城中村的产生原因极其复杂,改造也有一定的难度,如采用滚动式推进和局部置换方式更新城镇建设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式,采用自我改造的模式通常要使用这种方法,一方面为续建项目筹措资金,另一方面采取试点的办法先探探虚实,可以减轻自我改造的压力。

城中村改造是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难题,也是躲不开、拖不起、关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大事。近年来,我国城中村改造工作已经初见成效,有借鉴经验

的常规模式,有独具特色的积极探索,同时也暴露出许多新的问题。城中村改造是一项涉及面广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全员积极参与到改造工作中来。政府应充分发挥宏观指引作用,制定政策,提供服务,并大力做好宣传工作;广大群众应充分认识到城中村改造是关系社会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积极参与到城中村改造中,形成全员合力,实现社会的全面和谐、有序、持续发展。通过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积累、总结和完善,冷静分析和妥善处理城中村改造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走一条符合城镇自身特点的城中村改造之路。

参考文献:

[1] 马广钦,巴明廷. 城市化进程中的都市村庄改造和现代化建设:以郑州市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05(2): 42-46.

[2] 骆江玲. 国内外城镇化模式及其启示:以江西省鄱阳县为例[J]. 世界农业,2012(6):75-79.

[3] 杨仪青. 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面临的问题及路径创新[J]. 经济纵横,2015(4):17-21.

[4] 王艳飞,刘彦随,李裕瑞. 环渤海地区城镇化与农村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J]. 地理研究,2015(1):122-130.

[5] 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 城市地理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43-46.

[6] 何力武,刘骥. 城中村改造:历史起源及行为者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2017(3):78-82.

(责任编辑 许峻)

Analysis on the Mode of Urban Village Transformation
in the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YANG Yi-q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concept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of urban village transformation from a unique perspective, and analysis the mode of urban village reconstruction in the new urbanization deeply. On the basis of th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further thinking on the transformation mode of villages in the new urbanization: strengthening government's leadership and market operation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villagers; choosing the development model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the principles of people oriented; pushing forward the reform of the shareholding system, the problem of the masses solved by the masses; bold exploration, fully participation, and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new urbanization; urban village transformation; government domination; market operati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的立法建构

冯祥武

(中共永州市委党校 法学教研室,湖南 永州 425000)

摘要: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落实到法治领域,就是“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的立法建构”问题,就是在立法活动中通过追求良法之治、崇尚科学立法、遵循渐进立法来践行共享发展理念,将权利和资源更多地分配给人民群众,制定出更多的、具有共享发展内容的良法,以达到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的。

关键词: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立法实现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5.011

中图分类号:D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5-0043-06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共享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并且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发展理念——“共享发展理念”。关于共享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论述:“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1] 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段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是:坚持共享发展,就必须“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而“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

这一段重要论述落实到法治领域,就是“要深入分析共享发展理念对法治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深入分析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在法治领域遇到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措施,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2];就是“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的立法建构”问题。因为共享发展理念的立法建构,可以说是“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实现“共同富裕”的桥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所强调:“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3]

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的立法建构,就是要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在践行共享发展理念方面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的立法建构,就是要将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落实于立法理念、立法原则、立法实践的全过程;也就是要通过立法来践行共享发展理念,将权利和资源更多地分配给人民群众,逐步制定出更多的具有共享发展内容的良法,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一、立法建构的理念:追求良法之治

立法需要理念的引领。立法建构的理念涉及到立什么样法的问题。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落实到立法建构的理念之中,就是追求良法之治。具体内容包括:法分“良恶”,何为“良法”?何为“良法之治”?

(一)法分“良恶”

有学者认为,良法和恶法的概念最早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4]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分“良恶”。马克思早年通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5]来批判普鲁士的恶法“书报检查令”,因为它压制表达自由,而新闻出版自由只有通过良法之治才能得到有

收稿日期:2017-06-29

作者简介:冯祥武(1972—),男,湖南永州人,法学博士,中共永州市委党校法学教研室教授,兼职律师,研究方向:民商法。

效保障;通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来批判普鲁士莱茵省议会通过的恶法“林木盗窃法”,因为它剥夺农民到林地捡拾枯枝和采摘野果的习惯性权利,并将农民到林地捡拾枯枝和采摘野果升格为“盗窃犯罪”,给予刑事处罚,明显违反法的“实质正义”^[6]。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将资产阶级反动政府法令归于恶法的范畴,禁止适用于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例如,苏俄共产党于1918年通过颁布《关于法院的第3号法令》和《俄罗斯联邦人民法院条例》,完全禁止适用旧政权的法律;我们党于1949年2月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伪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完全废除原国民党反动政权的伪六法全书。

对于恶法是否是“法”,在20世纪的世界法理学界曾经有一场“富勒与哈特的论战”。论战缘起于二战结束后,在纽伦堡国际审判、东京审判中,许多德、日法西斯战犯及其辩护律师曾竭力为战争中所发生的惨无人道的罪行开脱,声称军人的义务是绝对服从国家利益,而无权对自己执行法令的行为作出善恶的价值判断。因为他们的行为所依据的是当时的生效的法律(例如德国法西斯残害犹太人就是根据《身份法》《剥夺犹太人财产法》《强制劳动法》等恶法)进行的,因此他们不应该对自己执行命令的行为负责,不应当被追判有罪。^[7]针对恶法是否还是法的问题,美国自然主义法学派代表富勒通过著述《法律的道德性》来论证“恶法非法”;英国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代表哈特通过著述《法律的概念》来论证“恶法亦法”。但是,纽伦堡国际审判和东京审判,判处二战主要战犯犯有罪行结果表明:执行法西斯国家邪恶的法令也是犯罪行为。这是对“恶法亦法”的否定。

对于恶法是否应被遵守,苏格拉底之死^①与钟相杨么起义,分别代表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苏格拉底用自己的生命来诠释:恶法也应当被遵守;而钟相、杨么则通过领导农民起义来宣示:恶法不应当被遵守^②。

(二)何为“良法”

何为“良法”?按照功利主义法学家边沁的观点,良法就是那些能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法律。^③按照边沁的这一良法标准,在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以前的社会形态中,也是存在一些良法的。例如,历史上刘邦攻占咸阳之后,与关中父老的“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完全废除秦朝苛法;美国总统林肯在南北战争时期颁布的

《宅地法》《解放黑奴宣言》,前者将土地资源分配给移民,后者将人身自由分配给黑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所颁布的有关禁止刑讯、缠足、蓄辫、蓄奴和买卖华工的法令,废除对贱民的歧视的法令和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9年德国的具有社会保障、国家赔偿、人权保障等内容的《魏玛宪法》等等。但是这些良法也并非尽善尽美。例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这一条的瑕疵在于:没有规定“无男女区别”,抑或“无性别区别”^④。为此,孙中山还曾遭受到中国同盟会第一位女会员、女革命家唐群英的当面质询。因为唐群英认为,要保障女性的身体、财产等,“全恃法律上之公权”,而“尤以选举权被选举权为重要”。女子“无选举资格,便是无人权,既无人权,便称不得是人”^[8]。

何为“良法”?马克思主义认为,良法必须是肯定、明确、普遍的“真正法律”,体现理性、自由和实质正义。^[9]马克思主义良法观有两个构成要件: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形式要件是肯定、明确、普遍;实质要件是理性、自由和实质正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良法标准,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下的立法是良法。例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土地改革法》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劳动合同法》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社会保险法》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不过,即使是社会主义的良法,也不是尽善尽美,听不到反对的声音。例如,2007年《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就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但《劳动合同法》在本质上仍然是良法。^[10]

(三)何为“良法之治”

我们常说法治的核心是良法之治。因此,追求良法之治,也就是一个追求法治的过程。关于法治的定义,中国法学界公认的通说是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所下的定义:一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二是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1]可见,“制定良法”是法治实现的前提,“服从法律”是法治实现的保障。

法治中国是民族复兴的题中之义。未来中国要实现复兴,不会是历史的简单重复,它必须要有法治的积极跟进。^[12]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指出:“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

遍的意义,我们要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13]32}在当下中国,“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就是要追求法治的核心——“良法之治”,就是要通过立法来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将权利和资源更多地分配给人民群众,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可见,“良法之治”的核心是“分利于民、让利于民”,“良法之治”的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

二、立法建构的原则:崇尚科学立法

立法需要原则的指导。立法建构的原则涉及到如何立出“良法”的问题。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落实到了立法建构的原则之中,就是崇尚科学立法。具体内容包括:立法是治国之大智;科学是立法之原则;如何实现科学立法。

(一)立法是治国之大智

崇尚科学立法,就要了解“立法是治国之大智”。“立法是治国之大智”是笔者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立法工作的三次用典总括出来的。关于立法对于治国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用典说,“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13]12}。关于立什么法?他又用典说,“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笔者注:语出王安石)。”^{[13]3}关于什么样的法才是善法?他进一步用典说,“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14]。(笔者注:语出刘安,就是说治理国家一定得有法律法规,而这些法律法规应当以分利于民、让利于民为根本。)

可见,能够通过立法,立出分利于民、让利于民的善法、良法,才是治理国家的大智慧。在当下中国,“善法”就是那些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实现分利于民、让利于民的良法。

(二)科学是立法之原则

科学原则是我国的立法原则之一。当前,我国立法之所以特别需要科学原则的指导,是因为“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是因为“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是因为“越是强调法治,越要提高立法的质量”^{[13]43}。在当下中国,只有科学原则指导下所立出的“分利于民、让利于民”的善法、良法,才能治国,才能治好国。

科学原则贯彻到立法活动之中,就有了科学立法。关于科学立法,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科学立法的核心在于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15]“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的科学立法,就要克服诸如经验立法、封闭立法、道德立法、政绩立法等各种非科学立法。“尊

重和体现客观规律”的科学立法,在当下中国,就是要制定出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将权利和资源更多地分配给人民群众的良法,以实现共同富裕。

(三)如何实现科学立法

实现科学立法,对立法机关而言,要避免“门外汉”立法。立法机关应当是研究法学的权威机关,立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应当具备专业的法学知识和法律技能。实现科学立法,对立法者个人而言,如果能做到明确立法的目的,认识立法的利益分配性,并能用立法来平抑各社会群体间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就会更自觉地做到在立法过程中,贯彻共享发展理念,将权利和资源更多地分配给人民群众。

关于立法的目的。在古代中国,立法的目的,就是“定分止争”或“一同天下之义”,立法实质上是为封建统治者“治民”“典民”提供器具。在西方社会,不同的思想家和法学家对立法的目的有不同的理解。例如:思想家亚里斯多德、西塞罗认为,立法的目的在于促进正义的实现;古典自然法学家洛克认为,立法的目的在于保护和扩大自由;功利主义法学家边沁认为,立法的目的在于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社会法学家庞德认为立法的主要目的是进行社会控制等等。在当下中国,立法的目的,就是要制定出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将权利和资源更多地分配给人民群众的良法,以实现共同富裕。

关于立法的利益分配性。法律本质上是分配权力和利益的国家契约。在法治国家,无论是权力还是利益,都是以法律为根据进行分配的。^[16]因此,立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分蛋糕”的工作。比如,我国宪法是在全国人大、国务院、国家主席等国家机构之间分配权力和利益;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目前规定的起征点是3500元,如果立法规定起征点为10000元,立法在分配利益方面在向人民群众倾斜,如果立法规定起征点为2000元,立法在分配利益方面在向政府和国家倾斜;2007年我国颁布并实施《物权法》,在立法分配利益方面可能更多地是在向那些拥有巨额财产的群体倾斜,因为《物权法》的立法,意味着他们过去拥有的巨额财产从此真正归属他们自己了;同样的道理,社会保险法也具有利益分配性,只是分配的主体更为广泛。

关于用立法来平抑各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冲突。因为立法具有利益分配性,因此,立法者往往利用立法来平抑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比如,1996年以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有到法庭审判阶段才可以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

助。这一规定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司法人权的保护。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便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聘请律师的时间提前到“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这一规定打破了以往律师不可介入侦查程序的禁区。但是,这一规定(立法)遭受到刑事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群体的批判。他们当时认为:犯罪嫌疑人一见辩护律师,或马上翻供,或不再招供,刑事侦查工作没法做。为了平抑犯罪嫌疑人群体的人权保护与刑事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群体工作开展之间的冲突,1997年刑法修改,立法机关在刑法第306条增加一个“律师妨碍作证罪”的罪名,用以规制刑事辩护律师规范行使辩护权,不可以刻意帮助犯罪嫌疑人洗脱罪名。再如,2006年律师法修改,为了改变我国刑事辩护律师“会见难”的问题,便在律师法中规定刑辩律师凭借“三证”(当事人授权委托书、所函、律师执业证)就可以直接会见犯罪嫌疑人。当有些律师依据律师法的规定,带上当事人授权委托书、所函、律师执业证到看守所要求会见时,看守所的公安同志说:律师法管你们律师,刑事诉讼法没有修改,会见犯罪嫌疑人仍需要侦查机关的批准。对此,律师群体意见很大,不断向司法机关和国家立法机关反映意见。为了平抑利益冲突,2012年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时,立法机关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直接采用了律师法中关于辩护律师凭借“三证”会见的规定。至此,刑辩律师“会见难”的问题才基本得到解决。

实现科学立法,对我们党而言:其一,在思想上,就是要充分认识到立法的利益分配性,以及可以利用立法来平抑社会各群体之间利益冲突的功能性;其二,在行动上,就是要通过党领导立法,将共享发展理念的政治追求落实到科学立法之中并将之法律化,以回应人民群众对共享发展的立法期盼,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最大化。只有这样的科学立法,才能最大限度地化解当前的社会各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三、立法建构的实践:遵循渐进立法

立法建构的实践涉及到遵循什么样的立法策略的问题。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落实到了立法建构的实践之中,就是遵循渐进立法。具体内容包括:立法实践为何需要遵循渐进策略;十八大以来渐进立法实践之成就;十九大之后渐进立法实践之前瞻。

(一)立法实践为何需要遵循渐进策略

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的立法实践为何需要遵循渐进策略?一个基本理由是“共享是全民共享、全

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为什么是“渐进共享”?因为,“共享发展的达成,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渐进过程。这是由共享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和我国当前的实际国情所决定的。”^[14]“实现(社会共享)这个目标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说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就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14]因此,共享发展理念立法建构实践也是一个“积小胜为大胜”的渐进立法过程。比如,尽管房地产税法有助于共享发展,但是立法的条件仍不是很成熟而未能实现成功立法。

(二)十八大以来渐进立法实践之成就

十八大以来,遵循渐进立法策略,党和国家一直在致力于用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来达成科学立法,以成就良法之治,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具体表现在:2013年废止劳动教养制度,有助于部分行政违法者实现人身自由的共享;2014年出台“史上最严厉”的《〈环境保护法〉修正案》,有助于实现良好生态环境的共享;2015年修改《计划生育法》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一定程度上为生育权松绑,有助于主体的人的自身生产;2016年出台《反家庭暴力法》,有助于实现家庭成员的和谐共享;2017年出台的《民法总则》确立了国家监护制度,有助于那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对物质生活的共享等等。

(三)十九大之后渐进立法实践之前瞻

迄今,从立法的数量来看,我国已经是一个法律大国。但是,从立法的质量和法律实施的效果来看,我国还不是一个法律强国。落实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科学立法仍大有作为。一是要落实已有立法规划,加快制定出诸如环境保护税法、房地产税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基本医疗卫生法、刑事被害人救助法等法律。^⑤二是可以考虑将财产公示法、遗产税法、反就业歧视法等更为凸显共享发展理念的法律,尽快列入立法规划。

就《刑事被害人救助法》而言,2014年我国已经出台了一部行政法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为什么又要单独搞一部《刑事被害人救助法》呢?主要是因为,刑事被害人是一个特别需要国家主动救助的群体,而《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只是鼓励并规范社会力量去救助那些需要救助的人群而已。在法律实践中,刑事被害人是特别无助的,很难得到民事上的赔

偿。这是因为:其一,有些刑事案件破不了案,刑事被害人得不到赔偿。其二,有些刑事案件即使破了案,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愿意赔偿或者无力赔偿。其三,我国目前的刑事法律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嫌疑人(被告人)对刑事被害人的赔偿仅限于其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对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属提出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抚养、扶养、赡养费、精神损害赔偿等赔偿项目的,法院判决不予支持。可见,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属在民事赔偿方面特别无助。这时,如果国家不对刑事被害人进行特别救助,社会就有失公平正义。因此,《刑事被害人救助法》可以说将是一部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具有共享发展内容的法律。

就《遗产税法》而言,它是法治领域落实共享发展理念极为重要的一部法律,也是共享发展理念之立法建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法律。这是因为:其一,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对“共同富裕”的设想是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来实现。而事实上,“先富”不会主动去带动“后富”来实现共同富裕。其二,为了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享发展理念,要求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其三,在建设法治中国的今天,“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莫过于立法安排了。而解决共同富裕问题,最好的立法安排又莫过于制定《遗产税法》。我们党不可能再像建国初期那样通过没收或者低价赎买的办法来解决财产问题了,更何况我国所有的公私财产均得到了《物权法》的一体保护。通过出台《遗产税法》,开征遗产税,是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实现共同富裕最合法的最有效的制度安排。其四,开征遗产税有先例。国外绝大多数国家有开征遗产税;我国在国民政府时期,1938年颁布了《遗产税暂行条例》,1940年1月1日正式开征遗产税。其五,我国已经具备了遗产税立法的诸多条件,可以实施渐进式的遗产税立法体系,分步确定遗产税征收目标。^[17]

就《反就业歧视法》而言,在我国,由于没有反就业歧视基本法或单行法,就业歧视现象在我国较为普遍,就业者很难得到平等的对待。而平等对待原则(the Principle of Equal Treatment),又是反就业歧视法的核心原则,其在美国、德国、荷兰、印度等国家的反就业歧视法律中都有明确的规定。^[18]《反就业歧视法》,是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的立法建构的应有之义,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逐步建立以

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19]这一重要讲话的落实。

总之,公正,是人民群众对国家法律制度的美好期望,更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本质追求。公正主要是通过利益共享的法治形式实现的。“法治通过调节社会各种利益关系来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20]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的法治实现,首先需要在制度安排上进行立法建构。只有在立法建构中贯彻落实了习近平的共享发展理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共同富裕”的目标才能逐步变为现实。

注释:

- ①公元前399年,雅典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苏格拉底被雅典的公民大会以其渎神罪和腐蚀雅典青年思想罪判处死刑。苏格拉底的学生和朋友在买通监狱守卫的情况下,试图以雅典的法律是多数人的暴政,没有公平正义为理由劝说其逃离。但苏格拉底坚决拒绝,其认为:虽然判处他死刑的法律是邪恶的,但逃脱法律的制裁也并不高尚,从而拒绝逃离。苏格拉底最终被执行死刑。
- ②钟相杨么起义口号:“法分贵贱,非善法;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
- ③1789年,边沁发表《道德与立法原则》,其核心思想为:一项法律的制定和形成都有人为的因素在内,法学家(立法者)应该使法律尽可能地实现社会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最终符合人们的最大利益。
- 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所以没有规定男女平等,是因为当时的临时约法在立法上多以英国立法为师,而英国直到1918年的《人民代表法》才规定:30岁及30岁以上的女业主或男业主的配偶才有选举权。1928年,英国进行彻底的选举改革后,妇女才最终赢得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
- ⑤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2015年立法工作计划,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lfgz/lfdt/2015-05/25/content_1936926.htm;全国人大常委会2016年立法工作计划, http://www.npc.gov.cn/npc/zgrdzz/2016-05/30/content_1990633.htm. 2017-06-28.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9).
- [2]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138.
- [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8.
- [4]曹胜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困境与求索: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视角[J].法学论坛,2015(5):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7-135.
- [6] 李可.马克思的森林立法观:以《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为主要分析对象[J].法商研究,2006(2):92.
- [7] 徐显明.法理学教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25.
- [8] 李晓哲.论唐群英“天下兴亡,人皆有责”的思想内涵[J].妇女研究论丛,2013(1):69.
- [9] 胡玉鸿.马克思的良法观及其时代意义[J].浙江社会科学,2015(1):25-36.
- [10] 冯祥武.《劳动合同法》遭受批判的原因评析:基于政治法律学的宏观视域[J].北方法学,2010(4):61-69.
- [1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99.
- [12] 吴传毅.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本构架[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4(8):4.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32.
- [14]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N].人民日报,2016-05-10(2).
- [15]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4-10-29(2).
- [16] 冯祥武.国家立法与社会资源分配的内在逻辑[J].政法学刊,2009(6):6-11.
- [17] 白晓峰.遗产税立法的困境与路径选择[J].法学论坛,2014(3):101.
- [18] 冯祥武.反就业歧视法基础理论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191-198.
- [19]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96.
- [20] 钱弘道.“法治浙江”: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前期探索[J].桂海论丛,2015(6):5.

(责任编辑 刘成贺)

Legislative Construction of Xi Jinping's Shared Development Concept

FENG Xiang - wu

(Research Office of Law, Party School of CPC Yongzhou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Yongzhou, Hunan 425000, China)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Xi Jinping's shared development concept implemented into legal field is the problem of legislative construction about Xi Jinping's shared development concept. It includes the legislative activities to practice the Xi Jinping's concept of shared development through pursuit of good governance, advocating scientific legislation, legislation gradually. The legislative construction about Xi Jinping's shared development concept will allocate more power and resources to the people, and make more laws with shared development content, so as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the people gradually.

Key words: Xi Jinping; shared development concept; legislative realization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功能定位反思

雷振斌

(鲁东大学法学院,山东烟台264025)

摘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在我国已经正式确立,但对于该制度的功能定位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并未形成共识,由此也影响到该制度的立法设计和司法适用的效果。目前,“虚伪排除”仍然是该制度功能的实然定位。这种定位虽然与我国刑事诉讼现存的利益观念、诉讼结构、立法技术相适应,但已经不符合未来刑事诉讼的发展方向。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非法证据排除的功能,应当实现从“虚伪排除”到“正当程序”的转型。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虚伪排除;正当程序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5.012

中图分类号:D925.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5-0049-08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已经被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所采纳。从总体上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并非只有单一功能,而是包含了“虚伪排除”“遏制违法”“保障人权”“司法廉洁”“程序公正”等多项价值目标在内的“功能群”。不同的国家由于诉讼理念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更由于对制度功能需求的不同,因此对该制度的功能定位侧重点也各有不同。关键在于,在这一“功能群”当中,只有确定何种功能应当居于核心地位,其他功能围绕着核心功能进行组织,才能实现功能产出的最大化;并且制度功能定位还将决定,当各功能在特定的场景中产生冲突时,何种功能应当优先得到满足。

具体到我国,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式确立以来,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运行状况并不令人满意,出现了“名禁实允”“虽令不行”的状态。^[1]这种状态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对该项制度的功能定位偏差有关系。本文拟探讨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功能在我国的实然定位与应然定位,并且分析该定位偏差的原因和改进路径。

一、“虚伪排除”:制度功能的实然定位

“虚伪排除”,顾名思义就是为了防止由于非法取证行为导致证据的不真实,而将该证据予以排除。

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美国,“虚伪排除”也是该制度最早的理论基础和功能预设。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斯蒂芬在评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说:“这项普通法规则的设计主要是为了防止不实证据被采用。它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受到威胁或者其他压制方法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做出虚假自白以摆脱进一步的强制。因此,普通法规则的目的并非针对应予反对的侦查方法,而在于保护被告人免受错误的定罪。”^①日本早期的判例也认为,“被不当地长期关押拘禁后的自白或者不自愿的自白”,由于具有很大的虚伪性,应当予以排除。^②日本学者对此的解释是:之所以排除并非出自任意的自白,是因为其虚假的危险性极大,而审判的目的是发现真实,所以使用这类自白是审判的自我矛盾,因而应当予以排除。^[2]可见,将“虚伪排除”作为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核心功能,并非我国首创和特有,但问题在于当美日等国已经逐步发展并超越了“虚伪排除”这一理论基础时,我国在制度的实然定位上仍然保留着该理论的痕迹,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予以说明:

(一)从制度引进的缘起看

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理论引进、争论,到制度确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1979年和1996年

收稿日期:2017-05-28

基金项目: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绩效实证研究”(J13WH51)

作者简介:雷振斌(1972—),男,山西平遥人,法学博士,鲁东大学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法律社会学。

的两部《刑事诉讼法》均没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任何规定。理论界也曾主张,凡是属于真实的证据材料,即使是采取非法方法获取的,也应该采用。^[3-4]

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6月29日通过的《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获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9年1月18日通过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也明确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这可以算是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首次正式提出。

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引进、确立和完善,是和一系列重大刑事冤假错案的曝光相伴随的。近年来被纠正的如“杜培武杀人案”“赵作海杀人案”“佘祥林杀人案”等,除了冤情的重大、洗冤的巧合之外,就是在每一起冤案的背后都暴露出当初侦查人员的严重刑讯逼供行为,这些刑讯逼供是导致冤案发生的直接原因。因此在冤案被纠正后,不只是理论界,整个社会都在呼吁出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防止刑讯逼供获得的口供被作为定罪的证据使用。在杜培武案件真相大白后的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就专门下发《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重申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2005年“佘祥林杀人冤案”促成了湖北省《关于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的出台。^[5]中共中央2009年下发的《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明确表示要“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证明责任、审查程序和救济途径等”。2010年“赵作海杀人冤案”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死刑证据规定》),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专门进行了规定。这两个规定标志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真正建立。

从我国引进和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历程可见,鉴于我国冤假错案的最重要原因是刑讯逼供,因此排除刑讯逼供获得的虚假证据,以保证口供的真实性,是我国确立该项制度的直接动因,并且附带的试图期望通过非法证据排除来实现对刑讯逼供的遏制。

(二)从制度设计的内容看

虽然在“两院三部”联合发布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制定者开宗明义即表明制定该规则的目的是“为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但从制度引进的背景即可看出,该制度设计的重心仍在于防范刑讯逼供可能导致的证据虚假,甚至不重在排除“刑讯逼供”行为本身。择其要者,从以下表现可见。

第一,对“非法证据”的严苛界定。典型表现是对证据“非法”的标准要求很高,尤其对“刑讯逼供”的界定,采用了“剧烈痛苦”标准。^[6]对于类似于“刑讯逼供”的“其他方法”如疲劳审讯等,看重的不是对被审讯者权利的保障,而是由于疲劳审讯所导致的痛苦程度,以及由此导致的证据虚假。

第二,对证据事项的规定缺失。一些旨在保障和恢复被非法取证者权利的“非法证据”并未规定,如“毒树之果”。《死刑证据规定》第34条规定:“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指认提取到了隐蔽性很强的物证、书证,且与其他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相互印证,并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等可能性的,可以认定有罪。”由于“刑讯逼供”的模糊标准,即使可能是“毒树之果”也难免会因为能够相互印证而被采纳。再如,仅仅排除直接来自刑讯逼供所获得的供述,而对刑讯逼供之后的“重复供述”是否排除也未规定,可知制度的重心只在于对刑讯逼供可能导致虚假证据的最低限度防范。

第三,对取证行为的宽松要求。典型的如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除死刑案件、职务犯罪案件之外,其他案件只要求讯问时“可以”同步录音录像。这就给办案人员提供了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可以此为借口不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甚至即使有录音录像也不提供。这无疑并不利于消除刑讯逼供。

第四,对“瑕疵证据”的宽容补正。根据两个《证据规定》和《刑事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将“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相区分,并给予补正机会,这种规定本身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立法对补正的标准比较模糊,“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会被司法者作任意解释;另外,瑕疵证据的补救措施是“作出合理解释”或者“重新取证”,这样的“补正”使得该规则在实践中容易被架空。如何把握解释是否“合理”,给予司法者的裁量空间过大;“重新取证”则容易将非法取证行为轻易的合法化。在这样的“瑕疵证据”补正的规则下,存在取证瑕疵的违法行为很

容易被规避,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立法者看重的主要还是证据的真实性,而不是取证过程的合法性。

(三)从制度运行的实践看

由于制度设计内容的宽松和标准模糊,导致在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被排除的数量很少,即使是被排除的,也主要是那些有确凿证据证明刑讯逼供,或者至少是有确凿证据使得难以排除违法取证的情形。而对于违法行为没有影响到证据真实性的情形,非法证据排除很容易被规避或者扭曲。

第一,激励不足。无论侦查、起诉还是审判,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启动难”的问题。审判中,法官对于被告人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重在核实其供述的真实性,而对于是否侵犯诉讼权利并不重视,甚至要求被告提供“充分证据”来证明非法取证的存在。对于排除非法证据将有可能导致无罪判决的案件,法院会更加谨慎,实践中也极少出现。

第二,规避有余。由于非法取证标准的模糊性和取证要求的宽松,司法者对非法证据认定很谨慎,轻易不予排除。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5条规定:“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由于刑讯逼供的标准被界定为“剧烈疼痛或者痛苦”,实践中就不会轻易认定构成刑讯逼供,除非被讯问者身上“有伤”,而且被看守所的体检证明予以证实。而对于“疲劳审讯”,由于法律并未规定明确的讯问时间限制,也很难被认定。“威胁、引诱、欺骗”也很容易被解释成为“讯问策略”。另外,虽然实践中存在大量的“瑕疵证据”,但是由于“瑕疵证据”补正的宽松要求,导致侦查机关自证合法的《情况说明》比比皆是,而这些《情况说明》也很容易被采信为有效证据。^③

第三,标准化。所谓标准化就是,当被告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时,司法者以证据的“真实性”论证取代了“合法性”论证,只要证据是真实的,就不排除。控方甚至法院以被告人在公诉阶段的供述与侦查阶段的供述“基本一致”,或者能够与其他证据及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能够反映其“真实性”为由,反证侦查机关取证的合法性,对被告人提出的排除申请不予采纳。^④这更典型地说明司法实践中对非法证据排除功能侧重于“虚伪排除”的事实。

(四)从制度设计的理念看

从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引进的背景、制度设计的

内容及其运行效果,可以观察到该制度设计的基本理念,也就是制度设计者期望该制度输出的最重要的功能,并且,该功能的输出必须与整个刑事诉讼制度整体的功能协调一致。刑事诉讼制度整体的功能包括“犯罪追诉”和“人权保障”两个方面,“犯罪追诉”又可以具体为两个标准即“不枉”与“不纵”。这样,刑事诉讼的制度价值目标可以概括为“不枉”“不纵”与“不侵权”。

一方面,我们在制度设计的应然理念上已经能够有限度地接受“不枉”优先于“不纵”,因为一般而言错误地将无辜者定罪后果,要比错误地使有罪者逃脱定罪更加令人不能接受。错误定罪在原有的犯罪损失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冤案的损失,而有罪者逃脱定罪则并不存在这种新增损失。因此,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才竭力防止因为非法取证所导致的虚假证据进入定罪证据体系。但之所以说是“有限度地接受”,是因为实践当中,“不枉”优于“不纵”的制度理念也并非能够得到顺利贯彻。那些冤案在被揭露之前的“留有余地”的判决就是明证。在司法者看来,尤其在死刑案件中,“留有余地”的判决,既能满足对“命案”这类严重犯罪的追诉需要,也可以为证据不足留下回旋余地,避免死刑误判的无法挽回。

另一方面,我们的立法和司法的实际理念在面对“不纵”与“不侵权”的取舍时,潜意识中还是倾向于前者。尤其是当非法证据排除所要排除的是“真实”的证据,而排除理由仅仅因为侵犯了被告人的程序权利时,立法者和司法者都会面临犹豫。这种犹豫体现在立法中就是“瑕疵证据”补正的宽松,而体现在司法上就是非法证据排除的高标准。

二、“正当程序”:制度功能的应然定位

毋庸置疑,通过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可能存在一定的虚假性,典型的如“刑讯逼供”可能导致的“屈打成招”,“非法搜查”无法排除“栽赃陷害”,这也是古往今来为什么国家都要或多或少地设置取证的法定规则的一个基本动因。因此,通过将由于非法取证可能导致的虚伪证据排除在定罪证据体系之外,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取证本身的不合法所带来的虚假证据,从而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在这个意义上,将“虚伪排除”作为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基本功能之一具有其合理性,在“不枉”的意义上,它保证了最低限度的实体正义。但将“虚伪排除”作为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核心功能,容易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缩减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其他功能产出,如“人权保障”“违法遏制”等功能。“虚伪排除”意味着“真实”就不需要排除,即使该证据是违

法获得的,这样的逻辑结果致使违法取证行为得不到遏制,不利于被追诉者人权的保障。换言之,“虚伪排除”保证了最低限度的实体正义,但也仅仅是最低限度而已,并没有实现应有制度功能的产出最大化。

正如上述,刑事诉讼制度的整体功能在于实现“犯罪追诉”与“人权保障”的价值平衡,既要保证“不枉”“不纵”,还要保证“不侵权”。刑事诉讼的取证规则同样服从这一整体的制度目标,既要满足“犯罪追诉”的需要,同时也要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权保障”。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是从反面保障刑事取证规则功能的顺利实现,这样,其制度功能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实现“不枉”,还必须兼顾“不纵”,更重要的是还必须实现对人权的保障。刑事取证规则的本质就在于,在国家和公民之间实现犯罪证明责任的平衡负担。所谓取证规则中的“正当程序”,是指国家为了实现犯罪追诉的目标,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强制,或者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配合取证时,必须严格遵循公平负担的原则,在程序上保障犯罪追诉的必要性和公民基本权利受限制的必要性之间的平衡。如果违背了这一公平负担,则破坏了正当程序,所获得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因此,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核心功能应当定位为维护刑事诉讼的“正当程序”。只有将制度核心功能定位为维护“正当程序”,才能实现非法证据排除应有诸项功能的最大化产出。

(一)“正当程序”能够保障“虚伪排除”

“正当程序”以实现“程序正义”为直接目的,但“程序正义”的实现,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实体正义”,尤其在保证“不枉”的层面更是如此。严格遵守取证程序,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刑讯逼供可能导致的虚假口供,也可以防止由于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导致的在收集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时产生故意或者非故意的虚假。“正当程序”在保障“虚伪排除”的实现时,只注重取证行为是否违反法定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就推定为“虚伪”,而不再衡量该证据是否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这样即可进一步防止将那些表面上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从而具有“真实性”,但实际上违背取证规则的证据进入到定罪证据体系中。比如,通过刑讯逼供获得的,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甚至是能够与隐秘的证据相互印证,从而具有高度真实性的“口供”。这样的“口供”往往是检验非法证据排除的“试金石”。

(二)“正当程序”优于“遏制违法”

“遏制违法”,又称为“吓阻效果”说,是美国非

法证据排除规则功能的主流观点。它认为由于法院将排除违法搜索所得之证据,使得执法人员进行搜索扣押之前,必三思而后依法行之,否则白忙一场,空自浪费时间与人力,如此则违法自然减少。换言之,即以排除法则祛除执法人员进行违法行为之“诱因”。美国最高法院在1974年的United States v. Callandra一案中宣称:“排除法则之首要目的在于吓阻未来警察之不法行为,并借此达成保障人民于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下免受无理搜索与扣押之权利。”^⑤“遏制违法”也是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确立的初衷之一,即对实践中频繁发生的刑讯逼供现象的遏制。

可以肯定,非法证据排除对吓阻警察将来的违法行为具有一定的效果,毕竟警察也不愿意在耗费时间和精力获得证据之后,仅仅因为取证的违法性而被排除,没有实际效果。有学者的实证研究也支持这一理论。如美国学者研究了在Mapp案判决前后,巴尔的摩及水牛两市的逮捕比例数字有很大差别,Mapp案判决之后,有急剧减少的现象。^⑥但也有学者的实证研究认为,通过排除非法证据来“遏制违法”,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如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Dallin Oaks通过研究芝加哥法院在审理赌博、贩毒、武器等三类案件时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违法搜索仍然屡见不鲜。^⑦我国学者的研究也表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威慑效果,但效果有限,尤其是随着侦查机关对口供排除规则的进一步了解,威慑效果更趋于下降。^[7]

具体到我国而言,依靠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来实现“遏制违法”的目的,其效果更值得担忧。原因在于由于我国目前的非法证据排除的非严格性,更由于即使某些非法证据被排除之后,其不利后果也很难落实到具体实施非法取证的侦查办案人员。即使在极端个别的案件中,办案人员构成刑讯逼供罪被判刑,也并非由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产生的功效。所以在目前情况下,以“遏制违法”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功能并不会取得理想效果。

以“正当程序”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核心功能则可以避开是否足以“遏制违法”的争议。“遏制违法”应当只作为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附属功能,换言之,能够吓阻一部分警察的违法行为当然十分理想,但如果未能吓阻警察的违法行为,通过坚守“正当程序”原则,将违反程序的证据排除掉,也会实现对被侵权者的救济功能,这也实现了程序公正的基本价值。

(三)“正当程序”能够兼容“司法廉洁”

美国法院在首次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

Weeks 一案中,就明白宣示其采纳排除规则的理由在于:“此种由执法人员使用非法方式扣押证据之趋势不应自法院的判决中获得承认。法院及其人员将犯罪者绳之以法的努力,不得借助于牺牲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原则的方式,否则就等于司法机关纵然不是公开违法,也肯定存在明显的疏忽所为的宪法禁止行为。”^⑧最高法院认为司法机关应该作为公平正义的象征,不应当与执法机构“同流合污”,对于违法获得的证据,法院应当站在中立的第三人立场,拒绝“收买赃物”。否则一方面要求人们必须守法,另一方面法院却支持公务人员违法,岂非自相矛盾?人们如果因为非法证据而被判刑,其内心也必然不服。另外,法院采纳非法证据,不仅在个案中放纵了执法人员的违法,而且也会间接鼓励其将来的违法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司法廉洁”与“遏制违法”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不可否认,“司法廉洁”是非法证据排除希望维护的价值之一,但“司法廉洁”也无法独立成为非法证据排除的核心功能,不应当成为该制度的基础。尤其在犯罪率节节攀升的今天,一味以司法机关的“洁身自好”,不仅不能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反而将重要证据排除,使其逍遥法外,这也难以获得公众对“司法廉洁”的认同。因此,美国最高法院在 Stone V. Powell 一案中指出:“虽然本院判决经常引用‘司法廉洁之必须’,但在特定场合决定是否适用排除规则时,其扮演的角色很有限,我们当然要保持司法程序的廉洁,但在排除具有高度价值的证据时,此一关切所具有的分量甚为有限。”^⑨

我国的情形就更加突出。在我国传统中,相比司法的程序正义,人们对司法机关实现实体正义更为期待,“司法廉洁”的内容也包含着“不枉不纵”的二元平衡,如果由于排除了重要的非法证据而使罪犯逍遥法外,恐不符合人们对“司法廉洁”的一般观念。所以,用“司法廉洁”来解释非法证据排除的核心功能,其可接受性不如“正当程序”。反过来,“正当程序”本身则可以兼容“司法廉洁”的基本要义。维护了诉讼程序的正当性,自然就直接体现了“司法廉洁”。而且,维护程序的正当性,由于平衡了“人权保障”和“犯罪追诉”两方面的功能,也更容易被社会普遍观念所接受。

(四)“正当程序”能够平衡“人权保障”与“犯罪追诉”

“人权保障”毋庸置疑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项基本功能。人权保障的对象既包括确定或者可能的无辜者,也包括确定或者可能的有罪者。就保

障无辜者的人权而言,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包含的“虚伪排除”功能,可以保障无辜者免于因为刑讯逼供所获得的有罪证据而被错误定罪,这直接体现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实体性人权保障功能。而在没有足够犯罪嫌疑的情况下,任何人都应当被推定为无辜,从而都不应当受到非法的搜查、逮捕或者其他的强制措施,以保证确定或者可能的无辜者享有充分的自由和隐私权利。在没有足够嫌疑和法定手续的情况下,由非法的搜查、逮捕等获得的证据应当被排除,这体现了非法证据排除对无辜者的程序性人权保障功能。

对于确定或者可能的有罪者,非法证据排除同样具有人权保障功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免受酷刑等非人道待遇不仅仅是为了保证口供的真实性,更重要的还是要保证,即使是有确凿证据证明有罪的被告人,也应当享有基本的人道待遇,不能在法定的刑罚之外再承受额外的处罚。这就是为什么非法获得的即使是“真实的”口供,也不应当被采纳的理由。从程序权利保障角度看,在没有足够嫌疑和法定手续情况下的非法搜查和逮捕,即使侥幸获得了有罪的实物证据,也应当被排除。其目的一方面在于尽量威慑警察今后不再做出类似行为,另一方面也在于对被侵权者的救济。这也符合“任何人不应从其错误行为中获利”的基本正义。

但是同样,“人权保障”也不应当成为非法证据排除诸项功能的终极标尺。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防范来自侦查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同时,也需要防范来自被追诉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亦即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并非要成为犯罪者掩藏犯罪证据的“保护伞”。诚如有人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提出的批评:“排除非法证据不构成对犯错误的警察的任何惩罚,但它可能,而且极有可能使犯有罪行的被告人逃避惩罚,它剥夺了社会对违法者进行惩治的权利,它保护了那些已经被发现有罪证据的人,但对于遭受非法搜查的无辜受害人却不能提供任何保护。”^⑩这种批评虽然有失偏颇,但如果一味偏向于人权保障,而不注意与“犯罪追诉”的必要平衡,就极有可能使得非法证据排除真的成为犯罪者用以逃避惩罚的工具。因此,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功能定位也必须考虑“人权保障”和“犯罪追诉”的平衡。

以“正当程序”为核心即可最大限度地实现这种功能平衡。现代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已经发展出诸多的例外,如“善意的例外”“最终的必然发现的例外”“在国外取得证据的例外”“个人搜查的例外”“用以反驳被告人的例外”等。^[8]“正当程序”的功能

定位要求司法者在衡量是否进行非法证据排除时,要考虑警察违法的程度,尤其要考虑警察违法属于实质违法还是形式违法,防止将警察在实质上并未侵犯被追诉者权利而只是在形式上不完善的情形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这种理念在我国的立法上就体现为“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的区分,“瑕疵证据”的本质就是虽然形式上表现为侵权但实质上并未侵权的证据。将非法证据排除的核心功能定位为“正当程序”,可以防止该制度过分偏重于“保护人权”,而导致自身成为犯罪人掩盖有罪证据的“保护伞”。

三、实然与应然的差距形成的原因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功能定位在实然和应然方面的差距,究其原因在于,实然的制度功能定位能够与现行的利益观念、诉讼结构和立法技术特征构成相适应的耦合状态,而应然的制度功能定位则与此构成冲突,因此需要改进才能调谐。

(一)与利益观念的耦合与冲突

“虚伪排除”本质上是对实体正义的追求,其体现的是实体正义中“不枉”的一个方面,虽然“不枉”也直接体现了对被追诉者人权的保障,但在中国的具体语境下,还是为了体现犯罪追诉的准确性,而犯罪追诉从本质上又是国家利益的体现,所以最终仍然可以归结到对国家利益的维护。更不必说“虚伪排除”的反对解释即为“不虚伪的,即使违法也不排除”,这种反对解释更体现了“追诉优先”的国家本位主义特征。

“正当程序”本质上则是对程序正义的追求,其体现的是在犯罪追诉中,国家和公民应当公正地进行证明责任的分配,以及公民应当在何种限度内可以被强制要求提供证据或者其人身自由和隐私自由受到相关约束的问题。“正当程序”虽然旨在实现“人权保障”和“犯罪追诉”的平衡,但在与其他相关制度的分工中,很显然非法证据排除侧重于对“人权保障”的成分更多一些。换言之,“正当程序”在价值上更注重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所以从根本上说,“虚伪排除”与“正当程序”的定位之争,本质是“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何者更应当优先的问题。

在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的制度实践中,之所以自觉不自觉地将制度功能定位侧重于“虚伪排除”,从理念根源上仍然是“国家利益”优先于“公民权利”的传统理念决定的。“国家利益”优先则必然意味着“犯罪追诉”优先。因此,我们在进行利益衡量时,虽然在两类“可能违背实体正义”的错误之间,我们已经有限度的认可“不枉”应当优先于“不纵”,但在面对“违背实体正义”的错误与“违背程序正

义”的错误之间,尤其在“不纵”和“不侵权”之间进行选择时,还是会不自觉地倾向于“不纵”。这也就可以解释我们在对非法证据排除进行立法设计和司法适用时,总是尽可能地减少或者限定该制度的适用范围和频率,提高该制度适用的门槛。尤其能够直接体现这种利益观念选择逻辑的是我们在司法政策层面的“维稳”和“维权”之争。犯罪是对稳定最大的破坏因素,因此“维稳”政策的必然逻辑后果就是“犯罪追诉”优先,在此政策导向之下,体现“维权”价值的非法证据排除也只能最低限度地满足于“虚伪排除”,防止造成冤假错案反过来破坏“维稳”,而不可能侧重于强调“正当程序”来满足“维权”要求。

与此相关联的另一层次的问题是,当面对可能的“放纵犯罪”错误与侵犯被追诉者程序权利的错误时,司法者面临的决策风险也不同。司法者如果因为排除掉“真实但非法”的关键证据因而可能导致无罪判决,正如陈瑞华教授所言:“如果法官判无罪,首先要汇报给庭长、分管的院长,要报告审判委员会开会,全院院里面看这个法官的眼神都是怀疑的,‘是不是进行权钱交易了?’公安、检察机关不同意,法官还得去跟他们解释,还得跟政法委汇报去。反过来,判有罪有多容易?法官一个人就说了算,没人管他。可以这么说:一个法官判有罪,是一马平川,没有任何障碍,没有任何职业风险;一个法官要去判无罪,会经历体制上的多重困难。从人性的角度,你说他本能地会宣告有罪还是无罪?”^[9]

基于对两类错误不同的利益衡量和决策风险,非法证据排除的制度设计和适用理念,只能满足于该制度最低限度的实体正义功能即“虚伪排除”,只能尽量缩小其适用范围和适用频率,提高其适用的门槛,而不愿意全面拓宽其程序权利保护的“正当程序”功能。前者与利益观念是耦合的,而后者则是相互冲突的。

(二)与诉讼结构的耦合与冲突

与利益观念的国家本位主义相适应,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表现为一种典型的“线性结构”,即公检法机关在处理刑事案件中是一种流水线式的作业,是一种“侦查中心主义”的模式。案件的实体真实最重要的是在侦查阶段来发现,而检察机关则是对这种实体真实的进一步检验,案件到了法院只是对检察机关检验结果进行的确认而已。在这种“线性”的诉讼结构之下,法院的独立和中立地位难以得到保证。在公检法三机关流水作业的线性诉讼模式中,后一机构对案件处理决定所做的实质性变更,直接决定了前一机构所做决定的“正确性”。比如

检察机关的不批捕或者不起诉往往构成对公安侦查工作的否定。同样,法院的非法证据排除更直接体现了对公安和检察工作的否定。根据考核办法,这种“否定”将会使办案人员的切身利益比如评优、升迁等受到直接的影响。更严重的是,如果法院排除了案件定罪的核心证据,将会使整个案件的公诉失败,而被告人无罪就将申请国家赔偿,那就意味着公安、检察机关要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基于我国公检法长期“重复博弈”形成的“默契合作”来看,无论是办案单位之间,还是长期从事刑事审判的法官和公诉人与刑事警察之间,都已经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因此,实践当中检察机关可以对法院在量刑轻重方面,甚至在改变罪名方面都予以默认,几乎从来不加抗辩;但如果法院作出了无罪判决,却会击穿检察院的“容忍底线”。尤其是法院以侵犯被告人的程序权利为理由,排除“真实的”关键性定罪证据而导致的无罪判决,更不能被控诉机关和被害人所接受。因此,法院只能选择谨守最低限度的“虚伪排除”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功能定位。

与诉讼结构的“侦查中心主义”相适应,在证据形式上我国形成的是“口供中心主义”,其他证据主要用来印证“口供”的真实性。因此,非法证据排除也主要是用来排除可能的虚假口供。如果有其他证据印证口供的真实性,则很难被排除,更不必说排除口供导致不能定罪的结果发生。

伴随“侦查中心主义”的则是“案件笔录中心主义”^[10],侦查机关的卷宗成为是否定罪的终极依据,而警察和证人的出庭则成为例外。在这种证据模式之下,程序公正的意义难以得到体现,由此法院也只能选择“虚伪排除”来作为非法证据排除最低限度的目标。

(三)与立法技术的耦合与冲突

“口供中心主义”的形成与我国的刑事立法技术直接相关。从刑事实体法的立法技术看,我国长期形成的是一种“主观主义”的立法模式,注重对犯罪主观性要件的证明,用行为来佐证意思。^[11]在这种立法思想指导下,必然衍生出对口供的严重依赖。从刑事程序法的立法技术看,则表现为取证规则的非严格性,以弹性的“标准”取代严格的“规则”。比如“刑讯逼供”“疲劳审讯”等的弹性标准即是适例。在弹性标准之下,侦查机关更容易行使自由裁量权,对“非法”进行限缩解释从而予以规避。这种立法模式更加不利于对被追诉人程序权利的保护,因此以维护“正当程序”为核心的非法证据排除很难实现。在实体立法的“主观主义”和程序立法的弹性标准下,非法证据排除也就仅仅能够满足“虚伪排

除”的最低限度功能了。

四、制度功能从实然到应然的转型路径

“虚伪排除”作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实然功能定位,其缺陷在于功能的单一性,与其他功能相冲突,影响了整体功能的产出。由于其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利益观念、诉讼结构、立法技术特征能够相互耦合,其存在有合理的一面,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其不适应性也日渐显现,所以有必要推动制度的功能定位向维护“正当程序”的应然转向,实现转向的条件也应当满足与利益观念、诉讼结构、立法技术特征的相互耦合。

(一)利益观念的转向

利益观念的转型是系统中所有要素转型的关键,也是其他要素转型的前提。我国社会正在逐步从利益的国家本位主义向国家利益与公民利益相均衡的方向发展。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本身就是公民权利观念得以提升的产物,“虚伪排除”也是出于对冤假错案的防范,这也直接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但仅仅满足于从实体上保障“不枉”是远远不够的,程序公正的维护对于公民利益的保护,对于防范国家权力的滥用具有更加根本的意义。“犯罪追诉”当然是很重要的价值,打击犯罪也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但随着冤假错案的不断曝光,人们对公权力滥用的警惕已经超过因为警察违法而使犯罪得不到追究的敏感。“打击犯罪,维护治安”固然重要,但公权力的滥用才是最值得防范的,来自公权力的侵害,比来自犯罪嫌疑人侵害更让公民无力防范,所以必须对公权力给予更大的约束。在此情况下,就有必要也有可能使非法证据排除的制度功能从最低限度的“虚伪排除”提升到更为全面的对犯罪人程序权利的全面保护。“正当程序”的利益观念基础正在形成。

(二)审判中心主义的转向

刑事诉讼的结构正在从流水线型的“侦查中心主义”向三角结构的“审判中心主义”转型。这也有助于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功能的转型。在审判中心主义的诉讼结构中,法院居于更加独立和中立的地位,相对于控辩双方,尤其相对于控方,利益上更加超脱,同时也更具有权威性。法院在排除非法证据时面临的压力和风险更小,也就更有激励严格对待被告人程序权利的保护。在这种诉讼结构中,法院对于辩方程序权利的保障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而不仅仅是最低限度的“虚伪排除”。

(三)立法技术的转型

从刑事实体法的角度看,应当改变主观主义的立法思路。虽然刑法主观主义有利于扩大对犯罪的控

制范围,对于有犯罪意图但未实行的,或者出于犯罪意图而实施的某些客观上没有危害性的行为可以纳入犯罪处理,有利于社会安全,但刑法主观主义的立法思路容易导致对口供的过度依赖。因此有必要从刑法主观主义向客观主义转型,也就在一定意义上减少了非法收集口供的激励。

从刑事程序法的角度看,应当提高刑事取证规则的明确性和强制性,减少辩方证明非法取证的困难。比如“沉默权”的赋予,违反沉默权告知程序的取证视为非法;对控方取证除了设置明确的要求外,应当设定“不利推定”原则,即对控方未能证明的某些事项,直接作出对控方不利的推定。比如“被告人庭前供述的非自愿性推定”“对不在羁押场所的被告人口供的违法性推定”“对不出庭的控方证人证言的不利推定”“禁止将《情况说明》作为取证合法的证据使用”等。这些取证规则可以有效地平衡控方与辩方在证明非法取证方面的行动能力,有利于对控方取证合法性的严格约束和判定,也有利于对被告人程序权利的保护。这样的立法技术就有利于实现非法证据排除从“虚伪排除”向维护“正当程序”的功能定位转型。

注释:

- ①Omnibus Crime Act 1968,18 U. S. C. § 3501.
- ②参见日本最高裁判所判例昭和 23 年 7 月 19 日《刑事判例集》2 卷 8 号,第 944 页。
- ③有学者经抽样调查发现,实践中瑕疵证据比例很高,可达 70% 以上,但被要求补正的很少,仅占被调查的 7.5%。另外,被要求补正的瑕疵证据中,重新制作的占 31.8%,《情况说明》占 68.2%,补正后被采纳的占 93.2%。参见:胡忠惠,徐志涛.刑事瑕疵证据补救的实证观察[J].北方法学,2015(2).
- ④参见安徽省凤台县人民法院(2014)凤刑初字第 00349 号

刑事判决书。

- ⑤United States v. Calandra. 414. U. S. 338(1974).
- ⑥Canon, Is the Exclusionary Rule in Failing Health? Some New Data and a Plea Against a Precipitous Conclusion, 62 Ky. L. J. 681, 704 – 705 (1974).
- ⑦Oaks Dallin. Studying the Exclusionary Rule in Search and Seizure, 37 U. Chi. L. Rev. 665(1970).
- ⑧232 U. S. 383, 58 L. Ed 653, 655 – 656(1914).
- ⑨Stone v. Powell. 428 U. S. 465(1976).
- ⑩Irvine v. California. 347 U. S. 128. 136(1954).

参考文献:

- [1] 闫召华. “名禁实允”与“虽令不行”:非法证据排除难研究[J]. 法律与社会发展,2014(2).
- [2] [日]西原春夫. 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69.
- [3] 戴福康. 对刑事诉讼证据质和量的探讨[J]. 法学研究,1988(4).
- [4] 申夫,石英. 刑事诉讼中“瑕疵证据”的法律效力探讨[J]. 法学评论,1998(5).
- [5] 房保国. 现实已经发生:论我国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J]. 政法论坛,2007(3).
- [6] 龙宗智. 我国非法口供排除的“痛苦规则”及相关问题[J]. 政法论坛,2013(5).
- [7] 王彪. 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威慑效果实证分析[J]. 河北法学,2015(1)
- [8] 杨宇冠.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J]. 比较法研究,2003(3).
- [9] 段文. 法院为什么不敢做无罪判决? [J]. 凤凰周刊,2015(9).
- [10] 陈瑞华. 案件笔录中心主义:对中国刑事审判方式的新思考[J]. 法学研究,2006(4).
- [11] 周光权. 刑法客观主义与非法证据排除[J]. 人民检察,2013(1).

(责任编辑 刘成贺)

The Introspection of the Functional Orientation of the 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 System

LEI Zhen – bin

(School of Law,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Shandong 264025,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the 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 rule has been officially established in our country, the function location of the system has not reach a consensus in the theory and judicial practice, which affects the legislative design of the system and the effect of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At present, “false exclusion” is still a reality location of this system’s function. Although the location adapts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criminal lawsuit, action structure and legislation technology of our country, it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riminal litigation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function of the 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 we shall achiev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false exclusion” to “due process”.

Key words: 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 false exclusion; due process

社会现实交往的全模拟传播

——对虚拟现实技术的传播价值及其走向的一种理论思考

祁 涛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从人类传播发展史的总体状况来看,为了克服时空等诸多局限,传播形态经历了由面对面的社会现实交往向非现实交往的演变,并自照相术出现后努力向模拟社会现实交往的方向转变。虚拟现实技术的出现与发展,为实现对社会现实交往的全模拟传播提供了可能,这将是一种以视像传播为基础、以身体在线为特征、以全感官参与为样态、以身临其境为体验的传播形态。正是对模拟现实交往的追求决定了虚拟现实技术的出现,也规定了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虚拟现实;现实交往;传播形态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5.013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5-0057-05

传播形态的演变是由理论设想指导的,而理论设想体现了人类对理想传播状态的欲求。目前传播理论设想的即时、互动、全媒体化等要素已在网络传播中全部实现,传播要素之间的重新组合可能会产生巨大的能量,但是一种全新的传播形态在理论空间中并没有找到位置。仅仅从传播要素层面来理解传播的理论设想,在互联网快速发展并且全面渗透经济社会生活的今天,传播形态不会出现革命性的变化。从总体视角来看,以往人类传播形态的演变过程是扬弃社会现实交往模式,发展非社会现实交往模式,以释放传播能量,克服时空等诸多局限。现代传播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在把地球村落化的同时,其即时、互动和全媒体化的特点使得非社会现实交往转变为模拟现实交往的传播形态成为了可能。因此,未来传播形态的变革方向当是实现对社会现实交往形态的全方位模拟。

虚拟现实(VR/AR/MR)技术的发展及其在传播领域的应用,当是传播向社会现实交往的全模拟形态转变的重要一步,也预示着人类传播形态演变的趋势和走向。但是,目前对虚拟现实技术的讨论,

多是集中于其在军事、新闻、教育等部分领域的具体应用。虽然杭云、苏宝华^[1]讨论了虚拟现实技术产生的沉浸式传播体验,史安斌、张耀忠^[2]讨论了其引发的“拟像”与“超真实危机”,喻国明、湛椿、王佳宁^[3]提出VR可以视为全新的未来媒介的主流形态,但是截至目前,还没有人从传播史的角度审视虚拟现实技术对人类传播形态演变价值,从而也限制了认识虚拟现实技术的价值与发展走向的眼界。正如卢卡奇所说:“只有在把这种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现实的认识。”^[4]笔者在此不揣冒昧,想从人类传播发展史的总体性中为虚拟现实技术对人类传播形态的影响,特别是对社会现实交往的全模拟传播的影响做出比较清晰的描绘。

一、社会现实交往与非社会现实交往传播形态的演变

按照杨保军教授的说法,“人类传播活动与人类是共生的,不存在哪个在先哪个在后的问题,是一种互生互动性的历史关系”^[5]。在与人类相伴而生

收稿日期:2017-09-06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消亡论语境下的报业数字化转型研究”(2014BXW012)

作者简介:祁涛(1977—),男,河南滑县人,新闻学博士,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新闻报道规范与新闻媒体运作。

的传播活动中,媒介决定着传播形态,“因为对人的组合与行动的尺度和形态,媒介正发挥着塑造和控制的作用”^{[6]34}。据此,麦克鲁汉将人类传播分为口头传播阶段、书面和印刷传播阶段、电子传播阶段;威尔伯·施拉姆将之划分为前语言传播、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五个阶段;黄旦将之分为口头媒介、书写媒介、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阶段。时期划分大同小异,描述异曲同工,主要的理论概念也已为人所熟知。笔者重提这一话题,意在从新的视角梳理这一过程,主要感兴趣的问题是,在传播形态演进的过程中,人类引入这些媒介,体现了何种传播欲求?这对传播形态的变化意味着什么?

在人类传播史上,基础的传播形态是口语传播,它主要体现为面对面的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直接交往。它的特征是以口语交流为基础,以身体在场为要求,以全部感官的参与为样态,以即时互动为优势。一般认为,口语传播时代大约从36000年前语言产生到公元前3000年文字出现。当然,在当代社会,口语传播也是基本的交流模式。人类学家记载了原始村落人在集市、汲水处、饭市等场所进行信息交流的情况;历史文献记录了苏格拉底辩论和古希腊、古罗马的政治集会,还发现了游吟诗人、新闻叫喊者等职业。这种基于现实交往形态的传播,产生的是具体而丰富的生活经验,被许多学者视为理想的传播状态。伊尼斯认为,口头传统“涵义鲜活而富有弹性”^[7]。萨丕尔发现,“许多原始的语言,形式丰富,有充沛的表达潜力,足以使现代文明人的语言黯然失色”^[8]。

虽然许多人怀念或赞美社会现实交往的优势,但口语传播和现实交流向文字传播造就的非现实交往形态转变不可避免。伊尼斯指出,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时间的世界超越了记忆中的物体的范围,空间的世界超越了熟悉的地方的范围”^[9],因而需要文字记载。将实物符号化的口语,虽然通过将传播对象化为语音而节约了传播成本,但是其对于身体的依赖,既不能将声音携带的信息延后,也不能传给不见面的人。因此,屈原疑惑“遂古之初,谁传道之”?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①。文字实现了语言符号的体外化,做到了使信息在空间上传之广远和在时间上传之久远。它既可使信息从中央直达边疆,也可使苏格拉底的辩论流传至21世纪。但是文字功能发挥的基础,是使传播摆脱对身体的依赖,使视觉与其他感觉分离,人们需要将意旨写成文字通过纸张传送,接受者则需要在与传播者隔离的情况下阅读文字、解码释义。

文字的应用标志着人类传播从部分社会现实交往中退却,向非社会现实交往迈进,并沿着该路径加快信息的生产和传送。文字传播面临着复制困难,人类遂发明了印刷术。首先,印刷加快了复制速度。中世纪抄书人在羊皮纸上抄《圣经》,10—15个月才能抄完,而谷登堡版《圣经》从出版到15世纪末,印制超过了2亿册,人们遂从在教堂里听牧师讲道变成了可以独自阅读领会。二是降低了印刷成本。“在13世纪初,为一本薄薄的手抄书支付的工资就相当于现在的3000美元,这是送给一位法国公主的生日礼物”^{[10]13},而印刷术出现初期,书籍成本就可以下降1/4。阅读成为普通人的生活内容。三是提高了准确性。在手抄时代,重要如英国大宪章,每年需要在英格兰各郡通读两次,但是人们很快便对哪个版本为真陷入了争论。印刷术的优势则是可重复性。印刷术和纸张的工业化,导致新闻事业的快速发展,由此推动了思想的普及。人们进一步改进了印刷机,发明了电报机,使欧洲从中世纪无文化的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型,阅读成为评判社会智力水准的根本标准。

人类依靠文字和印刷技术摆脱了社会现实交往的时空局限,同时更想摆脱文字传播设置的去社会现实交往的藩篱。英国人塔尔伯特想把瑞士风景经久不退地印在纸上,发明了照相术,标志着图像时代的来临;美国人贝尔为了实现不用出门也能交谈的目标,为了破除发电报必须先拟定文字的不足,发明了电话,塑造了一种亲近的交往形式;爱迪生制造“留像机”的冲动,推动了“可以把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生动活跃的语言和各种人物形象,以及自然界和生活中的真实情况,直接让观众看到影像和听到声音”的电影的出现。^[11]人们期望声音的传播能够跨越无限的空间障碍,从而发明了广播;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的电视,则是想通过声像一体化而创造出联觉的媒介,让人们看到真实的、动态的图像。作为可用所有传播要素互相连接的互联网,则满足了人们对于传播的即时、互动和全媒体化的想象。这些传播形态,在压缩了时间、消灭了空间的同时,更希望直观地再现现实,获得更多与身体相关的信息。

按照麦克鲁汉的描述,西方媒介的演变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折,他们“一直在一种徐缓的技术爆炸中被持续不断地塑造着,这一技术爆炸过程已经延续了2500年以上。然而,从电报问世之日起,西方人却开始经历了一种内爆的过程。他们突然以尼采似的漫不经心的态度,开始倒着放映过去2500年

这部电影”^{[6]333}。也可以说,从传播形态演变史的角度来看,从照相术出现引入图像开始,人类的传播形态同样发生了一个大的转折。在照相术出现之前,传播技术引导传播形态向非社会现实交往状态演变,以求克服交流障碍;照相术出现之后,传播技术则致力于模拟现实交往形态,目标是不断接近和重现社会现实交往状态,“借助电力媒介,我们到处恢复面对面的人际关系,仿佛以最小的村落尺度恢复了这种关系”。^{[6]315}当然,这种“恢复”只是一种不完全的恢复,只是在文字传播的基础上加上了图像,在声光技术支持下引入了声音和视频,即使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互联网络综合了所有的传播介质,它们距离社会现实交往的传播形态依然有着明显的距离——它们往往没有社会现实交往的真实感,缺少对传播信息的直观的体验感,不能实现所有感官的同时参与。虚拟现实技术的出现和发展,虽然其传播价值仅仅展现出冰山一角,但是“从身体姿势到触控、手势,到语音,到全息投影、脑电波,虚拟现实将变得真正像现实那样可以感受和触摸”^[12]。根据虚拟现实技术演进的状态来判断,它将为人类解决对社会现实交往的全模拟传播的欲求提供技术支持,引导人类交流进入模拟现实交往时代。这种模拟现实交往与口语传播不同,它在突破时空局限的基础上,以视像传播为技术条件,以身体在线为特征,以全部感官的参与为样态,以身临其境为体验。这将是一种全仿真式的传播(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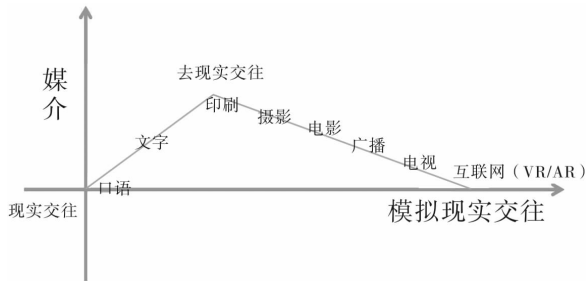


图1 全仿真式传播形态

二、虚拟现实技术与对社会现实交往的全模拟传播

审视人类传播形态演进的历史,我们发现,虚拟现实(VR/AR/MR)作为传媒场域应用前景广泛的技术,在满足信息可到达人类欲求的基础上,提供了实现对社会现实交往的全模拟传播的可能性。正是对这种传播形态的追求决定了虚拟现实技术的出现,也规定了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事实上,“虚拟现实”概念的提出者杰伦·拉尼尔就指出,虚拟现实技术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分享想象,生活在一个可以互相表达图像和听觉的世界”^[13]。为此,我们

不能仅仅将其视为利用计算机生成的一种模拟环境,并通过多种传感设备使用户沉浸到该环境中去的人机交互系统,而是将其与互联网技术结合在一起,看作是传播信息、建立关系的载体。它将“以更加丰富的手段、更为精准细腻的技术复制着世界,从而在新的界面层次上满足着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与感受,并打开了通向虚拟世界的大门”^[3]。那么,虚拟现实技术能够为模拟现实交往提供什么样的技术支撑,对社会现实交往的全模拟传播将会是何种状态?如上文所述,虚拟现实通过综合3D建模、立体传感、图形制作和网络传输等技术,可以构建以视像传播为基础、以身体在线为特征、以全部的感官参与为样态、以身临其境为体验的模拟现实交往形态。这是一种与面对面交流极为接近的传播状态,虽然与之也有明显的不同。

1. 虚拟现实技术以视像传播为基础

虚拟现实技术可以为交流者提供实时传送的3D/多维图像,这些图像具有超高清晰度,拥有立体视感。在人的层面,虚拟现实技术生产的影像既能展示人的形体和声音,也能够展示人的表情,甚至“清晰得连呼吸都能感受得到”^[14]。在物的层面,高清立体的影像能够提供360°的现场图像,如2016年“两会”期间新浪网推出的《人民大会堂全景巡游》,网友可以通过手机角度的变换,从不同角色、不同位置体验会场内部的视角感受。以视像传播为基础,虚拟现实摆脱了场域的限制,同时会产生高清效果和可制作效应。在现实交往中,距离会降低清晰度,而影像则可以通过无死角的特写镜头,看清现场的每一个表现,实现鲍德里亚所说的比真实还真实,即超真实。它也可以脱离现场的不可复制性,使受众既可以看到同步的交流过程,也可以看到已经发生过的交流状况,还可以体验人们未曾去过的旅游景点,甚至可以制作想象的场景。这种特性造成了模拟现实交往在某种条件下的不可检验性,如人们很难判断旅游景区的虚拟制作属于现场拍摄还是造了假。由此可见,全息网真图像建构的传播活动,可以无限接近社会现实交往形态,却与面对面的交流明显不同。

2. 虚拟现实技术以身体在线为特征

与以视像传播为基础相对应,虚拟现实技术构建的模拟现实交往以身体在线为特征。在现实生活的交往中,人自身必须在现场,物本身必须作为摆设而存在,而在虚拟现实技术条件下,人和物固然可能在真实的时空中被记录,但都需要化为影像符号以在场的形式通过网络传输进行传播。更重要的是,

与以往的影像不同,这种影像符号极其精致,“毫发毕现”,让人感到与现实生活毫无二致。当然,这种精致化的视像符号会造成两个具有悖论性质的影响。一是它与身体紧密相关,即它是对身体的精细复写,复写的目标是与身体的真实在场达成同样的效果。模拟现实交往就这样对身体产生了明显的依赖性,但它同时又是对身体的僭越,它是将身体制作成视像符号,这种视像符号不是对参与传播的主体的身体进行简单朴素的复写,它可以突出局部特写,可以将身体变形取得戏剧性效果,可以记录身体的某个瞬间做成记录。它可以穿越网络空间得到传播,也可以穿越时间为他人所见。身体的在线克服了口语传播因依赖身体的在场而受到的时空局限,同时也因为获得了对身体的制作权而使身体不再具有占据社会现实交往中心位置的神圣性,观众也“只是一个在场者的数字化身,他们没有能力对虚拟现实中的事件进行改变”^[15]。

3. 虚拟现实技术以全部感官参与为样态

虚拟现实技术与以往传播技术的最大不同,在于以往的传播技术只能有视觉和听觉介入,而虚拟现实技术则可以调动人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等多种感官。它的视像可以对视觉和听觉形成沉浸感,而传感设备则使人如触其物、如闻其香、如尝其味。但是与社会现实交往的全感官参与不同,这是一种拟感官参与,而这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学意义。一方面,这种拟感官参与往往会高于现实生活中的信息对于感官的刺激,属于高强度刺激。高清的血腥镜头、灾害的悲惨场景、放大的足球比赛声音,以及场景实物对于身体摩擦的模拟等,直接考验神经的承受力,从而产生显著的震撼感和同情感,这是虚拟现实技术模拟现实交往时临场感的来源。另一方面,由于是拟感官参与,视像交流还不能完全替代现实交往中的亲近感觉,即使能够清晰地看到对方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人却是不可拥抱的、物是不能抚摸的。男女之间的虚拟现实交往可能会使双方产生深深的情意,甚至有可能产生强烈的触摸需求,却不会获得夫妻间的实际亲昵。在这种意义上,模拟现实交往可能会如美国歌曲所唱的“打电话更寂寞,无精打彩真寂寞”那样,使人们对现实交流产生更加迫切的渴望。

4. 虚拟现实技术以身临其境为体验

钱学森先生建议将虚拟现实技术译为“灵境技术”,意指其制作的环境具有高度仿真特征,却非真实的情境。与社会现实交往不同,虚拟现实提供的模拟现实交往产生的是计算机情境,是通过计算机

作用于用户的感官形成的交互式视景仿真,这种仿真技术可以产生代入感和沉浸感。用户可以借助虚拟现实技术“亲临”事件现场,以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的身份,观摩和感受正在获取的信息,如美国《得梅因纪事报》所做的VR新闻《丰收的变化》,观众可以在360°全景视角“走动”,感受到身边是忙碌的农场主、散步的牲畜、嬉戏的孩子和草垛边飞舞的蝇虫,倾听农场主的交谈。用户也可能完全沉迷于虚拟世界之中,产生类似于身处现实世界之中的存在意识甚至是幻觉,浑然不觉甚至习以为常,进而忘记现实的社会生活,如马克·扎克伯格2016年2月参加三星发布会时,观众即沉浸虚拟现实世界中而浑然不知。

三、结语

莱文森指出,“一种媒介的存活系数,与前技术的人类交流环境的接近程度有直接关系。一切媒介的进化趋势都是复制真实世界的程度越来越高,其中一些媒介和真实的传播环境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和谐一致”^[16]。虚拟现实技术之所以被视为传媒业的“下一个风口”,展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在于其有助于人们“回归传播的原始形态”^[17],能够为随时随地的沟通和交流提供高效的应用平台,并超越时空传递真实环境和表达真实情感,满足人们对沟通所需要的全方位和全身心的现实感受,重新定义人与人之间面对面和在一起的含义,展现人类真实的社会实践及其实践成果。

但是如前文所述,虚拟现实技术通过提高视像的精微度和传感设备的灵敏度,足以达到“以拟乱真”的效果,究竟是使人类更接近理想的传播状态,还是使人类更迷惑于或是更远离了社会现实交往,可能还是一个未知的问题。施拉姆曾经说过,“人们终将要适应自己加工和分享信息的非凡能力。他们必须要学会为自己的利益去使用这一能力,而不是为自己的毁灭去使用这一能力;必须学会为了进一步的人性化和社会化去使用这一能力,而不是为异化或退化去使用这一能力”^{[10][17]}。为了使虚拟现实技术能够更好地帮助人们实现对社会现实交往的全模拟传播,需要我们学习适应现实技术提出的挑战,制订严格的传播规范,如对不同的传播文体设置不同的真实性要求,对全息网真技术的部署场所做出限制等等,规范的内容则由虚拟现实发展过程中提出的问题而定。

注释:

①按照王振铎先生在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多次讲座上

的解释,“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当指说话而不形成文字,就无法流传久远。本文取此释义。

参考文献:

[1] 杭云,苏宝华. 虚拟现实与沉浸式传播的形成[J]. 现代传播,2007(6):21-24.

[2] 史安斌,张耀忠. 虚拟现实新闻:理念透析与现实批判[J]. 学海,2016(6):154-160.

[3] 喻国明,谌椿,王佳宁. 虚拟现实(VR)作为新媒介的新闻样态考察[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15-21.

[4] [匈]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56.

[5] 杨保军. 新闻理论教程[M]. 2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6.

[6] [加]马歇尔·麦克鲁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 何道宽,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7] [加]哈罗德·伊尼斯. 传播的偏向[M].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

[8] [美]萨丕尔. 语言论[M]. 何道宽,译. 北京:商务印书

馆,2003:14.

[9] [加]哈罗德·伊尼斯. 帝国与传播[M].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7.

[10] [美]威尔伯·施拉姆. 传播学概论[M].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1] 崔金泰,崔玉屏,海虹. 电影史[M]. 沈阳: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2002:2.

[12] 周逵. 虚拟现实的媒介建构:一种媒介技术史的视角[J]. 现代传播,2013(8):29-33.

[13] Michael H. Virtual Realism[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14] 曹健. 体验“网真”[J]. IT时代周刊,2006(21):2.

[15] 杜江,杜伟庭. “VR+新闻”:虚拟现实报道的尝试[J]. 青年记者,2016(6):23-24.

[16] [美]保罗·莱文森. 莱文森精粹[M].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5.

[17] 俞哲旻,姜日鑫,彭兰. 《丰收的变化》:新闻报道中虚拟现实的新运用[J]. 新闻界,2015(9):61-65.

(责任编辑 姚虹)

The Full Simulation Propagation of Social Reality Contact

——A Theoretical Thinking for the Value and the Spread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QI Tao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human communicating development history, in order to overcome time and space limitations, transmission form has experienced the evolution from social reality face to face to the non-physical contact. Since photography appeared, the transmission form has translated to the simulate reality contacts. The emerge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have provided the possibility of achieving the full simulation propagation in social reality. This transmission form will base on video propaganda, characterized by the body online, with the whole sensory participation as a sample, and experience as immersive. The pursuit of simulate reality communication determines the emergence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and it also determines the rules of its development direction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simulate reality; reality communication; transmission form

中国中原城市群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邓 岩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郑州 450046)

摘 要: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对1996—2016年期间有关中原城市群研究的文献进行了梳理与剖析,从论文年载量、著者类型、文献来源、研究内容、文献被引频次五个方面进行了历时性的文献计量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对中原城市群的研究已逐步进入成熟阶段,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城市化等研究领域,并形成了稳定的研究者和研究机构,但是在智慧城市等城市发展新理念、中原城市群在新时期国家战略中的定位等方面的研究却少有涉及。

关键词:中原城市群;文献计量分析;CNKI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14

中图分类号:G3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5-0062-07

文献计量法,是采用数学、统计学等方法研究文献和文献工作系统的数量关系与规律,所涉及学科常被称为“科学计量学”(Scientometrics)或“信息计量学”(Informetrics)。^[1-2]通过对相关专题文献在分布状况、学科类别与层次构成、科研属性和成果特点的分析,从而归纳出其发展态势、影响力以及文献特点。^[3-4]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2003年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李克强在《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中原城市群”的概念。在后续的发展纲要与实践中,中原城市群以探索如何实现城市之间的协调联通和资源共享,实现规模性共赢为宗旨,顺应了协同、共享、整合等近年来的治理新思路,成为了实践部门的工作重点,也被科研工作者所关注。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对中国知网(CNKI)学术文献总库中所收纳的中原城市群研究论文进行综合分析,力求全面、清晰地描述目前我国中原城市群研究的现状,总结特点、发现不足,在此基础上预测并指导中原城市群的学术研究趋势。

一、中原城市群研究文献数据来源

在对科研产出和科研水平的评价当中,通常将论文发表状况作为一项重要衡量指标。^[5]利用文献计量方法对某一学科的研究论文进行定量分析,可以从特定角度了解该学科研究的发展水平与动向。^[6]本文研究的样本是在1996—2016年间公开发表,并被CNKI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收纳的有关中原城市群研究论文。对中原城市群研究论文的分析方法以CNKI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的分组分析方法为基础,同时参考了国内部分学者在文献计量研究中的常用研究方法,从论文年载量、作者类型、文献来源、研究内容、被引频次五个方面对有关中原城市群研究论文的基本特点进行统计分析。^[7-13]

CNKI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是目前国内最全面、最权威的学术数据库,主要涵盖学术期刊、博士学位论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重要会议论文、年鉴、报纸、专利和科技成果等多种文献类型。被CNKI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收纳的有关中原城市群研究论文中,最早的发表于1996年,因此本

收稿日期:2017-09-01

基金项目: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项目“河南省智慧科技园区发展路径研究”(172400410249);河南省社科联、经团联调研课题“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智慧中原城市群建设研究”(SKL-2016-3070)

作者简介:邓岩(1982—),女,河南南阳人,硕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从事城市化、公共管理方向。

文将 1996 年作为文献检索起点,实施检索日期为 2016 年 8 月,样本数据来源截至 2016 年 8 月 30 日。本文以“中原城市群”为主题进行精确检索,排除中英文扩展检索选项,选择的文献数据库为系统默认数据库(包括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特色期刊、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等 8 个子数据库)。通过对检索所得论文的逐篇阅读,剔除部分重复文献、会议通知以及部分与主题无关的文献等,最后选取 917 篇学术论文作为研究样本。

二、中原城市群研究文献年载量分析

论文发表数量的时间变化是该研究领域研究情况发展变化的重要外在表现,自 1996 年起至今的中原城市群研究论文数量变化如表 1 所示。由表 1 可知,从 1996 年有关中原城市群研究的第一篇文献出

表 1 中原城市群研究论文年载文章量分析

发表年度	文献篇数	百分比	发表年度	文献篇数	百分比	发表年度	文献篇数	百分比	发表年度	文献篇数	百分比
1996	1	0.11	2002	0	0	2008	103	11.23	2014	58	6.32
1997	2	0.22	2003	10	1.09	2009	126	13.74	2015	40	4.36
1998	0	0	2004	30	3.27	2010	101	11.01	2016	26	2.84
1999	1	0.11	2005	47	5.13	2011	70	7.63			
2000	3	0.33	2006	101	11.01	2012	56	6.11			
2001	3	0.33	2007	87	9.49	2013	52	5.67	合计	917	

根据普莱斯文章指数增长规律,科学文献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在一个学科发展的初期,文献的数量处于非常不稳定的增长阶段,而当该学科进入发展期,其文献数量将呈指数型增长,出现“情报爆炸”态势。^[14]从表 1 可以看出,中原城市群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少到多的过程,2009 年是国内关于中原城市群研究最多的一年,随后出现了逐渐下滑的趋势,在 2011 年之后趋于平稳。这一特征与我国城市群区域协同发展逐渐成熟的特征相吻合。2015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在中西部地区培育发展一批城市群”,这是时隔 37 年后再次召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并将城市群建设明确作为国家城市发展的重点模式予以推进,这必将推动对中原城市群的研究达到一个新高峰。

三、中原城市群研究文献作者分析

作者的特征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一学科的发展状况,本文从作者发文量和作者单位两个角度,采用文献计量法进行分析,以使著作者的特征分析更加全面。

(一)作者发文量分析

研究作者发文情况可以看出该研究领域中作者

现,一直到 2002 年的七年间,该研究领域的论文发表量平均每年只有约 2 篇,共计 10 篇,占数据库收录论文总数的 1.09%,说明国内学者在 2002 年以前对中原城市群的关注度较低。从 2003 年开始,这种现象开始发生显著变化,对中原城市群研究的论文数量明显增多,2003 年第一次突破个位数,达到 10 篇,此后一直保持上升势头,2006 年发表论文达到了 101 篇。从 2006 年开始一直到 2011 年,对中原城市群的研究进入了一个蓬勃的研究发展阶段,年平均发文量为 98 篇,其中 2009 年有关中原城市群的研究论文达到了峰值 126 篇。2012 年以后,中原城市群的研究势头逐渐下滑并趋缓,但也相对平稳。2016 年的论文发表总数信息尚不齐全,分析意义较低,但根据之前的发展趋势,预计将与 2015 年水平相当。

群的稳定性与成熟度。^[15-16]根据普莱斯理论,文献核心作者的计算公式为:

$$m \cong 0.749 \times \sqrt{n_{max}}$$

公式中 n_{max} 为发文最多的作者的论文数量, m 为核心作者最低发文量。^[17]在本文搜集到的 917 篇中原城市群研究论文中,发文量最多的作者的发文数量为 30 篇,经计算 $m \cong 4.10$ 。因此,本文将发表论文数量在 4 篇及以上的作者界定为重要著者,由此统计得出的重要著者有 26 人,如表 2 所示。其中王发曾以发文 30 篇排名第一,苗长虹发文 21 篇排名第二,还有 7 位作者发表论文在 10 篇左右。由此可见,在中原城市群的研究领域,已经有一批较有影响力的学者进行了较为长期的跟踪和研究工作。

(二)作者单位分析

通过对 917 篇文献的作者单位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大部分作者来自高等院校,如王发曾、苗长虹、刘静玉、高建华等来自河南大学,吴国玺来自许昌学院,王海江来自河南理工大学;另外一部分作者来自科研机构,如冯德显、杨延哲等来自河南省科学院。在对文献进行阅读筛选的过程中发现,虽然有来自党政部门和媒体领域的作者,但大

部分此类文献属于讲话文稿、新闻报道等,较少有专业的学术论文。

表2 作者发文量分析

排序	姓名	单位	发文量
1	王发曾	河南大学	30
2	苗长虹	河南大学	21
3	刘静玉	河南大学	12
4	吴国玺	许昌学院	11
5	高建华	河南大学	10
6	徐晓霞	河南大学	9
7	丁志伟	河南大学	8
8	李学鑫	商丘师范学院,河南大学	8
9	刘晓丽	河南大学,中国科学院	8
10	冯德显	河南省科学院	7
11	吕金嵘	河南大学,河南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7
12	苏朝阳	河南大学	6
13	赵威	河南大学,北京大学	6
14	王海江	河南理工大学,河南大学	6
15	雒海潮	河南科技学院,河南大学	6
16	杨延哲	河南省科学院	5
17	史雅娟	河南大学,中国科学院,河南工业大学	5
18	覃成林	河南大学,暨南大学	5
19	吕斌	北京大学	4
20	刘战国	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4
21	刘学功	许昌学院	4
22	贺鹏飞	河南农业大学	4
23	吴开	上海理工大学	4
24	于长立	平顶山学院	4
25	孟庆香	河南农业大学	4
26	赵建吉	河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4

通过对样本作者单位的统计分析发现,大部分作者单位位于河南省内,其中又以河南大学处于领头地位,这与中原城市群主要位于河南省内直接相关,说明河南省的高等院校科研方向与当地的区域发展保持了高度一致。另外,从作者署名情况来看,王发曾、苗长虹、刘静玉、高建华等来自河南大学的著者常合作发表论文,说明河南大学已经形成了中原城市群的研究团队。需要指出的是,其他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力量偏弱,著者分布比较分散,这样可能造成中原城市群的研究会集中偏向某一方方向,带有明显的学科侧重点和院校背景。如河南大学的学者们多以地理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中原城市群,较少有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机构关注中原城市群,从而揭示出中原城市群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领域中的不足。另一方面,来自党政部门的核心作者出现较少,中原城市群作为河南省区域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党政部门的政策制定者理应在研究领

域占据重要一席。从这一点来看,未来关于中原城市群的发展研究应该引起更广泛领域的学者们的重视,才能拓宽该领域的研究视野。

四、中原城市群研究文献来源分析

(一)文献出版来源分析

通过对 917 篇文献的来源进行统计分析,有关中原城市群研究论文最多的文献来源是河南大学硕士论文,其次是会议论文,排名第三位的是期刊《地域研究与开发》,第四位则是报纸《河南日报》。表 3 显示,关于中原城市群研究方面的论文,发文量排名前三位的学术期刊分别是《地域研究与开发》《河南科学》和《决策探索》,可见发表中原城市群研究论文的来源主要分布在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学领域。从发表刊物的等级来看,发表于中文核心期刊或 CSSCI 收录的中原城市群研究论文较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认定的中文核心期刊中,有 60 种期刊发表中原城市群研究论文共计 174 篇;在南京大学认定的 CSSCI 来源期刊中,有 27 种期刊发表中原城市群研究论文共计 82 篇。

表3 文献来源分析

排序	文献出版来源	篇数
1	河南大学硕士论文	39
2	会议论文	39
3	地域研究与开发(北大核心)	25
4	河南日报	24
5	河南科学	22
6	决策探索	18
7	郑州大学硕士论文	17
8	许昌学院学报	12
9	中州学刊(北大核心,CSSCI)	11
10	河南社会科学(北大核心)	10
11	现代商贸工业	10
12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10
13	河南大学学报(北大核心,CSSCI)	9
14	经济地理	9
15	经济研究导刊	9
16	人文地理(北大核心,CSSCI)	9
17	商业时代(北大核心)	9
18	特区经济	9
19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	8
20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8

(二)文献获得资助来源分析

文献获得资助来源分析有两方面作用:首先,科学基金资助情况能够反映出国家或地方政府部门对特定研究领域的重视程度;其次,能否获得以及获得何种类别的科研基金支持也说明了该论文的总体质量状况。经过统计得出,共有 30 多个类别的基金资

助了中原城市群研究;在研究的 917 篇文献中有 274 篇文章获得了资助。表 4 统计了排名前 20 位的资助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河南省政府决策招标课题、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对中原城市群的研究资助力度最大,相关的论文成果数量分别达 49 篇、36 篇和 31 篇,说明中原城市群的研究受到了国家层面和省域层面的共同重视。其他国家级和省部级基金项目对中原城市群研究也都给予了较为广泛和较大力度的支持,涉及很多类别和层次的科研基金。近年来中原城市群的研究之所以进入到较为稳定和成熟的研究阶段,就是得益于这些基金项目的支持。

表 4 研究资助来源分析		
排序	研究获得资助	篇数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9
2	河南省政府决策招标课题	36
3	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	31
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30
5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17
6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16
7	河南省教育厅自然科学项目	16
8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15
9	河南省自然科学基金	12
10	高等学校骨干教师资助计划	6
11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5
1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5
13	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	4
14	河南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	4
15	国家 973 计划基金资助项目	3
16	河南省科技攻关重点项目	2
17	国家 863 计划重大项目	2
18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基金	2
19	河南省人民政府第一次经济普查重点课题	2
20	吉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	2

五、中原城市群研究文献内容分析

(一)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能迅速、快捷地反映文章的主题和重点,提高对文献资源的开发和利用。^[18]根据文献计量学的基本观点,论文中关键词词频统计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的热冷情况,并作为研究热点的依据。^[19-20]本文通过人工统计的方式对样本 917 篇文章的中文关键词进行梳理,表 5 中显示出现频率最高的 30 个关键词。从关键词的内容来看,以“中原城市群”“城市群”“城市群经济”“中心城市”“郑汴一体化”为关键词研究中原城市群的文献较多,可见对于中原城市群研究的落脚点大多集中于区域

经济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城市化等方面。另外,关键词涉及的领域有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地理经济等多个方面,表明中原城市群研究所涉及的领域也比较广泛。

表 5 关键词分析		
排序	中文关键词	篇数
1	中原城市群	501
2	城市群	204
3	城市群经济	70
4	中心城市	53
5	郑汴一体化	46
6	河南省	34
7	区域经济	34
8	中原经济区	33
9	城市体系	28
10	对策	25
11	产业结构	22
12	城市化	21
13	城市规模	20
14	城镇化	19
15	经济发展	19
16	主成分分析	19
17	城市竞争力	18
18	产业集群	17
19	新型城镇化	17
20	城市群发展	16
21	首位度	16
22	因子分析	16
23	总体发展规划	16
24	可持续发展	15
25	空间结构	15
26	区域发展	15
27	指标体系	15
28	城市工业	14
29	发展	14
30	城市群建设	13

(二)学科类别分析

结合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按照学科类别进行的初步分组,本文又以人工检索的方式逐一查找,统计了 917 篇有关中原城市群研究论文的学科分类情况,如表 6 所示(该表只列出前 20 名)。由表 6 可知,中原城市群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领域和经济体制改革领域,分别为 525 篇和 137 篇,占文献总数的 57. 25% 和 14. 94%。此外,发表论文在 10 篇及以上的学科领域包括旅游、建筑科学与工程、农业经济、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等 12 个学科,共计 243 篇,占文献总数的 26. 5%。由此可见,目前国内学者主要从经济学、管理学角度研究

中原城市群,此外也有学者从社会学、公共管理等视角对中原城市群进行了相关研究。

表 6 学科类别分析		
排序	学科类别	篇数
1	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525
2	经济体制改革	137
3	旅游	57
4	建筑科学与工程	34
5	农业经济	26
6	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	18
7	金融	17
8	文化	16
9	交通运输经济	16
10	体育	15
11	数学	13
12	公路与水路运输	11
13	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	10
14	资源科学	10
15	铁路运输	8
16	工业经济	8
17	企业经济	7
18	地理	7
19	水利水电工程	6
20	地质学	6

（三）研究层次分析

本文结合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对中原城市群研究文献的层次分类,经统计发现中原城市群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基础研究(社科)、行业指导(社科)、政策研究(社科)、工程技术(自科)、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自科)、行业技术指导(自科)、职业指导(社科)、大众文化、政策研究(自科)、文艺作品、高等教育、大众科普、基础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高级科普(社科)等 14 个层次,如表 7 所示。其中基础研究、行业指导和政策研究(社科)所占的比重最高,分别为 430 篇、196 篇、124 篇,论文总量达到总文献的 81.79%,可见关于中原城市群的研究大多不是从技术的视角,而是从管理的视角来探讨研究的。

表 7 研究层次分析		
排序	研究层次	篇数
1	基础研究	430
2	行业指导	196
3	政策研究(社)	124
4	工程技术	49
5	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	36
6	行业技术指导	12
7	职业指导	9
8	大众文化	4
9	政策研究(自)	3
10	文艺作品	2
11	高等教育	1
12	大众科普	1
13	基础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	1
14	高级科普	1

六、中原城市群研究文献被引频次分析

论文被引频次是评价被引文献的学术价值和应

用价值的有效手段。^[4] 本文选择被引频次超过 30 次以上的文献进行排序,共计 25 篇,中原城市群研究论文被引频次的结果如表 8 所示。其中被引频次最多的论文是《河南省城市的经济联系方向与强度——兼论中原城市群的形成与对外联系》,达 273 次,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该论文发表于 2006 年,时间较早;另一方面,该文关注了中原城市群的形成,属于起点研究,对后续的中原城市群发展脉络梳理具有较为基础的借鉴作用。此外,从其他被引频次较高的文献来看,针对中原城市群进行宏观分析和整体研究的文献引用频次较高,包括发展战略、空间组合和产业结构等角度。涉及中外、城市群之间的比较研究和单项发展研究(如承载力、生态系统评价)的文献也占有一定比例,说明中原城市群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既有宏观构建又有实践探索的稳定发展阶段。

表 8 被引频次数分析			
排 序	论文题目	发表 时间	被引 频次
1	河南省城市的经济联系方向与强度——兼论中原城市群的形成与对外联系	2006	273
2	城市群产业结构与分工的测度研究——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2006	107
3	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战略构想	2003	90
4	中原城市群空间整合战略探讨	2004	89
5	中原城市群城市竞争力的评价与时空演变	2011	85
6	中原城市群的空间组合特征与整合模式	2008	81
7	中原城市群九城市的产业结构特征和比较优势分析	2005	78
8	中原城市群城市承载力评价研究	2008	62
9	从中外城市群发展看中原经济隆起——中原城市群发展研究	2004	52
10	基于城市群整合发展的中原地区城市体系结构优化	2007	52
11	中原城市群城市承载力评价研究	2008	43
12	基于改进熵权法的中原城市群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	2011	43
13	山东半岛、中原、关中城市群地区的城镇化状态与动力机制	2010	42
14	河南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选择及对策分析	2007	40
15	中原城市群城市竞争力实证研究	2007	39
16	中外城市群发展及其对中原城市群的启示	2007	37
17	中原城市群城市生态系统评价研究	2006	36
18	中心城市发展与城市群产业整合——以郑州及中原城市群为例	2010	36
19	城市群生态空间结构优化组合模式及对策——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2010	34
20	当代城市化背景下的中原城市群经济整合研究	2006	34
21	中原城市群发展特征及空间焦点	2005	34
22	关中、中原、山东半岛三城市群产业结构与分工的比较研究	2006	33
23	中原城市群竞合关系及一体化战略研究	2005	31
24	中原城市群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	2005	31
25	中原城市群的功能联系与结构的有序升级	2003	31

七、结论与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文以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有关中原城市群研究的 917 篇论文为研究样本,从论文年载量、作者分析、文献来源、研究内容和文献被引频次五个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对中原城市群的研究逐步进入到成熟阶段。1996—2016 年的论文数量统计表明,国内学者对中原城市群的研究发展迅速,发表论文数量变化较大,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该领域的研究已逐步进入到成熟阶段,论文发表数量趋于平稳。

第二,形成了稳定的研究者和研究机构,长期致力于中原城市群的研究工作。根据对样本的统计分析,在中原城市群研究领域形成了一批稳定、持续、有影响力的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在该研究领域代表人物方面,王发曾、苗长虹、刘静玉、吴国玺、高建华等为领军人物;在研究机构方面,以河南大学为代表的高等院校是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机构,另外河南省社科院等科研院所也对此有着深入研究。

第三,对中原城市群面临的新形势还没能充分重视。目前,对中原城市群的研究大多从宏观经济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城市化等角度出发,集中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随着国家战略层面对中西部城市群建设的重视,以及智慧城市等新的城市建设理念的兴起,对中原城市群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应予以关注。

第四,对中原城市群的研究仍需要基金项目的大力支持。尽管现有对中原城市群的研究得到了国家级社科基金、自科基金以及大量省部级基金项目的支持,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普及和新的城市化理念的提出,在国家战略导向下,中原城市群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对中原城市群的进一步研究还需要得到各类基金项目更大力度的支持。

(二) 政策建议

在对有关中原城市群研究的 917 篇论文进行细致统计研究的基础上,为响应国家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大力培养中西部城市群的号召,顺应智慧城市等新的城市发展理念潮流,促进中原城市群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保持对中原城市群研究的重视程度。通过论文年载量分析,发现中原城市群的相关研究在走过 2006—2011 年的高峰期以后,近几年有所下滑,虽然这种下滑趋势也呈现了较为稳定平缓的状态,但是对中原城市群研究的热情似乎已经成为过

去。然而中原城市群建设本身是一个长期的宏观战略,其发展与实践仍然是进行时,在国家战略导向和新理念的引导下,中原城市群的建设将进入一个新阶段,仍然需要不断进行新的理论探索和政策指导,从这一点而言,中原城市群的学术研究仍然需要得到重视,来维持它的研究进展。

第二,增强中原城市群研究的实践反哺与反馈能力。通过对既有文献的统计研究,发现大部分的文献都属于前端探索研究,即用以指导中原城市群建设的决策及部署。中原城市群的发展战略实施了十余年,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这些文献中提出的建议是否在中原城市群建设中得到实践,以及实践的效果如何,这类相关研究成果在既有文献中很少出现。因此,需要及时关注中原城市群建设的实践与理论的结合程度,进行较为客观及时的效果评价研究,这种检验真知的态度也是学术研究本身最具有价值的地方。

第三,扩大中原城市群的研究队伍。中原城市群研究具有明确的地域针对性,因而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研究人员的构成,从对作者的分析情况来看,目前中原城市群的研究人员分布非常集中,多年来都主要来自于河南大学,而且该校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科研团队和鲜明的研究方向,这种科研优势地位的确发挥了强有力的领头羊作用,但也反映出了科研队伍建设的局限性。因此,需要进一步扩大中原城市群的研究队伍,希望有更多的高校和科研单位加入,提供更多的研究视角和思路,同时也更需要这一宏观公共战略议题得到更多政府部门、政策制定部门相关人员的参与。

第四,提高中原城市群研究的深入性和创新性。根据统计情况,一方面,现有的中原城市群研究在学科和研究层次上涉及宏观管理和基础性研究过多;另一方面,在高水平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成果较少,主要集中在硕士论文和报纸、一般性学术期刊。因此,要提高中原城市群研究的深入性,鼓励更多具有应用性、学科交叉性、实践操作性的科研投入,才能为中原城市群建设提供更多的现实指导。同时也要加大中原城市群研究领域内成果的创新程度,紧跟国家战略和新的理念潮流,提高研究质量,取得更多有影响力和创见性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邱均平. 信息计量学[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1.
- [2] 李江,刘源浩,黄萃,等. 用文献计量研究重塑政策文本

- 数据分析[J]. 公共管理学报, 2015(2):138-144.
- [3] 马少美, 汪徽志, 孔琛. 中国电子政务研究文献计量分析[J]. 情报科学, 2009(8):1214-1218.
- [4] 崔薇, 曾润喜, 王国华. 中国网络舆情研究文献计量分析[J]. 情报科学, 2011(1):132-135.
- [5] 李雪蓉. 商业模式的文献计量分析[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16(2):273-287.
- [6] 查先进, 曹晨. 近二十年我国信息资源配置研究文献计量分析[J]. 图书情报工作, 2010(20):6-10.
- [7] 撒凯悦, 沈君. 世界经济研究领域前沿动态研究[J]. 经济学动态, 2015(6):93-101.
- [8] 李贺, 袁翠敏, 李亚峰. 基于文献计量的大数据研究综述[J]. 情报科学, 2014(6):148-155.
- [9] 赵飞, 艾春艳, 游越. 基于文献计量开展高校科研评估的探索与思考[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4(1):97-101.
- [10] 刘小玲, 谭宗颖, 张超星. 国内外“科学-技术关系”研究方法述评: 聚焦文献计量方法[J]. 图书情报工作, 2015(14):142-148.
- [11] 吴小节, 杨书燕, 汪秀琼. 资源依赖理论在组织管理研究中的应用现状评估: 基于111种经济管理类学术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J]. 管理学报, 2015(1):61-71.
- [12] 唐震, 李芳. 我国科技金融研究现状的文献计量分析[J]. 情报杂志, 2014(2):81-85.
- [13] 张立. 近年来我国开放存取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J]. 情报科学, 2014(1):138-142.
- [14] 张可, 张毅, 钱岳芳. 国内移动政务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J]. 现代情报, 2011(5):98-102.
- [15] 郭薇, 常健. 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作者成熟度的文献计量分析[J]. 学海, 2008(4):92-99.
- [16] 张素芳, 王宏. 近十年我国反竞争情报研究文献计量分析[J]. 现代情报, 2011(1):86-90.
- [17] 罗式胜. 文献计量学概论[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4:309-310.
- [18] 张翔, 王璨. 基于CSSCI的国内移动图书馆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J]. 数字图书馆论坛, 2014(1):52-58.
- [19] 陈新民. 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研究现状(2008—2012): 基于近五年的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4(4):30-34.
- [20] 任增元, 徐婧, 姜春林. 我国学术评价研究述评与趋势展望: 基于1998—2015年1429篇文献的计量分析[J]. 情报杂志, 2016(12):139-144.

(责任编辑 姚虹)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Zhongyuan Urban Group Research in China

DENG Ya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45004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metrology to comb and analyze research of Zhongyuan Urban Group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during 1996-2016. It conduct a diachronic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metrology from five aspects: thesis year load, author type, literature resources, research content and the literature cited frequency, the literature citation rates of literature sampl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Zhongyuan Urban Group research has gradually entered the mature stage, mainly focuses on macro-economic development, regional development, urbanization, and other research areas; and the stable researcher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has been formed. However, for the intelligent city development in cities such as new ideas, Zhongyuan Urban Group agglomeration in the new age of national strategic positioning, seldom studies are involved.

Key words: Zhongyuan Urban Group; bibliometrics analysis; CNKI

自媒体时代政府危机传播管理研究

李艳芳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文化与传播学院, 郑州 450044)

摘要:伴随着移动终端的完善和网络普及化程度的不断提升,自媒体时代受众的地位由原来的“被动接受”向“主动传播”发展,广大受众的话语权、参与权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确立和提升。然而,受众主体地位的确立也打破了长期以来传统媒体的信息垄断,弱化了政府对社会信息的控制力。自媒体时代如何在“众声喧哗”的舆论场中掌握话语主动权的制高点,需要政府在持续强化网络“把关人”作用的基础上,凝聚主流媒体的“微”力量,培养正能量的网络意见领袖,强化新媒体公众的自律和他律意识,加强政府的公信力建设,从而将重大突发事件造成的严重社会影响和破坏力降至最小范围。

关键词:自媒体时代;政府危机传播;双重话语空间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5.015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5-0069-05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的媒介环境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以广播、电视、报刊等为代表的传统媒体的主导地位不断被削弱,而以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影响力则不断增强。在这个人人都是新闻传播者的自媒体时代,媒体逐渐从一个高门槛的专业机构转变为普通人可以随意发布信息、传播信息的平台。伴随着新媒体的普及与纵深发展,新媒体基于自身传播特点所带来的弊端也不容小觑。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这不仅给社会造成很大冲击,也对政府的危机管理和危机公关带来了严峻挑战。自媒体时代新媒体在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传统媒体坚不可摧的信息壁垒,弱化了政府对社会信息的控制力。^[1]面对新媒体语境下的公共危机,政府如何在“众声喧哗”的舆论场中掌握话语主动权的制高点并把危机的影响力和破坏力消弭于无形,这是本文试图探讨和解决的问题所

在。

一、新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传播特点

(一)新媒体的即时性加快了危机传播的速度

传统媒体进行新闻报道一般是按照信息采集、编辑加工、审阅发稿、向社会发布的基本流程进行。囿于传统媒体较为严格的信息生产程序,公众获知事件信息的周期相对较长,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制约了传统媒体信息传递的时效性。而新媒体则是一种兼具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信息传播方式,网民仅需要用自己手中的相机、平板电脑以及其他智能终端拍摄图片或录制视频,就能够第一时间将事发现场的真实情况传播出去,不受传统媒体制作周期、版面等客观因素的制约。这种来源于多渠道的“平民新闻”极大满足了多元化发展趋势下公民日益高涨的知情权需求,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信源结构。^[2]例如2014年3月1日晚发生在云南昆明火车站的暴力恐怖事件,一伙暴徒蒙面持刀冲进昆明火车站广场和售票厅等处砍杀无辜群众,最终造成29人死亡、143人受伤。这一严重恶

收稿日期:2017-09-08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项目“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急管理研究”(2015-GH-456)

作者简介:李艳芳(1977—),女,河南巩义人,文学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新闻学。

性事件在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尚未公开报道时,很多身在现场的当事人或目击者通过微博、微信朋友圈等新媒体第一时间发出了求救信息和相关的图片、音视频消息。借助于新媒体强大的传播网络,发生在云南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事件的信息传播迅速形成由“点对点”发展到“点对面”“面对面”的滚雪球效应。一时间,这起令人震惊的袭击平民事件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

(二)新媒体的交互性把传播的权力部分下放民众

在 Web1.0 时代,传统媒体都是单向传送信息,其传者和受者定位非常明确,媒体处于决定性位置。也就是说,媒体按照自己的议程设置决定传播报道的内容和受众需要接受的信息,不管受众喜欢与否,都无从表达对信息的看法,绝大多数时候受众只能被动地接受信息,较少参与信息的反馈。伴随着互联网世界真正的信息传播平民化浪潮的到来,网络媒介的交互性真正实现了信息传播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的双向交流。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传输是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自媒体时代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并能够随时对信息进行补充、评论、反馈和互动,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民众掌握话语权的需求。通常情况下,公共危机事件爆发后,网民按照个人意愿通过博客、微博、播客、微信等多种途径和方式与其他网民分享文字新闻、图片视频、个人看法和观点。与此同时,政府与受众的信息沟通渠道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公众通过网络发表的“草根言论”有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危机事件的发展方向产生一定的影响。总而言之,自媒体的发展打破了以往重大突发事件延缓报道或者封杀消息的坚实壁垒,政府以往高高在上完全控制危机信息传播媒介的时代已成为过去。

(三)新媒体的开放性拓宽了受众获取危机信息的渠道

新媒体带领我们进入了“人人可言”的时代,受众拥有信息消费和信息生产的双重属性。一方面,新媒体传播主体的变迁为受众打开了全新的视野;另一方面,新媒体时代的传播主体不再局限于精英阶层,话筒掌握在每个人手中。与此同时,网络和手机等新媒体实现了信息的即时传递,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不仅能使信息瞬间生成、瞬间传播,而且还能即时开放互动,高度共享。媒介技术的进步和媒体形态的变革促使媒介格局发生与之相应的变化,而媒介格局改变的过程就是不同大众媒介“让

渡”受众资源的过程。^[3]毫无疑问,无论是新媒体技术的开放性、介质的开放性,还是内容的开放性,互联网以及基于网络平台之上的自媒体都神奇地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将偌大的世界变成了一个方便交流的“地球村”。新媒体是基于新技术之上不断向前的媒体形态,它的成长速度非常快,形态变化也多种多样,信息社会已然是没有秘密的社会。遍布全球的互联网为用户提供了方便、可靠的进入途径,体现了自由开放的理念和打不烂、堵不住的设计原则,这就对传统的政府危机公关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和挑战,广大网民不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媒体传播的信息,而是积极主动地寻求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各种重大信息,政府以往那种对危机信息有所保留和部分掩盖的状况已经不适应当今的媒介环境。

二、新媒体环境下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的症结

(一)网络舆情应对素养欠缺

近年来,我国正处于深化改革的社会转型期,这一时期是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高发期,这使我国政府特别是一些基层地方政府面临着如何快速妥善处理突发事件的巨大挑战。纵观近年来诸如山东聊城于欢“故意伤害案”、西安问题电缆等热点事件,不难发现当地一些政府部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尤其是负面报道时,仍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封”“堵”“删”“滞”等陈旧舆情处理思维,显示出目前基层社会治理的短板。^[3]由于重大突发事件均关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及其生命财产安全,网民的代入感很强。因此,面对汹涌的舆情,舆情应对理念不足的基层政府很容易在舆情事件中成为弱势角色,进而引发一系列的次生灾害。在当前新的时代条件和舆论格局下,如何提高各级政府的网络舆情引导能力和网络执政能力,依然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议题。具体来讲,一方面,某些基层政府部门面对重大突发事件进行主动引导和化危机为机遇的意识有待增强。所谓危机,有危便有机,危险的存在就意味着机遇也可能同时存在,如果在政府形象受损的危急时刻能够临危不惧,大胆决策和行动,或许可以为政府部门赢得比原来更高的声誉。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应对突发事件时为了彰显政府工作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与公众沟通交流用语过于程式化,通常情况下晦涩难懂的语言难以保障宣传的效果,也得不到广大民众的认可。因此,领导干部作为舆情处置的指挥核心,不断提高自身的舆情应对素养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缺乏舆论引导的意识

舆论是综合国力的一部分,舆论引导是一项系统工程。正如美国总统杰斐逊所言:“宁可没有政府,也不能没报纸。”由此可见舆论在一个国家发展中的至关重要性。毫不夸张地说,掌握了舆论杠杆,就可撬动社会发展。^[4]然而,舆论也是一把双刃剑,新闻舆论引导得好,就会对社会的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反之则会阻碍社会的进步。当前,新兴媒体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新的媒体环境对于政府职能部门应对网络舆情既是挑战也是难得的机遇。一方面,借助新兴媒体沟通及时、互动快捷的优势,政府部门可以在了解社情民意的基础上,与民众进行有针对性的沟通互动;另一方面,如果错失或延误了对新兴媒体传播优势的有效利用,那么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就会丧失舆论引导的主动权。纵观我国当前突发事件的产生及应对状况,很大程度上都是政府部门没有第一时间对广大网民进行信息公开,由于漠视了公民的知情权从而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例如2014年12月31日晚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如果政府能够第一时间通过官方媒体将事件的发展态势予以公开,就能够有效遏制谣言和小道消息的蔓延和扩散传播,从而就能够在稳定民心的同时,增强人民对政府从容应对突发事件的信心和决心。此外,政府部门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的过程中要低姿态,通过积极理性的信息发布,实现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危机舆情疏导,在影响受众直觉的同时,还要影响到他们的情感和思维,从而起到良好的舆论引导作用。

（三）政府和网民的沟通渠道有待畅通

以往政府与民众沟通是通过民众来信、来电反映情况,或者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到基层开展调研,如今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渠道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政府部门通过开设政府门户网站、微博、微信、论坛等方式,更加快捷自由地获得社情民意,这个转变不仅拓宽了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渠道,也进一步拉近了政府与民众的距离。虽然最底层的民众直接接触电脑的不多,但由于网络的自由性和开放性,网络依然是他们反映问题和倾吐心声的最便捷的渠道。同时,网络也成为政府领导层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然而非常态下政府与网民的沟通就存在着渠道不畅的问题,网民依然会因为各级领导上网搞一两次“问计于民”而欢呼雀跃,此类事件被各类媒体相继热炒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出政府部门运用网络来倾听民声的渠道还不畅

通,工作还不主动,百姓的心里话并没有在每时每刻得到反映,建言的渠道还需要更加便捷。因此,应该将倾听民声、集中民智作为一种常态化的政府行为纳入政府议事日程。当然,必定会有一小部分政府部门人员担心网上的一些负面报道,但是民意不可违,只有持续开展轰轰烈烈的问计于民活动,民众期待的制度化、常态化开门纳谏才能早日真正实现。

三、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危机传播的应对策略

（一）强化网络的“把关人”作用

在传统媒体占据主流传播渠道的上百年间,媒介“把关人”理论为社会的正常运转保驾护航,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网络进入人们的生活并在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由于“把关人”角色缺失等原因,尤其是以自媒体为主体的社会化新媒体较易导致舆论失控情况发生。因此,要进一步强化网络“把关人”的作用。把关人不仅要要对信息进行过滤、筛选,还要担当起监督的责任,通过对信息的把关达到净化网络信息环境的目的。具体来讲,需要各方不懈努力,在信息的传播上把好关。首先,就传播体制来说,政府要充分利用自身在网络传播中的权威地位,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对网络言论实施分类管理,对正面的有益的言论要大力提倡和宣传;对那些稍显偏激的言论要密切关注,必要情况下要及时予以疏导,化危机为无形;至于那些无关紧要的中性言论要保证其传播渠道的通畅,让广大网民在法律和制度许可的范围内充分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当然,对于那些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虚假、负面及小道言论也绝不姑息,要坚决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其次,培养网络文化的中坚力量也是强化把关作用的重要举措,通过骨干力量引导网络文化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伴随着媒介生态环境的改变,当前网络传播中的把关人角色已经由传统媒体中的传媒组织变成了网络传播中的传播组织、个人以及政府,这就需要网站在运用技术手段对信息进行取舍和加工的同时,也要加强对网民的规范、约束和指导。另外,可以成立网上评论员队伍,以便出现不良网络舆情时加以引导。

（二）凝聚主流媒体的“微”力量

新媒体的持续和强烈冲击促使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传统媒体不断在信息的采编方式、审核流程、内容等方面进行了系列良性变革。我国不但推出了相关的新闻网站,还将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纳入了新闻信息来源系统,实现了以“网络+微信、传统媒体+新媒体”的双核立体互动宣传新模式,极大地

强化了传统媒体的传播效果。^[5]例如“新华微评”作为新华视点的重点微栏目之一,通过在每个热点事件中及时发声,用有态度的微博形成主流媒体的舆论场,以无“微”不至的态度关注着社会的每一个微小变化,以积微成著的力量彰显着媒体的责任,已经成为新华视点微博账号的品牌栏目。^[6]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各类突发事件频发,新闻媒体作为公共传播机构,在引导社会舆论、维系社会秩序方面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新媒体在信息发布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媒体融合是传媒发展的必由之路。一方面,网络媒体拥有传统媒体亟需的高时效性与强互动性;另一方面,传统媒体的受众借助网络平台,能够弥补网络媒体信息不够深入、真实度欠佳的不足。因此,加快新时期不同形态、不同层级新旧媒体的融合力度,使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在运营模式和技术设备方面有机融合并实现强强合作,才能做到不同形态的“舆论场”相互取长补短,才能游刃有余地应对和处理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

(三)培养正能量的网络意见领袖

意见领袖是指在人际传播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意见和观点,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作为大众传播效果形成过程的中介或过滤环节,当意见领袖将接收到的信息经过二次传播传达给受众时,更有利于信息的广泛传播并增强其社会影响力。众所周知,网络自由、平等的显著特点决定了每个网民在网络上都具有同等的话语权,随之而来的则是政府及主流媒体逐渐失去了其天然的领导权。如果政府相关部门和主流媒体依旧沿袭以往刻板生硬、高高在上的说教方式,那么传播效果必然有限。基于优先相信身边的亲戚朋友、同事或熟人的人性特点以及微信圈子本身相互的高信任感,可以充分利用微信来整合意见和传播观点。同时,新媒体中微信的信息能够精准地送达用户并经由用户成员进行二次转播,不仅能够扩大信息的宣传氛围,还能够快速阻止不实信息的传播与不良情绪的蔓延。^[7]随着新媒体应用范围和领域的不断扩展与深化,政务微信在信息公开、党群互动、舆论监督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例如黑龙江宝清县认证的“微看宝清”党政微信公众平台,就是借助微信这个新媒体逐渐实现了“动动手指滑滑屏”就可以完成“指尖上的政民对话”。因此,要充分发挥网络的平民化功能,尤其在突发事件中,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发挥正能量的网络

意见领袖的作用。

(四)强化新媒体公众的自律与他律意识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网络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工具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存在着网民上网时道德自律和约束缺失等问题。然而目前我国政府还没有出台新媒体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新媒体的监管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盲点。毫无疑问,一个国家互联网的纯净程度根植于本国网民的文明素质和道德修养,那么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就是每个网民、网络机构以及网络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具体来讲,自媒体时代的网民要自觉遵守新闻伦理道德,强化责任意识,本着用事实说话的原则,对不清楚或不了解的内容坚决做到不发、不评和不转,更不能为了迎合受众而传播浮夸的言论和信息。一方面要充分运用好新媒体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又要谨言慎行。面对公共危机或表达某些批判、否定性的言行时,不应把新媒体作为肆意宣泄个人情绪和负面言论的集散地,要理智、理性地用好手中的话语权,信任并主动配合政府来化解危机。当然,每个公众都是富有个体性和自由性的单个个体,如果完全依靠个人自律,可想而知其效果必然有限。因此,还要加强对新媒体公众的他律,比如制定新媒体管理条例和规章,从制度层面对公众的言论加以规范,此外还可以通过相应的媒介技术对广大受众的新媒介身份进行实名认证和严格考核,对其发布的信息内容进行审核判断等。

(五)加强政府的公信力建设

政府公信力建设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增强政府公信力是提高民众对政府的支持、信任和信心的关键所在,也是提升国家形象的重要举措之一。当前,由于部分政府管理人员的不当行为削弱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最终影响到了政府的公信力。而政府公信力丧失的后果,轻则会引起民众不满,重则会引发各类恶性事件,更严重的甚至还可能影响到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当重大突发事件处于基本平息阶段时,就要尽快采取措施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建设。当然,加强政府的公信力建设不能简单停留于事件平息后对监管不力、导致突发事件发生负有直接重大责任的政府官员进行相关的责任追究,而是要尽快完善考核监督各级政府公信力建设的评价体系。唯有依靠制度来保障制度,才能真正使各级政府的公信力建设步入正轨。首先,要确保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科学可行,通过逐步兑现发展目标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建设。政府部

门要放下管理者的架子,主动通过新闻媒体的网络平台与网民进行互动沟通,从而使网络舆情朝着有利于政府形象的方面发展。其次,务必要确保政府行政行为的透明性和连贯性,从而以更加明晰的责任体系来构建政府的公信力。与此同时,还需要政府部门务必做到权责一致,以更加务实的积极行为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建设,将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纳入承办督办的范围,实现政府管理行为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公开化。

四、结语

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互联网日益成为社会公众参政议政的便利平台。根据2017年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7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7.5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4.3%,较2016年底提升1.1个百分点。^[8]逐年高速攀升的网民规模和互联网普及率,无一不在证明我国已经进入名副其实的网络时代,以微博、微信、网络视频、网络论坛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带来的海量网络信息早已让民众从全盘接收媒体信息转变为主动拉取信息,新媒体的便携性、私有性、互动性和强影响力对政府部门做好重大突发事件的危机传播至关重要。新媒体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危机传播过程中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弊端与问题,这需要政府、传统媒体、网络运营商和内容服务提供商的通力合作,更需要网民以及“意见领袖”的

积极配合。只有各方力量用好微平台,凝聚微力量,才能使新媒体真正成为自媒体时代传递正能量的舆论场。

参考文献:

[1]张可,王新婷.自媒体时代政府话语权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人民论坛,2014(23):56-58.
[2]王笑圆.自媒体时代危机传播管理之对话新思维[J].青年记者,2016(2):31-32.
[3]刘凌.新媒体影响下我国政府危机传播和舆论引导研究[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12.
[4]熊翠红.从受众心理看我国新闻舆论引导的策略[D].武汉:湖北大学,2006.
[5]金雨希,张燕.有微信,更微信:论传统媒体如何借力微信[J].中州学刊,2013(7):33-36.
[6]贾奋勇.新华视点微博,在新媒体舆论场彰显国家通讯社影响力[EB/OL].(2013-12-04)[2017-09-05].
<http://media.people.com.cn/n/2013/1204/c120837-23744932.html>.
[7]张珍珠.基于微信熟人关系圈的自我呈现探析[D].广州:暨南大学,2015.
[8]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7-08-04)[2017-09-05].
http://cnmic.cn/gwym/xwzx/rdxw/201708/t20170804_69449.htm.

(责任编辑 姚虹)

Research on the Management about Government Crisis
Communication in the We-media Era

LI Yan-fang

(College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s,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mobile terminal and the popularity of network, the status of the we-media's audience has shift from "spreader" to "receiver". Meanwhile, the right of speech and participant is established and improved to some extent. Howev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udience's thematic status also breaks the long-term monopoly of the traditional media information, and weakens the government's control over social information. How should the we-media master the commanding height in the "heteroglossia" public opinions? It needs the government continue reinforce the "gatekeeper" role, to condense the "micro" power from mainstream media, to cultivate internet view leaders with "positive energy", to improve the new media audience's senses of self-discipline and heteronomy. Enhancing the government's credibility construction, so as to minimum the social impact and destructive power that caused by serious sudden accidents.

Key words: we-media era; government crisis communication; dual discourse space

河南作家笔下的南水北调与移民记忆

——主评何弘、吴元成的《命脉》

刘海燕

(中州大学 学报编辑部, 郑州 450044)

摘要:文学豫军中的实力派——南阳籍作家,近年来,他们在以不同的方式,努力讲述着家乡大地上的南水北调——这项历时超过半个世纪的巨大水利工程,和由此引发的大规模移民工程。其中何弘、吴元成的《命脉》以纪实文学的方式,宏大的格局和人类水文明史的视野,极具耐力的恢弘叙述,让历史和现实的方方面面告诉我们,应如何看待南水北调这项世纪工程。

关键词:河南作家;南水北调;移民记忆;《命脉》;《迁与安》;《人间呼吸》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5.016

中图分类号:C915;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5-0074-05

南水北调,这项历时超过半个世纪的巨大水利工程,和由此引发的大规模移民工程,该由谁来讲述?如何讲述?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起点——渠首,就在河南南阳淅川县一个叫陶岔的地方,丹江口水库差不多一半的水面也位于淅川县境内。南水北调的主干渠从中原大地上穿过,是风景吗?不,更是命运——水资源与我们生活的命运。作为这片土地上的儿女,作为文学豫军中的实力派——南阳籍作家,近年来,他们在以不同的方式,努力讲述着这宏大的事件。

他们的作为和作品,唤起我心中几近倦怠的文学道义;作为一个多年从事文学评论之人,这在我对于当代作品的阅读中可是很少有的。因此,我觉得有义务推介他们的作品给这个时代。这里依写作的时间顺序介绍。

一、高宏民的长篇小说《迁与安》

高宏民,70后,在河南南阳的一个乡镇工作,是最基层的公务员,但是他着魔似地走在写作之路上。还没有网络的那些年,似乎每年高宏民会来一次省城,不善交际的高宏民由他的同乡——《传奇故事》

主编、小说家红都领着见文学界的几个朋友。红都说,宏民在乡镇无可交流之人,寂寞得很,一个人拼了命地写,把耳朵都快要写聋了。红都是一个阅遍文学经典、透彻而有悲悯之心的人,他怜惜宏民那颗热爱文学的心。也许红都的话有些夸张,但可以想象,一个小公务员爱上了写作,在乡镇是怎样的情景。对此,我心中有些难过,我希望像宏民这样的年轻人不要因为写作毁了自己的健康。天才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还是要健康地活着。人到中年的我,已经懂得尊重生命伦理,而不是成功学逻辑。

2012年冬天,宏民把他的长篇小说《迁与安》电子版发给我,让我给他写个推荐语,这部长篇改变了我对这个年轻作者的看法。曾经,我认为,他只是个苦行僧似的业余作者,《迁与安》这部长篇,让我感到他是一个有梦想和野心、有大责任感的小小说家。生活于基层、亲历过南水北调移民工作的宏民,终于找到了他该写的那本书。

《迁与安》聚焦于南水北调工程中的移民搬迁工作。当时我和同仁何弘都诚挚地给他写了推荐语,不是虚词,而是心中真实的感受。何弘写到:

丹江口库区移民、回迁、再移民、再回迁的反复上演,在人类移民史上堪称绝无

收稿日期:2017-09-12

作者简介:刘海燕(1965—),女,河南太康人,硕士,中国作协、中国评协会员,《中州大学学报》编审,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和思想类散文随笔写作。

仅有,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迁与安》通过一位移民一生的经历串起了丹江口水库数次移民事件,以对待移民的不同方式和态度,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值得阅读。

我这样写:

这是国内第一部写南水北调大迁移的撼心之作。作者无意于再现事件,而是着力写丹江边子民在故土上的根被拔起时心的痛感、空感和慌乱感。作品还表达了人去江荒,心魂、江魂、草木魂,都将失去记忆的回归路。它让我们在这种大荒凉里,听到万物的和声,那就是爱——万物之间彼此存活。

——《迁与安》封底“推荐语”^[1]

高宏民的这部长篇,在今天看来,最应附上“深入生活”“重点扶持”之类的称号,但什么也没有。偏于豫西南一隅的老实的宏民,好像什么也没申报过,无论是项目、文学奖项还是签约作家。宏民依然在农业时代的习惯里地老天荒地写作。只是,他的这部《迁与安》在几家网站上长销,有一次他很开心地发信息告诉我。有陌生人买他的书,对于宏民,便是最大安慰了。

二、高金光的诗集《人间呼吸》

2016年初夏,河南省首届杜甫文学奖评奖时,我作为评委之一,首次读到高金光的诗集《人间呼吸》,整个下午我脸上流着泪水。我和高金光只是认识,他是个少言的人,我也属于被动交往型,因此,我们没有私人交往,之前也没有关注过他的诗。这应是我2016年夏季最动心的一次阅读经历。

诗人高金光,南阳淅川县人,移民之子,他在省城郑州工作,但他的父老乡亲还在那个叫着水田营村的地方,这个村庄要迁往唐河。搬迁时,适逢他的母亲病重,在郑州住院。他揪心地写道:

搬迁的日子还没有确定
母亲的病情却越来越重
……

如果母亲赶不上搬迁
我将把她葬在哪里
不能让母亲一个人留在淅川啊
让母亲一个人留在淅川
我的心会疼上一万年

水田营 终于移植到唐河

家 从卡车上卸了下来

……

原谅我 母亲

在这个时候 我首先要做的
不是为您整好阳间的铺盖
竟是为你选择阴间的地穴

……

唐河的土啊

愿您护佑我的母亲

——《为母亲安家》^{[2]12-13}

这个不识字的母亲,一生也没怎么离开过这个村庄,最后却未能看上一眼,从郑州被直接搬进了唐河,被清冷、孤寂的生土掩埋。这个结果却是儿子所盼望的,“母亲 我要感谢你/终于与疾病战斗到今天/……一个人 难道/连死也要追赶着日子吗/……”^{[2]13} 儿子最担心的是母亲撑不到搬迁,那么把她葬在哪呢?难道要葬在即将被洪水淹没的淅川吗?母亲的处境,无论怎样,都令人肝肠寸断,只是母亲能够葬在有亲人陪伴的新土,而不是孤零零地被大水淹没,令儿子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心慰。诗人,更是儿子,他内心的真实感受,让我们深深体会到,在时代大事件的裹挟中,个体生命的无奈、疼痛与荒凉……

诗人还准确地描述了拆迁过程中,随着每一个物件的被毁、被弃,亲人们的心如何被揪痛:

揭第一片瓦的时候 心 一阵阵
揪疼 好像是撕自己的皮肤
荡起的灰尘 血光四散 模糊了眼睛
去第一根椽子的时候 似乎听见
我的肋骨断了 惨白的叫声
……

爸至始至终默不作声 你知道
他一生坚强 不会流泪 泪只往心里流
七十年岁月 经他的手 建了两次房
这座房该有二十岁的年龄 砖和瓦
是他亲自做的 椽子是他从南山挑的
它们像咱们兄弟 都是他的孩子
你可以体会他的心情 现在
爸为咱们营造的家没了……

——《弟弟向我描述拆房过程》^{[2]15}

我们明白了他们为何而如此心痛,因为那房子是父亲辛劳和梦想的物证,凝聚着一家人几十年的记忆。

他们只能把能带的都带走,不能带走的再品味一次,再多看一眼,留在记忆里。

如《父亲执意要带那对石门墩》，“装上吧 唐河啥都不缺/就缺石头 父亲对弟弟说/父亲说话的时候 脸上的皱纹/荡漾着柔情 是我们/小时候 见过的那种”^{[2]7}。那石门墩，是父亲从南山选料、请人加工的，在他们家已放了二十年。一草一石，都带着岁月的刻痕，和亲人的温热，那种物我一体的爱，读来令人百感交集。

再喝最后一口家乡水，“一口 又一口/慢慢地咽 细细地品/每一口都不愿是最后一口/家乡的水 现在还是家乡/喝了最后一口 就成了故乡”^{[2]8}。（《喝最后一口家乡水》）

然后，向祖宗告别。“跪下来 低下来/与黄土一样低/……对不起 列祖列宗/这一去千里迢迢/这一去再难相见……”^[2]（《在坟前向祖宗告别》）

在这一幕幕难以割舍的告别里，痛和爱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爱有多深，痛就有多深。

但无论如何，这些朴素善良的乡民，都能识大局，明大理。“看来咱真得为丹江让路了 真得/为国家做点牺牲了 父亲说/……父亲最关心农具 早早地/把锄 镰 锨 镢头归拢到一起/口头禅 会劳动 不怕出死力气/到哪儿都不愁没饭吃”^{[2]3}。（《关于搬迁的话题》）这个父亲身上，凝聚着中国老百姓的传统美德——心中有大义，宽厚、忍让、勤劳、乐观，不需太多。令人心疼，又令人敬佩！

后来评委会碰面讨论时，大家不约而同地首推高金光的诗集《人间呼吸》，一致认为，杜甫文学奖应奖给这样的诗歌。诗歌“授奖辞”是我写的，我在泪水中写了很久，希望能够准确表达，唯恐对不起那已逝的母亲和移民之子的心。

高金光的诗集《人间呼吸》“卷一”，以本色而深切的笔触，写南水北调中的故乡和亲人，在被拔根的过程中那种撕心裂肺的感受，在诗人的笔下，我们看到移民赖以生存的物件都坍塌了，移走了，但他们的心和记忆不会移走，会继续游荡在被大水淹没的故乡。高金光以一个移民之子的诚挚情感，尤其是对于临终母亲在故土和新土之间催人泪下的两难表达，完成了一个诗人对于时代生活深处个体命运的表达，完成了无愧于故土和历史的悲情表达。（《人间呼吸》授奖辞，写于2016年5月）

我也曾在不同地段看到过那被坚实的堤坝和铁丝网围起来的清澈的丹江水，一路向北而去，我的眼睛被一种复杂的情绪冲撞着，几乎落泪——不能不感叹工程的宏伟！直到读完何弘和吴元成的《命脉》，我才深深地意识到，对于南水北调，我们应有

更开阔、历时、理性的认识。

三、何弘、吴元成的大型纪实文学《命脉》

虽然知道近年来何弘和吴元成在合作做南水北调的调研，节假日总是风雨无阻地驱车上路……但翻开他们合作的纪实文学《命脉》这本厚重的大书，尤其读完后，还是很让我意外和震撼！大致可归因于以下特色：

（一）宏大的格局和人类水文明史的视野

全书大概可分为三部分：水对文明的塑造；历史中的南水北调全貌及当时移民的状况；聚焦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和新移民。

作者从人类水文明史的角度切入，在源头处，寻找水和人类文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源头性、历史性而不是时段性、片面性的视野下，梳理中国的水文明史，从水坝围出的良渚王国开始，一直写到元明时期的大运河和北京。这一部分的写作，辛苦的是扎实的史料准备工作和水利工程遗迹的现场考察，高难度的是怎样把历史写活？该书主笔何弘，多年来在一线从事文学和文化批评，又对历史入迷，足迹遍布天下，在这本书里，他表现出了把控历史和现时对接的能力，显示出了他在评论生涯中历练出的高度概括力。

譬如，他写到：大禹治理过的汉水，今天成了南水北调的水源。跨越四千年的时空，历史在此奇妙地连接在一起。“鲧和禹治水的传说，其实代表了中国两种重要的文化观念。一种是儒家的，以约束的方法获得秩序，面对自然如此，面对人们的思想道德也是如此；一种是道家的，顺应自然、服从自然的规律建立秩序，由自然及于人的内心和社会，均以自然而然为最高原则。”^{[3]46-47}他讲到助秦统一的郑国渠，就像是讲述一个幽默诡异的小说故事，让人明白，水利工程作为国家“命脉”的意义所在。

评论出身的何弘又善描述和讲故事，诗人、记者吴元成更是诙谐幽默，他们磋商合作的结果，自然既理性真实又风趣生动。

沿着人类水文明，尤其中国古代水文明的脉络，进入第二部分——历史中的南水北调全貌及当时移民的状况。作者写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江河治理，各地水库和大坝建设，南水北调的东线、中线、西线工程等。让读者对建国后的水利工程有个全方位的了解，对其是与非有个全局的判断。

第三部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中的新移民，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和陶岔渠首的建设，作者用了更重的笔墨，更集中的篇幅来写。作者采用移民口

述史的方式来呈现各个时段移民的生存状况,以给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原始档案,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写:“把移民最原始、最真实的东西保留下来,不加雕饰地还原移民的场景、过程及最真实的心理感受,并由此把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表现出来,才会更有意义。”^{[3]82-83}这部分将以其真实性而进入历史。

在这些被采访的移民中,有一些就是吴元成的亲属,因为切近,这些讲述就特别真实,因真实而复杂,因复杂而让人心生千滋百味。移民的生存境况和命运是那么令局外人难以想象!

在历时性的考察与呈现中,作者从几十年丹江口水库移民政策的变化,看到了国家政策的制定从以前的过分强调集体利益到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转变。在工程建设的进程中,发现人们从绘声绘色地讲述所经历的各种事件,到更多讲技术难题和工程质量,看到了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的建设者们已经有能力承担起世界上最复杂的工程。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也是一本激励民族自信心、营造民族梦想的大书。

(二)极具耐力的恢弘叙述,让历史和现实的方方面面告诉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南水北调这项世纪工程?

《命脉》的叙事风格属于经典长卷式,有种大河奔流波澜壮阔的气象,它让历史和现实的方方面面去呈现,给读者一种全方位的信息,有些类似史诗和小说中的复调手法;它的文体自觉、开放,融合了各类典籍中的水利资料、移民口述、作者的现场亲历等各种角度,有效地运用了考古学、人类学、尤其是文学的方法,在文学的方法中,又表现出一一般纪实文学作家所不具备的史学眼光,整体的把控能力,冷静的思想力,敏锐的判断力等,这应得益于何弘的理论功力。在当代纪实文学中,这种风格的写作,是很少见的。

我本人也从事文学评论多年,在一些看法上和何弘有着共识。如我们认为,不少当代写作和现实生活是平行的,让读者得不到高于或多于现实的东西,阅读变成了负消耗。深知才能自觉避之,在这部书中,能看到,作者的写作之心——清醒、诚恳、庄重、辽阔,努力扎根于优秀的文学传统之中,而不是当代浮躁的语境中,以叙事的罕见耐力,沉潜于人类水文明史和现实的原生态中去,给读者营造足够辽阔的时空,让你沉静下来,超越这个时代去思考。

这本书让我感到,关于南水北调,或类似的重大

社会生活事件,我们不应在当下的情绪和想当然中,而应在漫长的介入和思考中,去获取答案。这本毫不煽情的大书,就是这样以其气度和品格感动了我,也震撼着我。因为,在网络化时代,普遍浅抒情的语境中,我们已很难获得这种沉静的富于启示性的阅读感受。

为国承担,为民呼吁,应是纪实文学的责任和担当。在他们采访河南淅川和湖北十堰等地移民的过程中,所遇的每个群体都觉得自己委屈——“移民觉得自己背井离乡,是在牺牲,很委屈;接收地觉得自己本就不多的土地几乎是平白送给了别人,是在牺牲,很委屈;移民干部觉得自己无端受苦受累甚至挨打挨骂,是在牺牲,很委屈……”作者总结道:“这么多人的牺牲和委屈,归结到一起,其实就是他们的伟大奉献。”^{[3]281}半个多世纪以来,因为修建丹江口水库和实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湖北人、河南人做出了巨大牺牲,形成了独特的“移民精神”。这种“移民精神”,除了牺牲之义,还有顾全整个国家大局的意识,亦既为国承担。

作为采访者的他们,也曾为移民背井离乡中所受的苦难而落泪,为移民干部和接收地群众的牺牲而感动落泪……他们既深情又理性地深入其中,对这个世纪工程的方方面面进行全面的调研,在恢弘的时空中,理性地把它呈现出来,以事实来阐释那个颇具争议的大话题——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南水北调这项世纪工程?

即便如此,这个话题,也许不是一本书,一代人所能回答完的。作者尊重现实的复杂性,他的学理和诚恳,使他不作武断和抽象的总结,他以指向未来的笔触提出:如何推进后移民时代的发展,真正实现移民的长治久安、融入当地?南水北调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吗?“如果目前的城市发展模式不加以改变,用水方式不加以改变,问题肯定会再次出现。”^{[3]109}严肃的纪实文学,应如此不回避问题,同时带领大众做更深入的关注和思考。

(三)这是他们命运里的一本书,是故乡和时代赋予他们的重托

看似作者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无论寒暑,一有空就驱车上路考察和采访,南下荆襄,北上京冀,多在河南……实则这本书,在他们的命运里早就开始了。

作者何弘和吴元成都是南阳人,他们的父辈都曾参与过丹江口水库的修建,他们的亲人邻里有不少从这块土地上被拔根而成为移民。尤其元成,就在丹江边长大,丹江口水库的修建,家园的拆除,亲

人们移民湖北、支边青海哈德令的艰辛历程,都牵扯着他少时的记忆和命运。南水北调,发生在家乡土地上的这么巨大的国家工程!牵扯几代人生活和记忆的大事件,理应由这块土地上的儿子来完成。何弘和吴元成,这两个南阳才子,一个是评论家兼河南文学的掌门人,一个是诗人兼记者,既是偶然也是必然,故乡和时代的重托落在了他们的肩上,使他们成为移民工程的代言人、立传者。

在上路和书写的过程中,作为这块土地上的儿子,他们带着来自家乡无形的重托、义务和责任,带着几代人的情感记忆,也带着自己刻骨铭心的记忆,有最可信的真实情感和经验凝聚在其中,这也是纪实文学中最难得的。这使作品触动心灵的个性化表达得以可能。

作为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写作者,何弘和吴元成都有着对家乡青山绿水的记忆,有着浓郁的乡土情结,更有着一代人的理想主义精神和责任担当;他们承上启下,他们所认识的或不认识的移民们和当事人,都在渐渐老去,像那被水淹没的故土一样,都

将会被时光之水永久淹没。他们二位赶在时间前面,寻找到暮年中的移民们和当事人,记录下他们的过往和心绪,留下这些珍贵的独一无二的口述史。

如果说真实性是纪实文学的生命,思想性是其灵魂,文学艺术性是其翅膀,以这三点来衡量《命脉》这本书的话,那么可以说,这部作品在当代众多的纪实文学作品中,具有不可复制的品性和难以超越的水准。也许你可以挑出这本书尚需改进的地方,但无论如何,它都不失为一部大作。如果你想系统了解南水北调与人类水文明,想获得一种理性思考重大现实话题的方法,那么请翻开《命脉》。

参考文献:

- [1] 高宏民. 迁与安[M].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
- [2] 高金光. 人间呼吸[M].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
- [3] 何弘,吴元成. 命脉:南水北调与人类水文明[M].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 吕志远)

The South – to – 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and Immigrant Memory Written by Henan Writers

——Focusing on *Lifeline* by He Hong and Wu Yuancheng

LIU Hai – yan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Zho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Henan strength literature writers, who come from Nanyang, have written about the South – to – 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in various ways. This grand project took nearly 50 years' time, it triggered large – scale migration. He Hong and Wu Yuancheng's literature work *Lifeline* tells us how to understand the grand century project from historical and reality aspects, through the way of documentary writing, the view of grand landscape and water civilization, as well as the extent statement.

Key words: Henan writers; South – to – 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immigrant memory; *Lifeline*; *Migration and Security*; *Human Respiration*

明初政权闽东海陆军事连环防御体系探析

孙绍旭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200062;宁德师范学院 区域经济研究所,福建 宁德 352100)

摘要:地处闽浙交界的闽东,元代以来,倭寇入侵首当其冲。明初,随着全国内陆局势趋于稳定,洪武政权将注意力转向倭患严重的海防。明政府实行分区海防的积极防御策略,以沿海烽燧为中线,在近海建立卫所,环海建立水寨,组建精锐海军,形成隔离带;烽燧向内陆面建立军屯、县治、巡检、铺递组成的面、线、点互为表里、虚实结合、动静平衡的三面包围的陆上防御格局;最终形成系统、全面、高效的海陆连环防御军事大格局,到洪武后期,元末以来的倭患问题基本得到解决。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归纳和对比等,列出拙见,以期抛砖引玉。

关键词:明政权;闽东;洪武;军事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5.017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5-0079-06

闽东即现在的宁德地区,位于福建省东北部,东临东海,南连福州市,西接南平地区,北邻浙江省温州市和丽水地区。最东端是福鼎县星仔列岛,最西端为古田县笔架山,最北端是寿宁山羊尖,最南端为古田县水口镇的省洋村,东西长约235公里,南北宽153公里,陆域土地总面积13379平方公里,海域面积4.45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1046公里。^{[1]102}据《八闽通志》载,明洪武至永乐时期属于其范围的有:福宁县(今霞浦、福鼎和柘荣)、宁德县(今宁德和周宁县大部)^{[2]596}、福安县(今福安和寿宁县一部)^{[2]507}和古田县(今古田县和屏南县),这些都属于福州管辖,^{[2]431}还包括寿宁县的南里、北里、东里至十五都,这些当时属于建宁府的政和县。^{[3]31}为了显示完整性,本文海防方面部分涉及连江县。

对于初建政权而言,主要是从军事上实现对一个地区的控制,明初政府也不例外。这从一个数据可以看出些许端倪,宣德元年(1426年)明会典:福建原额兵125381员名,见在38475员名。^{[4]449}以上数据显示:以宣德元年为界,以前的驻军是以后驻军的3.23倍。那么,洪武年间,明政权在闽东的海陆

军事部署如何?

一、明初政府在闽东的海防部署

(一)海防部署的背景

从元代开始,倭寇便流劫于中国沿海地区,给当地人民造成极大危害。及至明朝初年,“乘中国未定,日本率以零服寇掠沿海”^{[5]201}。同时,张士诚、方国珍的余党流亡海外,“诸贼豪强者,悉航海纠岛倭入寇”^{[6]21}。使得倭寇活动越发猖獗,滨海一带皆被骚扰,而闽东更是当时倭患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闽东地处闽浙交界处,“岛夷入寇,必先犯此”^{[7]4421}。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是月,倭夷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傍海之民,遂寇福建沿海郡县。福州卫出军捕之,获楼船一十三艘,擒三百余人”^{[8]1056}。洪武五年(1372年)六月,“倭寇福州之宁德县”^{[8]1059-1060}。同年八月,倭寇再次进犯闽东,“倭夷寇福州之福宁县,前后杀掠居民三百五十余人,焚烧庐舍千余家,劫取官粮二百五十石”^{[8]1393}。根据赵轶峰《重谈洪武时期的倭患》一文统计:洪武时期倭寇侵扰从辽东到广东沿海合计有45次。^{[9]87-88}据范中义、全晰纲统计,洪武年间倭寇对辽东侵扰1

收稿日期:2017-09-15

作者简介:孙绍旭(1970—),男,福建周宁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宁德师范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史。

次,对山东侵扰达9次,对南直隶侵扰7次,对浙江侵扰16次,对福建侵扰4次,对广东侵扰7次。^{[10]18}面对如此严峻形势,随着全国统一的完成,明政府开始部署海防以御倭寇。

(二)明初海防部署

明初政府在沿海构建海防区、组建精锐海军、建立沿海隔离带达成打击倭寇之目的。

建构沿海海防区。随着全国统一的完成,明朝政权也日益稳定,朱元璋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海防。在沿海地区加强海防力量,划分鸭绿江、辽东、山东、直隶(今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为七个海防区。关于明初海防有学者曾作专文,学者赵红根据洪武时期在山东置水军24卫,增强海上防御力量和沿海建立11个卫所,建立海防工事等布置防御倭寇代价巨大出发,对山东倭患进行阐述。^{[11]458-459}据邸富生统计,“洪武一朝,明政府在浙江沿海共计设卫14,千户所31;在福建沿海设卫9,千户所13;在广东沿海设卫所20多处”^{[12]13}。陈懋恒统计:洪武年间在辽东沿海设八个卫,山东沿海设七个卫,浙江沿海设十一个卫,福建沿海设六个卫,广东沿海设九个卫,共驻军近三十万。^{[13]164-171}通过沿海划分海防区,建立卫所,实现提高局部应变速度与整体相互呼应有机统一系统,形成有效打击倭寇的第一道防线,对捍卫大陆安危起到积极作用。

组建海军打击倭寇。洪武三年(1370年)七月,明朝“置水军等二十四卫,每卫船五十艘,军士三百五十人缮理,遇征调则益兵操之”^{[8]1061}。洪武五年(1372年),便“诏浙江、福建濒海九卫造海舟六百六十艘,以御倭寇”^{[8]1390}。洪武六年(1373年)三月,明太祖诏“以广洋卫指挥使于显为总兵官,横海卫指挥使朱寿为副总兵,出海巡倭”^{[8]1448}。洪武六年(1373年)六月,“台州卫兵出海捕倭,获倭夷七十四人,船二艘,追还被掠男女四人”^{[8]1490}。该年内,福建都司都指挥同知张赫“率舟师巡海上,遇倭寇,追及于琉球大洋中,杀戮甚众,获其弓刀以还”^{[8]3042}。洪武十六年(1383年)八月,“赏温州、台州二卫将士擒杀倭寇有功者凡一千九百六十四人文绮、钞布、衣物有差”^{[8]2426}。洪武十九年(1386),命信国公汤和“往浙西沿海筑城,籍兵戍守,以防倭寇”^{[8]2799}。汤和至浙江后,筑城59座,选丁壮58750余人分守各地,并多次命令沿海卫所组织军队出海捕倭。沿海军事实力提升,使倭寇所造成的危害大幅下降。从这一时期起,倭寇在沿海的劫掠渐趋消弭,史料中也鲜有记载,但这并不意味着倭寇骚扰结束。洪武二

十年(1387),江夏侯周德兴先在福建濒海的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城筑城16座,增设巡检司45个,并选丁壮15000人分隶各卫所。^{[8]2735}在福建沿海督造了烽火门、南日、铜山、小埕等5座水寨。水寨“各为分汛地,严会哨,贼寡则各自为战,贼众则合力以攻”。仅浯屿水寨就有兵丁2898人,由一名把总统领。^{[14]80}另外还收编了方国珍、张士诚残余兵勇。^{[15]842}说明倭寇依旧还是沿海防御的重点,稍有疏忽他们便能重新登岸劫掠。通过沿海筑城,驻扎水军,建造战船,操练水军,主动出击,打击倭寇,取得倭寇在沿海的劫掠渐趋消弭的良好效果。

迁徙沿海居民建立隔离带。为国防需要,洪武时期曾经实施比“禁滨海民不得私出海”更严峻的措施,对打击倭寇起到巨大作用。汤和曾经迁徙沿海居民内撤,包括“废宁波府昌国县,徙其民为宁波卫卒,以昌国濒海,民尝从倭为寇,故徙之”^{[8]2745}。“徙福建海洋孤岛断屿之民,居沿海新城,官给田耕种,从左参议王钝请也”^{[8]2748}“国初,定海之外,秀、岱、兰、剑、金塘五山争利,内相仇杀,外联倭夷,岁为边患。信国公经略海上,起遣其民,尽入内地,不容得业。乃清野之策也”^{[16]366-367}。洪武十七年“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鱼。以防倭故也”^{[8]2460}。据万历《漳州府志》载:“国初即设备倭水寨,继有防海都指挥李彝者奏言,海岛居民多货番,以故番有向导,得入吾境。乃尽迁海岛居民,处之内地。于是内有防守,外无引援,百余年无倭患矣。”^{[17]145}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八月,“海盜张阿马引倭夷入寇,官军击斩之”^{[8]3134}。建立沿海隔离带,坚壁清野,破除倭寇一贯实行的里应外合之策,使其粮草来源被阻断,以达到灭倭之目的。

(三)明初闽东海防烽燧部署

自洪武初命江夏侯周德兴经略海徽备倭,卫所巡检司,筑城数十,防其内侵。又于外洋设立水寨,初惟烽火门、南日山、浯屿,后增为五寨。^{[14]80}洪武二十年(1387),江夏侯周德兴先在福建濒海的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城筑城16座,增设巡检司45个,并选丁壮15000人分隶各卫所。^{[8]2735}

明代福建海防,初时有三水寨,霞浦的烽火门即是其一(另外两个分属兴化、泉州二府),后来增设小埕(在连江)和铜山(在漳州东山),五水寨闽东北占了两个。^{[10]16}大体说来,在福建沿海卫所防御体系中,沿海五卫,福宁卫居一;十二千户所,闽东北居二(福宁大金所,连江定海所);四十五巡检司,闽东北居七(福宁州6,连江1),占比在15.6%—20.0%之

间。^{[18]5}可见以福宁府(州)为中心的闽东是福建备倭的战略要地之一。

此外,明政府还在福宁州沿海与陆地交接处的一都、三都、五都、七都、八都、十都、十一都、十五都、四十一都、四十二都、四十五都、五十一都、五十二都、五十三都构建 37 个烽燧,^{[2]849-909 [19]887-888}以实现及时传达信息的作用。

二、明初政权的闽东陆地部署

倭寇在闽东的劫掠渐趋消弭,其原因除明朝政府在闽东沿海广建卫所、水寨,加强海防建设之外,明政府在闽东的陆地建立的与海防相对应的纵深、连环、系统的军事部署起到强大后盾的作用。

明初政权对闽东主要是通过县城建立文职公署,在各险要地域建巡检司,在各地驻军,建校场烽燧等军事设施,以及通过铺递加强联系的方式实现对接海防部署的目的。下面分别对这些设置作概要性介绍:

(一)建立文职公署

明初政权在闽东的福宁县、宁德县、福安县和古田县都设立县级行政机构,主要包括:县衙、阴阳学、医学、僧会司、道会司、际留仓、申明亭、旌善亭、县前铺、河泊所等机构,部分县还设有公馆,如古田县的黄田驿(在二都)、水口驿(在一都)、水口递运所(在一都)^{[2]849}等。

关于这些行政机构的驻军有载如下: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福宁有弓兵 600 名。^{[1]1170}

就古田县言,明初设团练兵 100 名,守城兵(守兵,即机兵)200 名。机兵在农村“尽力农亩”“有事用以征战”,担任防守堡垒、关、隘等任务。^{[20]643}宁德与福安没有相关记录,就以古田县为标准计之,共 600 名。则这四县共计守城弓兵 1500 人。

通过这些比较完整的行政机构的设置而形成以各个县治为中心然后向县域四周扩散的控制区域,即以县治为圆心,以周边的军事或其他文职机构间距为半径的一个个扇面。

(二)创设巡检司

明初政权在闽东各险要地域建巡检司 12 个,分别是:福宁县的松山巡检司、清湾巡检司、高罗巡检司、延亭巡检司、大笕筴巡检司、水澳巡检司,宁德县的麻岭巡检司,^{[2]907}政和县的赤岩巡检司、古田县的杉洋巡检司,^{[2]849}西溪巡检司、谷口巡检司,^{[2]888}寿宁县的渔溪巡检司。^{[2]861}

关于这些巡检司驻军情况,洪武三年(1370年),在渔溪洋(今于南阳乡洋边村)设立渔溪巡检

司,在赤岩(今周宁县泗桥乡赤岩村)设立赤岩巡检司,分别隶属于福宁卫指挥所和建宁卫指挥所。巡检司配巡检 1 人、书手 1 人、皂隶 2 名、弓兵 18 名,为寿宁最早的军事机构。^{[21]588}

明代设杉洋、谷口巡检司,每个巡检司设巡检 1 员,书手 1 人,统弓兵 30 名,全县有弓兵 60 名。^{[19]643}

古田的西溪巡检司也以此为标准计之。麻岭巡检司“有塘兵十,此地距城一百八十里,与寿宁泗州桥交界”^{[19]33}。

明时,“福宁州巡检在今县治者四:曰清湾司、曰高罗司、曰延亭司、曰柘洋司。每司弓兵百名,括民丁为之”^{[22]485}。柘洋司为正统六年置,不在此列;松山巡检司根据此标准计之。另,据《福鼎县志》之军事编记载:大笕筴巡检司、水澳巡检司在明代有巡检 1 人,书手 1 人,弓兵 60—100 人不等,每司以 60 人为标准计之。

总之,这十二个巡检司大体兵力 656 人。这些设置于各地险要位置的巡检司不仅对该地区的治安起到巨大作用,杜绝隐患的发生,同时,它与县治行政机构遥相呼应,加强了对周围地区的控制。

(三)驻军

为有效控制闽东各地,明初政权在各地各县驻扎了庞大的军队。据《明史》卷九十:“革诸将袭元旧制枢密、平章、元帅、总管、万户诸官号,而核其所部兵五千人为指挥,千人为千户,百人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23]2193}卫所是明初确定下来的军队编制。该编制 10 人为 1 小旗,5 小旗为 1 总旗,2 总旗为 1 百户所,10 百户所为 1 千户所,5 千户所为 1 卫。一般 1 卫为 5600 余人,陆军、水军、骑兵编制统一,概莫能外。^[24]

明初部队有卫兵、弓兵、机兵及戍闽之客兵。^{[25]485}据《福宁府志》记载:前明卫所,官军舍馀,粮米则支于广宁仓,银则支于州帑。定海俱支连江县。大金银支州帑,米则支大金仓。拔按:明初本卫旗军 5600 余名,以操海、屯总计之也。^{[26]156}据《霞浦县志》按:旧志,洪武二十一年,置福宁卫指挥使司,其属有指挥同知、有镇抚、有经历知事,为千户所者七:中、左、右、前、后及大金、定海,各统以镇抚百户。原额官兵五千员名,唯定海所属连江,余皆屯州治,守城戍寨,按季践更。^{[27]421}这是福宁卫的旗兵数量。此外,还有福州右卫指挥使司和建宁左卫指挥使司

旗兵。据《八闽通志》载:福州右卫指挥使司屯田新旧共 39 所,旗兵 1926 人。其中中所屯五所:怀安县一所在三都上洋;古田县四所,俱在五都破察乾起至十都前山止。前所屯五所。俱在古田县十二都起至四十四都赤粧止。后所屯五所:古田县一所。^{[2]861}

旗兵总数 1926 人,按 39 所平均,每所 49 人,古田县有屯军 10 所,人数 490 人。建宁左卫指挥使司:屯田 21 所。共田地 460 顷 73 亩 4 分 8 厘,计旗军 1355 名。福州府古田县 18 所,在一等都宝石等处。福宁州宁德县 2 所:一所在县南二都飞鸾渡,一所在县西一都白鹤岭。^{[2]862} 旗兵总数 1355 人,按 21 所平均,每所 64 人,古田县有屯军 18 所,宁德县 2 所,共 20 所,合计 1280 人。

根据以上数据的统计,明初驻扎于宁德地区的旗兵人数 7370 人。

明洪武二十年(1387 年)为防止倭寇骚扰,朝廷派江夏侯周德兴来闽设卫筑寨,次年,在沿海增设卫所寨堡^{[1]1177}。这个水寨没有确切的兵数记载,而永乐十八年(1420 年)在烽火岛建烽火门水寨,为闽海 5 水寨之一,隶属福建都司。^{[1]1166} 烽火门水寨(每岁分福州左、中、福宁卫更番以备倭寇):福宁卫官员 11 员,旗军 990 名;大金千户所官四员,旗军 300 名。^{[2]909}再加上小埕澳水寨,福宁卫镇海千户所,官四员旗兵 400 名。^{[2]852} 两处合计水军 1690 人。

就以上数字言,明初政府在闽东就有旗兵 7370 人。水寨卫兵 1690 人,合计 9060 人。

(四) 建设军事训练基地

明初政权在闽东建校场烽燧等军事设施。明初政府在军事驻扎区建立校场,主要有福宁(州)校场:明洪武二十年(1387 年)置福宁卫时,在西门外钓桥西(今霞浦城关西关)设西校场,长百余米。古田县校场,明代建,在城东北溪山亭侧。宁德县演武厅,在南门,明代建,面积 909 平方米。^{[1]1164} 供部队训练以提升战斗力之用。

为保证海防安全,明政府在闽东沿海建立 38 个烽燧,主要有沙松、台澳、赖离、后琦、大青画、小青画、东壁、离智、烽火、梅花、三山、大峰、南金、金家、南岭、白露、水澳、黄琦、白岩、沙埕、右县、长门、积石、闾峡、南山、罗浮、赤崎、小南、塔尾、下许、青山、界石、刘金、下簗、车安、石湖、关崎。^{[2]909} 关于校场与烽燧驻军列入旗兵范围之内,不另作计算。

(五) 添加信息传递机构

明初政权在闽东各地有铺递 59 个。古田县有

总铺、曹阳铺、茶亭铺、崎岭铺、汤寿铺、常赖铺、朱坑铺、秀岭铺、预洋铺、谷口铺、竹园铺、云顶铺,^{[2]849} 寿宁县有县前铺、叶洋铺、芹溪铺、尤溪铺、平溪铺、南溪铺,^{[2]861} 福宁县有州前铺、金台铺、流溪铺、官田铺、湖平铺、官洋铺、钱大王铺、龙亭铺、杜家店铺、杨家山铺、五蒲铺、白琳铺、顾洋铺、岩前铺、北水铺、牛岭铺、分水岭铺、石津铺、尤家店铺、盐田铺、黄沙铺、渔洋铺、高罗铺、大金铺,^{[2]907} 宁德县有县前铺、山洋铺、飞鸾铺、白鹤铺、界首铺,^{[2]909} 福安县有县前铺、柳斜铺、任家铺、化蛟铺、大梅铺、松萝铺、界首铺、廉村铺、大留铺、曾坂铺、龟灵铺。^{[2]908}

铺递驻扎有铺兵,负责官府传送军事情报及迎送官员之役,募自民间。明洪武三年(1370 年)福宁设总铺,洪武二十年(1387 年)增设金台等 28 铺,有马夫、抗夫(均属铺兵)151 人。^{[1]1170} 以此为标准计算,每铺 5 人,则总计 295 人。一般铺递到县衙或巡检司、驻军机构等步行 2 天内均可到达,通过这些铺递向各地传递信息和了解掌握各地信息,以实现最好的控制。

综上所述,明初政府在闽东这一区域驻扎有四县共计守城弓兵 1500 人,十二个巡检司大体兵力 656 人,旗兵 7370 人,水寨卫兵 1690 人,铺兵 295 人,合计 11216 人。

三、明初闽东海陆军事布控格局详情

(一) 明初闽东海防布控格局详情

1. 外海建立水军

明政府在福建外洋设立水寨,初惟烽火门、南日山、浯屿,其中烽火门在福宁州,南日山属兴化、浯屿属泉州,后又增二寨,其中小埕在连江。如此增设,沿海水寨布置更为严密的同时加强了闽东的水军实力。

2. 近海筑城建立卫所

明政府在福建沿海卫所防御体系的沿海五卫中,闽东有福宁卫,占 20%;十二千户所,闽东有福宁大金所,连江定海所二所,占 16.7%;四十五巡检司,闽东福宁州有 6 个巡检司,连江有 1 个巡检司,占比在 15.6%。

3. 沿海构建烽燧

明政府在福宁州沿海与陆地交接处构建用于传递信息,沟通海陆的众多烽燧,具体见表 1。

根据表 1 所列,明初政府在福宁县的一都、三都、五都、七都、八都、十都、十一都、十五都、四十一都、四十二都、四十五都、五十一都、五十二都、五十三都等十四都设置烽燧 38 处,驻兵守卫,传达警报,强化海陆交接地带信息传递的作用。

表 1 明洪武二十八年福宁州烽燧部署情况

所在地域	名称
一都	沙松、台澳
三都	赖离、后琦
五都	大青画、小青画、东壁、离智、烽火
七都	梅花
八都	三山、大峰、南金、金家
十都	南岭、白露、水澳
十一都	黄琦、白岩
十五都	沙垵
四十一都	右县
四十二都	长门
四十五都	积石、閭峡、南山、罗浮、赤崎、小南
五十一都	塔尾、下许
五十二都	青山、界石
五十三都	刘金、下簗、车安、石湖、关崎

(二)明初闽东陆地军事布控格局详情

为了更直观地对明初闽东的文、武署的部署情况做全面了解,现对闽东各县行政机构、军屯、铺递、巡检、烽燧等的具体情况分县别进行阐述:

1. 古田县的军屯、铺递、巡检分布

古田县的屯田军有 28 所,分布于五都至十都,十二都至四十四都间;巡检司分布于一都、西溪和三十六都,铺递在县治、一都、二都、七都等地,再加上县治的行政机构和水口关(在古田县南一都)。可以说,古田几乎是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

2. 福宁县的军屯、铺递、巡检、烽燧等分布情况

福宁县有屯田军 10 所,从一都到六都,二十都至二十六都,四十四都至四十六都;巡检司分布于一都、五都、十一都、十二都、四十三都、五十都,铺递在县治、二都、四都、六都、九都、十八都、十九都、二十都、二十一都、二十二都,三十五都、三十六都、三十八都、四十二都、四十三都、五十二都等;烽燧处于一都、三都、五都、七都、八都、十都、十一都、十五都、四十一都、四十二都、四十五都、五十一都、五十二都、五十三都,再加上县治行政机构和沿海水军驻扎,可以说,福宁县几乎是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

3. 宁德县的寺庙、军屯、铺递、巡检分布情况

宁德县有屯田军有 2 所,一所在县南二都飞鸾渡,一所在县西一都白鹤岭。巡检司分布于十五都和赤岩;铺递在县治、二都、十九都等地,再加上县治的行政机构,宁德县部分在直接监控之下。

4. 福安县的寺庙、军屯、铺递、巡检分布情况

福安县有渔溪巡检司,铺递在县治、九都、二十都、二十一都、二十五都、二十六都、二十七都、二十八都等地,再加上县治的行政机构,福安县直接监控之下,其他部分也因为临近地区的文武署机构而属

于有效监督之内。

就内陆总体控制而言,在闽东四个县的 173 个都中,有驻军、军屯、铺递、巡检中兼具其一以上者 102 个,占 57.7%;兼具其二者 22 个,占 12.6%;兼具其三者 2 个占 1.14%。

总之,明政府在沿海建构海防区、组建海军打击倭寇、迁徙沿海居民形成隔离带,形成以海陆交接处为枢纽的四条防线。海陆交接处建造烽燧,沟通海陆信息;烽燧之外,沿海筑城,驻扎着卫所、巡检司;卫所、巡检司之外则为外海水寨,驻扎水军,配备战船,操练水军,主动出击,打击倭寇。为配合海防力量,明政府在闽东的福宁县驻扎屯田军对接沿海烽燧,密切与近海卫所和水寨水军的关系,在古田县西部驻扎屯田军,在南部即宁德一、二都和古田南部驻扎屯田军队,从而形成了一个东西南三面包围的陆地军事大格局。在这一格局的内部通过建立福宁县、古田县、宁德县、福安县等县级行政机构,在要害之处建立巡检司、关隘,并在闽东大地上建立了行走于古官道之上传递信息的铺递,从而形成一个有点、有线、有面,且点中有重点,线有主线,面有实面的东、西、南厚实,县治行政中心坚实,险要地带特置巡检的巨大网络。在这一军事力量控制如此严密的区域,即使有一两处受到侵扰,信息能够即刻被传递至县治所在地,县治所在地会作出反应,或调集周边队伍,或通过福州府协调调集部队对之进行处理,可以在 1—3 天内得到有效解决,这成为海防的有力支撑。海陆联防的战略布局形成了对倭寇强大的打击力度,洪武后期,元末以来的倭患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由此,可以引发我们更进一步思考,明政权之所以在该地设置如此庞大的军事力量,除闽东作为防备倭寇北上、南下的枢纽作用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目的?福建其他地方如闽南、闽中等地海陆布控情况与闽东有何异同之处?中国沿海的其他海防区的海陆布控情况如何等等问题,都有待更进一步的挖掘和探讨。

参考文献:

[1] 宁德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宁德地区志[M]. 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

[2] [明]黄仲昭. 八闽通志(上)[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3] 寿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寿宁县志[M]. 厦门:鹭江出版社,1992.

- [4] 吴廷燮. 都抚年表[M]. 魏连科,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 1982.
- [5] 金安清. 东楼考[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2.
- [6] 郑晓. 吾学编, 四夷考[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0.
- [7] 顾祖禹. 读史方輿纪要(卷九十六)[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8] 明太祖实录[M].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 1962.
- [9] 赵轶峰. 重谈洪武时期的倭患[J]. 古代文明, 2013(7).
- [10] 范中义, 全晰纲. 明代倭寇史略[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11] 赵红. 论明初洪武时期的山东海防[J]. 烟台大学学报, 2005(4).
- [12] 邱富生. 试论明朝初年的海防[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1995(1).
- [13] 陈懋恒. 明代倭寇考略[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 [14] 福州府志[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880.
- [15] [清] 谷应泰. 明史纪事本末(第三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16] [明] 郑若曾. 筹海图编[M]. 上海: 中华书局, 2007.
- [17] 罗青霄. 漳州府志[M].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1965.
- [18] 林校生. 闽东北“畬”“倭”关系初识[J]. 福州大学学报, 2012(3).
- [19] [明] 黄仲昭. 八闽通志(下)[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
- [20] 古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古田县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21] 寿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寿宁县志[M]. 厦门: 鹭江出版社, 1992.
- [22] 柘荣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柘荣县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23] [清] 张廷玉, 等.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24] [明] 王圻. 续文献通考[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 [25] 卢建其. 宁德县志[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3.
- [26] 李拔. 福宁府志[Z]. 宁德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1.
- [27] 徐友梧. 霞浦县志[Z]. 霞浦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6.

(责任编辑 许峻)

On Sea – land Military Defense System in Mindong Under the Early Ming Regime

SUN Shao – xu

(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Institute of Regional Economics, Ningde Normal University, Ningde, Fujian 352100, China)

Abstract: Mindong, located in Fujian and Zhejiang border, has been attacked violently by pirates since Yuan Dynasty. Hongwu’s administration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coastal defense with the stabilization of inland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Many effective measures are taken to construct partition defense, with the beacon tower to the mid – line, guarding post offshore, water stockade villages surrounded by sea, and an excellent team of navy, which led to the defeat of pirates in the late Yuan Dynasty. The inland beacon tower has formed army tuen, county government, inspection that shaped the defense pattern. The event eventually leads to a systematic, comprehensive and efficient naval defense chain. After Hongwu period, the Japanese yen problem has basically solved. The essay tries to illustrate the filed documents for further study.

Key words: Ming regime; Mindong; Hongwu; military

变革型领导的本土辩证逻辑及领导方式的转变路径

张志杰

(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郑州 450000)

摘要:变革型领导作为“舶来”的领导范式,得到了我国学界的普遍关注与研究,部分学者开展了本土的实证检验,但它能否适应中国土壤取决于这种领导行为对其生成逻辑的遵循。本文从本土化理念的视角出发,对危机与情境、当前与长远、外来与本土、盲从与遵从等四个方面对其生成逻辑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在中国本土情境下我国领导干部领导方式的转变路径。

关键词:变革型领导;本土化;领导方式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5.018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5-0085-04

一、引言

“变革型领导”这一概念最早由 Burns 提出^[1], Bass(1985)在其基础上发展了该理论,认为变革型领导通过让员工意识到所承担任务的重要意义,激发下属的高层次需要,建立互相信任的氛围,促使下属为了组织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并达到超过原来期望的结果^[2]。随后, Bass & Avolio(1993)进一步提出了变革型领导模型的四个主要因素,即领导魅力、领导感召力、智力激发、个性化关怀。

最近二十多年,变革型领导理论占据了领导研究的中心地位,已经成为领导理论研究的新范式,是当前最受欢迎和最前沿的领导理论之一^[3],并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分支。变革型领导的研究与实践也得到了国内的广泛关注,并引发学者的研究热情。本文借鉴近年来对变革型领导的研究成果,探讨变革型领导对我国领导干部的文化适应性的辩证逻辑以及打造具有本土化的变革型领导风格的路径选择。

二、变革型领导的本土辩证逻辑

变革型领导是“舶来”的领导范式,本文基于变革型领导的领导魅力、领导感召力、智力激发、个性化关怀的四个维度,结合我国的“本土化”情境,思考从危机与情境、当前与长远、外来与本土、盲从与遵从等四个方面来阐述其在本土的辩证逻辑。

(一)危机与情境

Bass(1999)认为,对于在什么情境下变革型领导行为最有效的认识是极为缺乏的,他建议研究者应该关注那些对变革型领导产生影响的情境因素的研究。也就是说,环境能够迫使领导者改变其领导方式,以适应环境的生存条件。

灾难和危机始终伴随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类就是在不断地与灾难和危机的斗争中成长与发展的。Rosenthal 认为危机是一种严重威胁社会系统基本结构或者基本价值规范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中,决策集团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极不确定的情况下作出关键性决策^[4]。时至今日,公共危机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我国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市场经济发展的配套制度并不健全,政府在将高度集权的具体事务推向市场的同时,相应的配套措施或社会力量并没有跟上,导致政府退出后许多矛盾纠纷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5]。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社会环境将更加复杂多变,使得公共管理者产生了调整组织管理和领导风格以化解危机的现实需求。在这种情境下,变革型领导范式提供了可持续的危机化解方案,满足了我国目前面临的领导能力提升需求。^[6]

收稿日期:2017-09-10

作者简介:张志杰(1973—),男,河南郑州人,管理学博士,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及领导科学。

危机作为一种情境因素,虽然可能对组织的生存与发展产生威胁,但同时也可以为变革型领导风格的形成与效力的发挥充当催化剂。变革型领导者能够在危机处理中担当大任,这与他们和追随者之间形成的特殊关系有关。变革型领导在危机处理中的作用机理表现在:(1)变革型领导的价值观和目标内在化能够为组织确立信心。当危机发生时,下属的信心能够有效预防危机的扩散和稳定人心,而这种信心来源于变革型领导者。Howell & Avolio (1993)研究发现,变革型领导的下属会将领导者的价值观和目标内在化,接受领导者的价值观,从而下属将会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去追求领导者所提出的使命和目标。目标内化的价值观就会形成彼此的信任和激励,从而这种信任和激励就会形成化解危机的力量,以此去化解危机。(2)变革型领导者具有令下属心悦诚服的特质或行为,因而成为下属的角色典范,得到下属的认同、尊重和信任,能为下属指明方向与恢复信心。变革型领导的特征满足了追随者的愿望,他们愿意模仿并追随领导者,从而在组织中形成凝聚力。在危机出现时,变革型领导能够凝聚组织的力量,共同抵御危机的发生。(3)变革型领导通过强大的个人魅力,感染周围的群众。在危机情境下,群众的相对剥夺感是一种潜在的心理行为,这种行为如果得不到及时控制,就会像火山一样爆发,极大地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变革型领导以个人的感染力激发追随者的热情,勇于面对困难与挑战。

(二)当前与长远

长远发展离不开当前的客观存在。“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领导干部只有着眼当前、立足当下,经济社会的发展才能更长远。同时,领导者应具有前瞻性的战略视野,能够兼顾当前与长远,给组织发展指明方向,确立组织发展目标。变革型领导通过为下属提供有意义并且富于挑战性的工作、对组织成员表达较高的期望、采取积极乐观的工作态度,使他们在乐观与希望中展望未来的发展。变革型领导是具有绝对人格力量的人,关注组织的未来方向,能够为追随者确立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愿景,使追随者产生极度强烈的忠诚、激情和献身精神。我国传统文化伦理赋予了领导者神圣的权威形象和强大的号召力,这符合变革型领导的特点。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就是在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当前与可持续发展的辩证关系,在我国锦标赛体制下

领导追求以GDP为目标的粗放式发展转变为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变革型领导风格着眼于组织未来发展的愿景,与可持续发展的规律高度契合。为此,我们的领导干部应具有这种能为下属提供清晰的、有感染力的、能对他们产生激励作用的领导风格,确立着眼于组织长远发展的目标和愿景。各级领导干部在制定政策时应该充分考虑地区长远发展的实际,不能制定不切合实际、脱离科学发展的政策,实现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革和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制度,不再简单地把经济增长速度与干部的德能勤绩廉划等号,上级政府也不能把经济增长速度作为提拔干部的唯一依据。根据领导归因理论,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使得领导干部确立的愿景与发展规划符合客观实际,切实做到和谐发展。

(三)外来与本土

领导行为应该是镶嵌在特定文化中的一种特殊现象,领导的内涵、领导作风及效果必定受文化的影响(Hofstede,1980)^[7]。纳哈雯蒂指出,领导者的归因模式会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8]。Avolio & Bass (1988)指出,集体主义倾向会促使个体支持组织的目标与价值观,从而使得变革型领导有效地聚合下属的目标和价值观,以形成属于整个组织的愿景,极大地提高变革型领导行为的效能。变革型领导强调领导者的道德品质,面对有魅力的领导者,追随者会更加崇敬、尊重、信任和认同。

中国社会是一个差序格局、关系取向的群体社会。几千年文化传承中,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为官者历来提倡“为政以德”,要求领导者注重自身道德修养,行为正派。“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化是“从文化”,这种文化有利于凝聚组织力量,有利于组织的团结和注重集体利益。这种集体主义的文化氛围为变革型领导风格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儒家中庸思想主导的社会心理和行为导向有时被曲解为对独立创造力和个性化的扼杀。尤其在当前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环境下,变革型领导者更应注重对下属创新创造发展活力的鼓励和支持。

人情社会也是中国社会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人情社会的文化背景下,领导干部容易与下属形成团结互助的文化氛围,但由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制度可能会成为摆设。与西方对规则和契约的遵循相比,中国社会处理事情往往难以避免依

靠人情、托关系的情况。这种社会文化要求变革型领导在管理社会事务时,避免被人情关系网缠绕,依照制度设计和法律规定治理社会问题。

(四)盲从与遵从

盲从和遵从的根本区别在于,下属在服从领导决策的同时是否拥有独立的思考、见解和判断。在Bass看来,当下属受到变革型领导的激励后,会提高工作热忱与动机,并彻底改变对工作的态度;下属会做出自我牺牲并超常努力,以提高工作效能^[2]。变革型领导使追随者接受领导者的感召,认同领导确立的目标并渴望模仿其领导者的行为,而追随者在这一遵从的过程中,容易从感情上屈从于领导者的决策,有时忽略了独立思考,短视了决策的对与错,导致盲从行为的发生。假如下属没有对领导所做出的决策进行科学思考和判断,并且不能及时指出领导的错误之处,那么决策失误带来的损失将无法挽回。孔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当追随者发现领导者的决策确实不符合现实或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应及时提醒和纠正。假如变革型领导者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他所确立的组织目标与愿景是经过科学决策的,并且这种决策还处于监督之中,这样追随者就会遵从领导者的决定,并与领导者一道完成共同确定的使命。

变革型领导更多地扮演了自下而上的功能,强调了对下属精神和智力的支持,通过授权等让下属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与展示,而下属也会更加积极主动和热衷于参与,不仅仅是执行领导者的指令。中国传统的管理文化则偏向于自上而下的领导,大多强调了对权威的尊崇,这种权威主义下的领导者往往表现出权威、仁慈的领导行为,下属则表现出敬畏顺从、感恩图报以及认同的效法行为。这种权威造成下属对领导的决定唯命是从,不敢对领导的决定说“不”。因此,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我们对领导干部的个人“魅力”不能过分尊崇和过度崇拜,更不能过度神话领导威权的作用,而应根据实际执行领导的决策。

三、本土情境下领导方式的转变路径

变革型领导在我国具备了一定的文化土壤,但还应拥有恰当的培育方式,使其在社会管理实践中生根发芽,使我国的领导干部真正转变领导方式以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

(一)德行为魂,要加强道德修养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儒家思想将“为政以德”作为治国理政的最高理念,其核心就是应加强领导者的个人道德修养。

公共管理者要想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并获得追随或认可,必须具备高尚的品德,就像孔子所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我国选拔干部的根本原则,它突出了个人道德的重要性。变革型领导努力重塑下属的个人价值观和自我意识,并将下属的需求和抱负推向更高水平。领导干部要不断加强自身道德的修养,端正自身,以身作则。一些领导干部因贪腐而被查,究其原因,主要原因是领导个人道德的缺失,导致他们罔顾法律,丧失集体性道德意识,引发伦理道德失范行为乃至集体性权力寻租行为。为此,领导干部应按照中央“三严三实”教育活动的要求,不断提升个人道德素养和自身素质:一是将道德教育纳入领导干部教育培训的长期计划,作为一门主要课程进行培训。“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领导干部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带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带领群众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清明的政治生态;二是对领导干部进行严格管理,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加强反腐制度建设和干部监督,尤其是加强对领导干部财产的适时监督,以减少领导干部寻租空间;三是定期进行反腐倡廉的教育,重塑公共领域的伦理制度体系建设。

(二)能力为基,不断提高处理公共危机的能力

突发性自然灾害和社会群体性事件等公共安全危机时刻考验着公共管理者的执政能力。如果危机事件不能及时得到有效控制,其危害将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变革型领导能够使得群众价值观内化一致,从而形成化解危机的强大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危机一旦发生,领导者依靠其强大的个人魅力和战略洞察力,能够聚集人心和士气,树立克服困难的勇气,及时获取各方的支持,从而带领大家迅速平息、妥善解决危机。为此,领导者要不断提高处理公共危机的能力:一要对危机及时进行评估预警,及时掌握各类信息;二要广泛依靠群众,使参与处理危机的部门、单位协调一致,形成合力,尽快处置;三要积极做好善后工作。

(三)思维为标,拓展具有前瞻性的思维

领导干部所确立的目标、决策应充分体现出前瞻性,也就是目标和决策要有科学性。影响领导前瞻性的因素主要有组织权利、习惯、知识素养等。前瞻性对领导干部来说,就是具有战略眼光、国际视野的特点。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领导干部应充分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严格依据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办事。反过来,前瞻性不是脱离现有的实际

情况,比如政府所制定的公共政策必须符合现有实际情况,否则这种前瞻性就是无序的“大跃进”。谨记孔子所言:“无欲速,未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四)作风为钢,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群众路线是我党致胜的法宝。实践证明,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及我国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关键是坚持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关系。反之,不依靠群众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受挫折,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公共决策和社会管理中,领导干部应从“以政府为中心”向“以人民为中心”转变,凸显人性化管理,倾听群众意见和呼声,了解群众疾苦,使群众真正参与到公共管理中来,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的基本问题,实现社会公平。领导干部转变工作作风,应该从被动回应群众到主动邀请群众积极参与社会管理。搞好干群的伙伴关系,领导干部首先应该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积极开展网络问政,主动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其次,应致力于领导干部与群众彼此之间的信任,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与协调。

(五)担当为本,弘扬敢于负责的传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敢于坚持原则,并带头示范、以上率下。一是坚持不断创新。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大数据对现代社会的广泛渗透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挑战,同时其先进的技术和平台也为改革提供了革命性的工具。面对环境的复杂性,领导干部要主动适应环境的变化,积极制定有关政策与措施,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敢于克难攻坚。领导干部要以问题为导向,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认真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群众对公共产品的需

求不断增多,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对于社会治理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就需要领导干部发扬知难而进、勇于负责的精神,团结带领干部群众克服困难,想方设法解决问题。三是坚持不断学习。大数据时代,有的领导干部面临着“本领恐慌”,这就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培训,以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在培训内容上,重点培训互联网知识、领导力提升等方面的内容;在培训重点上,重在培训处理公共危机的能力和公共治理的能力。

参考文献:

- [1] Bass B M, Bass R. The Bass Handbook of Leadership: Theory, Research, and Managerial Applications [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2008.
- [2] Bass B M. Leadership and performance beyond expectations [M]. New York: Free Press. 1985.
- [3] 于博,刘新梅.“揭开黑箱”:变革型领导中介变量的研究现状与展望[J]. 心理科学进展. 2009(1).
- [4] Uriel Rosenthal, etc. Coping with Crisis: the Management of Disasters, Riots, and Terrorism. Springfield, Illinois: Charles C [M]. Thomas Publisher Ltd, 1989: 10.
- [5] 刘米娜,杜俊荣. 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政府信任研究: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分析[J]. 公共管理学报, 2013(2): 64 - 74.
- [6] Bass B M, Avolio B J.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Development: Manual for the Multifactor Leadership Questionnaire [M]. California: Consulting Psychologists Press, Inc. 1990.
- [7] Hofstede G. Motivation,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 Do American theories apply abroad? [J].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1980(1): 42 - 63.
- [8] [美]安弗莎妮·纳哈雯蒂. 领导力[M]. 2版. 王新,译. 北京: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3: 159 - 162.

(责任编辑 许峻)

The Local Dialectic Logic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the Leadership Transform Method

ZHANG Zhi - jie

(Zhengzhou Preschool Education College, Zhengzhou 450000, China)

Abstract: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is a borrowed leadership paradigm and it gets great concern in Chinese academic field. Some researchers apply the local test to it, and this is the only way to see if it fits China. In this paper, from the view of localization, we analysis its inside logic in four aspects, such as crisis and circumstance, current situation and long - term development, foreign scope and domestic scope, blindly obedience and submission. Then we give advice to leadership transform in China.

Key word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localization; leadership

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的诗学风格

张白桦, 胡雅洁

(内蒙古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呼和浩特 010080)

摘要:诗学由一个文学概念被后人引入到翻译学当中进行研究,译者进行翻译活动时都会有不同的诗学风格,本文以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为研究对象,从诗学主题、文学样式和原型人物角度讨论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时在译本选择和翻译策略上的诗学考量,以及诗学因素促使译者翻译时做出的调整。

关键词:诗学;翻译;林语堂;《浮生六记》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5.019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5-0089-04

一、引言

“诗学”起初是一个文学概念,最早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其目的是为了了解什么是诗歌,包括戏剧。后来,诗学的概念由英国翻译理论家莫娜·贝克(Mona Baker),美国翻译理论家威利斯·巴恩斯通(Willis Barnstone)等人相继作了深入的研究和阐释,从而把“诗学”的概念由文学引入到了翻译学。本文主要从诗学的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微观层面的文学要素有文学样式、主题和原型人物等,宏观层面则是从文学的功能出发,主要指文学在社会系统中起到什么作用。

《浮生六记》是由清朝作家沈复所著的一部自传体散文。该书以作者的夫妇生活为主线,描述了作者与妻子陈芸从情投意合,结为连理,到后来由于封建礼教和贫困的压迫与煎熬,最终理想破灭,陈芸死后作者开始游历各地。1935年,《浮生六记》首次由林语堂英译,至今共再版六次,是这本书再版次数最多的英译版本。林语堂对这对夫妻知足常乐、恬淡自适的生活感动至深。从林语堂选择翻译《浮生六记》到他具体的翻译过程中一些对于原文的调整都可以用诗学因素来解释。本文将林语堂《浮生六记》英译本为研究对象,探析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的诗学风格。

二、微观诗学要素:文学要素

诗学中的文学要素包括文学手法、文学样式、主题、原型人物、情节和象征等,即微观层面上的文学特征。翻译不仅仅是文字层面的转换,由于目的语和源语之间存在很多文化层面的差异,如果译作想要在译入国家被读者接受,就需符合译入语国家的主流诗学。从微观层面上,影响翻译活动诗学风格的因素有很多,该部分将重点从诗学主题、文学样式和原型人物角度讨论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时在译本选择和翻译策略上的诗学考量。

(一)诗学主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经济受到了严重打击,开始兴起了“西方衰落”的思潮。20世纪30年代,现实主义成为了西方国家的主流诗学,现实生活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西方国家经济上的严重衰落,导致人们精神上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为了寻求安慰和解脱,西方人开始关注东方文化,关注东方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试图从东方文化中得到精神上的释放。

1935年,林语堂首次将清朝的小品文《浮生六记》进行英译。当时的中国正在大力倡导白话文运动,同时将西方文学作品汉译引入中国,很少有人将中国文学译出。此时林语堂选择英译《浮生六记》

收稿日期:2017-08-20

作者简介:张白桦(1963—),女,辽宁沈阳人,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译介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显然与中国的主流诗学不符,但他的选择却符合了译入语国家的主流诗学,因为关注现实生活、寻求精神上的解脱正是当时西方国家的诗学主题。而《浮生六记》这样一部描写中国寻常夫妇居家生活和作者浪游各地的自传体散文,主要是作者抒发己情,传达一种安逸闲适的生活方式和怡然自得的处世态度,这恰好是当时西方人所追求的理想主题。林语堂在翻译《浮生六记》时,对译文做出的一些调整是符合译入语国家诗学风格的。例如:

芸不善饮,强之可三杯,教以射覆为令,自以为人间之乐无过于此矣。^{[1]18}

Yun could not drink, but could take at most three cups when compelled to. I taught her literary games in which the loser had to drink. We taught there could not be a more happy life on earth than this. ^{[1]19}

原文描写作作者夫妇二人在沧浪亭避暑时夫妻之间的日常乐趣,这种安逸闲适的生活是作者认为的人间之乐,也是当时西方国家所追求的理想主题。然而在一些中西方文化有差异的地方,林语堂在翻译时做出了调整,如例句中“射覆”被译为“literary games”。“射覆”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字类的酒令,这对于西方国家的人们来说是陌生的,而林语堂将它做了归化的处理,翻译为“literary games”即“文字游戏”,这样的改写使西方读者更能够接受,符合他们主流诗学的诗学主题,从而可以更顺畅地传播到译入语国家。

是时风和日丽,遍地黄金,青衫红袖,越阡度陌,蝶蜂乱飞,令人不饮自醉。^{[1]118}

The sun was beautiful and the breeze was gentle, while the yellow rape flowers in the field looked like a stretch of gold, with gaily dressed young men and women passing by the rice fields and bees and butterflies flitting to and fro—a sight which could make one drunk without any liquor. ^{[1]119}

原文是描写作作者与友人相聚,大家相约外出赏花作乐时的情景,这正符合了当时西方读者所追求的诗学主题。但是原文中“黄金”“青衫红袖”等都是对风景和人物的暗喻,如果直接翻译为“gold”和“blue dress and red sleeve”那么必然会引起西方读者的误解。林语堂在翻译时做出的调整能更好地向西方读者传递这个诗学主题。林语堂在翻译时把“黄金”“青衫红袖”等词直接解释了出来,这样一来,西方读者的理解障碍就减少了许多,也符合当时

的主流诗学。

(二)文学样式

文学样式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学体裁,常见的有小说、诗歌、剧本、散文、寓言等,中国古代的文学样式有赋、骈文、说、论、杂记、游记等。不同的文学样式也会影响译者的翻译活动,并且文言文的表达方式与用词等方面有许多与白话文不同的地方,这些都需要译者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对原文进行调整。

沈复的《浮生六记》属于古代文学样式中的杂记,也是一部用文言文书写的自传体散文。杂记的特点是篇幅短小,内容丰富,以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为主要内容。林语堂选择翻译的《浮生六记》比较容易被西方国家读者所接受,并且与当时西方国家的主流诗学也是符合的。然而,《浮生六记》著于清朝,通篇为文言文,林语堂却是现代翻译家,再加上英语与汉语语言形式的差异,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必然要对原文进行调整。例如:

时吾父稼夫公在会稽幕府,专役相迓,受业于武林赵省斋先生门下。^{[1]14}

At this time, my father Chiafu was in the service of the Kueich' i district government, and he sent a special messenger to bring me there, fo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during this time, I was under the tutorship of Chao Shengtsai of Wulin [Hangchow]. ^{[1]17}

原文中“幕府”“武林”都是现代汉语中不再使用的词语,在西方国家中属于词汇空缺的文化词。“幕府”指明清时期的督府衙门,其职能相当于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因此林语堂在翻译时将“幕府”译为“district government”,这样就符合了译入语国家的文学形式,使西方读者能够读懂并接受。“武林”是“杭州”的旧称,在林语堂所处的时代,人们对“杭州”都比较熟悉,而对于“武林”,恐怕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它也是个地名,更不用说西方读者了。于是林语堂在“Wulin”后注上了“[Hangchow]”,以便于西方读者理解和阅读。

桥南有莲心寺。寺中突起喇嘛白塔,金顶缨络,高矗云霄,殿角红墙,松柏掩映,钟磬时闻;此天下园亭所未有者。^{[1]230}

On the south of the bridge there was the Lotus - Seed Temple, with a Tibetan pagoda rising straight up from its midst and its golden dome riding into the clouds, with the terracotta walls and temple roofs nestling under the kind shade of pine - trees and cy-

presses and the sounds of temple bells and ch'ing [musical stone] coming to the traveler's ears intermittently—all combining to achieve a unique effect that could not be duplicated in any other pleasures garden of the world. [1]231

原文的两句话主要是描写莲心寺的景色,语言精练短小,每小句不超过九个字。这种简洁的语言表达是符合中国人的审美的,但西方读者未必认可。林语堂将原文的两个句子在翻译时合并为一个长句,结构清晰而又紧凑,同时也将莲心寺的美景形象地表达了出来,这样的文学形式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口味。这样的调整符合译入语国家的主流诗学,亦可使译入语国家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三)原型人物

原型人物是文学作品中笔墨最浓,集中了作者绝大部分正面情感和精力的主人公,是经典的、将近完美的人物角色,多设定为文学作品的主角。[2]59 原型人物往往也是译者选择译本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浮生六记》中,沈复笔下的芸娘通情达理,温婉动人,又富有生活情趣,简直是作者眼中接近完美的妻子。而林语堂对于芸娘的赞赏与倾慕更是毫不掩饰,在《浮生六记》的译者序中,林语堂开头第一句话便这样写道:“芸,我想大概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女人。”[1]X111 对于原型人物芸娘的喜爱,或许也是林语堂选择翻译《浮生六记》的原因之一。芸娘的人物形象不仅符合译者林语堂个人的诗学风格,也符合当时西方国家的主流诗学。芸娘的人物形象并不像当时典型的封建妇女,她既聪明又要强,个性之中潜藏着反礼教的精神,追求自由,崇尚自然,这些特点都是符合西方读者的审美与主流诗学的。选择翻译以这样的原型人物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译作能够尽可能多地被译入语国家读者所接受。而林语堂在向美国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时,也经常将中国文化中的女性形象做中西合璧式的改写。[3]46 例如:

……但李诗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种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爱。[1]20

…but Li Po's poems have the wayward charm of a nymph. His lines come naturally like dropping petals and flowing waters, and are so much lovelier for their spontaneity. [1]21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而芸娘却能品评诗句,从她喜爱的诗人可以看出她追

求自由,崇尚自然,这样的原型人物在西方国家是受追捧的。林语堂在翻译时为了突出这样的形象和缩小文化差异,对原文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他将中国古代的神话人物“姑射仙子”翻译为“the wayward charm of a nymph”,对“姑射仙子”做了解释,缩小了文化差异,并且在译文中加入了如“wayward”“naturally”“spontaneity”等词,这样也突出了芸追求自由,崇尚自然的人物形象。这样的原型人物符合当时西方国家的主流诗学,更能够得到西方读者的认同与接受。

珠乃纯阴之精,用为首饰,阳气全克矣,何贵焉? [1]44

For a woman to wear pearls would be to leave no room for the male principle. For that reason I don't prize them. [1]45

作为一个东方女性,芸娘具有中国古代妇女鲜有的果敢与无私。原文中作者堂弟结婚时,新娘缺一对珠花,芸娘立刻将自己结婚时婆婆送的珠花拿出来给了堂弟媳,这样的人物性格在西方是受到认可的。林语堂在翻译时将问句“何贵焉?”改为肯定句“I don't prize them.”这样的翻译使得译文的语气更加强烈,芸娘果敢无私的个性更鲜明,原型人物的特点更加突出。

三、宏观诗学要素:功能要素

诗学要素从宏观层面上看,主要是指文学的功能,即在社会系统中,文学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或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功能要素对译者选择译本和翻译策略同样重要,译者选择的译本符合当时译入语国家社会的主流诗学,译作才会被译入语国家读者接受,才会引起译入语国家的重视。当译入语文化的接受者尚未产生了解译出语文化全貌愿望的时期,倒可能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希望窥一斑而见全豹,此时如果译者做出相应的调整,可以达到在文化层面上进行阐释、交流、传播的目的。[4]73

社会体制决定特定社会时期的主流诗学,一旦主流诗学发生变化,某些作品能够在短时间内被擢升到“经典”的地位。[5]19 林语堂翻译《浮生六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时西方经济受到了重创,社会上兴起了“西方衰落”的思潮。西方国家的读者渴望在精神上寻求解脱,于是他们开始将目光投向外界,投向了东方文化,试图让现实生活中的压力在东方文化里得到释放和缓解。此时就需要文学发挥解脱心灵、缓解压力、作为精神支柱的作用。《浮生六记》正是描写中国寻常夫妇生活与作者浪游各地的文学作品,作品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中国人安逸闲适、

怡然自得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在当时西方国家的社会背景下,这样的文学作品无疑符合西方读者的期待,而林语堂对于原作的一些调整,同时在文化层面上也有将译出语文化阐释、交流和传播的功能。例如:

是年冬,值其堂姊出阁,余又随母往。^{[1]6}

In the winter of that year, one of my girl cousins, (the daughter of another maternal uncle of mine) was going to get married and I again accompanied my mother to her maiden home.^{[1]7}

原文中的“堂姊”一词,在林语堂的译文中翻译为“girl cousins”,但他却在后面加上了“the daughter of another maternal uncle of mine”并且用括号括起来。括号里的内容是原文中没有的,是译者增译出来的。由于中西方存在文化上的差异,译者的增译能够让西方读者读懂原文所表达的意思,符合译入语国家的主流诗学。

合卺后,并肩夜膳,余暗于案下握其腕,暖尖滑腻,胸中不觉怦怦作跳。^{[1]10}

After the drinking of the customary twin cups between bride and groom, we sat down together at dinner and I secretly held her hand under the table, which was warm and small, and my heart was palpitating.^{[1]11}

“合卺”是一种中国古代汉族婚礼仪式,指新婚夫妇在结婚当日的新房内共饮合欢酒,而在西方并没有这样的习俗,如果直接翻译出来可能导致西方

读者看到后一头雾水,这也是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所在。因此,林语堂将“合卺”翻译为“the drinking of the customary twin cups between bride and groom”直接将“合卺”的意思解释了出来。这样就有阐释和传播译出语文化的作用,也使得译入语国家的读者更容易理解与接受,符合了西方国家的主流诗学,发挥了文学应有的功能。

四、结语

本文以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为研究对象,通过从诗学的微观层面以及宏观层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诗学因素中的诗学主题、文学样式和原型人物等文学要素和功能要素会影响译者选择译本和翻译策略过程中的诗学风格,译者对原文做出的调整也可以用诗学因素来解释。林语堂英译的《浮生六记》堪称经典,本文的研究旨在为今后中国的典籍英译提供一个个案参考。

参考文献:

- [1] 沈复. 浮生六记[M]. 林语堂, 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 [2] 米亚宁. 浅论翻译与诗学[J].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2).
- [3] 杨柳. 翻译的诗学变脸[J]. 中国翻译, 2009(6).
- [4] 张白桦. 翻译基础指津[M]. 北京: 中译出版社, 2017.
- [5] Lefevere And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2.

(责任编辑 谢春红)

Poetics Style of the English Version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Translated by Lin Yutang

ZHANG Bai - hua, HU Ya - ji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ohhot 010080, China)

Abstract: Poetics is a literary concept, then it is introduced into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ors' translation activities have different poetics styles. This thesis' s study object is Lin Yutang' s translation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and it discusses poetics thoughts of his choices of translation version and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motifs, genres and prototypical characters, and some poetics factors require translators to make some adjustment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 poetics; translation; Lin Yutang;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从《英汉翻译教程》的若干译例看英译汉的技巧

刘钦荣,牛巧红

(郑州师范学院 文学院,郑州 450044)

摘要:开展《英汉翻译教程》中的译例点评工作,既有利于对教材的理解和掌握,也有益于英汉翻译教学。英译汉不仅要掌握两种语言的语法结构规律、文通句顺,更要明晰两种语言的文化基础、英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表达艺术。

关键词:《英汉翻译教程》;翻译技巧;直译;意译;通达;雅致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5.020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5-0093-04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0年9月出版的《英汉翻译教程》^[1]是我国高等院校通用的一本翻译教材,30多年来为英汉翻译教学作出了巨大贡献。该书通过英汉两种语言的对比和大量译例,介绍了英语汉译的一系列常用方法和技巧,对翻译工作者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遗憾的是,书中有些译例在忠实通顺方面存有一些问题。本文选取若干译例加以评点,从而说明一个问题,即我们以汉语为母语的译者首先要对汉语有敏锐的语感,还要精通汉语的语法,要对自己的译文吹毛求疵,精益求精,这样才可能译出地道的汉语句子。下面我们举些译例,逐一加以评点。

(1) “Did you at least total the guy that hit you?”^{[1]22}

对那个揍你的家伙,你至少已经向他报复了吧?

该句中的“向他”跟“对那个揍你的家伙”重复,应删去“向他”。意思是:“你对那个揍你的家伙报复。”

(2) He favored the efforts' to improve relations with all peaceloving countries.^{[1]70}

他赞成为了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改善关系而进行努力。

该句中的“进行”跟“努力”不搭配,应删去“进行”。原文中本来没有“进行”字样,是《教程》用黑

体字形增译的,反倒弄巧成拙。

(3) It was said that someone had sown discord among them.^{[1]109}

据说有人在他们中间搞挑拨离间。

该句中的“搞”跟“挑拨离间”不很搭配,应删去“搞”字。

(4) The vague restlessness since boyhood remained.^{[1]75}

从小就有的那种模糊的不安定状态依然存在。

该句中的“依然”跟“还”重复,应删去“还”字。此外,句中的“状态”是《教程》用黑体字形增译的。“不安定状态”不如“不安定感”准确。

(5) We place the highest value on our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1]59}

我们最高度地珍视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

该句中“最高度地珍视”里的“最”不能修饰“高度”,应删去,或把“最高度地”改为“极为”,说成“极为珍视”。这是凭语感理解的;从语法上如何解释呢?查王还先生主译的《简明汉英词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高度:(形)highly to a high degree(attributive or adverbial adjunct only)。”请注意括号里的说明:只用于定语或状语。汉语语法管它叫非谓形容词或区别词,即这种形容词不能作谓语。

收稿日期:2017-08-29

作者简介:刘钦荣(1965—),男,河南太康人,郑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现代汉语语法、对外汉语语法教学。

非谓形容词一般是没有什么比较级和最高级的。因此不能说:“最高地珍视”。而“飞机飞行的最高度”中的“高度”则是名词。

(6) After Aunt Lena had heard about the family trouble, she agreed to look for a job. ^{[1]35}

丽娜姨听见了家庭的困难情况后,同意去找工作。

该句中的“听见”与“情况”搭配得不恰当,应把“听见”改为“听说”或“听到”,会更合适些。

(7) Even Fulbright (富布赖特), who was an old friend of his, was showing signs of independence. ^{[1]144}

甚至他的一位老朋友富布赖特也露出了要闹独立性的样子。

该句中的“性”字应删,不能说“闹独立性”,只说“闹独立”。其所以会译为“(闹)独立性”,大概是因为原文用的名词。

(8) Reading makes a full man; conference ... a ready man; writing ... an exact man. ^{[1]72}

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智,写作使人准确。

该句中的“准确”与“人”语义上不搭配,因为不能说“人准确”。“准确”似可改为“严谨”,译成:“写作使人严谨”。

(9) Out of sheer joy she waved. ^{[1]119}

她出于纯粹的高兴,才挥了挥手。

该句中“纯粹的”与“高兴”搭配得不恰当,一般不说“纯粹的高兴”。应改为“她纯粹出于高兴。”

(10) His arrogance made everyone dislike him. ^{[1]75}

他的傲慢态度使谁也不喜欢他。

该句显得别扭,语法上似乎不通,问题出在“谁”字上:它一般不做“使”字的兼语。其实,只需说成:“他的傲慢态度使人不喜欢他”,不必硬用强调说法。

(11) Home after seven years. Home. The word had meant so much to him. ^{[1]119}

家,阔别了七年的家,这个字对他多亲切呀!

这是个常见的典型病句。应改为:“这个字对他来说多亲切呀!”应注意:“对……来说”的“来说”丢不得。因为“对……来说”表示从某人某事的角度来看,丢掉“来说”,“对……”则表示对待某人某事,“对”字后的词语从意念中的主动者变成被动者,语义大相径庭。

(12) The landing was designed to cut the peninsula in two. ^{[1]54}

“cut ... in two”译成汉语是“把……切成两

块”,对应于固定短语是“一分为二、一切为二”。《教程》把该例译成“登陆的目的是要把该半岛一切为两”显然别扭。应注意“两”和“二”的不同用法。此外,《教程》中“犹予”^{[1]68}和“世外桃源”^{[1]78}以及“园柱”(column)^{[1]48}均有误字,应分别改为“豫”“源”“圆”。

(13) He squeezed his sister too and gave her a gentle push. ^{[1]71}

例中有两个动词“squeezed”和“gave”是连着说的,并且也很对称。《教程》把此例译成:“他也捏了一下他的妹妹,并且把她轻轻推了一下。”明显不够顺畅,原因是后半句用了“把”字句。英语中没有“把”字,汉语中有,但有使用条件。该例后半句若译成“并且轻轻推了她一下”,不用“把”字句与前半句的句式一致,似乎更显顺畅些。

(14) We were shocked by his coarse manners. ^{[1]12}

我们对他的粗暴态度感到震惊。

该句原文是被动语态,译文用被动句更顺畅些。译成:“他的粗暴态度令我们感到震惊”。主动句中,“我们对他的粗暴态度”有歧义:一是“我们对他”做定语,二是“他的粗暴态度”做“对”的宾语。放在全句中当然是后者,但是人们理解句子是试误加领悟的过程,读完全句才能得到正确理解。

(15) They signed two agreements that served to warm up the atmosphere of their relations. ^{[1]55}

例中的“warm up”对应汉语可有多词语。如果把例句译成:“他们签订了两个协定,目的是使他们的关系热乎起来。”虽然能够理解,但不够纯正。其中的“热乎”过于口语化,与整句语体不协调,宜说成“亲热”。再比如把“knife, scissors and what not”译成“刀子啦,剪子啦,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1]263}就显得不协调,不如译成:“刀子、剪子什么的”。

(16) Party officials worked long hours on meagre food, in cold caves, by dim lamps. (A. L. Strong) ^{[1]50}

例中“on meagre food”“in cold caves”“by dim lamps”如何翻译? 这得既合乎汉语习惯,又要忠实原文。《教程》把例句译成:“党的干部吃简陋的饮食,住寒冷的窑洞,靠微弱的灯光,长时间地工作。”这倒不如分别在“吃”“住”“靠”后分别加上助词“着”,成为“吃着、住着、靠着”,更为忠实原文、更为顺畅。因为加上“着”字,成为扩展了的连谓式,前三部分表示后一部分“工作”的方式条件。试比较下面两句:“党的干部吃简陋的饮食,长时间地工

作。”和“党的干部吃着简陋的饮食,长时间地工作。”可见,一个“着”字便见高低。

(17) Talking with his son, the old man was the forgiver of the young man's past wrong doings. ^{[1]47}

在和儿子谈话时,老人宽恕了青年人过去所干的坏事。

《教程》用的是状语“在和儿子谈话时”,若改用分句“同儿子进行交谈”,则更忠实原文。译成:“同儿子进行交谈,老人宽恕了这个青年人过去所干的坏事。”

(18) May I extend my heartiest congratulations to the great Chinese people and its Communist Party, through you, for the glowing success of your tremendous revolution, which is now inspiring the world. ^{[1]76}

让我通过您最衷心祝贺伟大的中国人民及其共产党,祝贺你们的巨大革命的辉煌胜利,这个胜利正在鼓舞着全世界。

该句中的“中国人民及其共产党”宜说成:“中国人民及中国共产党”。英语习惯于用代词替代,而汉语习惯于重复名词。再如:

(19) She loved giving orders to the servants and they loved obeying her. ^{[1]90}

她喜欢对仆人们发号施令,他们也爱听她指挥。

该句宜译成:“她喜欢对仆人们发号施令,仆人们也爱听她指挥。”

(20) My work, my family, my friends were more than enough to fill my time. ^{[1]70}

我干工作,我做家务,我有朋友往来,这些占用了我的全部时间。

该句宜译成:“我干工作,做家务,跟朋友往来,这些占用了我的全部时间。”汉语习惯于不用代词,尤其是不过多地重复代词。再如:

(21) Restow was about to become, for lack of anyone or anything better, a very influential intellectual—the wrong man at the wrong place with the wrong idea. ^{[1]60}

因为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人,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于是罗斯托就要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了,这真是在错误的地方任用错误的人去实行他的错误主张。

按汉语的习惯,该句中的两个“他”都宜去掉。全句改译为:“因为找不到更好的人,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于是,罗斯托就要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了——一个在错误的位置上具有错误主张的不适当的人。”又比如:

(22) The footmen were as ready to serve her as they were their own mistress. ^{[1]73}

仆人们愿意服侍她,就像他们愿意服侍他们的女主人一样。

该句可以去掉一个“他们”,译成:“仆人们愿意服侍她,就像愿意服侍他们的女主人一样。”

(23) He didn't succeed in ringing her up, for he dialed the wrong number. ^{[1]59}

他没有给她打通电话,因为他拨错了号码。

该句更符合汉语习惯的译法是:“他给她打电话没通,因为号码拨错了。”汉语的特点是洗练,讲究语义上的意念,而英语更注重形式,要求结构上的完整,这突出表现在代词做定语。例如英语“I put my hand into my pocket.”译成汉语是:“我把手放在兜里。”而不是:“我把我的手放在我的兜里。”再如:

(24) They have not done so well ideologically, however, as organizationally. ^{[1]58}

但是,他们的思想工作没有他们的组织工作做得好。

该句中第二个“他们的”宜删。

(25) She tried her best to right her husband from the charge of robbery. ^{[1]43}

她尽力为丈夫被控抢劫申冤。

该句可译成:“她尽力为她丈夫被控抢劫申冤。”

(26) The doctor began to work as soon as he came to the front. ^{[1]154}

医生一到前线,他就立刻开始工作。

这种句子中的“他”与“医生”可以同指一个人,也可以不是同指一个人。按汉语的习惯,应译成:“医生一到前线,就立刻开始工作。”因为“他”所指不明,去掉后反倒明确。

(27) Holmes struck another match when he approached. ^{[1]154}

当霍尔摩斯挨近的时候,他又划了一根火柴。

和上例同理,“他”宜删去。改成:“霍尔摩斯挨近的时候又划了一根火柴。”

(28) Smith fell down when he ran fast to meet them. ^{[1]154}

当史密斯跑得很快去会见他们时,他摔倒了。

照汉语习惯,全句改成:“史密斯跑得很快去会见他们时摔倒了。”

(29) The earth rotates as it travels through space. ^{[1]154}

当地球通过太空时,它在转动。

照汉语习惯,全句宜改成:“地球通过太空时自身在转动。”

限于篇幅,本文不过多地举例评点。其实,在大量的译例当中有个别的句子欠妥,实属难免。况且这又牵涉到直译、意译以及保持原文风格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关于直译和意译问题,记得叶圣陶先生认为无所谓直译意译,翻译就是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最合适的句子来传达原文的意思。叶老说:“一方面保持着原作的美质,一方面融化为我国的语言,是翻译家的义务,也是翻译家的愉快。这跟‘直译’‘意译’的说法似乎不相干;照字面讲,我想‘直译’‘意译’全没有这回事。要翻译就只有一种方法,像头里说的。这种方法并非不能办到,因为有少数翻译家已经办到了,叔湘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你翻开他译的……是现代我国的语言,是活生生的语言,是精粹非凡的语言——一个‘了’字不多用,一个‘的’字不少用,在节奏韵味上推敲到了家。”^[2]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在1943年说的这段话至今仍具有很

大的指导作用。

翻译要做到无懈可击是不可能的,但一定要吹毛求疵,精益求精。比如王宗炎先生极力推崇吕叔湘先生的译文,大加赞赏这句译文:“一种荒凉的宁静挂在田野之上,好像它们也感觉寒感稍减,在它们的漫漫的冬眠之中伸伸脚。”但同时加括号指出:“好像它们……”似乎不如“好像这些田野……”^[3]可见,译文要做到曲达原义、字字熨帖,实属不易。

参考文献:

- [1] 张培基,喻云根,李宗杰,等. 英汉翻译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0.
- [2] 叶圣陶. 叶圣陶论创作[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535.
- [3] 王宗炎. 语言问题探索[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237.

(责任编辑 谢春红)

On the Skills of English – Chinese Translation from Some Examples of *English – Chinese Translation*

LIU Qin – rong, NIU Qiao – h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Zhe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comment in *English – Chinese Translation*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the understanding and mastering of the materials, but also beneficial to the English – Chinese teaching course. It should not only master the grammar structures of the two languages and the sentences should clear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the two languages, and English and Chinese way of thinking and expression of art.

Key words: *English – Chinese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kills; literal translation; paraphrase; access; elegance

基于言语行为理论分析《围城》的反讽艺术

周迪,张红

(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呼和浩特 010080)

摘要:以约翰·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为指导,以钱钟书《围城》为分析文本,从朱小舟学者提出的宏观言语行为和微观言语行为两个视角分析小说中独特的语言艺术——反讽。这样分析的目的是丰富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揭示小说的主题,挖掘作者进行反讽言语行为的真实意图,从而读者既可以从言语行为理论对《围城》中独特的反讽艺术进行赏析,又能够从一个新颖的角度对这部小说进行深入的解读。

关键词:言语行为理论;《围城》;反讽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5.021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5-0097-05

近年来,随着学者对跨学科领域的深入研究,大量的语用学理论运用于赏析文学作品中,从而产生了一门新的研究领域——文学语用学。其中,约翰·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作为语用学领域的主要理论,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其应用于赏析文学作品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钱钟书先生的著作《围城》作为中国文学的一部经典之作,其语言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特色。因此,小说受到了许多学者的青睐,但对其研究主要集中于语言的修辞方面,如对小说中比喻、讽刺、幽默、象征等艺术手法的研究,而从语用学角度,尤其是从言语行为理论对小说《围城》的语言特色进行解析的研究相对较少。《围城》运用了大量的反讽艺术手法,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语料。由于言语行为理论发挥着透过字面看实质,以此揭示出言语隐含意义的作用,这和反讽艺术手法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在约翰·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框架下对《围城》的反讽艺术手法进行解析能够对小说中言语的隐含意义进行深入地探究。因此,本文将在约翰·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框架下对钱钟书的著作《围城》进行反讽言语行为剖析,这样分析的目的是探究小说中的反讽言语行为的隐含意义。这种探究不仅加深了读者对《围城》中反讽

言语行为的理解,而且可以挖掘作者进行反讽言语行为的真正意图,从而深化读者对小说的理解,引起读者的共鸣。^{[1]60}

一、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

20世纪中叶,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汀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在《如何以言行事》^[2]一书中,约翰·奥斯汀指出语言不仅仅发挥着“陈述”“说明”“描写”事情的作用,而且发挥着通过语言做事情的作用。于是,他将句子划分为两种类型:表述句(constatives)和施为句(performatives)。后来,由于这两种分类不够全面,约翰·奥斯汀在此基础上对其分类进行完善,把言语行为划分为三种类型: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和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而约翰·塞尔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根据语言的功能不同,将言语行为划分为五种类型:阐述性言语行为(assertives)、表达性言语行为(expressives)、指令性言语行为(directives)、承诺性言语行为(commisives)和宣告性言语行为(declaratives)^[3]同时,约翰·塞尔指出,说话人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才能成功实施其言语行为:第一,基本条件(essential conditions),即说话人能够承担起实施其言语行为的能

收稿日期:2017-08-15

作者简介:周迪(1992—),女,河南南阳人,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文学。

力;第二,命题内容条件(prepositional content conditions),即说话人通过言语表达自己将要实施的行为;第三,准备条件(preparatory ditions),即说话人认为自己将实施的行为不仅与听话人的利益相符合,而且听话人愿意说话人实施其行为,但这一行为并不是说话人经常实施的行为;第四,诚意条件(sincerity conditions),即说话人真正愿意实施的行为。其中,说话人实施任何一种言语行为的必要条件是诚意条件。Henk Haverkate 提出:说话人只要对诚意条件进行反讽性操作,其言语行为就可以达到反讽性言语行为。^{[4]100}如果说话人实施的言语行为没有遵守诚意条件,那么其言语行为就可能达到反讽的艺术效果,其言语意义就不能仅仅理解为说话人言语的字面意义,而是与其字面意义相反的意义。^{[5]118}

“反讽”(Irony)作为一种文学常用的艺术手法,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代表作《理想国》中,含有“伪装、欺骗”之意。后来,随着对其研究的不断深入,“反讽”才具有文体学和美学的价值,相应地其研究范围也随之扩大,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其用于文学作品的赏析中。近年来,不少学者从语用学领域对反讽的艺术手法进行了研究。其中,国内外一些学者深入地研究了用言语行为理论分析文学作品的可行性,如:荷兰学者 Teun A. van Dijk 从宏观言语行为(macro-speech acts)和微观言语行为(micro-speech acts)两个视角深入地对文学作品进行剖析;中国学者朱小舟进一步细致地探究了用宏观言语行为与微观言语行为两种角度赏析文学作品,她指出宏观言语行为是作者在文学作品中通过文字与读者进行交流的言语行为,而微观言语行为是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人物与人物之间交流的言语行为。^{[1]60}这些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起到了指导性作用。总之,将言语行为理论用于文学作品赏析时,宏观言语行为决定了整部文学作品的基调,而微观言语行为决定了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人物间的社会关系。由此,从言语行为理论研究反讽艺术手法往往是说话人通过言语的字面意思来传达与其相反的意思,而听话人需要透过言语的字面意思来推测其暗含的意思,说话人借此达到反讽的目的。

二、《围城》中的反讽言语行为研究

从言语行为理论的框架下对文学作品的反讽艺术手法进行赏析,不仅需要从宏观的角度对文学作品的反讽艺术手法进行言语行为研究,而且需要从微观的角度对其进行言语行为探究。因此,本文将在约翰·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框架的指导下,从宏

观言语行为和微观言语行为两种视角对钱钟书《围城》中的反讽艺术手法进行细致地剖析。

(一)宏观反讽言语行为

宏观反讽言语行为是指作者在文学作品中通过文字与读者进行交流的言语行为,即作者通过文字的字面意思来传达与其相反的隐含意思,而读者需要透过作者的字面意思来推测其暗含意思,借此达到反讽的目的。本文的宏观反讽言语行为将从小说中作者的审视视角、主题表达、语言组织以及人物塑造四个方面对其进行深入地探究。

1. 审视视角

《围城》中,作者钱钟书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审视着“围城”内外所发生的一切。作者避开小说中的人物,用文字直接和读者对话,向读者传递自己的看法、态度和情感,这种外在式的写作视角使小说文本中出现大量的反讽艺术手法。因此,作者以自己的口吻从侧面向读者描述“围城”中所涉及的人物及事件,间接地对其进行讽刺,使小说语言委婉含蓄、蕴意深刻、富有哲理。例如,文中作者描述方鸿渐购买假文凭时写到:“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盖包丑;小小一方纸能够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6]9}作者表面看似在叙述文凭的作用,实际是借用“遮盖的树叶”等言语向读者传递出对男主人公方鸿渐伪造文凭这件丑事的讽刺。主人公方鸿渐并没有对自己伪造文凭这一行为进行正面评价,而是作者以一个旁观者的态度通过文字向读者描述主人公方鸿渐伪造文凭这件事,透过文字的字面意思向读者传递对伪造文凭这种丑陋行为的讽刺。这种外在式的审视视角使作者站在围城之巅,欣然笑看世间丑态百相、人事浮华,从而达到反讽的艺术效果。

2. 主题表达

《围城》这部经典著作是以描述旧中国不同阶层的知识分子病态畸形的生活为对象,全文围绕着一个主题“人生百态就像一座座围城,城外的人渴望冲进来,而冲进城内的人却急切地想逃出去”。作者主要通过描写小说中不同知识青年的教育、爱情、事业和婚姻状况四个方面,从侧面向读者揭示出主人公们所遭遇的困境就像一座座围城,引诱着城外的人冲进去,而冲进城内的人却又急切地想逃出来,逃出城外的人却又不知不觉地陷入另一个围城,如此循环,永远逃不出围城的束缚的现象。作者在文中看似是在叙述旧中国中上层知识分子教育、爱情、事业和婚姻状况,实际上是用这种循环往复困于围城的现象从侧面嘲讽人性的虚荣、懦弱、丑恶等

本性,同时也讽刺当时旧中国残酷的社会现实。因此,作品主题的反讽为整部小说奠定了反讽的基调。

3. 语言组织

小说语言诙谐幽默、寓意深刻、妙趣横生、富有哲理,其中最独特的艺术特色是作者通过运用多种艺术手法达到讽刺的艺术效果。因此,本文将从内敛性反讽、漫画式反讽和戏谑性反讽三个方面对《围城》中最具特色的反讽言语行为进行解读。

(1) 内敛性反讽

内敛性反讽即作者通过叙述自己的看法、态度等,从侧面对掩藏在语言背后的事物进行揭露,以此达到反讽的艺术效果。例如文中描述县里人们的就业情况时,写到:“他们那县里人侨居在大都市的,干三种行业的十居其九:打铁,磨豆腐,抬轿子。土产中的艺术品以泥娃娃为最出名;年轻人进大学,以学习土木工程为最多。”^{[6]7}作者看似是在向读者介绍旧中国百姓所从事的三种职业,实际上则是通过对现实的描写,从侧面向读者传递当时中国贫穷的社会状态,以及对人们传统职业观的讽刺。因此,作者借用内敛性反讽艺术手法与读者进行交流,传递出自己的真实意图,使读者感受旧中国的窘迫处境及人们思想的腐朽,从而达到反讽的艺术效果。

(2) 漫画式反讽

漫画式反讽即作者用漫画的笔法夸大小说中人物的形象,使之生动传神、栩栩如生,展示出作者对笔下的人物的态度和看法,从而勾勒出对小说中塑造的人物的性格特点的讽刺,以此达到反讽的艺术效果。例如,文中刻画法国巡捕时,描写到:“法国巡警本来苍白的脸色现在红得像生牛肉,两眼里新织满红丝,肚子肥凸得像青蛙在鼓气,法国人在国际上的‘绰号蛤蟆’,真正名副其实,可惊的是添了一团凶横的兽相。上海这地方比得上希腊神话里的魔女岛,好好一个人来了就会变成畜生。”^{[6]129}作者连用多个想象奇特的比喻手法对法国巡捕的面部进行夸张性地描写,使人物形象惟妙惟肖、形神俱佳。瞬间,一幅栩栩如生的凶神恶煞般的漫画浮现在读者脑海里。作者通过一种奇特的人物面部形象描写看似是在勾勒法国巡捕的形象,实际上是通过诙谐幽默、夸张的描述表达出对法国巡捕的厌恶,同时也反映出旧上海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人性的摧残,从而也对旧中国的社会现状进行抨击。

(3) 戏谑性反讽

戏谑性反讽即作者将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融于一体,看似是以开玩笑的口吻戏谑众生,创造出一种富有智慧、谐趣的审美境界,实际上作者是从侧面对

小说中的对象进行讽刺,以此达到反讽的艺术效果。例如,“鸿渐一眼瞧见李先生他的大铁箱,衬了狭小的船首,仿佛大鼻子阔嘴生在小脸上,使人起局部大于全体的惊奇,似乎推翻了几何学上的原则。那大箱子能够从大船上运下,更是物理学的奇迹”^{[6]139}。作者看似是用诙谐幽默的语言对李先生的外貌及行李进行描写,实际上是用局部大于整体、几何学原则、物理学等科学的隐含意思来讽刺李梅亭可恶的嘴脸和一堆繁重的行李,从而从侧面向读者传递出李梅亭占便宜、想赚钱的丑恶嘴脸。因此,作者用戏谑性反讽的艺术手法既对李梅亭的丑恶嘴脸进行了讽刺,又揭露了当时人们生活苦不堪言的社会现状,进而从侧面对旧中国当时贫穷的社会状态进行讽刺,这种艺术手法使得语言蕴意丰富。

4. 人物塑造

小说通过大量的反讽性描写成功地塑造了不同知识青年的人物形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男主人公方鸿渐,他作为小说中当时封建社会下的牺牲品,留学归来,一踏上阔别四年的故土,就接二连三地陷入人生的“围城”,逃不掉爱情与婚姻的“围城”,摆脱不了事业的“围城”、最后又沦陷于社会的“围城”。作者向读者展示方鸿渐所遭遇的不同“围城”,更能体现出他的生活状况。在爱情与婚姻中,他意志薄弱,优柔寡断,被鲍小姐引诱后,又遭其抛弃;继而被苏文纨羁绊,随之遭她报复;最后又陷入孙柔嘉的诓骗中,方鸿渐可谓是饱尝感情上的折磨。因此,才有流传至今的婚姻观:婚姻仿佛一个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迫切地想飞进去,而困于笼内的鸟想飞出来。在事业中,方鸿渐屡遭同事暗算,莫名其妙地卷入到同事之间纷繁复杂的恩怨纠葛,使他在事业上遭受痛苦。在社会磨练中,方鸿渐,一名留洋回国打算报效祖国的知识分子,回国后地位依然低下,四处求职,却屡遭碰壁,使他无所适从,似乎他的一切都被一只冷漠的大手所束缚,最终,使得本就无能想靠买假文凭工作的他只能屈服于这只隐形掌控的大手,一回国就逆来顺受地接受亲戚和朋友的施舍,随之又屡次踏入爱情的陷阱,进入事业的低谷。作者通过文字对方鸿渐婚姻、爱情、事业等方面的失败进行描写,从侧面向读者传递出对社会的炎凉、爱情与婚姻的欺骗及事业的无奈。

(二) 微观反讽言语行为

朱小舟学者认为微观言语行为是指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人物之间进行交流的言语行为。约翰·塞尔将言语行为理论划分为五种类型,但 Henk Haverkate 指出:由于说话人的宣告性言语行为缺乏诚意条件,

因此宣告性言语行为不具有反讽艺术。^{[4]94}因此,本文将从约翰·塞尔的阐述性言语行为、指令性言语行为、承诺性言语行为和表达性言语行为四个方面对《围城》中最具特色的反讽艺术手法进行探究。

1. 阐述性反讽

阐述性言语行为即说话人的言语具有真实性。阐述性反讽是说话人从反面描述事情,即所描述的事情不具有真实性,说话人可以通过赞扬来表达批评,也可以通过批评来表达赞扬,目的是使听话人推测其话语的暗含意思,并相信话语的真实性。以《围城》中唐小姐和曹元朗的对话为例:

唐小姐也把那诗看了,说:“曹先生,你对我们这种没有学问的读者太残忍了。诗中的外国字,我一个都不认识。”曹元朗道:“我这首诗的风格,不认识外国字的人愈能欣赏。题目是杂拌儿、十八扯,你只要看忽而用这个人的诗句,忽而用那个人的诗句,中文里夹了西文,自然有一种杂凑乌合的印象。唐小姐,你领略到这个拉杂错综的印象,是不是?”唐小姐只好点头。曹元朗脸上一圈圈的笑痕,像投了石子的水面,说:“那就是捉摸到这诗的精华了,不必去求诗的意义。诗有意义是诗的不幸!”^{[6]74}

曹元朗表面上看似是在为不理解复杂诗风的唐小姐解围,赞扬唐小姐读懂了诗的精华,而实际上他的话语违背了合作原则中的质量原则,话语不具有真实性。因为如果看不懂诗,又怎么能够捕捉到诗的精华?所以他是在奉承唐小姐,没有诚意地赞赏唐小姐。作者通过运用阐述性反讽手法对人物间的对话进行描写,看似是在描述人物间的对话,实际上是从侧面对曹元朗乐于奉承的人物形象进行刻画,以此使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2. 指令性反讽

指令性言语行为即说话人要求听话人做某件事情的言语行为,包括命令、建议、请求等。指令性反讽是说话人的言语表达出与自己所说的言语的字面意思不同或者相反的隐含意义。当说话人的言语并不是真正要求听话人做某件事情或者是一件听话人根本不可能做的事情时,其言语行为就达到了反讽的艺术效果。

例如,当谈到苏小姐结婚时,方鸿渐调侃赵辛楣:“应当是杏花,表示你爱她,她不爱你;还有水仙花,表示她心肠太硬;外加艾草,表示你为了她终身痛苦。另外要配上一束石竹花来加重这种涵意的力量。”^{[6]134}

赵辛楣喜欢苏小姐很多年,而在苏小姐即将和别人结婚之际,方鸿渐却建议赵辛楣送花给苏小姐。

赵辛楣,作为多年的爱恋者,并不是苏小姐的结婚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是绝对不会送花给苏小姐祝福的,但方鸿渐给赵辛楣推荐各种花,建议他送花给苏小姐。方鸿渐并不是真正地要求赵辛楣给苏小姐送花,双方都知道给苏小姐送花这件事情是根本不可能的。方鸿渐的指令性言语一方面是在描述要求赵辛楣送花给苏小姐这件事,另一方面从反面透露出赵辛楣对苏小姐的放不下,进而从侧面对爱情进行了讽刺。由此,指令性反讽言语行为巧妙的运用语言技巧,使得小说中塑造的人物之间的话语蕴意丰富。

3. 承诺性反讽

承诺性言语行为即说话人通过言语使自己承担起实现承诺的义务,主要有发誓、保证等。即说话人能够完成自己所承诺的言语行为。若谈话双方都知道说话人并不能完成自己的承诺却主动承担时,其承诺便有了反讽的意味。因此,承诺性反讽是说话人通过言语承诺了一件自己根本完成不了的事件。以《围城》中方鸿渐的父亲为例:

方鸿渐父亲:“既然如此,你辞了就好。咱们这种人,千万不能够为了贪图小便宜而忘记大义。我宁愿你逃出来做个难民。不回乡,你不过也是为了这一点民族气节,当初你进报馆工作,我就不赞成,觉得还不如教书。明天你过来,咱们爷俩再讨论讨论,我替你找一条出路。”^{[6]116}

方鸿渐的父亲在方鸿渐辞职时,承诺帮他寻找一条出路。但是,以他父亲的能力是不能帮助他找到工作的,更不可能实现他自己的承诺。他父亲为了在媳妇和儿子面前维护自己的形象,才做出了一件自己实际上实现不了的承诺。同时,当初方鸿渐去报社工作,他父亲巴不得他在那里工作,现在,却说出如此违心的言语。因此,方鸿渐父亲的言语是一个典型的承诺性反讽的言语行为,从对其言语的隐含意义的解读,可以看出这种手法从侧面对他父亲死要面子的穷酸文人的形象进行讽刺,从而达到反讽的艺术效果。

4. 表达性反讽

表达性言语行为即说话人真诚地表达自己对某事件的态度、看法或情感,如:表达感谢、祝贺、问候、赞美;表示抱怨、道歉等等。表达性反讽是说话人的言语与其内心的真实想法相反,以达到称赞或贬低听话人的目的。^{[1]64}

例如:顾尔谦的兴致倒没有减低,嚷成一片道:“今天好运气,真是死里逃生哪!那时候就想不到还会跟你们两位相见。我想今天全船的人都靠李先

生的福——李先生,有你在船上,所以飞机没光顾。这话并不荒谬,我相信命运的。曾文正公说:‘不信天,信运气。’”^[6]¹⁴⁰

顾尔谦表面上看似在赞扬李梅亭,而实际上是李梅亭带的行李太多,携带不方便,在遇到紧急逃命情况时,拖了大家后腿,他还心里怨恨别人,一脸不高兴。这种情况下,顾尔谦的言语并不是真诚地赞赏李梅亭是他们的福气,隐含的话语是在讽刺李梅亭行李累赘,拖后腿,从而表达出对李梅亭的不满,但是因为不好意思直接表达出来,所以只能用这种隐含话语的方式来表达。顾尔谦使用表达性言语行为从侧面讽刺了李梅亭的丑恶嘴脸。

三、结语

综上所述,言语行为理论作为语用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不仅仅为语言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而且对文学作品的赏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在言语行为理论框架的指导下,从宏观言语行为和微观言语行为两个角度分析《围城》的语言艺术——反讽,既使得小说中的反讽艺术手法在言语行为理论的框架中得到细致地剖析,也使读者深入地理解作者进行反讽言语行为的意图,从而进一步

验证了用言语行为理论赏析文学作品的可行性。因此,这样有助于读者更为深入地从一个新颖的角度理解文学的艺术性,为以后的研究创造崭新的思路和视角。

参考文献:

[1] 朱小舟. 言语行为理论与《傲慢与偏见》中的反讽[J]. 外语与外语教学:社会科学版,2002(8).
[2] Austin J 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3] John R S.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ply of Langu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4] Haverkate H A. Speech Act Analysis of Irony[J]. Journal of Pragmatics,1990(14).
[5] 彭辉,戈玲玲.《傲慢与偏见》中的反讽[J].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
[6] 钱钟书. 围城[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谢春红)

A Study of Irony in *Fortress Besieged* Based on Speech Act Theory

ZHOU Di ,ZHANG Ho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ohhot 01008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be based on the speech act theory of John Austin to investigate the sarcasm of *Fortress Besieged*, a typical work of Qian Zhongshu. It will thoroughly analyze the sarcasm of *Fortress Besieged* from two angles, macro – speech act and micro – speech act, in detail. Therefore, the analysis of the novel based on the speech act theory will enrich the characters of figures in *Fortress Besieged*, reveal the theme of the novel and dig out the implied meaning of the sarcasm that the author used in the novel. At the same time, analyzing *Fortress Besieged* from the speech act theory angle will facilitate readers’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central ideas and appreciate the excellent expression of language in *Fortress Besieged*. What is more, the paper will prove that it is a certainly appropriate way to thoroughly analyze literature from the speech act theory in a new angle.

Key words: speech act theory; *Fortress Besieged*; irony

话语标记“不管怎么说”的多角度研究

张 漪

(郑州大学 文学院, 郑州 450001)

摘 要:“不管怎么说”是汉语口语中经常用到的话语标记,从形式上看,它通常出现在句首和句中且拥有变体形式。语义上,用“不管怎么说”连接的两个语段通常包含让步、补充、转折、因果、顺承等关系。在语用方面,除了提醒注意、明示后续内容等功能,“不管怎么说”还具有凸显强调的功能。在历时演变过程中,动词“说”的语义逐渐泛化、虚化,“不管怎么说”的结构逐渐凝固,最终形成了话语标记“不管怎么说”。

关键词:话语标记;“不管怎么说”;语义;语用;构式语法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5.022

中图分类号:H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5-0102-05

一、引言

在现代汉语口语中经常用到“不管怎么说”这个短语,在有的情况下,“不管怎么说”与说话行为有直接关系。

(1)你不管怎么说都说不过他的。

(2)他不管怎么说,大家就是不信。

在有的情况下,“不管怎么说”的意义与说话行为没有直接关系,是作为一个整体来使用的。

(3)不管怎么说,她总是不幸的。(刘振华《女儿悲》)

(4)不管怎么说,总不能不讲经济效果。(刘莱敏《父亲》)

这一类“不管怎么说”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语音上具有可识别性,“不管怎么说”之后可以停顿,也可以加语气词“吧、呀、啊”等;第二,句法上具有独立性,“不管怎么说”经常出现在句首,不与相邻成分构成任何语法单位,属于句法以外的成分,删除它们不会导致句子不合语法;第三,语义上具有非真值性,“不管怎么说”的有无并不影响语句的命题内容,不影响我们对句子的理解;第四,功能上具有连接性,“不管怎么说”在话语中具有总结、转折等功能,能够表达出说话人附带的不满、责怪或表决心的

主观情感。^{[1]202}

从这些特点来看,作为整体的“不管怎么说”是一个典型的话语标记。本文将从话语标记“不管怎么说”的句法位置及其变体形式、语义背景、语用功能等多方面考察它的用法。

二、话语标记“不管怎么说”的句法位置及变体形式

在各大语料库中我们没有发现居于话语末端的“不管怎么说”,话语标记“不管怎么说”要么出现在句首,要么出现在句中。如:

(5)不管怎么说,在校园里,我还算得上是一位明星,因为校台里有过我的声音,校报上有过我的名字。(卞庆奎《中国北漂艺人生存实录》)

(6)不管怎么说,我可完全是为了大局,为了演习任务!(肖云星《天幕下的恋情》)

(7)良久,他才把话接下去:“伟明,不管怎么说,我们总算是一母同胞嘛。(贺政民《一个理论家的愤怒》)

(8)我并不后悔,不管怎么说,两次都毕竟给我心头留下记忆。(肖复兴《中学生梦幻曲》)

董秀芳在《词汇化与话语标记的形成》^{[2]58}一文中指出,话语标记经常存在变体形式,“不管怎么

收稿日期:2017-08-24

作者简介:张漪(1992—),女,浙江宁波人,郑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说”也有一些功能相似的变体形式,如“不管怎么着”“不管怎么样”等,“不管怎么说”及其变体形式的后面还可以出现语气词,如“吧、呀、啊”等。例如:

(9)不管怎么着吧,反正抓破脸了,看你屙啥屎。(许俊选《金牛奇传》)

(10)不管怎么样,再过十二年,我小黄狗决意把“狗年”让给猫姐姐,让世界上出现第一个“猫年”。(郑文贤《花猫黄狗贺猪年》)

(11)当天晚上,夫妻俩商量决定,不管怎么样,尽快搬家,以避开那个奇怪的女人为好。(王薇华《她走了……》)

例(9)(10)(11)中的“不管怎么着”“不管怎么样”都可以用“不管怎么说”代替,说明动词“说”的语义已经虚化、泛化,不再表示说话行为。

三、话语标记“不管怎么说”的语义背景

我们把话语标记“不管怎么说”出现的语义背景概括为“A,不管怎么说,B”。通过对语料的分析我们发现,A和B之间的语义关系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A段陈述某些事实或现象,B段是与之相关的既定事实。A段与B段常常伴有让步的逻辑关系。

(12)我弟弟他除了盗窃行为,还经常在家聚众赌博,甚至有时带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来家里举行舞会,夜里就都住在屋里。为这事我说过要他注意影响,可他不听,我们还吵过一架。后来我见劝阻无效,就采取了消极的做法生把间壁门堵了起来,只是自己洁身自好,没有向派出所报告,客观上起了纵容他的作案动机。我当时的错误思想是:不管怎么说,弟弟总是弟弟,父母去世早,只有我们俩相依为命,能教育尽量教育,不能轻率走极端。(王朔《枉然不供》)

(13)“去你妈的整形吧。整形不是借助器械、绷带、采用手术和牵引的办法改变骨骼和肌肉的走向、位置及厚度吗?这一切我通过意念同样可以办到,就是慢点,但没痛苦。”“你知道我不管怎么说也是唯物主义者,精神原子弹那号玩艺几十年前就是陈词滥调了……”(王朔《痴人》)

例(12)中A段陈述弟弟行为不端的事实,B段陈述兄弟俩相依为命的事实,并做出了“弟弟总是弟弟”的让步,因而“没有向派出所报告”。这里的“不管怎么说”可以用“退一万步说”来代替。例(13)中A段陈述整形可以通过意念办到,B段中说话人表示自己是唯物主义者这一既定事实,委婉表

示了自己并不相信这些陈词滥调。

(二)A段陈述某些事实或现象,B段对A段的信息作一些补充说明。A段与B段之间有补充关系。

(14)他也给我介绍了这样一位姑娘。我努力了,但终于忍受不了她习惯性流露的轻佻口吻以及那总是罩在我心头的淡淡迷惘,像走进一幢布局复杂的房子,本来想进这间屋子,却走进了另一间屋子。吹掉了。不管怎么说,在我身上我们原先那种精神,是大大减弱了的。(王朔《空中小姐》)

例(14)中A段陈述的事实是“忍受不了她习惯性流露的轻佻口吻以及那总是罩在我心头的淡淡迷惘”,B段“在我身上我们原先那种精神,是大大减弱了的”是对A段“忍受不了”的补充说明。

(三)A段陈述某些现象或情况,B段引出的结果与A段在语义上不是趋同的,而是出现了相反或相对的情况。A段与B段常常有转折关系。

(15)伍凤兰之死,引起了伍家的一阵慌乱,别看伍学礼的父亲开着南川市最大的报关行,独霸一方,但不管怎么说,伍凤兰毕竟是他逼死的。(陈定兴《香港之滨》)

(16)马锐的小伙伴们都忿忿地说:“有这么不讲理的么?看都不能看了!”马林生完全想象得出,马锐的那一眼是怎么看的,他的那双眼睛有时比说出话来还气人。但不管怎么说,这也不能成为暴打人家一顿的理由。(王朔《我是你爸爸》)

例(15)中A段陈述伍学礼的父亲独霸一方的事实,B段却不是顺承地说伍学礼的父亲可以不顾人命,而是说“伍凤兰毕竟是他逼死的”,也就是说伍学礼的父亲需要对伍凤兰的死负责。因此,A段和B段形成转折关系。例(16)中A段陈述马锐的“那双眼睛有时比说出话来还气人”这一事实,其结果是遭受了一顿暴打,但是B段中马林生却觉得这不能“成为暴打人家一顿的理由”,A段和B段之间有转折关系,这里的“不管怎么说”经常和“但”“但是”连用。

(四)A段陈述某些事实或现象,B段推论出这些事实或现象产生的结果。A段与B段之间常常有因果关系。

(17)对这一拾金不昧事件,有人解释为“衣食足而后知礼义”,有人说“贫贱不移,富贵不淫”是劳动人民传统的风骨,有人归功于“五讲四美”的宣传和村规民约的作用;不管怎么说,反正这一下子,就让那些高调入云而贪占无厌者,显得形象不那么高大体面了。(邵燕祥《蠡县三题》)

例(17)中,A段陈述对这一拾金不昧事件的各种说法,B段是这些说法造成的后果,即“让那些高调入云而贪占无饕者,显得形象不那么高大体面了”。

(五)A段陈述某些事实或现象,B段表达说话人对这一事实或现象的主观想法,多用来提出建议、说明理由、表现决心、反省自责等。A段和B段常常是顺承的关系。

(18)亚茹也发现了这点:“怎么,你对他还挺有好感的?”

“没有没有。”慧芳连忙否认。

亚茹道:“不管怎么说,这些人还是离他远点。孩子是单纯的,很容易就受到一些不良影响,她们不会分辨是非,还是要以正面教育为主——特别是女孩子。”(王朔《刘慧芳》)

(19)“这是两码事戈玲,他对敌人对同志那是两种态度,一个横眉冷对,一个俯首甘为,不能混为一谈。不能!绝对不能!”牛大姐气愤地站起来。戈玲:“不管怎么说,我认为现在还没到各自逃生的地步。出了问题就解决嘛。其实你们就是不往后缩,挺身承担责任,我们年轻人不会让你们顶雷,我们也会主动承担这件事的责任——对不对东宝?于德利?我们惹出的麻烦我们不推诿。”(王朔《懵然无知》)

例(18)中,A段中陈述亚茹以为慧芳对他有好感,B段是亚茹对慧芳提出的建议“这些人还是离他远点”,这种用法在B段经常会出现“该”“应该”等词语。例(19)中,A段陈述牛大姐支持各自逃生的理由,B段则说明戈玲反对各自逃生的理由。

有时A段可以省略而不会影响对B段语义的理解。

(20)“你这一套骗得了周瑾骗不了我。”赵蕾说,“不管怎么说,不管你是不是真拿我当意中人,反正我是看上你了,由此也就缠上你了,不管今后会发生什么,你是休想甩掉我。恩断情绝好,另有新欢也好,你有千条计,我反正一条道走到黑,坚决不跟你离婚,耗也耗你一辈子。”(王朔《给我顶住》)

(21)但是,不管怎么说,自己的确太毛糙,太容易冲动,已经过了“而立”之年,还像个不经事的中学生,好动感情,浮躁浅薄,一触即跳。(杨镰《青春只有一次》)

例(20)中,B段表现的是赵蕾看上听话人,一辈子跟定听话人的决心。例(21)中表现说话人对自己“太毛糙,太容易冲动,已经过了‘而立’之年,还像个不经事的中学生,好动感情,浮躁浅薄”的自

责与反省。

以上根据话语标记“不管怎么说”的上下文的语义关系将其语义背景大致分成了五类,不排除在现实使用中有更复杂的语义背景。下面我们谈谈话语标记“不管怎么说”在语用中的功能。

四、话语标记“不管怎么说”的语用功能

王刚认为话语标记“再怎么说”的主要功能是提醒和明示^{[3]64},我们认为,话语标记“不管怎么说”也具有提醒和明示功能,除此之外,“不管怎么说”还有凸显强调的功能。表示这一事实非常重要,不可忽视。

(一)“不管怎么说”后面跟的是说话人希望听话人注意的事实,为引起听话人的重视,往往冠以“不管怎么说”进行强调,例如:

(22)不管怎么说,蒋芹正怀着你的孩子,对她、对孩子你都要负责任。(于久惠《粉红色的梦》)

(23)不管怎么说,少了生养孩子的体会,也少了许多麻烦和负担,便有时时间和精力去体验更丰富的生活。(于久惠《粉红色的梦》)

例(22)中,“不管怎么说”引出的事实是“蒋芹正怀着你的孩子”,提醒听话人应当“对她、对孩子你都要负责任”。例(23)中“不管怎么说”引出的事实是“少了生养孩子的体会,也少了许多麻烦和负担”。

(二)一般来说,“不管怎么说”强调是说话人或听话人不愿承认的事实,如:

(24)不管怎么说,我打一个挨过敌人子弹的人,我,我有罪。(翟剑萍《迎春花》)

(25)是我不够尊敬您,伤了您的面子? 没有没有,不管怎么说,我心里始终还是把你当爸爸……(王朔《我是你爸爸》)

例(24)中“不管怎么说”引出的是“我打一个挨过敌人子弹的人”的事实,由于这一行为并不光彩,因此说话人不太愿意承认这一事实。例(25)中,“不管怎么说”引出的事实是“我心里始终还是把你当爸爸”,但是可能由于某些原因,听话人觉得说话人“不够尊敬”、伤了自己的面子,因此不愿承认说话人把自己当爸爸这一事实。

(三)“不管怎么说”还经常用于提醒听话人不一定考虑在内的事件,或者是听话人未意识到的、忽视的事实。如:

(26)不管怎么说,总不能不讲经济效果。(刘莱敏《父亲》)

(27)真的天德,不管怎么说,咱们早年好过,那么好过,我,我……有一肚子话没有人说了,就都冲

你说了吧。(于德才《野血》)

例(26)中听话人提醒听话人“不能不讲经济效果”,显然听话人没有把经济效果考虑在内。例(27)中“不管怎么说”引出的事实是“咱们早年好过”,但是听话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说话人后面还用了“那么好过”进行强调。

话语标记“不管怎么说”体现了说话者的一种交际策略,本来听话人认为是不应当或者非必要的事情,说话人想要委婉说服他人,因此采用让步策略,用“不管怎么说”陈述客观事实,希望降低因自己的看法、态度和情绪给听话者带来的心理影响,这也表现了话语标记具有主观化和交互主观化的特点。

五、“不管怎么说”的发展机制

到现代汉语阶段,“不管怎么说”才作为话语标记被普遍加以使用,在北大 ccl 语料库中我们能找到的“不管怎么说”首次出现在民国小说《武宗逸史》和《雍正剑侠图》中,摘抄例句如下:

(28)这天,天还没亮,宋员外及县令等人就带着礼品来城南向江彬请罪。不管怎么说,这场误会,死三人,伤无数,总是闯了大祸。县令回到家中,不敢入睡,连夜把宋员外等人叫到一起商议。最后认定还是主动向江爷请罪,保不准还能见到皇上呢。(《武宗逸史》)

(29)再过十年只要身体不坏,他们也差得多哪!但如果人家真过来,哥哥这么大的年纪,可叫人担心哪!要是老哥哥于成被人家打上一拳踢上一脚,岂不把一世的英名付于流水?再说,不管怎么说,老人家为我们管闲事,怎么也不能让老侠客总动手哇。(《雍正剑侠图》)

(30)“二位起来,咱们没多大交情,我也不是诚心拿的他们俩,误打误撞,该着你们俩省点儿事。你们也别给我道谢,我也不要你们的情。”“不!老人家,不管怎么说,贼人是您拿的呀,您这一拿住他们俩,我孙亮就能得回故里,我的老母八十多岁,孩子又都很小,他们押在大牢已经三年了。这回,我们一家子二十七口就能出牢啦!”(《雍正剑侠图》)

可见在民国时,“不管怎么说”已经虚化成为了话语标记。在言语交际中承担提醒、明示和强调的作用。

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是近二十年来兴起的研究语言的方法,Goldberg 对构式的定义是:

“当且仅当 C 作为形式与意义的结合体 < Fi, Si >, Fi 的某些方面或 Si 的某些方面不能从 C 的构成成分或从已经确立的构式中精确地推导出来时, C 就是一个构式”。^{[4]294}

“不管怎么说”从状中短语发展成为意义较为整体的话语标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下面从构式语法的角度探讨其发展机制。

(一) 构式原型:“不管 S1, S2”

根据吴福祥的研究认为,充当连词的“不管”形成于唐五代,例句来源于《敦煌变文》,梁洁、汪秀君也对此表示赞同^{[5]27}:

(31)财物库藏,任意般将,不管与谁,进(尽)任用。

连词“不管”一般引导无条件条件复句,表示条件或情况不同而结果不变,下文多用“都、总”等副词跟它呼应。如:

(32)不管远不远他都不去。(《现代汉语词典》)

(33)不管困难多大,我们也要克服。(《现代汉语词典》)

构式原型突出的是 S2 所陈述的事实或者期望, S1 的条件变化与否并不重要,表现出一定的主观倾向。

(二) “怎么”进入 S1: “不管 NP 怎么 VP, S2”

为了加深程度,“不管”后面往往有并列的词语或表示任指的疑问代词,于是出现了“不管 NP 怎么 VP”的结构,并逐渐成为常规用法。例如:

(34)但是,不管鱼玄机怎么逼迫,她就是不承认有那码事。最后,绿翘实在支持不住了。(民国小说《古今情海》)

(35)不管三个人怎么追问,雷春就是不说。(民国小说《雍正剑侠图》)

这一阶段构式加强了“不管 NP 怎么 VP”结构的凝固性,突出了 S1 的客观条件对 S2 的不利,更加突出 S2 的主观化。

(三) VP 逐渐稳定: “不管 NP 怎么说, S2”

在这一阶段,由于口头动词的常见性,VP 渐渐固化为动词“说”,演变为“不管 NP 怎么说”句型。

(36)不管江彬怎么说尽好话,士兵就是不开关门。(民国小说《武宗逸史》)

(37)何吉在旁边也接话茬了:“不管爷怎么说,奴才认为教师这一下打得好。”(民国小说《雍正剑侠图》)

这个阶段的实意动词“说”还未虚化,依然表示“说话”这一行为动作,如例(36)中“怎么”后面跟的是“说尽好话”整个短语,因此动作前面必须跟施事主语 NP。

(四) NP 虚化脱落, VP 虚化泛化: “S1, 不管怎么说, S2”

这个阶段中间与其他成分联系不太紧密,对象

比较灵活多变的 NP 脱落,同时“说”的语义逐渐虚化、泛化,不是单纯的指说话行为,最终形成了现代汉语中的话语标记“不管怎么说”。

(38)可是,相差十九岁呀,又残废到这种程度,不管怎么说,部队也没同意她跟黄山丁走。(刘兆林《心灵》)

(39)不管怎么说,叫他这一哭,搅得我心里头也乱糟糟的,真替他感到难为情。(王兴浦《他是我的老乡》)

例(38)中,“不管怎么说”具有实在意义,“说”可以替换为“请求”“申请”等动词,句中的“不管怎么说”不能省略,此时的“不管怎么说”还不是话语标记。例(39)中,“说”的语义已经虚化、泛化,不能用其他动词来替换“说”。明示了“我心里头也乱糟糟的”这一事实,具有凸显强调的语用功能,去掉“不管怎么说”后,不影响对句子的理解。标志着“说”的完全虚化和话语标记“不管怎么说”的最终成型。

六、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话语标记“不管怎么说”具有语篇的衔接功能,衔接的上下文往往具有让步、

补充、转折、因果、顺承等关系。其语用功能在于提醒和明示后续内容,并具有凸显强调的作用。虽然在历时过程中我们没有发现“不管怎么说”明显的发展脉络,但我们推测,是在“不管 S1,S2”的构式原型中发展出来的状中短语“不管怎么说”的动词“说”语义虚化、泛化后,最终形成了话语标记“不管怎么说”。

参考文献:

[1]郑娟曼,张先亮.“责怪”式话语标记“你看你”[J].世界汉语教学.2009(2).
[2]董秀芳.词汇化与话语标记的形成[J].世界汉语教学,2007(1).
[3]王刚.汉语话语标记“再说”提醒、明示功能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
[4]李福印.认知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梁洁,汪秀君.“不管”的语法化历程及语用特点[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3).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e Multi – angle Study of Discourse Marker
“buguan zenme shuo”(不管怎么说)

ZHANG Y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1,China)

Abstract:“buguan zenme shuo”(不管怎么说) is a discourse marker often used in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In form, it usually appear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entence and the middle of the sentence. It also has some variant forms. In semantics, the two sentences that are connected with “buguan zenme shuo” usually contain the relationship of concession, supplement, turn, causality, succumbing and so on. In pragmatics, “buguan zenme shuo” also has the functions of reminding the attention, express follow – up content as well as highlight. In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the semantic of the verb “shuo”(说) is gradually generalized and blurred, and the structure of “buguan zenme shuo” gradually solidifies. Finally, the discourse marker “buguan zenme shuo” is formed.

Key words:discourse marker;“buguan zenme shuo”(不管怎么说);semantic;pragmatic;construction grammar

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中师德建设路径探析

何艳丽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外国语学院, 郑州 450044)

摘要:通过对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过程中师德建设现状、影响因素的分析,探讨了进一步加强师德建设的路径及策略,这对于转型时期应用型高校的建设与发展以及建设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和特色鲜明的师德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地方本科高校;师德建设路径;转型发展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5.023

中图分类号:G6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5-0107-05

师德,指教师的职业道德,是教师的道德品质、道德观念和行为习惯的总和。教师作为教育过程的具体实施者和文化的传播者,他们的素质水平、理想信念和道德修养对学生的价值取向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加强师德建设,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是教育体制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教学方法提升的关键,是培养高水平人才的前提,是新时期助力我国高等教育跨进世界前列的保证。

地方本科高校在转型发展过程中随着目标定位和教育内涵的转变决定了对师德的要求具有不同于其他类别高校的特点。通过对转型高校在校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发现,学校转型发展中对师德的需求不仅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操守,继承以身作则、身正为范、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传统优良的情操和品质,并且还要符合90后甚至00后大学生自身特点的新需求,即在转型发展过程中要着眼于创新教育、特殊教育和主题教育,以良好的思想政治素养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来影响、教育学生。^[1]

一、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中师德建设的现状

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传统的教师队伍管理、考核、评价、监督、激励机制也发

生了较大的变化,暴露出师德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

(一)重教书,轻育人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不仅要传授给学生大量的知识,帮助学生学习文化,更是学生思想和发展上的导师和引路人。而当前,大部分教师则认为,只要按照学校的规定完成课时量和科研任务就可以了,教育学生是辅导员、学院和学校专门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事情,跟自己关系不大,对学生思想道德方面的问题视而不见,存在着“我教我的课,学生学不学与我无关”的思想。而在缺乏约束机制的情况下,教师只要不犯错误,不管育人质量如何,师德考核就是合格,甚至优秀。

(二)重功利,轻敬业

列宁说过:“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而在当前市场经济的某些负面影响下,部分教师缺乏事业心,有“人在曹营心在汉”的现象,把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最高理想,工作中敷衍了事、斤斤计较,缺乏敬业精神。对学生不关心,与学生接触少,更不愿意积极主动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学习要求,上课对学生不考勤,无平时成绩,不认真备课,存在照本宣科等现象,对学生缺乏热情和人文关怀。

收稿日期:2017-08-20

基金项目:2015年度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航空港区建设背景下高职外语专业校企合作路径的研究与实践”(152400410315)

作者简介:何艳丽(1971—),女,河南方城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及心理学。

与自己名利相关的事情非常关心,却对教育事业极其淡漠,如教研活动没有领导参加,教研室主任就召集不起来;因为没有相应的经济和政治待遇,党务等事务性工作不愿意干;更有甚者,个别老师在外面做兼职,不参加学校的政治学习等相关活动,把学校作为辅助事业,存在“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思想。^[2]

(三)重科研,轻教学

由于当前对教师评价机制存在着一定偏差,各种评优考核、职称评定等过多地倚仗于科研项目的完成量,对教学工作量及教学效果没有更多的要求,导致一部分老师把主要精力放在发表论文和做项目上,忽视了教学工作。

二、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中师德建设的影响因素

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过程中师德建设的影响因素有多种,既有转型阶段这一特殊时期对教师要求提高,教师个人对转型期的迷茫而造成的影响,还有社会环境变化和学校师德建设工作机制不完善所带来的影响。^[3]

(一)转型期所特有的影响

地方本科高校的转型发展,对教师队伍的要求不管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较大的提高。高职称和高学历(主要体现在博士学历)比例的提高,“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所占比例的提高,教师专业知识和结构合理性的提高,教学能力和创新素质的提高,这些都要求高校教师需要转变观念,需要有将学科专业知识转化为与转型发展相适应的产业行动能力,需要明确转型后学校的定位、人才培养和课程设置等方面的不同,如何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和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而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以及还要有与转型后相适合的科研方向的转变和科研能力提高。这些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研究和实践,势必会给教师带来相当的压力,对教师师德方面的培育和塑造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社会环境的影响

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入,各种思想观念的相互碰撞和交融对教师的职业道德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想直接侵蚀和影响部分教师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导致部分教师角色定位不清,价值标准混乱,理想信念缺失,相对较低的教师待遇也使得教师在观念和行为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如职业认同感缺失、心理失衡,从而产生价值迷茫、育人意识淡薄等问题。有些教师甚至不讲政治

和原则,对社会主义信念和改革开放的信心、党和政府的信任不够坚定。这些消极的心态或情绪直接影响高校教师的师德建设。

(三)师德建设机制不健全的影响

师德建设的关键在于要建立有约束力、可操作的评价体系。当前师德建设的规章制度很多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在转型期所遇到的一些新问题、新情况,找不到合适的处理方案;对于师德建设的规章制度,也都是重制定轻实施,流于形式;师德建设的评价体系及奖惩内容也大都是宏观多抓手少,内容空泛,标准模糊,可执行度不强,监管部门对此更是缺乏监管力度,没有形成良性激励、惩治机制。

(四)教师自身师德自律意识不足

高校在转型期对教师的要求是多元的,包括教育教学理念和思想的转变、教学内容和方法的转变等等,教师自身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提升,以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高校职能都要求教师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习转型过程中。而目前所面临的情况确实十分严峻:一是教师认识不到转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缺乏学习和提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二是教师面临着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无暇顾及职业素质的提高,进而发生思想道德失落的现象;三是部分教师角色意识模糊,尤其是年轻教师,他们背负着学校提升科研水平、以及自身评定职称等多种考核,使其更多地注重科研任务,从而忽视了教书育人环节,再加上大多数教师并未受过系统的教师职业培训,对教育教学的技能和技巧并不熟悉,而高校对年轻教师的培训和引导又缺乏一套长期有效的机制,师德建设可以说是空谈。

三、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中加强师德建设的路径

在学校转型发展过程中,师德的需求一方面需要督促教师自觉地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和学生的利益而尽职尽责,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师德对教师履行义务、承担责任、提升精神境界、践行师德行为、获得幸福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因此,面对学校转型发展的挑战,我们更加认识到加强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加强师德建设,提高教师的思想道德素质、开拓他们的创新意识、提升其教学实践能力始终是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的根本任务,这需要教师个体、学校和社会等各方面共同努力。

(一)教师个体

对教师本人来说,首先要转变观念,提高主体意识。教师要明确学校转型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所

在,即学校转型后办学定位的改变、人才培养的改革、学科专业结构的调整和师资队伍转型以及转型发展的途径和突破口。作为转型期的教师,只有形成了这种理念,将主体意识内化为道德修养,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来影响学生,才能使学生会学、会思、会问、会答,使学生学会对问题独立的思考,有自己的见解,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发展。其次,教师要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远离墨守成规,着眼创新教育。教师要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素质,树立正确的教师职业理想和专业的学术态度,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教师要有科学创新精神,不断更新自己的教学方法,不盲从、不附和。既要有创新,又要在创新中有继承的思想,给学生增添一双想象的翅膀,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教师要通过学习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尽快融合到学校转型的发展过程中。第三,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水平,做到为人师表。要学会育人,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加强师德修养,形成以敬业为本、以敬业为荣、以爱生为怀、以奉献为乐的师德规范,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关爱学生,做学生的知心朋友,以渊博的知识引导学生、以高尚的人格塑造学生、以良好的道德风范影响学生。

（二）学校方面

对学校来说,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要找好抓手,即抓好“两支队伍”和“两个基层组织”建设。抓“两支队伍”就是要抓好“党员干部队伍”和“教师整体队伍”;抓“两个基层组织”是指抓好“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教学组织”,也即党支部和教研室。做好两个抓手工作:一是要提高认识,重视宣传教育。要宣传好党的大政方针,宣传好典型人物,以典型事迹带动师德建设,同时通过抨击和揭露师德师风中出现的丑陋现象来遏制不良的师德现象出现。二是要完善机制,重视正面引导。要事实求是,制定出切实可行、操作性强的师德师风建设机制,引导教师自觉遵守师德规范。三是要加强考核,重视奖罚落实。在好的机制推出后,考核评价必须跟上,奖罚必须分明,监管必须到位,采取有效措施引导教职工自觉加强师德修养,模范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四是以解决师德师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为突破口,着力抓好集中整改,例如,以师德建设和考核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来查找教师在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尊重学生、严谨治学和为人师表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分析出原因,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上下联动、集中整改的办法予以解决。

（三）社会方面

从社会层面上,高校教师的师德建设需要社会

大环境的支持。一是国家应提倡尊重教师、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和尊重创新观念,对教师创造的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对他们付出的劳动给予充分的认可,努力营造有利于师德建设的良好氛围,不断提高教师的社会待遇和地位,使教师在劳动中能够获得认同感、荣誉感和自豪感,从而激发他们为教育事业献身的热情。二是国家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高校师德建设,积极地引导高校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党和人民满意的好教师。三是国家要遵循高校师德建设的规律,着眼长远,培育高校教师首先要做道德上合格的教师,然后再实现以德施教和以德立身的好教师楷模,将高校师德建设全面推向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逐步促进师德建设迈向新的台阶。四是要做好舆论宣传工作,例如,可以通过举办“最美教师”的评选活动、“优秀教师”和“文明教师”的表彰活动等,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传播正能量和弘扬主旋律。

四、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中加强师德建设的措施

师德建设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地方高校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加强师德建设工作,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等有关国家法律法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充分尊重和落实教师主体地位,发挥教师师德建设主动性,积极探索建立宣传教育、示范引领和实践养成相统一,政策保障、制度规范和法律约束相衔接,考核监督和奖惩相结合的师德建设工作机制。

（一）建立健全师德教育制度,创新师德教育模式

1. 建立健全师德承诺制度、日常师德教育制度、岗前师德教育制度和入职宣誓制度。将教师的理想信念教育、学术规范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法制教育和岗位行为教育等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到师德教育体系工作中。

2. 创新师德教育载体,精心设计师德教育内容,增强师德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将师德教育贯穿到教师日常的教学科研工作中,积极开展教师师德论坛、青年教学基本功大赛、青年教师论坛等与教学科研密切相关的活动,鼓励教师积极参与调查研究、学习交流、挂职锻炼和志愿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提升师德素养,增强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师德榜样教

育,建立师德先进人物事迹库,定期组织师德大讲堂、典型人物事迹展等形式多样的师德教育活动。

(二)增强教师自身师德建设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引导教师珍惜荣誉,增强职业自尊,自觉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将师德修养自觉纳入职业生涯规划,在个人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等实践活动中自觉恪守师德规范,注重内省、内化品行,不断提升师德践行能力,积极养成师德自律习惯。在道德养成和道德实践过程中自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与国家“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结合起来,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做到内心深处真正明白,切实树立教书育人的根本宗旨。

(三)积极推进师德宣传制度化、常态化,构建“部门联动,形式多样”的师德宣传格局和舆论环境。

1. 培育和宣传师德先进典型。挖掘和提炼优秀教师为人师表、为人学为师的典型经验和感人事迹,推出最美教师优秀事迹展,弘扬高尚师德,引领校园风尚。每年定期开展以“立德树人、教书育人”为核心的师德建设主题宣传活动等,引导广大教师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创新师德建设宣传教育途径。宣传师德榜样事迹,警示师德失范行为,拓展师德宣传媒介。建立“校园网师德建设专栏”,探索官方微博、微信以及微电影等新媒体宣传师德的新路径和新形式,拓展校广播站、校报等传统媒体在师德宣传方面的功能,构建师德宣传、学习和交流的综合性平台。^[4]

(四)健全师德考核体系,激励教师践行师德规范

1. 建立健全师德考核评价体系。将教师的理想信念、工作态度、职业操守、学术道德、工作实效等师德表现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将师德考核作为年度考核评定的一项重要内容。

2. 建立全覆盖的师德考核机制。要尊重教师主体地位,坚持客观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采取个人自评、学生测评、同事互评、单位考评和社会参与等多种形式进行师德考核,科学合理设定各项分数比例。

(五)强化师德监督机制,防止师德失范

要不断完善师德监督机制,建立健全师德状况调研、师德重大问题报告、师德舆情快速反应和师德建设年度评议等制度,及时研究加强和改进师德建

设的政策措施,积极构建学校、学生、教师、家长和社会“五位一体”的师德监督体系。设立师德投诉举报电话、邮箱及信箱,及时掌握师德信息动态,及时纠正不良倾向和问题,努力将各类违反师德的行为消除在萌芽状态。对师德问题做到有诉必查,有查必果,有果必复,做到公平、公正和公开。^[5]

(六)完善师德激励机制,促进教师自我完善

1. 完善师德表彰奖励制度,定期评选表彰师德标兵、师德先进个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党支部、优秀教师、教学名师、青年教学骨干教师和优秀辅导员等先进典型,树立师德榜样,塑造教师师德形象。

2. 将师德表现作为评奖评优的首要条件。在评优评先、干部选拔、职务晋升、岗位聘任、研究生导师遴选、派出进修以及各类项目申报等工作中,同等条件下,师德表现突出者优先考虑。

(七)建立健全教师违反师德行为的惩处机制

按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对于违反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的行为,如:损害国家利益、侵犯学生和学校合法权益的行为;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有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在科研工作中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篡改侵吞他人学术成果、违规使用科研经费以及滥用学术资源和学术影响;影响正常教育工作的兼职兼薪行为;在招生、考试、学生推优等工作中徇私舞弊;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的礼品礼金等行为;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等都要依据规定给予相应的处分。凡出现以上情况,出现师德年度考核不合格者,在年度岗位聘任、考核评优、职称晋升、绩效奖励和申报各类项目等各项工作中实行一票否决。

(八)建立和完善保障制度,切实加强师德建设

1. 学校成立师德建设委员会,负责师德建设的总体规划和统筹协调工作,研究解决师德建设的重大问题。学校党委书记和校长担任师德建设委员会主任,分管部门的校领导担任副主任,成员由人事处、纪委、宣传部、组织部、保卫处、工会、教务处、学生处、科研处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组成,人事处为牵头部门。各基层党总支成立师德建设分委员会,在学校师德建设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本单位师德建设工作,党总支书记和院长担任分委员会主任,各学院党总支委员、教务办主任、教研室主任、教师代表等担任成员。

2. 明确任务分解,保障师德建设任务的全面落实。各成员单位密切合作,结合本单位工作开展师德建设工作。人事处、组织部、学生处和保卫处重点

负责师德考核与惩处工作,科研处重点负责与学术相关的规范、奖惩、评审与推荐工作,教务处重点负责教师课堂教学的行为与规范,宣传部重点负责师德建设宣传工作,人事处、宣传部、工会重点负责师德激励工作,纪委(监察审计室)重点负责师德督查工作。

3. 建立问责、追责机制。对严重违反师德行为的教师监管不力、拒不查处、拖延处分或推诿隐瞒,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单位,将追究该单位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4. 加大师德建设经费投入力度。将师德建设专项经费纳入单位日常运行经费中,确保师德建设工作顺利开展。

总之,加强高校师德建设是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 and 关键所在。要建立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6]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必须以党的高等教育各项法律法规、方针政策为指导,通过牢固树立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人的教育理念,发挥教师在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和学风建设中的示范作用,形成“爱国守法、敬业爱岗,教书育人、关爱学生,传承文明、勇于创新,严谨

治学、启智求真,为人师表、乐于奉献”的师德师风,以优良的师风带动学风、校风建设,以高尚的情操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和促进学生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以扎实的专业和娴熟的教法作为人才培养工作,充分发挥师德建设在地方高校转型发展中的重要驱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张文强. 新时期加强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的思考[J]. 河南社会科学,2016(2):119-122.
[2] 唐珏. 地方高校师德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 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16(5):100-102.
[3] 甘路有. 我国高校师德建设的现实困境与对策[J]. 现代教育科学,2016(1):38-43.
[4] 杨昌宇. 新时期高校师德建设的现实意义和实施途径研究[J]. 石油教育,2016(5):93-96.
[5] 唐勇. 新常态下地方本科高校师德建设的探索与实践[J]. 韶关学院学报,2016(7):99-103.
[6] 习近平. 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N]. 人民日报,2014-09-10.

(责任编辑 许峻)

On Teacher’s Ethic Construction of Local Undergraduate University in Transition Period

HE Yan-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By making 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s and influences of teacher’s ethic construction,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to teachers in the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ocal undergraduate university,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strategies and paths of teacher’s ethic construction. The research provides vital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the building of high-level teache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istinctive professional ethics.

Key words: local undergraduate university; paths of teacher’s ethic construction;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河南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建设的思考

——基于河南省2012—2016年本科专业增长的分析

卫世乾

(许昌学院 学报编辑部,河南 许昌 461000)

摘要:2012—2016年,河南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的增长速度较快,具有专业种类、学科门类及学校归属相对集中的特点,新增专业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存在盲目增设、重复现象严重、建设任务重等问题。政府应逐步落实高校专业设置的自主权,发挥宏观调控功能;高校应合理定位,错位发展,加强内涵建设。

关键词:河南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发展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5.024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5-0112-04

目前正在实施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把专业设置、布局调整与专业认证确定为重要的建设内容,要求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对人才的实际需求出发设置、调整专业。^[1]河南省普通高校存在本科专业盲目重复设置,专业布局和专业结构不能完全适应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2]已经严重影响了河南省普通高校向应用技术大学的转型发展。为了进一步引导河南省高校调整和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推进高等教育的内涵发展,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教高[2012]9号),本文以河南省普通高校2012—2016年以来教育部新增和撤销的本科专业^[3-7]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论证,以期对河南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的优化与发展提供帮助。

一、河南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增长的特点分析

(一)本科专业增长速度较快

2012—2016年间,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含民办和职业院校)共新增本科专业116个,撤销17个,调整专业按新增专业处理(下同)。其中2012年新增本科专业1个,撤销8个;2013年新增6个;2014年新增99个,撤销4个;2015年新增2个;2016年

新增14个,撤销5个。5年来,每年都有新增专业,并且新增本科专业数量远远超过撤销专业。河南省普通高校的本科专业数量总体上呈现增长态势,而民办高校撤销专业远远超过新增专业。

(二)优化的本科专业种类相对集中

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部分新增专业点分布比较集中,会计学、物流管理、物联网工程、翻译、机械电子工程、商务英语、车辆工程、新能源材料与器件、软件工程、财务管理、商务英语等专业,共布点46个高校,占本科专业调整院校总数的39.7%;其他新增专业分布比较分散。对于临床药学、金融学、飞行技术、绘画和应用统计学、服装和服饰设计等专业,有的高校是新增这些专业,而有的高校则是撤销这些专业。

(三)优化的本科专业门类分析

截至2014年底,河南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已涵盖了2012年版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以下简称《目录》)中所有12个学科门类,共设置80个专业类,覆盖《目录》中92个专业类的86.96%。^[2]2012—2016年河南省普通高校新增专业均为《目录》中的专业,其中基本专业为95个,占新增本科专业总数的81.9%,涵盖了除哲学和医学

收稿日期:2017-08-30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河南省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战略研究”(2015BJY002)

作者简介:卫世乾(1973—),男,河南洛阳人,硕士,《许昌学院学报》理科编辑室主任、副编审,研究方向:高等教育与教学。

外的10个专业类,工学、管理学和文学居于前3位;特设专业为21个,占新增本科专业总数的18.1%,主要是工学。撤销专业均为《目录》中的基本专业。

从新增本科专业所属门类来看,主要集中在工学、管理学、文学、理学、农学,共有108个,占新增总数的93.1%,其他学科新增专业点比较少。撤销专业中,艺术学最多,其次是理学和工学。

(四)优化的本科专业学校分析

为了方便研究,将河南省高等本科学校按类型主要分为传统本科高校、新兴本科高校和民办高校。新兴本科高校、民办高校和传统本科高校分别新增本科专业48个、37个和34个,新增专业均集中在工学和管理学等学科。各类本科高校撤销的专业数量比较少,主要集中在工学、管理学和艺术学等学科。

从新增本科专业高校的性质来看,主要分为综合类大学、理工类高校、师范类高校、农业类高校、医药类高校、财经类高校和政法类高校。理工类高校新增本科专业41个,师范类高校新增31个,财经类高校新增15个,综合类大学新增13个,农业类高校新增11个,主要是管理学和工学相关专业;医药类高校新增6个,主要是医学、工学相关专业;政法类高校新增2个工学相关专业。综合类大学撤销了理学和艺术学专业;理工类高校撤销了艺术学、经济学、工学和管理学相关专业。

河南工程学院、许昌学院、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新乡医学院、南阳师范学院、新乡学院、商丘师范学院、信阳农林学院和黄河交通学院主要新增工学、管理学、理学和艺术学等相关专业;河南大学新增历史学、理学和管理学相关专业,同时撤销理学某些专业;郑州华信学院新增管理学相关专业,同时撤销经济学和管理学某些专业。

二、河南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调整中存在的问题

(一)新增专业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河南省的经济产业结构正在调整和升级,急需一些新兴学科和应用学科。河南省普通高校的本科专业结构和专业布局存在以下不足:支撑河南省支柱产业的专业设置明显不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布点较少,专业种类不多;培养从事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人才的专业设置缺乏。^[2]这些都严重制约了河南省的经济转型和发展。近些年虽然河南省普通高校逐步新增了食品加工、新能源材料与器件、机械电子工程、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智能电网信息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等国家急需的专业,撤销了一些社会需求小的专业,部分程度上优化了河南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的结构与布局,但是新增专业多是学

科基础比较成熟的基本专业,有关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物流管理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设置严重不足,培养出的人才还不能完全符合河南省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

(二)新增专业存在盲目性

高校专业设置要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高校自身的实际情况,通过对产业、行业进行深入的市场调查,进行科学论证。^[2]肖红艳认为湖南省部分高校增设本科专业时缺乏前瞻性,存在一定的盲目性。^[8]尤其是部分新兴本科高校和民办高校,为了片面追求学校的短期利益,未能客观分析学校的专业特色和办学优势,没有充分考虑社会需求,盲目追求学科专业的小而全,甚至跨学科设置专业。河南省新增本科专业覆盖范围广,出现师范类院校新增工学、农学和管理学专业,理工类院校新增人文社科专业等现象。新增专业大多属于工学、管理学、文学,其中会计学、物流管理、工程造价等专业成为热门专业,还有一些社会需求趋于饱和、就业率低的专业。^[2]这些新增专业多为比较成熟的“短、平、快”专业,教学成本较低,而撤销的多为办学成本较高的艺术类专业。

(三)新增专业重复现象严重

王婕认为河南省普通高校专业设置重复,雷同现象严重。^[2]从河南省普通高校新增本科专业来看,新增本科专业涵盖专业门类广,主要集中在工学、管理学和文学等几个专业门类;新增热门专业如会计学、物流管理、工程造价等分布于多所高校,而撤销的专业数量过少,力度不够,导致普通高校的本科专业数量过度膨胀。说明河南省高校专业设置的趋同现象比较严重,许多高校都朝着多科性、综合性的方向发展,部分高校逐渐丧失其原有的办学特色和专业优势。

(四)新增专业的建设任务繁重

近五年河南省有85个新增本科专业,主要分布在新兴本科院校或民办高校,占新增专业总数的73.3%。新兴本科院校或民办高校的学科建设参差不齐,专业基础比较薄弱,办学经费、师资队伍、仪器设备及实验条件等与老牌本科高校相比明显不足,这些高校只有在办学条件等方面不断加以完善和提高,才有望实现该校本科专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目标,否则这些高校无法取得跨越式发展。^[9]

三、对河南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一)政府应逐步落实高校专业设置的自主权
落实高校专业设置的自主权,核心是理顺政府

和学校的关系,明确两者的权利、责任和义务。^[10]根据河南省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国内外高校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教育主管部门要顺应时代潮流,对高校专业设置的管理应由直接管理模式向间接管理模式转变,逐步将专业设置权下放到学校,让各高校根据社会需求和自身办学条件,单独进行专业的设置、调整和改革;政府对专业设置的管理应该由前置性审批逐渐转变为后置性评估,专业目录的作用可由指令性转变为指导性。^[8]教育主管部门可以适当放开民办院校灵活设置本科专业的权利,亦可以在不同地区,选择部分新建本科高校进行试点,取得相应的成功经验后,在充分吸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向全省推广。

(二) 政府应发挥宏观调控功能

专业结构调整与优化是一个动态、持续不断的自我调整过程,没有终点,^[11]政府应充分发挥宏观调控功能。

1. 积极引导高校合理设置专业

政府部门可根据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积极引导高校发展目录外专业以及工科引导性专业,积极设置和建设与河南省支柱产业、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相关的应用型专业,大力发展应用型、复合型专业。

2. 统筹规划全省高校学科专业布局

政府要积极引导高校在一定条件下自行设置符合社会需要与学校发展定位的专业,^[12]不再增设就业红牌专业,对专业总数较多的院校实行专业数量控制,统筹规划全省高校学科专业布局。^[13]对于新增专业,高校应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和专业就业前景,制定科学合理的专业规划;对于就业率较低的特色专业,应积极寻求专业的优化转型。^[2]政府要大力支持和重点扶持具有强烈社会需求和良好发展势头的学科专业,尤其是建设一大批符合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以及智能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等新兴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学科专业,对部分就业率低、重复程度高的学科专业果断进行“关、停、并、转”,^[8]不断优化普通高校的专业布局和专业结构,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

3. 搭建高校专业建设信息共享平台

政府应充分调研,总体把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人才需求变化,引导高校及时设置、调整学科和专业方向,同时充分考虑新建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不同诉求,以调动新建本科院校办学的积极性;^[14]在专业设置的审批上,对新建本科高校和老牌本科高校要区别对待,实行匿名评审制度和淘汰

制度,对不同专业进行动态管理与评估。^[15]政府应搭建全省新建本科院校专业共享平台,为新建本科院校主动调整专业结构,践行错位发展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撑。

政府应重点加强对新兴本科高校和民办本科高校专业设置的调控和引导。部分新兴高校新增专业建设乏力,而民办高校虽然专业设置相对灵活,但从撤销专业数量远多于新增专业的现象就可以看出,民办高校的专业结构和布局已与社会严重脱节,学生就业前景缺乏竞争力。政府应积极引导这类高校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深入调查研究,科学分析论证,科学合理设置专业。

(三) 高校应合理定位,错位发展

高校必须合理定位,按照各自的相对优势和特色错位发展。^[9]王捷提出郑州大学、河南大学专业设置应侧重基础理论学科、国家重点发展学科和具有相对优势的学科,而地方本科高校,尤其是新兴本科高校和民办高校,应积极向应用型大学方向转变,努力培育符合地方经济社会需要的专业人才。^[7]同时高校应坚持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专业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的关系。^[16]普通高校,尤其是新兴本科高校和民办高校,应主动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充分利用学校的办学定位、办学目标和办学条件,制定规范合理的专业建设规划,逐步形成与众不同的专业品牌和优势,打造自己的专业特色和专业优势,在不同领域、方向和层次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够降低同行业之间的竞争,形成有别于其他普通本科高校的差异化优势,并不断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才有助于高校在高等教育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取胜。

(四) 高校应加强内涵建设

高校本科专业调整的目标是优化专业结构,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河南省普通高校,尤其是新兴本科高校和民办高校,更应该在本科专业调整后,努力加强本科专业建设,尤其是新增专业的内涵建设,逐步提高专业建设质量。河南省普通高校只有主动适应新形势,分别从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特色专业建设、教学管理和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着手,不断优化本科专业布局,才能构建符合教育规律、适应社会需求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具有大学科、跨学科概念的新型复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1] 吴玉章,霍正浩,方建群,等.本科专业设置与布局调整

- 探析[J]. 高教研究, 2013, 31(6): 32-35.
- [2] 王婕. 河南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结构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J]. 高教学刊, 2015(15): 132-135.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公布2012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备案或审批结果的通知(教高函[2013]4号)[EB/OL]. [2013-03-29]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moe_1034/s4930/201303/t20130329_150112.html.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公布2013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备案或审批结果的通知(教高函[2014]1号)[EB/OL]. [2014-03-17]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moe_1034/s4930/201403/t20140317_166213.htm.
-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公布2014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备案或审批结果的通知(教高函[2015]4号)[EB/OL]. [2015-03-16]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moe_1034/s4930/201503/t20150316_189371.html.
-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公布201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教高函[2016]2号)[EB/OL]. [2016-02-19]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moe_1034/s4930/201603/t20160304_231794.html.
-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公布2016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教高函[2017]2号)[EB/OL]. [2017-02-19]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moe_1034/s4930/201703/t20170317_299960.html.
- [8] 肖红艳. 湖南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建设的思考: 基于湖南省1999—2008年本科专业增长的分析[J]. 理工高教研究, 2010, 29(4): 39-44.
- [9] 石火学, 林素川, 钟春玲. 福建省本科专业结构优化和调整机制研究[J]. 教育评论, 2016(4): 7-12.
- [10] 肖红艳, 姚落根. 湖南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结构现状及调整研究[J].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 28(4): 5-8.
- [11] 杜才平. 目前我国高校专业设置的现状、问题及其对策[J]. 河北社会科学, 2011(4): 181.
- [12] 刘初生. 湖南省地方本科院校工科类专业结构调整研究[J].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1, 3(12): 44-47.
- [13] 陈爱志. 福建省高校本科专业结构现状及其对策研究[J]. 教育评论, 2015(1): 142-144.
- [14] 许明春, 张君诚, 管强. 福建省新建本科院校专业结构现状、问题及调整策略[J]. 教育评论, 2015(3): 130-133, 146.
- [15] 张红爱, 肖瑛. 政府和高校专业结构调整策略及其启示[J]. 现代大学教育, 2006(2): 91.
- [16] 左清. 高等教育专业布局与省级政府的宏观调控[J]. 现代大学教育, 2003(6): 62-65.

(责任编辑 姚虹)

Thoughts on Speciality Construction of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Henan Province

——Based on Analysis of Undergraduate Speciality Increase in Henan Province from 2012 to 2016

WEI Shi-qian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Xuchang University, Xuchang, Henan 461000, China)

Abstract: The specialities of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Henan province increase fast from 2012 to 2016. Professional types, discipline categories, ownership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The new speciality can not completely meet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t contains the casual construction, repeated construction, big task to speciality construction, and other problems. Government should gradually give the college and university autonomous right of speciality setting, and implement the Macro-control functio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hould reasonably locate, supplementarily develop, and strengthen the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Key words: Henan provinc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graduate speciality; development

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为例

王景丽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大学生创新创业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郑州 450044)

摘要:我国的高等院校尤其是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工作开展时间相对较晚,对于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目前仍处于摸索阶段。本文对应用型本科高校和创新创业教育内涵进行阐述,分析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构建“一二三四”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路径。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5.025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5-0116-05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进入以结构调整、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阶段,一种崭新的教育类型——应用型本科教育应运而生。作为培养应用型、技能型高级人才的基地,应用型高校要积极实施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创新创业人才,使之具备创新思维和创业技能,转变以往陈旧的人才培养理念,由培养“就业者”向培养“企业家”转变。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是一所新升格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学校高度重视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于2015年正式成立金河众创空间,建筑面积2700m²,可同时容纳250名创业者在孵经营,为创业者提供创新创业培训、创业孵化、项目推介、创业指导和政策扶持等一站式创新创业服务。

总体上来看,我国很多高校对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因为种种复杂因素的制约,多数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起步较晚,发展迟缓。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现状及客观存在的问题,对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在课程体系、长效运行机制等方面提出可行性建议,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开展。

一、应用型本科高校与创新创业教育的内涵

(一)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内涵

所谓应用型本科高校,是以本科教育为主,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学科为依托,以应用型专业教育为基础,以人才需求为导向,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高等院校。

应用型高校是高等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面向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一线,承担着培养以技术为基础的应用型人才的重要职责,培养出来的学生应具有开阔的眼界、较前沿的知识体系,较强的实践水平和动手能力,还应具备一定的创新创业能力。因此,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教育基地,应用型本科高校不仅要注重对学生的基本理论、知识技能的培养,同时需要注重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

(二)创新创业教育的内涵

创新创业教育是一种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的教育形式。创新与创业是密不可分的,创新是创业的基础和核心,强调原创性的“推陈出新”,而创业则是创新的重要体现形式,强调把创新的理论变成实践,开创新的事业。

收稿日期:2017-09-30

作者简介:王景丽(1971—),女,河南偃师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及体育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施,有利于高校培养具有开拓精神的创新型人才,有利于培养能将理论转化为技术,进而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应用型高级人才。所以,应用型本科高校的首要任务就是,围绕社会需求和区域产业发展,注重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造就一批既会动脑又能动手,既拥有较高知识水平又具备较强实践技能的人才。

(三)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十三五”规划内涵

2015年,学校明确提出了实现“十三五”规划的“一二三四”工程:围绕“建设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一定支撑作用、在省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应用型本科院校”这一战略目标,促进学校由“专科学校向本科院校、综合型院校向应用型院校”两个转型,推动“教学质量、管理水平、创新创业”三个跃升,实现四个显著增强,即师资队伍素质显著增强、教科研水平显著增强、学生综合能力显著增强、学校发展活力显著增强,确保五年后顺利通过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合格评估。

二、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现状

作为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基地,应用型本科高校已逐渐认识到了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纷纷走上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道路。但由于起步较晚、基础薄弱等种种因素的制约,目前在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发展现状并不理想,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针对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

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针对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工作的研究相对较晚,且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很多高校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或流于形式无实质性内容,或仅仅把创新创业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一部分内容,尚未做到把创新创业教育同各专业教育有机结合,现有的师资、教材、课程体系、教学手段、实践基地等教育资源满足不了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需求。

(二) 尚未形成支持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有效机制

多数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仅作为第二课堂的内容,未纳入到学科建设规划、人才培养目标、质量评价体系之中。部分学校虽已建立一套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方案,但协调机制不畅,导致了人才培养效果不明显,达不到培养目标的相关要求。

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为例,该校虽然成立了大学生创新创业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但创新创业课程

归教学口管理,创新创业竞赛类大赛归属部门较多,有大学生创新创业就业指导中心、教务处、团委等部门管理,北大学城科技园和众创空间的部分管理又受制于后勤管理部门,相互之间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对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激励机制不够系统。

(三) 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与培养方式脱节

当前,很多高校正处于转型发展期,部分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虽然已经定位于“应用型”,但培养方式的调整严重滞后,仍停留在研究型高校阶段。主要表现在:一是重理论、轻实践,缺乏特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能有效接轨,无法满足现代化、差异化、多样化的人才需求;二是人才培养方案中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手段欠缺,部分高校迫于规定只开设了孤立的创业课程,与其他的专业课程衔接不够紧密,且师资有限,大多未经过系统专业的创新创业教育培训。

刚升格为本科高校的郑州工程技术学院,近年来在不断探索创新型人才培养,成立了职业发展和创新创业教育教研室,尝试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但是,在课程体系的开发和建设、创新创业专职教师专业素养提升机制、创新创业学分设置等具体措施还不到位。

三、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 对创新创业教育内涵和价值的认识还不到位

很多刚刚转型的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教育理念仍处于较为感性的“功利主义”阶段,部分高校的就业指导部门甚至学校领导把创新创业教育作为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的一种途径,只是对学生进行简单的技能培训和临毕业前的就业指导,而未从根本上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业思维,更不从学校的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的高度,去探索契合本校实际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方案,导致创新创业教育要么应付差事、盲目跟风,要么急功近利、不切实际,有悖于创新创业教育的基本理念。究其原因是对创新创业教育的内涵和价值的认识不到位。

(二) 创新创业教育资源短缺

与科研型高校相比,应用型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存在严重的师资队伍缺乏、教材选用随意、专项配套资金不足、创新创业场所有限等教育资源短缺问题。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的创新创业教育师资不仅数量上不足,知识结构也较为单一,大多数教师未接触

过企业的实际工作,更无创业实践经历,满足不了创新创业教育的实际需求。其次,现有的创新创业教学用书相对比较混乱,对教材的选用没有结合专业进行,无法按要求实现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目标。另外,实践教学场地和创新创业场所未得到充分利用,开展创新创业的专项配套资金不足也是制约创新创业教育的关键因素。

(三)“协同创新”合作机制有待改善

在协同创新合作方面,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的人才培养方式大致分两种。一是内部协同,指高校内的院系、职能部门之间的合作;二是外部协同,包括兄弟院校之间、高校与行业或企业的协同创新合作,还包括高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学。这两种形式都有其局限性,内部协同的组织较为松散,加之有些学校管理体制不畅,缺乏有效的沟通与交流;外部协同由于信息、需求、利益分配的不对称性,导致各方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工作浮于表面,难以建立深度协同创新合作机制。

(四)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有待改进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于2016年成立了以校级党政一把手为组长,主管校领导为副组长,相关职能部门和院系负责人为成员的创新创业建设委员会,对统筹协调学校的创新创业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在协同创新合作方面,仍存在职能部门之间和院系之间沟通不畅、校企合作涉及创新创业领域少、与行业缺乏深度的协同创新等问题,制约着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开展。

四、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结合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可构建为:“一二三四”模式,即“一个目标”“两轮驱动”“三种能力”“四项改革”。

(一)一个目标

以培养应用型的创新创业人才为目标,使大学生成为具有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的应用型、技能型高级人才。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注重培养政治信念坚定、专业理论扎实、专业技能过硬、综合素养较高、创新创业能力较强的应用型人才。在创新创业体系构建中,加大科技创新团队和科技平台建设力度,重点引进、培养科技团队带头人,在已培育的创新团队和科技平台中重点推出一批研究方向稳定、梯队合理、具有较好发展前景的创新群体。

(二)两轮驱动

强调理论与实践教学两轮并驾齐驱,注重讲授理论知识的同时,通过实习实训、参观学习、模拟比赛,沙盘操练等行之有效的办法,促进学生的专业水平、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齐头并进的发展。在理论教学方面:一是从师资入手,多措并举,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二是从过程入手,建立多方参与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建立教学质量管理机构,健全质量监控制度。建立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制度,对人才培养工作实施全过程监督、指导、考核、评价。改革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把教学、科研、指导学生创新创业、指导学科专业竞赛等纳入教学工作量的计算。在实践教学方面,注重以下工作的提升:创新科技管理体制,优化科技管理和评价机制;壮大科技创新团队,加强科技平台建设;加强产学研合作,提升服务社会能力;加大科技经费投入,培养科技创新骨干。

(三)三种能力

即培养具有专业基础能力、社会实践能力、创新创业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人才。专业基础能力是指相关专业理论知识,在本专业领域具有独立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社会实践能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能将所学专业知识灵活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二是具备良好的沟通和人际交往能力,能很快地融入和适应社会。创新创业能力是指要了解创新创业的相关知识,掌握其规律,培养创新意识,提高创业能力。

(四)四项改革

应用型本科高校要结合本校实际,从机构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保障机制等四个方面大刀阔斧开展教育教学改革。要成立专门机构,逐步完善创新创业教育长效运行机制,优化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合理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参与性、创新性。构建创新创业教育的保障机制,从制度建设、资金保障、评价体系等方面共同营造创新创业教育的良好氛围。

五、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路径

(一)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

积极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主动探索教学新模式,将创新创业课程纳入并作为人才培养方案的重要环节,逐步在教育教学全过程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

1. 理论课程方面

把高校已按规定开设的大学生就业指导、职业

生涯规划等课程内容进行融合,增设创新创业基础课程纳入公共必修课。将创新创业课程与专业课程体系有机结合起来,鼓励开设《管理学原理》《市场营销学》《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等有利于提高大学生创业技能的课程作为选修课。此外,还要充分利用学校网站,开发微课、慕课等在线课程,方便学生随时随地学习。

2. 实践课程方面

一、二年级学生以开展行业、企业认知实践为主,逐步培养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如到企业实地参观、认知实习等;三、四年级学生可以组织开展创新创业大赛、实战训练、学科竞赛、创新创业技能培训、入驻基地进行项目孵化等。

3. 课程讲授方面

可摒弃以往“一个老师讲到底”的现象,尝试模块化教学、专题式授课,每个老师只讲授最为擅长的其中1—3个模块。操作性较强的模块和专题,鼓励聘请有实战经验的行业专家和企业精英到校讲授。

(二) 完善创新创业教育长效运行机制

1. 提高领导重视程度

通过成立并推动校级创新创业建设委员会的运行、定期召开全校性的创新创业工作会议等方法,提高各级领导对创新创业工作的重视程度,协调有关部门加强同各学院的联系沟通,增强主动服务意识,加快提升学校创新创业工作水平。

2. 成立创新创业指导服务专门机构

成立专门机构是创新创业教育长效运行的根本保障。在学校层面,可成立与市场衔接的专门部门,如创新创业管理中心、创新创业指导服务中心、创新创业学院等,负责对外联络、对内协调,统筹全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在院系层面,成立创新创业办公室,与教务、学生工作部门同级,负责落实学校的相关政策,安排部署院系的创新创业工作;在教师层面,成立创新创业教研室,负责全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课程的开发、设计与讲授;在学生层面,成立创新创业协会,激发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内在潜能和主观能动性。

3. 搭建创新创业实践平台

因地制宜地建设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制定规范可行的管理和运行制度,组建专家委员会,对创新创业孵化项目、市场分析及创业计划书等进行评估,提供指导意见;为创业者提供创业培训、政策咨询、小额贷款、税费优惠等咨询服务;建立创业导师制度,由专家团队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帮扶,提高创业成功率。

(三) 构建“校企协同”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

应用型本科高校是以“为区域或行业经济发展服务,培养应用型专门人才”为目标,突出“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为本位”的理念。因此,要本着资源互补、优势互补的原则,充分挖掘高校和企业的优势和潜能,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等领域开展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1. 校企共建教学体系

根据企业需求增设专业课程,开发校企合作教材,让企业参与到该专业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中去,使高校的课程设置与用人单位的需求结合更紧密;邀请企业精英担任专业建设委员会成员,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上给用人单位更多的话语权;实战型较强的专业课程,交由行业专家和企业精英讲授,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水平。

2. 校企共同实施培养过程

鼓励企业通过订单式培养、共建实验实训设备、派驻实习实训指导教师等形式,与高校共同实施培养方案。让企业为高校搭建实习平台,让高校成为企业的技术研发与人才培养基地,双方共同打造合作共赢的校企合作平台,全方位提高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

(四) 搭建创新创业教育的保障机制

1. 加强领导,建立院系联动机制

创新创业教育必须加强领导,建立以学校发展为最终目标,学校统筹、学院推动、全员参与的工作机制。建立以创业部门为主,各学院书记、院长责任共担,及时组织力量,完善工作手段,通力合作,才能形成了全校上下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具体来说,在校级层面,要成立创新创业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协调和管理我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在联动机制层面,建立以大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牵头,学工、教务、团委、科研、财务、国资、人事、招生、后勤等部门齐抓共管,学院积极参与的创新创业工作机制。

2. 重视师资建设机制

当前,大多数高校严重缺乏既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又有一定的实践经历的师资,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师资力量薄弱。因此,着力构建一支以专任教师为主体,企业精英、成功创业人士为补充的创新创业师资队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此外,还要定期组织教师到企业实地参观、参加创新创业培训,引导自主学习,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3. 形成资金保障机制

学校每年投入专项资金开展各类学生创新创业

活动。可汇聚学校资源和社会资本,设立“大学生创新创业行动基金”“大学生创新实验基金”“自主创业资助基金”等创新创业基金,也可联合银行开展小额贷款,为大学生创业提供资金支持。

4. 加强制度建设

为了指导和规范创新创业的具体管理工作,学校要制定与创新创业工作相关的奖惩制度、基金管理办法、学分管理办法等相关管理制度。在制度健全的基础上,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制度执行监督,确保各项政策落地生根。

5. 优化评价机制

构建多维视角的融督导评价、同行评价、学生评价、社会评价等为一体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评价体系。评价指标应结合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目标来合理设定;评价内容上,应重点关注教学内容、方法、手段和质量;评价主体上,强调全员参与;评价手段

上,多措并举,综合运用期末考试、双创竞赛、日常训练等评价手段。

参考文献:

[1] 张显悦, 郝婷婷. 应用型人才培养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路径[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5(1).
[2] 章刘成. 应用型本科院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及实践[J]. 质量探索, 2016(2).
[3] 周桂瑾, 俞林. 应用型本科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水平提升策略研究[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5(32).
[4] 刘有余, 刁杰胜. 应用型大学生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J]. 宜春学院学报, 2015(5).
[5] 程宝华. 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研究[D].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15.

(责任编辑 许峻)

Study on Training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alent
in Application – orien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ANG Jing – li

(Employment Guidance Center,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in application – orien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tarted not very early in our country.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model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This thesis describes the connot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and its problems; puts forwards the construction of “one, two, three, fou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alent training model; makes clear implementation path of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for application – orien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application – orien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talent developing model

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探析

向媛秀

(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南宁 530007)

摘要:将人口大国发展为人口强国,助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实施,高等教育尤其是以应用型教育为主的高等教育肩负着十分重要的责任和使命。然而应用型大学概念的提出及推进发展刚起步不久,对其办学规律的认识把握还不够准,还受着传统高等教育教学思想的禁锢,其办学规模和发展速度、教学改革创新和办学效益远不能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必须加强对应用型大学本质属性的认识,解放思想,打破常规,以改革和创新精神大力全面发展应用型大学。

关键词:应用型;高等教育;改革建设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5.026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5-0121-04

应用型本科高校对中国高等教育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事物,也具有全新的概念和定位,全新的内涵和外延。在中国高等教育处于大发展、大提升,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节点的历史时期,举办应用型本科高校是历史的必然,是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办好应用型本科高校任重道远,时不我待。本文就从应用型大学的历史性认识、发展应用型大学的必要性、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等四个方面进行阐释。

一、对应用型大学的历史性认识

2015年10月21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从国家层面做出了加快推进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顶层设计。之前,教育部在有关应用型大学的政策论述中,也明确要求将600所左右的普通本科转变为应用型大学,转型的大学正好占到普通本科高校总数的50%左右。我国高校类型的传统定位是:教学型、教学科研型、研究教学型和研究型。从这种划分来看,教学型本科高校可能更接近应用型本科一些,但实际上其定位并不十分清晰,在培养目标上存在着单一化、表述过于笼统及与其它类型高校同质化

等问题。这类教学型高校大多具有建校时间长、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烙印、且多为省级以上政府或行业单位办学等特点,与新常态下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的要求和目标还有一定距离。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萌芽起因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所带来的人才短缺。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在我国东南沿海及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率先出现了一批由中心城市举办的新型地方性大学(专科性质),这类学校后来逐渐发展到110多所。随着自身办学实力的增强以及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110多所地方高校中的大多数都已升格为本科学校,如广州大学、青岛大学、济南大学等,他们具有职业性、地方性、实用性等方面的特点。这是我国现代最早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学校,即现在所提应用型本科高校的雏形,其间不过三十多年的时间,相比于我国动辄百余年、数十年办学历史的普通高等教育来说,高等职业教育(应用型本科高校的雏形)的办学历史还比较短,对办学规律、办学内涵等方面认识还不够。但是,这类高校所承担的人才培养任务却是社会急需完成的,也是十分繁重的。从形势发展来看,未来的应用型本科高

收稿日期:2017-08-13

作者简介:向媛秀(1974—),女,湖南邵阳人,硕士,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工商管理、区域经济。

校应包含全部地方本科高校和部分原教学型普通本科高校。

二、发展应用型大学的必要性

(一)发展应用型大学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2014)》提出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着许多不足,如:学科专业设置优化不够,成果转化不够;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不高,创新人才培养不够;质量意识相对薄弱,绩效评价不高;学生创新创业总体比较小,就业与专业关联度不强等等。《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也提出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人才供给与需求关系深刻变化,面对经济结构深刻调整、产业升级加快步伐、社会文化建设不断推进特别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高等教育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同质化倾向严重,毕业生就业难和就业质量低的问题仍未有效缓解,生产服务一线紧缺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人才培养结构和质量尚不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要求”的问题。

我国高校的转型发展,实质上也是一种高等教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到,从当前经济发展现实出发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的是对生产者一边进行调整,通过这种调整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包括制度改革、创新创业、对外开放等诸多内容。实际上就是改革当前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全面释放生产力的潜在能量,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经过十余年的高速发展,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后,高校同质性发展造成了高等教育结构不合理,学科专业结构千篇一律以及设置的不够科学导致了人才培养质量和人才培养目标远远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局面。

教育事业要发展,必须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形成高校发展的新常态,要进行大刀阔斧式的结构调整,形成特色鲜明、各具活力的多层次高校群体。

(二)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必须重视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培养

高度重视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培养,是经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21世纪的金融危机重挫各国的虚拟经济,而以高水平的技术创新为本的实体经济国家如德国、瑞士、荷兰、芬兰、奥地利等则应对自如,在其背后是合

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和完整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支持,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应用技术大学所提供的人才资源和技术服务的支撑,应用技术大学对实体经济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欧洲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实行“二元”包括综合性大学和应用技术大学,德国高等学校总数为421所,包括108所综合性大学,210所应用技术大学。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数量在欧洲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中占绝大部分。目前,欧洲发达国家应用技术型人才与学术型人才培养的比例一般在8:2,这与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的结构是相吻合的,而应用型大学是这类人才培养的重要机构。

三、应用型大学的内涵和实质

我国未来的应用型大学将包括地方性本科高校和教学型普通高校,目前,地方性本科高校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提升内涵的问题,教学型普通本科高校则面临着如何突出应用型特点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应用型本科学校的办学定位、指导思想、人才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建立清晰明了的认识和界定,尤其是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具体实施者、政府主管部门、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之间,要形成统一的认识和界定。应用型本科高校教育在诸多方面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必须以解放的思想、创新的思维、开拓的视野去厘清应用型本科高校教育的内涵和外延。

(一)对高等教育学科类型的认识

对高校的分类有多种标准,譬如国际上通常用研究型、应用型、技术型来划分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制定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是以教学计划为基础对教育的等级进行分类的,它把整个教育系统分为6个等级,涵盖了中专、专科、本科、研究生等多个层次,其中第5级又分为A、B两类:第5级中的5A级,就相当于普通高等教育,其课程是以理论性为主的;5B级的课程体系的内容是面向实际的,适应具体职业需要的实用性技术的知识体系,这就是应用性技术教育。由此可见,高等教育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普通高等教育,另一类是应用性技术教育,而且这两类教育都可以举办专科、本科或硕士这几种不同层次的教育。正是高校分类标准的多样性,导致了高校办学类型的多样化,适应了社会人才结构的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

(二)对应用型大学教育价值取向的认识

应用型大学教育价值的本质就是应用型技术大学教育价值主体之间的一种需要的满足与被满足的

关系。因为应用性教育活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创造活动,所以,应用性教育的价值在应用教育的目的演化上表现得尤其显著。也就是说,应用性教育就是一种能力本位教育。能力本位的职业教育是培养学生具有某一职业应备能力的教育,它要求先分析出作为一位成功的工作人员应具备的能力,然后再根据这种分析所得的“应备能力”来设计职业教育课程及教学,学生接受这种课程和教学而且必须真正获得这种“应备能力”后方能毕业。要把握能力本位教育的基本理念,首先必须理解能力本位教育的能力观,因为,对能力本位教育的理解往往源于对其能力观的理解。用英语表述为“competency”,其含义是完成某具体任务的技能、态度,而知识是能力的基础,无知必然无能。

四、我国应用型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应用型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为经济建设培养了不少人才。然而,总体上说,我国的应用型教育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应用型教育的发展不适应经济改革的需要。第一,应用型教育基本上还停留在“应试教育”上,注重学历化教育,不注重能力培养。第二,应用型教育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目前,我国应用型教育绝大多数属于公立性质。在办学类型上,基本上是学校教育,而企业教育、社会教育滞后,应用教育的社会化程度低;在办学层次上,较高层次的应用型教育学校较少,满足不了学生、家长追求高学历的愿望。第三,没有形成系统的推动应用性教育广泛、持久服务社会的机制。教育培训经费投入不足,生产实习条件差。尽管近几年来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增加了投入,但是就应用教育的整体而言,投入是不够的,办学条件相对较差。第四,师资队伍的问题比较突出。没有高素质的教师,不可能有高水平的应用型教育的专门人才。随着我国应用型教育规模的扩大,现在应用型教育的师资结构、总量和质量都与现实需求不相适应。

五、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应用型高校建设

针对我国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依据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精神,我国应用性高等教育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和发展:

(一)转变观念,加大投入

要加大对应用型高等教育的投入,加强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基础建设,改善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办学条件,其中包括提高现代教育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

推进应用型高等教育教学的现代化。如前文所述,这次改革将有 600 所地方普通高校向应用型转变,而其中不足三分之一的高校具备应用型本科高校的雏形,其中多于三分之二还是传统的教学型学校。因此,必须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改造和提升。虽然国家和各地方政府对应用型高校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投入也越来越大,但是比起教学科研型或科研型高等教育而言,差距仍然相当大。笔者认为,这是一个思想观念的问题。所以,应用型高等教育教育的现代化不仅是设备、技术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应用型高等教育教育的办学思想和管理的现代化。

(二)找准定位,有的放矢

选准应用型教育定位,是保障应用型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核心所在。培养哪个层次的人才,这是应用型高等教育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应用型教育主要是以应用为着力点、以就业为出发点的教育而不是教学科研型教育,发展应用型高等教育必须与繁荣经济、促进就业、消除贫困紧密结合,而不能无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市场对毕业生需要不需要,企业对毕业生欢迎不欢迎,经济社会对毕业生满意不满意,既是评价应用型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尺度,也是衡量职业教育改革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如果我们的应用型高等教育只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技能,办成普通教学型、研究型大学的另一种形式,那么培养出来的学生就很难适应社会的需要,应用型高等教育也势必陷入发展的困境。

(三)加强融合,开门办学

加大应用型高校教育的外延性和联合互补性,实行“校校合作、校企合作、校政合作、工学结合”,与行业企业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需求对接,争取地方政府、行业企业支持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促进应用型教育融入经济社会、促进创新创业的根本途径。中国制造 2025、“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区域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社会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和发展,亟需应用型高等教育的深度融入和重要作用的发挥。应用型高等教育只有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才能更好地培养社会急需人才,而应用型高等教育要真正融入经济社会,必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四)以人为本,双师双能

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双师双能型”队伍是决定应用型高等教育发展成败的关键。教师素质和技能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应用型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工学结合”必须有足够数量和水平的“双师双能

型”教师的保障。随着企业对技能型人才要求的提高,传统单一的知识型、理论型教师已越来越不能适应职业教育的发展。一是建立激励机制,加大力度,通过继续教育、走入行业企业等措施促进教师队伍向“双师双能型”转化;二是调整高校教师人才引进标准,争取“双师双能型”教师的引进,形成新进青年教师到校企合作企业先行工作一年的制度;三是加强与相关校企合作行业企业、单位部门的教学深度融合,形成相关技术人才走进校园指导实践的机制。

(五)提升内涵,以德化人

加强人文素养和职业道德教育,是职业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人文教育对人的综合素质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中国应用型高等教育中,应特别注意两种极端倾向:一种是把应用型高等教育办成普通教育的另一种形式,换汤不换药;另一种是单纯强调“技能”,把职业训练与素质培养割裂开来,与创新创业割裂开来。前者是我们已经意识到并且致力于纠正的,而后者还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关注。事实上,无论是普通教育还是应用型高等教育教育,都不应忽视人文教育。

总之,应用型高等教育对提高人力资源素质有着重要作用,我国必须加强应用型高等教育建设,以迎接新的经济时代对人力资源的挑战,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提高学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才能促进我国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才能保证“中国梦”的顺利实现。

参考文献:

[1]孔繁敏.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实证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2]黄达人.大学的治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3]郝克明,汪永铨.中国高等教育结构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
[4]黄达人.准确理解本科应用转型的内涵[N].中国青年报,2014-06-16.
[5]孟庆国.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实践与政策研究[N].中国教育报,2014-08-13.
[6]古天龙,魏银霞.教学型高校培养目标定位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09(1).

(责任编辑 许峻)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pplication – oriented Universities

XIANG Yuan – xiu

(Guangxi Cadres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ning 530007,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transform a great population state into a human resource power and achieve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higher education, especially application – oriented education, bears a very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However, the concept of application – oriented university has been put forward for only a short time. Influenced by the ideas of traditional higher education, the regulations of running such a university have not been grasped thoroughly and accurately. Therefore, neither the size and developmental speed nor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and the benefit of running such a university can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or a region. Thus we should reinforce the knowledge of the nature of application – oriented university, free our minds and break the routines, and develop the application – oriented university thoroughly in an innovative way.

Key words:application – oriented; higher educa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微时代”下高校辅导员 在学生突发事件中的应对机制研究

孙 静,陈美琦

(重庆三峡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404100)

摘 要:辅导员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线人员,是学校与学生紧密联系的纽带,在应对学生突发事件时发挥主力军作用。“微时代”的到来对高校辅导员处理学生突发事件提出了新要求。本文通过论述高校学生突发事件的内涵以及“微时代”下高校学生突发事件的新特征,进一步分析辅导员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在“微时代”下辅导员应对突发事件的机制策略。

关键词:“微时代”;高校辅导员;学生突发事件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5.027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5-0125-04

当前,越来越多的新兴媒体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从微博、微信到现在流行的微电影、微小说等等,一系列的新兴“微”事物逐步登上了互联网的大舞台。随着社会转型和高校环境的日益开放,网络渗透到高校学生的各个方面,加之现在大学生个性突出,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强,使得学校在日常管理和发展中面临诸多不可控因素。尤其是“微时代”的来临受到了青年大学生的青睐,并对学生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产生深远影响,在此互联网背景下发生的一系列学生突发事件,均能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因此,有必要对“微时代”下高校辅导员应对学生突发事件的机制进行研究。

一、高校学生突发事件内涵

高校突发事件一般是指发生在校园内或者与高校成员相关的,由于自然的事故、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原因诱发的,对学校的正常秩序、安全稳定造成一定影响的事件。高校突发事件有多种类型,主要包括:校园安全事故、校园公共卫生事件、社会政治类事件和自然灾害事件等。本文中所指的高校突发事件主要指高校学生突发事件。在高校,一旦学生发生突发事件,往往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并产生巨大反响。因此,维护高校稳定也是社会稳定工作

的重点。^[1]

二、“微时代”下学生突发事件的特点

“微时代”下,新型交流软件的相继出现,使得高校突发事件既具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主要特征如下:

(一)参与主体多样化

“微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存在于学生生活的各个方面,高校一旦发生危机事件,网络舆论就会贯穿整个过程。高校突发事件参与主体多样化的突出表现还在于学生在网络空间的虚拟身份,他们可能以虚拟身份发布和传播信息,并“直播”事故发生现场,给危机事件的处理带来很大困难。

(二)传播速度快

能够及时快速传播信息是互联网的最大特点。高校突发事件发生后,只需短暂的几秒钟互联网就能将信息传播出去,信息传播的速度极快。如果高校管理者不能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就不利于突发事件的处理和舆情监测。加之现代大学生善于利用新媒体和自媒体直播、转发和评论危机事件,可能造成事故态势急剧扩散,负面消息泛化,会带来放大效应。^[2-3]

(三)影响范围广

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交流是一种即时互动的快速

收稿日期:2017-09-12

基金项目:重庆三峡学院2017年度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专项研究项目(17djszzd10)

作者简介:孙静(1988—),女,河南商丘人,硕士,重庆三峡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教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信息传播。高校突发事件一旦发生,信息很容易在学生群体中迅速传播,甚至波及到同一城市乃至全国各地的兄弟院校,即使突发事件得到了有效控制,但其负面影响仍可能在其他高校存在,造成影响的持久性及范围的扩大化。^[1]

(四)控制难度大

“微时代”下,高校控制突发事件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于互联网信息传播即时快速、途径多、传播速度快,导致高校处理突发事件的难度大大增加;二是高校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发生危机事件的隐患无处不在,事件发生的随机性也给处理和控制危机事件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三是高校一旦发生规模性的突发事件,由于矛盾众多和庞大的网民体系,辅导员不能很好地把握舆情,大大增加了学校对危机事件的控制难度。

三、高校辅导员应对突发事件存在的问题

学生突发事件的解决是个综合性的难题,其影响因素包括:事件本身的复杂性、紧急性;高校辅导员在应对学生突发事件问题上自身掌握的理论以及实践能力的局限性;事件主体的不配合性;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不完善性等。辅导员自身综合素质的不足势必会影响到其对学生突发事件的处理效果。

(一)辅导员对突发事件的预防应急能力不足

高校学生突发事件发生频率低,但是一旦发生后后果不堪设想,防患于未然是最好的办法。目前高校辅导员普遍年轻化,经验不足,缺乏网络舆情相关信息,洞察力不足,对潜在的危机缺乏高敏感性,对突发事件苗头不能进行准确判断分析,在校园网络舆情工作中容易处于被动地位,甚至错失良机。大学生“网络大军”个性较强,思想活跃,对于各类信息的鉴别能力极为缺乏,容易被虚假信息蒙蔽双眼。高校辅导员在学生工作的第一线,要多和学生接触,正确引导,提升危机舆情的研判力。

(二)辅导员缺乏应对突发事件的相关知识和技能

辅导员是学校和学生之间联系的纽带,对于处理突发事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辅导员在面对学生突发事件时需要有关理论来引导其解决问题。但是现实情况是很多辅导员缺乏相关的理论知识,即便拥有理论知识,在紧急情况下能把这些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技能操作却又是一个问题。很多年轻辅导员缺乏相关工作经验和必要的培训且对网络舆情认识不足,难以有效运用网络与管理网络,^[4]当学生突发事件发生后容易惊慌失措或不能合理运用

应急理论化解矛盾,甚至导致事态恶化。

(三)辅导员应对突发事件的恢复能力不足

在处理突发事件的最后阶段,辅导员担负着大量的“扫尾”工作。有的辅导员以突发事件前期处理工作结束作为整个事件完结的标志而忽略了对相关学生进行必要的心理干预和疏导,忽视操控舆论方向和开展教育工作等善后恢复事项。^[5]突发事件会给学生当事人和参与学生造成一定的心理影响,如果辅导员没有及时对学生当事人进行必要的心理干预和疏导,在“微时代”下,网络的聚合效应可以将一件小事瞬间放大成一件大事,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发酵成舆情。^[6]有时高校辅导员没有进一步操控舆论方向,导致旧有的突发事件刚结束又引发新的事件,不仅损害学校名誉,而且扰乱学校秩序。当校园突发安全事件前期处理工作结束后,部分辅导员没有趁热打铁对其他学生进行校园安全教育,致使学生对此认识不足,不能有效预防同类事故发生。

四、高校辅导员应对突发事件的机制研究

高校一旦发生大学生危机事件,学校必须紧急响应,尽快解决。辅导员往往担负着处理学生突发事件的第一责任人,因此建立完善的应对突发事件的机制,对高校辅导员至关重要。“微时代”下,在突发事件的预防应急上,辅导员要有效利用网络舆情信息监督系统收集、分析学生安全信息并进行必要的干预;在突发事件发生后,辅导员要以自身掌握的理论 and 技能为基础,争取学生积极配合,多方联动,共同处理突发事件;在突发事件处理后期,辅导员要利用专业知识对学生进行心理干预和疏导,控制好网络舆情,并开展事发后的学生教育工作。

高校学生突发事件处理相关工作机制的构建如图1所示。

(一)设立预防应急机制

校园突发事件的发生防不胜防,对于高校辅导员来说,对学生状况应具有高度的敏锐性和警惕性,提前建立一套相对完备、运转协调的预警机制,在突发事件尚处于潜伏期时就能够预防控制,并制订应对措施,力争将危机消灭于萌芽状态。

“微时代”下,要建立有效的预防应急机制,就必须构建起全方位多主体的网络舆情信息监督系统,使高校辅导员能够及时获得相关信息,以便尽快采取应急预案,做到全方位、多主体以适当的方式掌控事件发展趋势。全方位指的是网络舆情信息监督系统必须对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等多个方面进行管理,以掌握相关学生较为全面的信息;多主体指的是充当安全信息情报员的学生干部及其他学生主

体和QQ、微信、微博、论坛等网络媒介主体。这些主体扩大了辅导员了解学生安全信息的来源渠道,有利于辅导员更好地监督和掌握学生日常动态。辅导员在日常工作中还要善于注意有关学生思想、学

习、生活的相关信息,通过走寝室、进课堂等方式掌握学生发展规律,了解学生在心理、就业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遇到异常、特殊问题,要根据预警机制分析处理,把预警和防范意识提升到战略高度。^[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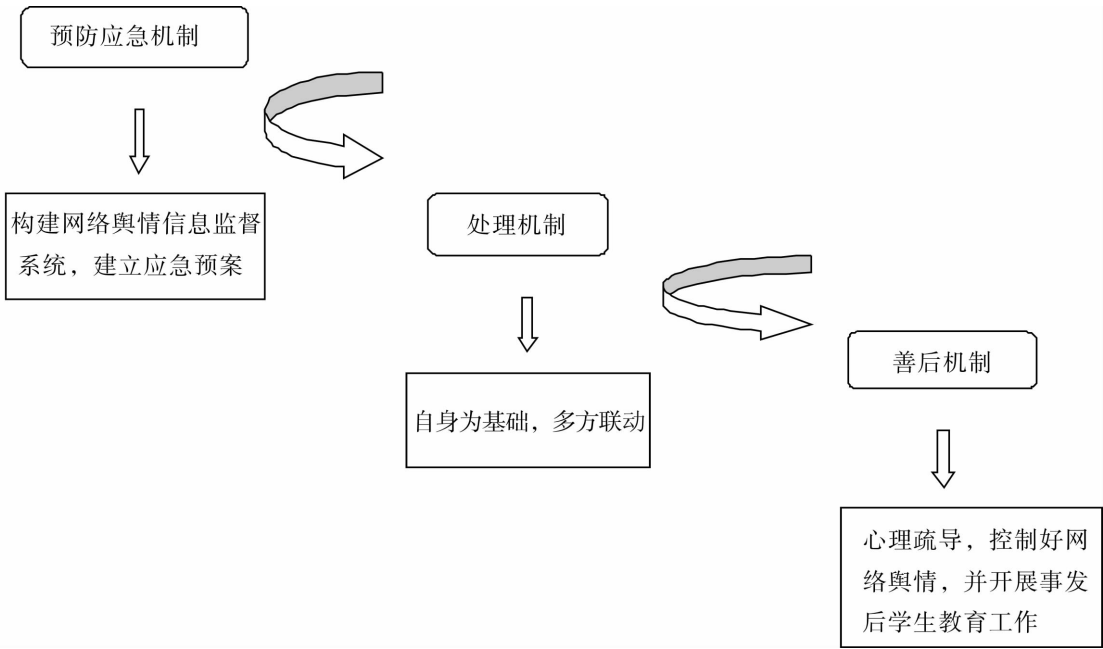


图1 突发事件处理工作机制

(二) 构建危机处理机制

高校辅导员是学校与学生联系的桥梁和纽带,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对上要向上级组织汇报有关学生工作的情况,对下要通知学生有关学校的相关政策措施,规范学生言论和行为,指导学生干部控制好局面,正确引导舆论方向。突发事件发生后辅导员要以自身掌握的理论和实践技能为基础,多方联动共同处理。

1.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控制事态蔓延

学生发生突发事件,辅导员必须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控制局势,如果遇到威胁学生生命安全的突发事件,要本着生命至上、保护学生的原则,视情况拨打110、119或120请求救援,及时挽救学生生命。

2. 快速了解信息,及时上报领导

处理危机事件的其中一个重要步骤就是上报信息。遇到突发事件,有时辅导员的处理方式、能力和水平有很大的局限性,必须第一时间将信息上报给有关领导,让领导了解真实情况,并协调各个部门做好配合,才能更加全面有效地处理学生突发事件。^[8]

3. 联系学生家长,争取支持配合

家校互动是化解危机事件的长效机制。一旦学

生发生事故,辅导员不仅要按应急预案及时处理,还要及时联系家长,并向家长说明情况,表达学校对学生的关心和对事故的高度重视,争取得到家长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共同做好危机事件的相关处理工作。

4. 做好舆情监测,引导舆论正面传播

“微时代”下,大学生大多通过微博、微信、QQ、BBS论坛等多种网络渠道获取信息,辅导员应全面掌握学生的交流方式,充分发挥学生干部和党员以及信息员的力量,主动参与,积极应对。可以有组织有目的利用网络进行讨论,及时跟帖澄清事实,以便正确引导学生言论,并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做好主题教育等相关工作。

(三) 加强善后恢复机制

善后恢复是辅导员应对突发事件的延续,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辅导员要提高突发事件善后恢复意识,深刻认识到处理突发事件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善后恢复。辅导员要对在事件中受到影响的学生进行心理疏导,根据突发事件性质合理选择“一对一”或“一对多”等形式开展工作,驱散突发事件可能给他们造成的心理阴影。

第二,“微时代”下,辅导员需利用网络舆情信

息监督系统持续关注校园网络舆情现状,对不良信息加以规范,以免负面网络舆情再次出现而导致同样的恶性结果。

第三,辅导员还需对本次突发事件进行反思总结,分析原因,找到突发事件处理过程中的薄弱环节,总结经验教训,并将处理方案和处理过程整理归档,这样更有助于提高辅导员预防和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第四,开展主题教育活动。辅导员要抓住契机,以本次突发事件为例,通过班会以及班级 QQ 交流群、微信、微博等多种网络渠道在学生中开展危机意识、爱国主义、心理健康、科学等主题安全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培养大学生科学理性看待事物的能力。

五、结语

高校学生突发事件的发生影响校园和社会的和谐稳定。辅导员作为高校学生工作的组织者、管理者和指导者,是应对处理突发事件的主力军。在“微时代”下,防范及处理危机事件,要求辅导员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本着“防治结合、重在预防、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运用新媒体资源,守住网络阵地,形成正面的处理危机舆情的主流舆论强势,有计

划、有方向、有目标地开展工作,减缓消极影响,维护高校的正常教学秩序,确保社会的安全稳定。

参考文献:

[1] 方小英. 辅导员在高校突发事件中的角色定位及对策研究[J]. 管理观察,2017(9):120-121.

[2] 安莉丽.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突发事件预警机制研究[D].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2013.

[3] 赵敬东. 自媒体环境下高校辅导员应对危机事件防范机制研究[J]. 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31(19):250-252.

[4] 黄燕. 网络环境下研究生辅导员应对突发事件的职业能力提升[J]. 上海管理科学,2014(2):101-104.

[5] 刘娟 王欣楠. 提升高校辅导员校园突发事件危机处理能力的研究[J]. 现代交际,2016(5):133-134.

[6] 高德毅. 微时代危应对:高校舆情引导的变革之道[J]. 思想教育研究,2013(7):8-10.

[7] 高军,李绍龙. 高校辅导员预控学生突发事件的长效机制研究[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13,31(9):56-58.

[8] 林佩云,钟向阳,杨利江. 高校辅导员应对突发事件的思路与方法探析[J]. 教育与职业,2009(35):166-167.

(责任编辑 姚虹)

Research on the Coping Mechanism of College Counselors
in Student Emergencies Under the “Micro Era”

SUN Jing, CHEN Mei - qi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4100, China)

Abstract: The counselors, who are a link between schools and students, are the front - line staff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university, they play the main role in dealing with the emergencies of students. The arrival of “Micro Era” ha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college counselors to deal with unexpected incidents. In this paper, the connotation and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 emergencies under the “Micro Era” are discusse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emergency of the counselor are also further analyzed. Therefore, the mechanism strategy of counselors to deal with the emergencies is put forward under the “Micro Era”.

Key words: “Micro Era”; college counselor; student emergency